

高承勇案：踏勘白银现场

2016.9.19
2016年第38期
www.lifeweek.com.cn

三
耳关

生活周刊

北京搬离北京 超级首都的解决之道



9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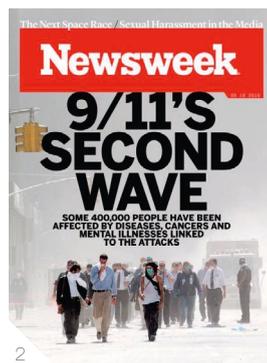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明镜》(德国)2016.9.10

默克尔的时代要终结了吗？

默克尔的移民政策和欧元政策都引来了不少反对声，其中新兴的右翼民粹党派 AfD（德国选择党）的迅速崛起倍受关注。另一方面，保守派也在呼吁默克尔调整方向。默克尔已经对移民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如东欧方向关闭巴尔干半岛某些线路以及控制土耳其难民涌入，但这些举措都无法从本质上改变移民困境。默克尔会离支持她的民众越来越远吗？



1 / 《旁观者》(英国)2016.9.10

比预期的好

那些认为英国脱欧后会迎来经济大衰退的论断好像在面临现实的挑战。英镑与股市的低落似乎只会是一时之象，多项经济数据表明，公投结果给英国经济造成的震撼与冲击正在平复。楼市趋于平稳，暴跌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开始上扬，预测中的金融危机没有出现，央行的降息措施也发挥了作用……也许这意味着，渺茫与灾祸并不等同。

3 / 《经济学家》(英国)2016.9.10

政治谎言艺术

在社交媒体发达的当下，我们已进入一个危险的“后真相政治”的时代。过去的政治谎言是为了让人们的世界产生错误的观念，新型谎言则是为了增强偏见。特朗普口无遮拦的政治谎言就是其中的典型。在碎片化信息横飞的社交网络中，这种政治谎言更加被放大，让社会失去了“自我纠偏”的能力，久而久之也会加剧社会组织间的孤立与信任缺失。

2 / 《新闻周刊》(美国)2016.9.16

15年之后

“9·11”事件过去了15年，有统计数据显示，已有5441名相关人士被确诊罹患至少一种癌症，其中多数人是当年参与救援与清洁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部分是生活工作在世贸中心附近的人们。大楼崩塌所产生的致癌污染物是诱因。还有更多人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疾病折磨，呼吸系统与消化器官病变是最常见的病例，精神创伤亦犹在。

4 / 《纽约时报杂志》(美国)2016.9.10

美国高中问题

当孩子在学校惹了麻烦，传统的训导方式往往会引出更大矛盾，美国高中生总是在身体力行改变着教育问题中的各种现实。据统计，美国高中生里有8%的人数确认自己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目前美国的包容度可以让他们正视自己的情感并健康发展。互联网是美国高中生释放自己的一个窗口，YouTube提供了巨大空间以展示自己。



P32 封面故事

超级首都的解决之道

北京搬离北京

- 36 跨越单中心，超级首都演变史
- 46 成为城市副中心，通州状态
- 54 梁陈方案，历史与现实
- 62 东京：超级首都的聚与散
- 76 华盛顿：特区之“特”
- 80 首尔：“迁都”之困



P146 特别报道：时空交错里的片断高承勇

特别报道

- 时空交错里的片断高承勇 84
豺狼的日子：白银案现场寻访 94

社会

- 时事：杜特尔特，强人当道 106

经济

- 市场分析：交叉持股新浪潮 104
商业：“大棕熊”昭示斯柯达雄心 114

文化

- 艺术：藤本壮介的“脚手架” 128
戏剧：老斯卡拉剧院的《吉赛尔》 134
电影：拉夫·迪亚兹和他的纯粹电影 138
电影：《追凶者也》，曹保平的黑色幽默 140
设计：透明未来 144
科技：谁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 148
思想：乔姆斯基及其批评者 158
书评：杰斐逊和想象的国度 160

- 书与人：世界如此美好，我们连一半都未曾理解 162

专栏

- 邢海洋：楼面价“悬壶” 18
苗千：一场有关上帝的赌局 152
袁越：实践是检验疗效的唯一标准 154
薛巍：城市中的行人都在去向何方？ 155
张斌：活下去的勇气 156
宋晓军：朝鲜核问题有可能“长期化” 157
朱伟：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¹⁾ 166

(本期绘画：张曦)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3
读者来信	10	生活圆桌	24
天下	12	好东西	28
理财与消费	20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22		

2016年第38期，总第904期，2016年9月19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整容，制造完美自我

拼颜值的社会，颜值高意味着机会多，早有一众敏锐投资客由传统服务业转向整容业。有研究预测，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排名第三的整容大国，预计2019年市场规模将达到8000亿元。需求真有这么大？不妨看看身边。我单位上百名女员工，整出一张美脸儿，几乎人人有兴趣，真行动的四五成。让我吃惊的是，有20多岁的漂亮姑娘，已经开始注射瘦脸针和玻尿酸，每年花费数万元，赚的工资不够美容。整容由医疗转向美容，市场表现超旺盛。“让人生更完美”无可厚非，只关心心理是否健康、手段与度是否适当。这期文章让我至少明白：整容医生也会拒绝“网红脸”，时尚领袖秉持个性化审美，韩国微整形逐渐强过手术刀……这些流行趋势有助于我们做判断，做一个有自信的人终归还得有正确观念的引导。

上海 柳芳菲

风雨阁老坟

我的老家在河南邓州城西一个乡村。小时候去邓州，坐在车里远远望见城郊有两通大碑，近望碑下还有石龟座。觉得好奇问家长，家长说那是阁老坟。想去看看，却一直没有机会。

大学期间喜欢地方历史和文化，特意查阅明史和各种文献资料。李阁老即李贤（1408～1466），字原德，明朝邓州人，现今为邓州市孟楼镇长乐岭村。他1433年考中进士，后一直在朝中任职，曾任内阁首辅，经历了宣宗、英宗、代宗、英宗、宪宗五朝四位皇帝，人称五朝元老。从政30余年，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为明朝一代贤相。他还是明清以来在京任职级别最高的南阳人，去世后谥号“文达”，人称李文达或李阁老。民间传说，当时皇帝赠封李贤上三代，他的曾祖父李宽甫、祖父李威、父亲李升都赠封重要官职。

李贤去世后葬于邓州刁河北岸白落堰，现在位置是龙堰乡姚营村阁老坟自然村。其曾祖父和祖父葬于孟楼长乐岭附近，父亲死后葬于邓州城西解放村，这三处墓地在邓州都被称为阁老坟。据地方史志记载，在这几处阁老坟中李贤墓是规模最大的，不仅有高大封土堆、围墙，而且墓前还有成对石人、石马、石羊等，但这些遗迹大都在1949年以后被破坏。目前南阳市博物馆尚存有李贤墓前石马一对，在田间能见到的遗迹听说只有李贤父亲李升墓前两块碑刻。

有一次，我去邓州考察古迹，无意间得知一个信息：李贤墓碑刻在一座石桥下面。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随即找了两位向导驱车前去看个究竟。出邓州城向南约5公里，我们先到了阁老坟村，在村民指点下找到李贤墓原址。如今这里已成为村民住宅区，周围全是成排民房。听说几十年前有村民在原址还发现过金坠等文物，上面镶着各

色宝石，异常精美，现收藏在文物部门。村民们感叹：要是阁老坟保存到到现在不知道还能发现多少古物哩！

随后在该村邻近的刁河石桥上找到两块碑刻，顾不上桥下有水，我立即脱掉鞋子挽起裤腿下桥观察。遗憾的是这两块碑刻被当作桥面石，被一层厚厚水泥覆盖，无法看到碑刻的具体内容，只是从碑上局部文字中得知这两块碑刻为李贤墓碑刻。看完这两块碑刻，我提议去看看另外一个阁老坟，两位向导带我来到邓州城郊，在一片庄稼地里找到李贤父亲李升墓前两块并行而立的碑刻。一块石碑是青石质，通高4.77米、宽1.62米。碑额阴刻小篆“奉天诰命”，故此碑又称诰命碑，时代为成化元年，近500字，主要记载当朝皇帝加封李升及其夫人的一道诰命内容。另一块汉白玉质，碑名为：“明故封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公神道碑”，立于明成化二年（1466），通高4.9米、宽1.4米，约2000字，记录着明成化元年（1465）李升的生平及其夫人受封的情况。两块碑刻均为当朝重臣书写，文字端庄俊美，刻工精细，并饰以金箔，至今金痕犹存。历经500多年风雨沧桑，李升墓葬早已不存，两块碑刻能保存至今十分难得。李贤及其父亲这几通碑刻规格高、内容全，为研究明史和古代书法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

陪我考察阁老坟的两位先生都已年过古稀，他们对当地文化颇有研究，告诉我在他们年轻时曾去看过位于邓州西南部的李贤祖父李威墓，该墓前原来曾经有一块汉白玉碑刻，规格同现在的碑刻大致相同，保存完好。“文革”期间当地人传说此碑石可治病，一时间周围百姓乃至邻省湖北等地百姓都来砸碑、取石，一通重要碑刻就这样被破坏殆尽。

我们都希望当地文物部门重视起

来，尽快采取措施抢救文物。最好将这几通碑刻迁往安全地方保存，将来能在博物馆中陈列，供更多观众欣赏。

河南南阳 唐新

“小升初”乱象

随着孩子进入小学五年级的学习之后，很多家长见面互相问的都是一句话：“你家孩子上岸了吗？”“上岸”这个我曾经不解其意的词变得熟悉起来，它指的是孩子初中确定了，没定的则被称为还在水里漂着。

孩子的年级在增长，家长们的焦虑在加重。我们因为孩子可以直升本校的初中部，焦虑心理相对那些对初中没底的家长们减轻了很多。很多认识的家长都说：“‘小升初’太折磨人了。”有的家长甚至为此放弃了生二胎的想法，说一个孩子的“小升初”就已经被折磨得不行了，再来一个真的难以承受。家长在焦虑的心理作用下，没有政策保障这类门路的家长只好带着孩子转战课外培训机构的课堂，不少孩子同时在上几个机构的培训班，参加各科培训，只为了在几个学校的“海选”中能被提前招生进去，早点结束折磨人的“小升初”。但是提前上岸的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的孩子还是由电脑派位决定初中的去向，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公布前家长们一点底都没有。

目前，北京各区小学的教材版本不统一，师资水平

差异也大，择校难以避免。“小升初”没有统一的考试，对于平时成绩好的孩子来说如果片内中学不好的话，家长们大多数都不甘于等派位，所以就只能通过课外机构的学习为孩子参加“海选”做准备。因为“海选”不考课内学习的内容，都是拔高的内容，不上课外班根本考不上能组织“海选”考试的学校，由此催生了培训机构报名报不上的现象。最近一个朋友就打电话告诉我想给孩子报一个课外机构的数学班，没名额了，想交钱还交不出去，要等着明年再报名。郊区小学教学质量不如城里，如果成绩好的孩子想上市里的初中，就得起早贪黑坐车到市里上课外班，否则因为教材难度比城区孩子学的教材低更是无法通过“海选”进入城区的优质中学。如果不这么学或者在课外班学得不好，就只能在郊区上初中或者进入私立的全市招生的中学就读。私立的中学一年学费几万，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教育年年在改革，年年出新政策，越改家长们越无所适从，孩子一到五年级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培训机构的课外班一对一辅导听说在有的热门地带都炒到了一小时收费1000元。为了孩子“小升初”，有的家庭一年投入几万甚至十几万元。这种乱象最近几年越演越烈，拼完小学拼初中，拼完初中拼高中，拼完高中拼大学，不少家长都是一声叹息：不

知何时是个头啊！

北京 宝妈

过度推销令人烦

去过加油站的人都知道，加油设备附近总是放了一排排的燃油宝，以前加油站工作人员不会反复兜售，爱买不买。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只要车子停下加油，销售人员马上就会强烈推销燃油宝，至于加什么油、加多少油反而成为无关紧要的事。刚开始，我抱着充耳不闻、誓死不从的态度，坚决不买燃油宝，但由于这是我家附近仅有的加油站，每次都只能硬着头皮来加油。时间一久，经不住销售员的软磨硬泡，我的态度稍有松动，销售员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外包装，并将其中1瓶燃油宝倒入汽车加油孔，我只好无奈买下5瓶一组的燃油宝。总算安稳了几个月，加油站工作人员又开始了新一轮销售攻势，说燃油宝必须持续用才能起效果，又欲打开燃油宝重施故技，这次我果断拒绝。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还悄悄对我说：“我送你两瓶矿泉水，下次一定要找我买燃油宝哦！”反倒让我觉得欠了人情。当我驾车驶离加油站时，赫然发现加油站的电子屏上显示“加油满30升，送矿泉水2瓶”，才幡然醒悟，原来被这位加油站

工作人员“假公济私”地忽悠了一下。心烦之余，我又尝试舍近求远，到其他中石化、中石油加油站加油，结果同样碰到了销售人员过度推销燃油宝的情况，估计应该是这些加油站长期采取的一项推销行动。

无独有偶，近期我在理发店也有类似遭遇。为我干洗头发的美容师甚为热情，主动拉家常，套近乎，介绍头部按摩的好处，等我表示赞同之际，便立刻转入正题，开始推销美容体验卡。本来还有点兴趣，谁知美容师又说，做一次美容相当于你两包烟钱，先生不要舍不得……喋喋不休地过度服务，让我立刻联想到加油站推销燃油宝的事，所以忍住没买，美容师只得怏怏而去。

其实，我相信无论燃油宝还是美容卡，可能产生相应的功效，但销售人员的过于热情、强势兜售，让顾客难以接受，不胜其扰，甚至适得其反，会影响到产品或服务本身。一切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销售，即便取得阶段性成果，最终必定没有好的结果，恰到好处的销售服务才是正道。关于加油站过度推销燃油宝一事，我已向12345市民服务热线投诉，服务热线反馈，加油站核实后将整改。过不了几周，我又要去加油了，不知加油站实际整改的效果究竟如何。

江苏张家港 胡先生



孟加拉 | 回家

9月10日，孟加拉国加济布尔县火车站，在外地工作的人们乘坐火车回家庆祝古尔邦节。





英国 | 伦敦设计双年展

(右图) 首届伦敦设计双年展于9月7~27日在伦敦历史悠久的萨默塞特宫举行。此次双年展的主题为“设计乌托邦”，来自37个国家或地区的作品与公众见面。图为西班牙设计师玛丽亚·莱文(Maria Levene)站在自己的作品内。



印度 | 登革热疫情蔓延

(左页上图) 9月8日，出现发烧症状的病人在南德里市政管理局验血，检测是否携带登革热病毒。随着雨季的降临，登革热疫情在印度各地呈快速蔓延趋势。

也门 | 汽车炸弹

(左页下图) 9月9日，在也门首都萨那，当地几名儿童在察看路边一辆汽车残骸。这辆汽车载有两枚简易爆炸装置，并实施了炸弹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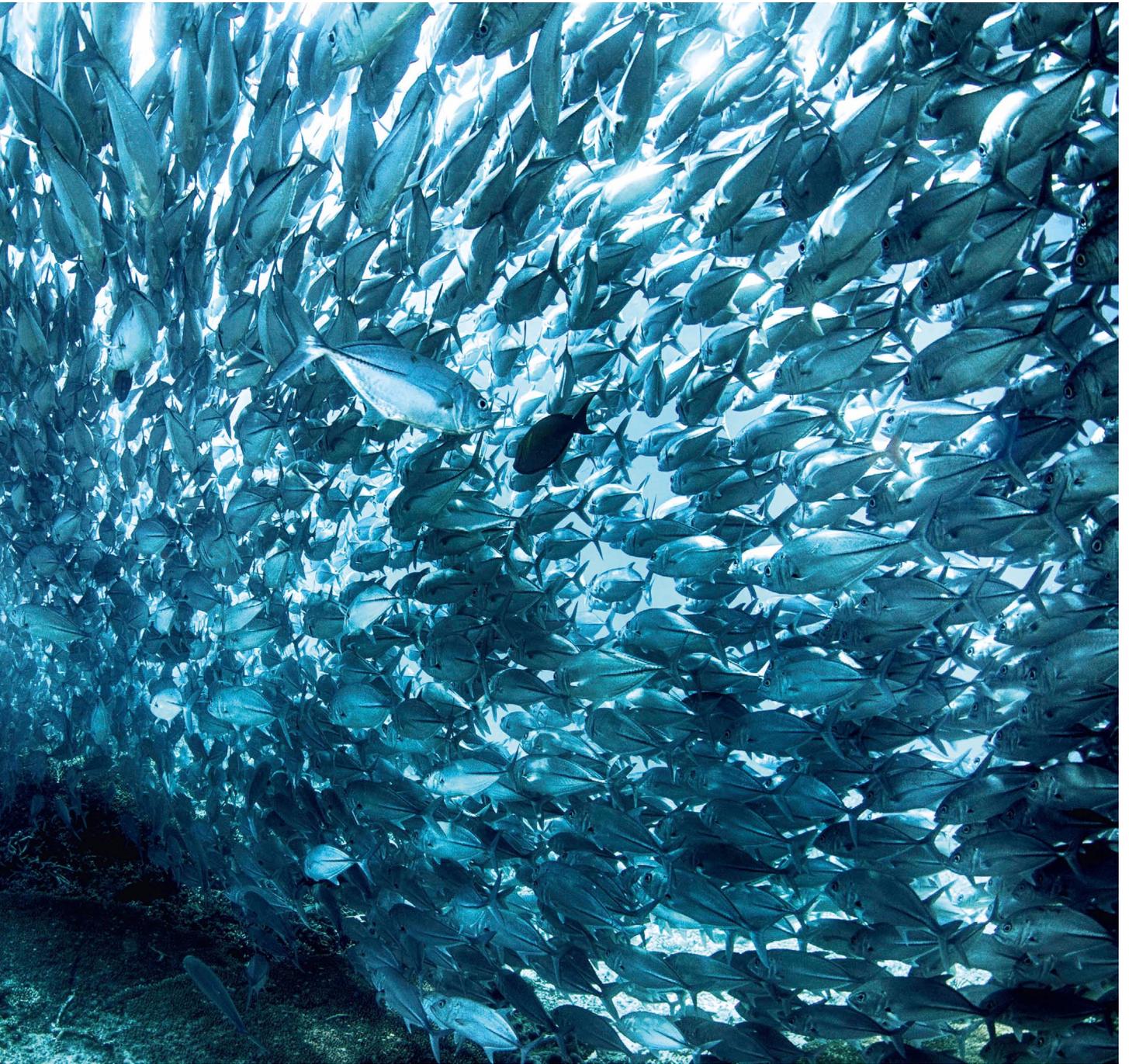
马来西亚 | 杰克鱼风暴

(右图) 罗马摄影师弗朗哥·图利 (Franco Tulli) 在马来西亚水下拍摄了一组“杰克鱼风暴”的照片。大量的杰克鱼群在水下组成了一堵墙，堵住了潜水员的去路，画面令人震撼。

澳大利亚 | 南极摄影展

(下图)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博物馆与艺术馆推出了 2016 年南极摄影展，从 60 多幅摄影作品中精选出最震撼人心的 24 幅。除了常见的冰山河川和“冻人”景观，这次的展览主题更多聚焦在南极洲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上，从优雅迷人的帝企鹅到凶猛残忍的海洋巨鲸，从探头探脑的跳岩企鹅到懒洋洋晒太阳的海豹，这组照片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未被人类过多侵扰的野性南极。





楼面价“悬壶”

文 / 邢海洋

楼市炙手可热，排队离婚、虚假结婚、抵押原房产之类的投机行为像极了去年股市 5000 点。当时鼓舞投资者迎高而上的是“改革牛”希冀，如今的楼市的参照，则是实打实的“地王”楼面价，一虚一实，楼市接盘者似乎更有底气。

8 月底，闽系房企融信中国力挫融创、万科等强手，以总价 110 亿元拿下静安地块，成交楼板价 10.0315 万元 / 平方米，可售部分实际楼板价 14.5896 万元 / 平方米，刷新了全国单价地王纪录。融信的激进使人联想到两年前同为闽系的秦禾与阳光城，两家中型房企，2014 年秦禾也是拼命扩张，不断通过银行、股权基金、信托等机构抵押融资，是年年中，秦禾关联担保金额约 340 亿元，为净资产的 6.67 倍。阳光城则由于销售不如预期，大量求助于信托、基金等代价较高的融资方式输血。但短短一年过后，秦禾扬眉吐气，一年销售回款达到 300 亿元，闽系的大胆得到了回报。这次，福建的同乡也开始赌了，加杠杆所需资金也是代价不菲的互联网通道的保险资金及银行理财，其负债率也高达 600%。今年半年报 A 股中的房地产企业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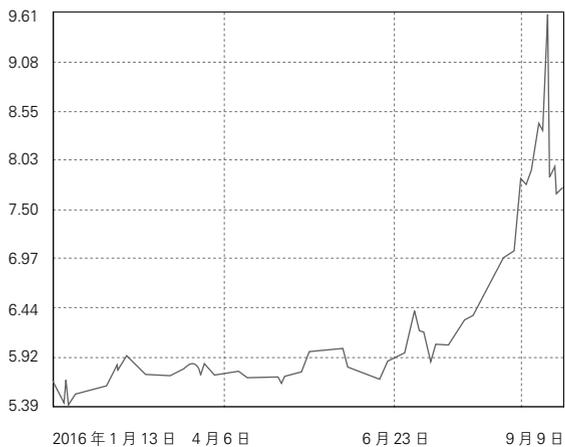
产负债率已升至 81.33%，比去年末上升 3.87 个百分点。

相对而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大型房企资金状态却出奇的好。宽松的融资环境和上半年火爆的房产销售，让大型房企可动用资金创下历史纪录：截至 2016 年 6 月底，恒大手持现金 2120 亿元，另有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为 1260 亿元。恒大、中海、万达和万科等 15 家大型房企手持现金合计超过 8740 亿元，此外，他们还有同等的银行授信未使用。

大型和中型房企表现迥异，昭示人们和 2014 年同样的信息：永远有赌徒，有稳健的生意人。楼市若上涨，皆大欢喜，若下跌，赌徒出局。“招拍挂”18 年，地方政府获得了超 30 万亿元的土地收入，土地运作年年如此。近年来，楼面价超过商品房价格更成为普遍现象。那些早年的地王已经入市，因为房价年年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的土地成本不但解套还大赚一笔。可今年的楼面价却“离谱”得多，截至 8 月底，全国拿地溢价率超过 100% 的地块达到 88 宗，深圳的一块地总价达到 310 亿元。加杠杆的企业，除了敢拼的闽企，还有挟持银行信贷的央企，上半年频频制造地王的信达净资产负债率就超 300%。若房价下调或停涨，这些中小房企就面临灭顶之灾。背后为他们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乃至个人投资者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中小房企的倒下势必引发房地产的抛售，打压价格，大地产商也难招架。大地产商背后则是那些规范运作的大金融机构。

问题是，虽说是买者自负，可卖地的一方是垄断了土地资源的政府。地方政府减少了土地供应，这个信息很明确，外界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买卖双方也形成了默契，虽然不挑明，政府对于未来房价的保障是负有责任的。在北京，从今年 5 月至今，政府投入市场的住宅用地已连续 3 个月为零。今年前 8 月，北京住宅用地仅成交 7 宗，较去年同期下降 66.7%，同期上海，规划建筑面积同比减少 21.44%。☑

香港上市的融信中国（单位：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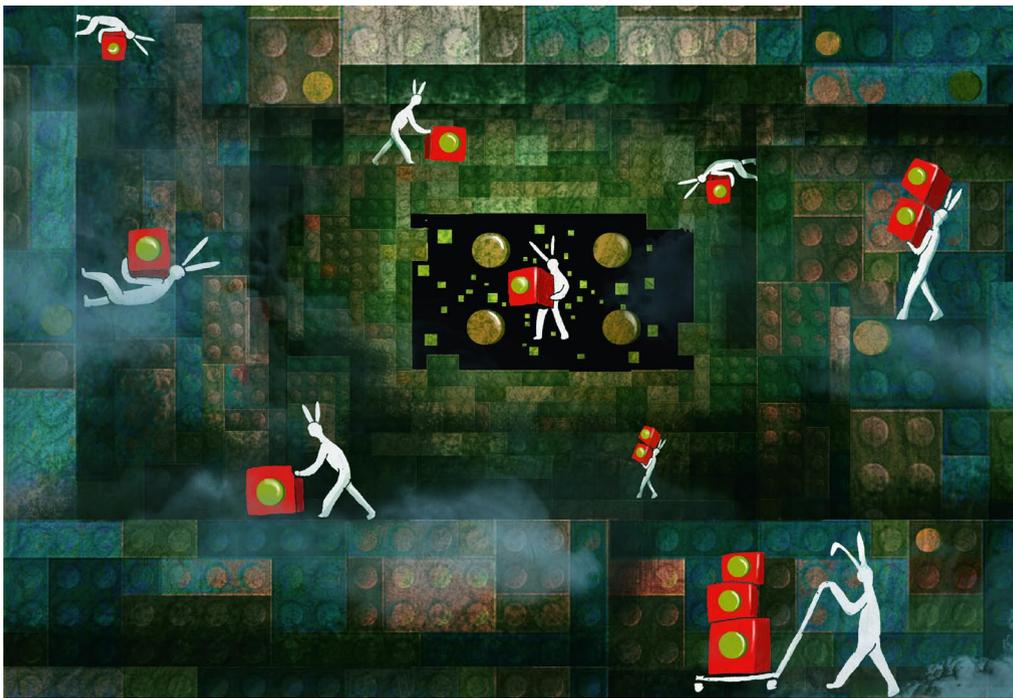


松果

一万个生活家

有营养，有态度





栏目插图 | 范薇

出口份额升

尽管全球贸易停滞，中国进出口似乎也增长乏力，但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所占份额却在逆市上涨。据 IMF 数据，2015 年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已升至 14.6%，为 IMF 自 1980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比例，较 2014 年的 12.9% 也大幅上升。出口的全球份额增加，一个关键的动力是中国向更先进的组装，尤其是电器组装领域转型。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时说，在努力推动附加值更高产品出口的同时，中国正在逐渐成为德国的经济竞争对手。

企业发债“负利率”

这或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连没有政府背景的非金融企业发债也要投资者倒贴钱。9 月 6 日，德国跨国巨头汉高公司和法国制药商赛诺菲万安特以 -0.05% 的利率发行了短期债券。其中汉高发行 5 亿欧元的两年期债券，赛诺菲发行为期三年半、规模达 10 亿欧元的债券。目前两年期德债收益率为 -0.67%，相较于无风险的主权债，汉高这次发行的企业债还溢价 52 个基点。

险资南下

9 月 7 日，保监会开放保险资金参与沪港通试点，自此，险资加入资金“南下”大潮。据 Wind 数据显示，沪港通资金已经连续 15 个交易日呈现南向流动，累计资金净流入 412.27 亿港元。港股市场拥有一批估值便宜而又优质的龙头企业，尤其是大中型标的，较受保险资金青睐。此前保险资金参与香港市场，主要通过 QDII。而沪港通不占用 QDII 额度，是非常便捷的投资方式。





电动车大洗牌

8月工信部公布了所有电动车企业销售商必须具备的17项技术，而石家庄市政府则于7月取消了电动车地方补贴。骗补风波后，蜂拥而上的电动车行业或迎来政策调整期。截至2016年初，国内电动汽车生产企业约有200家左右，其中仅有两家企业获得国家相关许可证。种种迹象表明，管理者希望将行业从业主体控制在10家左右，电动汽车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野蛮增长后的大洗牌。

PPP 驰援“稳增长”

截至7月底，“发改委”两批公开推介的PPP项目中，已有619个项目签约，总投资1.00191万亿元。按计划，9月初将形成第三批示范项目清单并正式对外公布。PPP签约项目主要集中在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学校、医院、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地产投资走弱、制造业投资低迷，经济增长仍靠基建投资托底。目前共有81家上市公司参与过PPP项目，其中，龙元建设、铁汉生物、博世科等公司合作PPP项目最多。

“先进产能”

今年以来已有16个省份发布了去产能方案，推动煤炭价格近几个月明显上涨。秦皇岛煤价8月中旬一度触及17个月高点，自6月份以来涨约20%至每吨470~480元。价格之所以回升，是由于煤炭产量同比减少1.7亿吨，降幅9.7%；消费量同比减少9750万吨，降幅为5.1%，产量降幅明显高于需求降幅。如今，约有76家重点企业集体申请复产，以释放先进产能，一些国有大矿已经放开生产。

VR“空欢喜”

Steam的数据显示，HTC Vive的用户增长在8月几近停滞，目前的出货量大约在10万台，低于预期。从2015年第二季度开始的一轮VR狂潮正在退潮，Oculus、HTC Vive和Sony PSVR三大产品似乎都难完成年初的目标。即便是技术门槛较低的Cardboard眼镜盒子类产品或一体机产品，也已经不再被资本看好。做VR内容的创业者们也活得不好，想直接从用户手中赚钱的想法几乎破灭。





自拍照里的学问

可别小瞧了自拍照的意义和价值。以美国佛蒙特大学为首的研究小组最近就发现，个人上传到图片网站上的自拍照不仅可以成为评估环境保护经济价值的一种有效手段，还能为市政规划提供极其重要的参考信息。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最新论文分析了某图片网站上的7000余张带有地理位置信息的照片后发现，从2007到2014年间，佛蒙特州的保护区一共为该州旅游业带来了18亿美元的收入。此外，图片分析结果还显示，植被覆盖、路径密度和运动项目等8种因素在增加保护区的吸引力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本地人和外来游客对景观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偏好。

好消息

梦想成真

科学家很早就发现，睡眠能强化对新学知识的记忆。但威尔士斯旺西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这种强化作用只有对于那些主观上希望获取的信息才最明显。针对一群正在学习外语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实验显示，对学习本身越看重，从睡眠中获得的益处才越大，否则只会加速遗忘。



偏执与成功

“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的说法当然未免过甚其词，但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研究小组追踪调查了4566家软件行业的新创公司从1990到2002年的运营数据后发现，那些选择不随大溜、不一味迎合主流用户当前口味的公司最有可能存活下来，获得投资以及最终上市。

坏消息

荒野无踪

发表于最新一期《当代生物学》上的调查结果显示，仅仅在过去的20年中，全世界仍处于原生状态的荒野面积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南美亚马孙地区和中部非洲是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区域。研究者指出，荒野的存在对于生物和生态保护有重要意义，一旦被破坏便几乎难以恢复。

开放与开吃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管不住自己的嘴？根据美国圣母大学的最新研究结果，开放式厨房和办公空间的流行可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开放厨房使食物更触手可及，而开放空间中人们也更容易受他人进食行为影响。实验显示，大学生志愿者在开放式厨房中平均每餐会多摄入170卡路里热量。



我仍记得范甘迪教练有次说过，“最好的机会也往往是你最后的机会”。不管是对篮球还是对人生而言，这句话都正确无疑……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身高，还有思考事情的方式，如何做决定。当然还有我顺滑的罚球，那也是为何我的罚球命中率有83%——比大鲨鱼奥尼尔略高一点点。

——姚明在篮球名人堂入选典礼上的演说

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一款手提式装置，它利用微型传感器，可以马上判断水果的成熟度，而无需进行挤压测试。对超市顾客而言，这可能让挑选方法发生颠覆性改变。以往他们需要仔细揉捏货架上的水果，才能决定将哪些放入购物车内。

——《洛杉矶时报》报道说，手机连接廉价的小型光谱仪后可以分辨水果是否成熟

取消一个耳机插孔并不需要勇气。但对 AirPods 开出 159 美元的售价确实需要勇气。

——投资者和应用开发者戴夫·佩尔在 Twitter 上发帖称

我们在众生身上已经可以感受到这股愈来愈高涨的仇恨和暴力。他们心中的纯真已荡然无存。再也没有什么是无价之宝了。他们的想法都一样。路上碰到的都是禽兽，一些看起来很像动物的欧洲脸。这个令人作呕的世界和这股全球风行的昏庸愚昧，勇气变得微不足道，伟大可以仿冒，荣誉感式微。

——《加缪手记》第一卷

+/-

数字

22.1

万

英国少女博·杰瑟普设立了网站 SpecialName.cn，帮中国孩子选择英文名字。这项服务的收费是 60 便士，网站每天的访问量是 2.7 万人，她每个月能挣 1.6 万英镑。在半年时间里该网站给 22.1 万个中国孩子建议了英文名。

1864

只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发表报告称，由于中国积极恢复大熊猫的栖息地，成年野生大熊猫在中国内地现有 1864 只，所以把它从“濒危”降为“易危”物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每 4 年进行一次重大更新。



41

秒

通过收银台时，每人大概平均需要 41 秒，每件物品大概需要三秒。所以排队时，前方人少东西多，胜过人多东西少。有时站在一个满当当的购物车后面，可能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最好回避犄角旮旯的收银台，如果有墙或者柜台遮挡，收银员可能就无法正确地预估，自己的工作效率会给队伍长短带来多少影响。



(插图 山羊胡)

不要害怕过去。如果有人告诉你过去是不可回复的，你不要相信他的话。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上帝眼里都只是一瞬间，在他眼里，我们都应努力去生活。

——奥斯卡·王尔德，《自深深处》



再见，朋友圈

文 / 尚小右
图 / 谢驭飞



“你们坚持不了多久的。”得知我和几个人关闭朋友圈后，N斩钉截铁地说。身为专写养生的自媒体人，N有2个公众号3个私人号，自称练就了“怦然心动的微信整理魔法”。N一边回复卖轻断食果蔬汁的赞助商，一边教育我：“这个时代，微信才是人体的延伸。没了朋友圈，你会有幻肢痛的。”

果然，在关闭朋友圈的头几天，我总习惯性地寻找小红点，屡次误点“附近的人”，再懊恼地“清除位置信息并退出”。有时甚至会发呆：那些老发小视频的代购，最近新上了啥？一放假就全球玩的堂哥，这几天在亚马孙还是摩洛哥？老发鸡汤配自拍的美貌学妹，到底做直播了没有……一同闭关的朋友也叫苦连天：“我已经无聊到翻遍所有玩过的社交网站，再这样下去，我要重新装扮QQ空间了！”她又说：“你知道我‘人人’里的照片都没修过吗？还是素颜！太可怕了！”

最终是她最早缴械投降。另一个朋友C发给我她的朋友圈截图：人人时代的“大光明”淳朴证件照，花样对比如今披着大波浪的精致模样，底下写着“爱自己终身浪漫的开始——王尔德”。身为旁观者，C对我们告别朋友圈颇感兴趣，老说这是个有意思的新闻题材。然而C是个负责民生板块的记者，职责和提成都不允许她亲身体验。C总自嘲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她的微信头像是琼·迪迪昂，人家层次高到获了“美国文学

卓越贡献奖”；她的朋友圈却非常接地气，全是自己写的推送：“怪！煮熟蛋清呈紫色！坏！铁核桃也拿来卖！”

逐渐地，坚持闭关的就剩我一个了。其他人总结，这跟意志力没关系，只因为就我没工作闲得慌。但我真的发现，没有朋友圈的确令人心痒难耐，不过痒久了也习惯了。我再也不会在本应早睡时玩手机，给朋友的“深夜放毒”点赞，最后凌晨时分叫了奶酪炸鸡的外卖。总之我尝试好好生活，即便内心时不时嚎叫：“我想用日系滤镜！发Emoji表情！写心灵鸡汤！拿别人的赞！”

然而好好生活没多久，C就帮我在她的报社找了份实习工作，既编辑公众号又外出采访。主任记者说：“奖金是和点击率挂钩的，推送能多转就多转。”犹豫是否继续闭关朋友圈，没等我想明白，主任就发话：“你们实习生去出现场，晚饭补助一人30块，别想着吃大餐了，吃碗面赶快写稿去。”

就这样，我重启了朋友圈。没错过什么大事，无非室友的老公从韩国欧巴变成乒乓国手又变成盐系美男。成了疯转“最好的医生是人体的自愈力（惊醒了无数人）”的新闻民工后，我向N抱怨：“只想自由支配朋友圈罢了，原来这么难。”N叹了口气，不愧是只生产爆款的自媒体人，一张口便是剪裁流畅的公众号金句：“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

如果你的样子变成史努比

文 / 陈萱
图 / 谢驭飞



麦子很伤心，喝了很多酒，去了几趟厕所后终于伤心地哭起来。几天前，柠檬做了一个梦，第二天醒来就和麦子分手了。起先麦子还当她是开玩笑，柠檬平时就古灵精怪，他们这两个个性迥异、聊天只能谈天气的人之所以能在一起8年，其间还经历了两年半异地，全赖初遇时柠檬的一个恶作剧。

可是这一次，柠檬显然不是在游戏。她收拾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无声无息地从麦子的生活中消失了。短信不回，电话关机，微信显示对方已不是你的好友。麦子追问过许多次，但柠檬就是不肯告诉他自己梦见了什么，只是说她发现自己并不爱他。大概是梦见了别的男人吧，麦子想。柠檬大学主修哲学，中途又皈依了弗洛伊德，她相信梦是现实的镜子。

伤心欲绝的麦子还是想知道柠檬究竟梦见了什么，一把鼻涕一把泪央求我：“你们不是闺蜜吗？帮我问问。”我是个爱惜羽毛的人，自然不会答应去和这团稀泥，但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还是找了借口把柠檬约到我们常去的那家星巴克。

看见柠檬花枝招展地向我走来，连我都不禁狐疑她是不是早就背着麦子陷入新的恋情。柠檬嫣然一笑，不等咖啡端上来就主动坦白了。

在梦中，麦子单膝着地双手捧着戒指，柠檬正要答应之际，麦子却忽然在她面前变成了一匹马。柠檬最近很迷《马男波杰克》，波杰克是一

匹拟人化的中年马，身上云集了人类大部分缺点，认识他的动物都被他伤害并因此而厌恶他，但偶尔他也会展现善良真诚的一面。看的时候，柠檬还觉得麦子和波杰克有几分相像呢。

变成了马的麦子依旧每天6点起床沿着家附近的绿道慢跑半小时，回来时会记得在楼下给她带份小笼包和甜豆浆。程序员的麦子和柠檬依旧没什么共同话题，但即使变成了马，麦子还是体贴温柔，凡事忍让柠檬，每个纪念日都会记得准备巧克力和百合。他们很快完成婚礼，之后有了房子和孩子。

睡梦中，一生是那样轻易就被完成了。闹钟声吵醒了柠檬，她下意识地看了看枕头另一侧，空空如也，麦子早就起床出去跑步了。

我听得云里雾里，但梦仿佛是个喜闻乐见的大团圆。柠檬答非所问，她讲起林夕曾给王菲写过的一首词，还轻轻哼起来：“如果你的样子变成史努比，是否留下一样的回忆……如果你是假的，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體，我还爱不爱你。万一你的面孔失去原有比例，要不要坚持完美主义。”柠檬说，梦里的她很不快乐，即使和她曾以为最爱的麦子一起生活一起变老，即使梦中他们拥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她就是开心不起来。

但现实不是卡夫卡的小说，麦子永远不可能变成一匹马。柠檬说：“可麦子会变老变胖变丑变成另一个人，我也一样。”我宁愿柠檬永远爱着麦子，而麦子也永远爱着柠檬，即使是在回忆里。☑

青年小马的堕落

文 / 阿波琪 13号

图 / 谢驭飞



小马至今仍自鸣得意同事叫他“小马哥”，是因为他如《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一般放荡不羁。他的名字是我起的，而且我保证和《英雄本色》并无半毛钱关系，实在是因为他姓马并且我又很喜欢阿根廷著名球星马斯切拉诺。

哥哥进炮局的时候小马刚上“大二”，故意伤人后来又大闹警局，考虑到特殊原因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里的钱罐子进了局子。那年暑假爸爸想把羊卖掉换学费，小马堵在羊圈门口连哭带闹，说已经失去他最亲的男人不想再失去他最亲的羊。小马申请了助学贷款，火车站台上爸爸跟他说不卖羊家里交不起学费，你是家里唯一的希望。那是小马哥第一次哭。

小马工位上贴着的油笔画经常会引来过往同事的赞叹，线条流畅笔锋细腻，与这个穆斯林汉子的外颜形成鲜明反差。因为文化课成绩不佳，学了9年美术的小马去了东北某动画学院，之后成了某互联网公司的视频编辑。那天因为素材缺失，工龄不满1年的小马哥和3年的文案吵了起来，小马哥说没见过哪个主厨做饭还得自己买菜的，惊煞众人。

后来文案和小马还是成了朋友。小马说话直抒胸臆，不经意总会蹦出一些奇思妙想的话语，文案称惊为天人。不过让小马心里不满的是自己的才华总是在为他人做嫁衣，真正引以为豪的视频能力却无处大施拳脚，就在小马哥郁郁不得志

的时候，机会来了。

年会播放的公司宣传片这次需要小马操刀，小马在QQ签名上写道：“你给我个机会，我还你一个奇迹。”加班加点两个月后的验收会上，老总看完片子暴跳如雷，说我堂堂一个上市公司的宣传片怎么能如此不三不四。小马哥涨红了脸，公司其他同事看完片子以后的夸赞还在耳边回响，他忍不住在会上问了老总片子问题出在哪儿，老总说：“你们啊还太年轻。”

之后小马按照老总的意见重新制作了宣传片，看着年会上同事看着宣传片木然的表情，小马尴尬至极，那次年会之后小马在QQ签名上写道：“太认真你就输了。”

后来小马哥因为经常不按时交工而被领导批评，最终在一次例会上交了辞呈，理由是工作无聊而且没有进步空间。新来的视频编辑马上到岗。那天在吸烟区，领导催促新来的视频编辑赶紧和小马完成工作交接，免得小马的负面情绪影响团队和谐，这一切被路过的小马尽收耳中，小马回到工位，清空了他的QQ签名。

小马每餐必喝冰红茶，他说“大三”暑假在工地搬砖，空闲时和工友坐在工地上边抽烟边喝冰红茶是他目前能回想起来的最快乐时光。回宁夏的火车上，小马掏出手机，瞅了瞅助学贷款支付成功的短信。那晚他做了一个梦，家乡的大漠上，他看见西装革履的小马哥迷失了方向。☑

跑步这件小事

文 / 耳东某

图 / 谢驭飞



至少在朋友圈，跑步已经火了好几年。打开手机，A刚更新某个定位计时软件下自己的路线图，叹为观止的距离下配的是云淡风轻的“心情不错，出来跑步散心”；B更加勤勉，定位到一个著名的度假地点，发送一张穿着专业衣服鞋子，以一个名胜古迹为背景的大汗淋漓图；C说自己刚参加完半马，伴随着一个官方通告成绩短信的截图。我是D，刚跑完3公里，感觉自己失去了在朋友圈发跑步状态的资格。

多年以前，事情是完全相反的。我在学校痛苦地准备着那个需要考核的3公里，周围大部分同学也对此深表抵触，纷纷质疑道：为什么人要花时间在空地内愚蠢地画圈？甚至会将其升华到生命存在的意义的高度，并得出结论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多年以后，马孔多的冰块突然融化，大家之前的抱怨和怀疑也随之流逝，又一股脑加入跑步大军，并且都同时喜欢古希腊奥运会时的那句口号：“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美，跑步吧！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

在奥运会上，长跑项目同多年前一样，依旧冷门。在里约奥运会，即使女子万米跑破了尘封二十几年的纪录，人们口中的田径仍旧是不可阻挡的博尔特、加特林和喜欢掉棒的美国接力队。业余世界里喜欢长跑的我们和竞技体育中孤独的长跑运动员仿佛生活在地球的两极，大家熟知的长跑偶像更多的是身边的牛人和误打误撞的村上

春树。

村上俨然是身边文艺跑者的偶像，即使没读过《挪威的森林》，也得看过《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对于自己突然变身跑步明星，他也有点措手不及，在一篇小文中写道：就像从来不会鼓励人去写作一样，自己从来不会鼓励任何人去跑步；跑步只是因为他的身体热爱这个运动，而不是他有骄人的忍耐力，喜欢用汗水和无聊折磨自己。他还说自己曾以为优秀的职业选手也都爱着这项运动，直到有一次见到马拉松运动员濂古利彦，他迫切地上去问对方：是否有那么一天希望明天休息不用跑步。对方一脸惊愕，仿佛不相信有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答道：那当然，每天都想。

村上也曾表达过一个观点，认为人的身体是可以修行的，要时常保持清洁和美好。我想这才是周围很多在跑步的朋友的出发点，用不着升华到精神修行那么高，我们日复一日地跑步，强迫自己爱上这项曾经痛恨的运动，其实就是为了摆脱现实中平庸累赘的躯壳，追上那个理想中更完美的自己。翻译成成人话就是：要减肥。☑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叶子创可贴

叶子创可贴用可变色的特殊材料营造出从仲夏到深秋的过渡——从清新夏日的绿色渐变到秋天落叶般的金色，增添了美观性。

软体章鱼机器人

由3D技术打印出来的软体章鱼机器人Octobot，融合了微流体、机械工程以及液体燃料等技术，全部机身告别传统的刚性部件（电池、电路板等），依靠气体的流动来引发章鱼机器人的触角摆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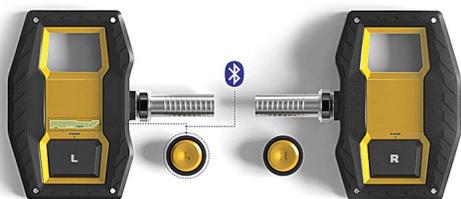


科技生态手机

Galaxy Note7 配备虹膜识别技术，并实现了全机身 IP68 级防尘防水，内置 Type-C 转接头，支持传输数据及无线快充。手机可连接 Gear VR 及 Gear 360 体验高清虚拟现实，还可享受三星智付、S 健康、云空间等专属服务。

潮流搭配跑鞋

阿迪达斯 UltraBOOST 跑鞋采用了全新的红黑配色，除了一贯的 Boost、Torsion System 科技之外，还有全新 360 度针织鞋面配以区域支撑，让每一步都更加稳定。



蓝牙踏板转向灯

出自韩国设计师之手的踏板转向灯，左右车把手安装了蓝牙通讯功能，能够在骑行转弯时通过按钮控制踏板处的 LED 灯，随即闪起显眼的左右箭头，以告知后方车辆安全避让。

桌面音响系统

HiFiMAN 发布的 X100 桌上 HiFi 迷你音响系统，包括一台多功能扩大机、两只喇叭与一个超低音。两只主喇叭使用了钕磁铁，能提供完整的全音域频段。调整音场与低音频响的功能让声音变化更有弹性。



金属密码 U 盘

这款金属带锁 U 盘，受启发于达·芬奇密码筒，在 5 道转盘上都设置了 0~9 的阿拉伯数字，安全系数较高，金属材质略有古典文艺复兴的质感。



海蓝宝项链

宝格丽 Divas' Dream Bellezza 项链以海蓝宝石、蓝宝石和钻石镶嵌而成，呈现出古罗马卡拉卡拉浴场大理石的色彩及马赛克的优美曲线，吊坠中间镶嵌了一颗雨滴状海蓝宝石。

彩色玻璃柜

帕特里夏·奥奇拉与平面设计师合作的 Credenza 餐具柜，对角线和三角形图案的彩色玻璃面板镶嵌在半圆形框架中，它的制作使用了意大利的传统彩色玻璃切割工艺。



安妮椅

罗斯·拉夫格罗夫以有机的造型，为 Bernhardt 家具设计了胡桃木“安妮椅”。它的原型来自传统美国法院椅，曾出现在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影片中。





雏菊花台灯

尼卡·祖潘克设计的“雏菊花”台灯，“爱我、不爱我”的花语传说被转化成聚碳酸酯灯罩，粉红、黄色、绿色、胭脂红等六种色调散发柔和的光泽。

刺绣山茶花

香奈儿“刺绣山茶花”腕表与著名的勒萨日刺绣工坊合作，用米色丝线刺绣出精致的山茶花茎秆和叶子，白色珍珠和贝母的花朵在表盘上绽放。



慕尼黑蓝

MCM的“帕特丽夏”(Patricia)斜挎包造型来自品牌档案库，欧洲植物鞣革的慕尼黑蓝色结合结构化的轮廓，MCM标志被雕刻在抛光的推进式锁扣上。



迷幻仙人掌

充满童趣的Gufam品牌“仙人掌”衣架始于1972年，今年与时装设计师保罗·史密斯合作推出了特殊配色的限量版，赋予这一标志性产品迷幻的“新衣”。



超级首都的解决之道

北京搬离北京





北京国贸 CBD 夜景。在城市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中，国贸地区成为连接新旧两个中心的重要枢纽

主笔 / 贾冬婷

人们对于北京行政中心搬迁到通州的第一反应，有一种“狼来了”的不可置信。上一次要迁到河北保定的消息言犹在耳，事后也被证明不过是房地产的又一次概念炒作。更深层的怀疑是，北京作为首都的“图腾”意义如此巨大，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北京市政府，都很难挣脱这股强大的向心力。

那么，这一次是什么推动了反磁力作用，并最终让行政中心搬迁成为现实的呢？

当然，可以说“城市病”到了必须下猛药的时候。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犯罪频发……我们在享受城市带来的交易、安全、卫生和娱乐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被这些“病症”所困扰。而城市的规模和密度，则被视为罪魁祸首。于是，在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似乎就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更大，还是更好？

事实上，北京“瘦身”如同一场屡败屡战的战役。改革开放后，北京一直把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但历经三次城市规划，这一目标却屡屡被现实击败：1982版总体规划提出，要把北京市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左右，但仅仅3年后的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就已经突破了这一数字；1993版规划提出，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382万；2004版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961万，同时北京人口年均增长率仍在不断提高。

这不禁让人想起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诸神为了惩罚他，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他每每快要推到山顶，沉重的巨石又滚回山下，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某种程度上，北京的人口控制和城市疏解也陷入西西弗斯式的困境，一次次地从终点回到起点。

为什么人口控制总会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所击败呢？美国马里兰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丁成日用“水坝”来比喻北京人口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假设有一个100米的水坝，水库水面为50米，有一个闸门放水，大坝的泄水量好比流入北京的人口。过去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也加大了城市间的差别，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在加大，

这相当于水库的水面在不断地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制度、住房制度改革极大地弱化了改革前城市人口控制措施的有效性，结果已经无法通过直接的户籍制度来控制北京人口，转而提出“以屋管人”“以业管人”的间接措施，相当于放水的闸门在不断地松动，导致泄水量加大；而且，国家整体发展趋势也在不断释放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以户籍制度改革、高考移民门槛的松动、事业单位改革为代表，好比国家为了发展加大了闸门口径。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大坝的守护人员不准泄水，如何能够做得到呢？

北京这30年间进行人口控制和城市疏解的理论依据之一，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即发展应该受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城市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城市效用函数和城市规模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也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最优规模”，它取决于城市规模正反两个效用的相互对比。在现实中，正面效用主要是城市的集聚效用，负面效用则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昂、基础设施不足等。经济集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这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均会有所上升。此外，城市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都会抵消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比如拥挤，如果一个人上班路上要比原来多花一个小时，他实际投入工作中的时间就少了，人均产出就会下降。最终，只有当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其生产或生活成本时，企业和居民才会留在这个城市。相应地，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规模。据此理论，在城市跨越最优规模拐点的时候，就应该去控制它变得“过大”。

然而城市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最优规模”。现实中，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往往被低估了。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指出，投入品的分享、劳动力市场群聚以及知识的溢出，是导致集聚的三个根本原因。城市的集聚充分论证了这一点。人类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正如一个蚂蚁群体可以去做远远超出单个蚂蚁能力范围的事情一样，城市可以做的事情也远远超过了单独的个人。城市让观察、倾听和学习变得更加方便。“在一座大城市里，人们可以选择同行来分享他们的兴趣，就像

莫奈和塞尚在 19 世纪的巴黎相互找到了对方一样。在班加罗尔和伦敦人口密集的走廊里，思想可以很方便地在人与人之间交流。人们愿意忍受城市里的高房价，正是为了与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生活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的知识将会对高房价做出补偿。”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他所著的《城市的胜利》中指出：“超大城市的规模并非过于庞大，限制它们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把规模经济递增的因素考虑进去，最优规模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大伦敦”规划的操盘手、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规划学院教授彼得·霍尔指出，一种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正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出现。彼得·霍尔认为，这背后有两个潜在的机制：一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全球城市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伦敦、纽约和东京是全球性的金融节点，迈阿密、洛杉矶、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新加坡是“跨国节点”，巴黎、苏黎世、马德里、墨西哥城、圣保罗等则是“重要的国家节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二是信息化，高端经济由制造、加工转向服务生产，尤其是转向处理信息的高端服务业。据统计，发达国家全部就业岗位中的 3/5 到 3/4 是服务业，而这中间又有 1/3 到 1/2 属于信息处理行业。这一趋势非常强烈，预计到 2025 年将有 80% 到 90% 的就业岗位分布在服务领域，并且 60% 到 70% 的就业将属于信息生产和交流产业。因此，已经呈现出一个与 18、19 世纪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转变同等重要的长期经济过程，即从制造业向信息化发展模式的转变。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出现，即由专家顾问提供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这是后工业化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

由此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趋势：当生产分散于全球，服务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超级城市。一方面，公司之间、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让集聚依然有效，而高速发展的电子交流系统和高质量的交通网络又让交流地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CBD，它们也可以是分散组团式的，比如在靠近交通节点的若干区域。正因如此，这种需要面对面集聚的功能正在经历一个“集中式的分散”过程，即在一个更广阔的城市区域尺度上扩散，同时又在这个区域内的特殊节点上重新集聚。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结构中，后台管理、物流管理、新型总部综合体、传媒中心以及大规模娱乐和运动等功能构成次级中心的内在动力。由

此，很多传统的单中心城市，逐渐转变成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

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的出现是全球性的。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运输成本的减少，制造业比重的不断衰减，美国和欧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表现出“逆城市化”的现象。有趣的是，在一些城市人口数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从 80 年代开始，在一些美国大城市又出现了人口和收入水平的正增长，这正是因为金融、专业化服务、新技术等思想密集型产业更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传统观点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会让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一旦你在偏远的乡村也可以通过维基百科学到知识的话，为什么要忍受纽约的高房价呢？但是，短短几十年的高科技是无法战胜人类数百万年的发展历史的。格莱泽指出：“在网络空间里的交流将永远无法与分享一顿美食、一个微笑或一个亲吻相提并论。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它只有在与通过面对面方式取得的知识相互配合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互联网企业家在班加罗尔和硅谷的集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高度集权化的“超级首都”东京可以作为北京的一个参照系。早在 1946 年，东京的城市设计者就开始担忧一个超大城市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城市病——“集聚不经济”的典型表现——对东京来说也并不新鲜。前后几版规划可见思路演变：一开始的做法是限制城市的规模和人口，以绿带来限制都市蔓延，随后则是给城市扩容，建新城来疏解功能。直到 1976 年的规划意识到了东京一极的问题，开始强调在都市圈内应该存在多个核心城市，各有分工但又相对独立，此后的 30 多年这种“分散型多心多核”模式一直是东京首都圈规划的原则，而最近几年“迁都”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可以说，对于北京这样的巨型城市来说，“更大”和“更好”并不矛盾。在它要成为“世界城市”的雄心下，两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首都功能的叠加、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模式的转型，都一步步加强着北京的虹吸作用，这注定让控制城市规模的做法变得徒劳。与其控制城市规模，不如为它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通州副中心等城市结构调整方案的内在动力。而在北京城市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中，行政功能的搬迁无疑会形成最强大的反磁力作用。■

跨越单中心，超级首都演变史

主笔 / 贾冬婷



北京前门——正阳门箭楼



北京“摊大饼”式的单中心扩张模式，让心脏的负担过大。另外再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才能缓解心脏的压力。通州副中心就是这样一个辅助的心脏。

发酵：双中心的可能性

行政中心搬迁，对北京来说并非突如其来。事实上，这一议题真正进入讨论，是在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和50年前的“梁陈方案”一样，出发点也是保护旧城。当时要编制2004～2020版北京总体规划，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所所长，他提出一个方案，“北京如果要保护旧城，必须在空间上分离”。赵燕菁告诉我，当时中央让他们论证旧城中心区到底能盖多高。他们回复，中心区是一寸都不能盖高的，古代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么，由此带来的城市功能损失应该在新区得到解决。当时他略为夸张地形容：“要么把故宫搬走，要么把行政中心搬走，两者只能留一个。”

如果行政中心要搬，搬到哪里去呢？赵燕菁当时的建议即是通州。“奥运会之前，有两次改变城市机构的机会，第一次是奥运场馆的选址。曾提出选在南城，带动整个城市往南走，往天津方向走。北京东南方向的亦庄作为备选方案，结果在最后一分钟被放弃。最终还是选在了中轴线以北的延长线上，理由是中轴线有历史和文化上的传承，而且机场在北边，亚运村的基础设施也在北边，而当时能让北京选上是头号任务，选不上连规划都不用做了。奥运场馆选在北边了，那地铁就要跟过去，高速公路、公共服务全都得围着，最后北京的单中心结构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赵燕菁说，在奥运会选址已经无法更改的情况下，当时行政中心搬迁可以选择的副中心只有东南两个方向。“在这两个方向里，副中心首先要避开其他城市功能扩张的用地。提出选择通州，则因为可以沿长安街延伸行政功能，有利于行政职能的分期迁移和水平分工；通州的对外交通，特别是对中央行政功能影响较大的机场交通条件很便捷；通州的水系发育也有相对丰富

的自然素材，有利于通过设计形成壮丽的景观形象。”

当时的想法是搬迁中央行政中心。理由很简单，中央行政及其相关附属职能在北京经济和空间上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一个需求“黑洞”，任何企图逃逸出其引力范围的功能分解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比如有句著名的顺口溜：“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就是抱怨机关分散在二里沟、三里河、六铺炕、九号院和中南海五个地方，其辐射之广可见一斑。“那个时候中央找北京市要的地，全部加起来有好几十平方公里。我们就觉得，那还不如索性集中起来，建个新城，再把老城的部分功能搬过去，副中心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建起来。”赵燕菁说，报告交到北京市，当时的市领导都有批示。“他们也认为，因为首都功能，因为旧城保护，北京的增长潜力都被抑制住了。当时市领导还说，如果中央不搬，那北京市就要搬。”

然而，最终写入2004版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两轴、两带、多中心”方案，是一个四面开花的均衡发展方案，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央行政中心搬迁。“相当于迈出去了第一步，指出北京需要进行战略性的空间结构调整，但是涉及第二步‘如何调整’，却并没有捅破中央行政功能需要空间分解这层纸。”背后的原因被普遍视作一种复杂的心理“图腾”作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作为国家的象征，已经成为一种国民心理定式。但是赵燕菁认为，天安门上根本没有行政办公功能，人民大会堂也基本上是一个集会的地点，而非实际办公设施，所以中央行政功能的外迁，不会对首都“心理定式”功能产生任何影响。他形容，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猜想病人绝对不会接受开刀这一最佳解决方案，于是干脆不提，转而推荐效果较差的保守疗法。但是这种拖延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病人耽误彻底治疗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改变“单中心”城市结构是最佳方案呢？赵燕菁引入一个城市经济学分析框架：“城市就像一个公司，土地是它的产品。城市间的竞争就是看谁能将自己的产品——土地——用最合理的价格卖给尽量多的城市消费者——个人或企业，从而使收益最大化。城市的收益主要来自两方面——税收和地租，而如果把税收也看作广义的地租的话，城市所有的收益都来自于土地。城市的增长总是受制于土地价格的上升：当城市扩张的好处大于土地价格上升的坏处时，城市发展趋于扩张；当城市土地价格上升的坏处大于规模扩大的好处时，城市的发展趋于减慢甚至停滞。因而，城市空间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寻找合适的空间

北京不再提“经济中心”，并不等于放弃了发展经济。1996年，北京提出“首都经济”概念，将首都功能与经济建设捆绑在一起。

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

赵燕菁分析，在传统的经济地理模型里，土地大多被假设为均质和无差异的，而现实中，城市土地的价格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并不仅仅是土地供给的数量决定的，而更多是由土地供给的区位决定的。几乎所有城市的物理边界，都可以近似地看作无限的，因为很少城市用完了其周边所有的土地，真正导致地价上升的原因是最优区位的供给不足。但问题恰恰是，在一个单中心的城市里，随着城市扩张速度的加快，中心区位供给必定短缺，而且规模越大，短缺就越严重。增加城市边缘土地，建设卫星城，最多只能在统计上压低城市的平均地价，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心区的短缺。而当城市进入高速成长阶段时，城市中心区往往已经被大量的现状建筑所包围，如果继续增加中心区土地供应，就意味着要面临巨大的拆迁成本。

因此，当单中心的机会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就存在一种潜在的新的均衡可能——双中心的空间结构：此时，城市不是继续扩大原有的城市中心，而是在城市建成区之外，建设一个新的城市中心。“由于使用新的城市中心的人少于使用老的城市中心的人，新中心的地价会低于老城，但是新中心的拆迁和补偿部分也少得多。因此，如果新城市中心的价值减去征地的价值大于老城的价值减去赔偿的价值，建设新城市中心的好处就会大过在原来的中心扩张。”赵燕菁指出，城市是否采用多中心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关键取决于城市发展的速度。“在城市规模增长速度上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根据国际经验，这个拐点大约出现在人口年均增长率3%，并维持25年左右的持续增长的时候。超过这一拐点，建新中心的边际成本就会急剧增加。”

如今回头去看，赵燕菁仍然认为奥运会前后是北京改变单中心结构，从而转变发展模式的最好机会。“就像一辆汽车想要拐弯，必须在车开着的时候才能拐。一旦车子抛了锚停下来，再怎么打方向盘，车都拐不过去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北京的机场、地铁几年间全建起来，人口一年上百万地增长，都是不得了。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低估了经济增长速度。”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梁陈方案，到奥运会前提出中央行政中心搬迁的动议，到2015年7月北京市正式宣布建设通州副中心，是一个漫长发酵的过程。一开始觉得不可思议，天方夜谭，过一段时间它就发酵了，最终成为现实。”赵燕菁告诉我，其实在2004版总体规划里面也有一句话，“在南苑或通州潮白河与北运河沿线的地区预留行政办公用地”，埋下了一个伏笔。



“首都”的选择：经济中心的取舍

如同一种“图腾”效应，北京“摊大饼”式的城市格局，根源于首都功能的选择，尤其是围绕“经济中心”的争议。

当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把统治中心迁到长江下游的南京之后，北京变成了一座普通城市，政治地位显著下降，预算变得紧张。城市的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开始致力于把这里建设成全国的“文化中心”和旅游胜地，同时强调把这个城市遗留下的帝国往昔转化为一种资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在长江流域，那里的城市都陆续建立了一些现代工厂，并引以为傲，而拥有百万人口的北京却几乎没有建立现代的高效率工业。在一份1930年的工会调查中，列出的工厂只有一家电力公司、一家火柴厂、一家供水公司，以及一家刚刚增设的印刷厂。

1949年定都北京让它的命运彻底转向。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未来的北京要烟囱林立”，其实也不只是一种政治雄心。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董光器曾参与过1949年后的历次北京市总体规划修编，他告诉我，1954版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是以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为前提出发的。“当时北京的首要问题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解决数十万失业人口的生计，巩固新生的政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实为当务之急。”赵燕菁认为，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逻辑，计划经济下，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税收，一个城市拥有多少大型的企业，就决定了它的富裕程度。当时最富裕的城市是上海，全国八分之一的税收都由上海贡献。首都是全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当然必须要有工业，建工厂。

不仅要建工厂，而且要建“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告诉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建成了六大工业基地，在全国都很有影响。东北郊的酒仙桥地区是在原苏联和民主德国援助下建立起来的我们第一个电子工业基地，朝阳路一带是纺织工业基地，北京工业大学周边是机械工业基地，阎头是化工基地，再加上石景山所在的钢铁和重工业基地，还有房山的石化基地。而且，全国统一划分的工业部门有130个，北京就占120个。“那时候北京完全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工业占GDP的比重最高曾达到72%，仅次于辽宁，位居全国第二。”

对“经济中心”的舍弃始于80年代初。十年“文革”之后，工业大发展的代价凸显出来，污染严重，交通堵塞，影响首都形象。与此相关的，是北京建设

长期以来“骨头和肉”的不配套，拖欠的那部分就是城市建设，比如生活用房、城市基础设施。赵燕菁认为，这也是因为计划经济的时候不需要市场，只要能用最底的成本把产品生产出来，再通过政府的划拨、调配就可以完成交易了，不需要城市的基础设施来支撑，所以对产生交易的城市的需求不是很大，也就不倾向于发展城市。董光器说，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听取了北京建设的汇报，给北京市定了性——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重工业基本不再发展。在其后的1982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也没有再提“经济中心”。

北京不再提“经济中心”，并不等于放弃了发展经济。重工业转移后，用什么来填补税收缺口呢？1996年，北京提出“首都经济”概念，将首都功能与经济建设捆绑在一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时任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他告诉我，当时首都经济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转变产业结构，摆脱对工业的依赖。那时期一大批工厂从市中心转移到郊区，原址建起了写字楼、商场、会展中心等。比如国贸中心，就是把金属结构厂外迁后建起来的，开了“退二进三”的先河。

大工厂从市中心搬迁的一个副产品是，政府取得了土地差价，可以拿卖地的钱弥补城市建设的欠账了。董光器印象最深的是皇城根遗址公园：“我们规划上坚持了30年，虽然城墙拆了，可是历史的遗址还在，7公里长，里头充满了乱七八糟的房子和仓库，一直没有钱来拆迁。后来钱从哪儿来的？就是盖东方广场的时候，有24个亿的资金划拨给了东城区，它拿出8个亿建成了一条绿带，其中6个亿都是拆迁成本。”

不可忽视北京奥运会对城市改造的巨大推力。陈剑说，在筹办奥运会的7年时间里，因为国际形象展示的压力和资金投入的动力，北京调整产业结构，最终实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今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达到80%，而全国的平均值才突破50.5%，北京在1995年就达到了这一比例，可以说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比全国至少提早了20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首钢的搬迁。董光器回忆：“规划和首钢斗争了几十年，首钢越斗越大。我们在50年代限制首钢规模300万吨，结果它来个‘明三暗五’，名义上300万吨，实际上按照500万吨生产。60年代我们说，首钢500万吨不能再大了，它来个‘明五暗八’，80年代又来了个‘明八暗十’，越发展越大。门头沟是离北京最近的风景区，可是由于首钢在那里，门头沟老发展不起来，它把整个西郊的河全部污染了。最终首钢搬迁是中央决策，花了500个亿，在曹妃甸建设



左图：2008年奥运会后首钢搬迁，是北京经济结构调整的标志性事件

右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佳

一个新首钢，原来的用地置换成了经济文化产业用地，把永定河绿化带、生态带建设起来了。”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城市收益来源和模式发生了变化，正是因为土地批租的收入，再加上很多央企总部和商业银行的税收，北京获得了对全国经济的辐射力和支配力。

“无论鼓不鼓励、争不争论，北京事实上一直是经济中心。”赵弘说，按照最初的认识，“首都经济”的本质是知识经济，核心是高新技术产业，但在实践中，“首都经济”内涵不断拓展，也带来北京日后不断膨胀的经济雄心及人口增长。特别是进入90年代，随着土地市场的引入——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化突飞猛进。更大的推动力是在2001年申奥成功后，中央拨了2850亿元搞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建场馆，挖地铁，修污水处理厂，北京进入快速发展期，相应的投资和人口也被吸引过来。董光器告诉我，之前北京每年的新增人口大约30万，结果那几年每年进来80万人，相当于一年增加一个大城市。

与其他国家的“超级首都”不同，特别是与那些后工业化城市不同，北京的“首都功能”和“经济功能”一直在事实上叠加在一起。陈剑告诉我，中央和北京在经济上已经很难分割了。去年，东城和西城两个区的税收就占了整个北京税收的5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央企。所以，尽管有人呼吁未来将城区中央的这两个区合并成为一个“首都特区”，将首都功能从北京独立出来，但是第一步的财税独立就很难进行。

一边是政治统治权，另一边是与之并行发展的经济统治权，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佳指出，由于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心城区的持续累积，北京的首都功能和经济功能在空间上进一步“抱团”，形成了中心城区高密度、高强度的集聚格局。由此，北京既面临着类似发达国家首都城市的“功能转型”，也面临着类似发展中国家首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环境压力加大的双重挑战，城市病加重。

出口：从“大北京”到京津冀

“不能把城市病都归咎于‘摊大饼’。”董光器说，任何一个城市现代化发展都是从摊大饼开始的。比如伦敦，刚开始才几平方公里，现在发展到330平方公里，加上外伦敦是1500平方公里，这可比北京的饼大多了。“一个城市要盖工厂，要就业，要解决生活问题。一开始工厂盖了，来不及盖住宅，来不及建公共设施，只能依托旧城，当然大饼就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如果进入到经济发达的程度了，经济结构转型了，饼还在继续摊，那这个大饼就太大了，会引起大城市病，这个时候就要开始疏解。”

摊大饼，其实是一种单中心扩张模式。赵燕菁认为，在城市缓慢发展期，“摊大饼”是最有效的增长模式，但是进入高速增长长期的时候，单中心结构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那些采取单中心扩张的超级城市——无论东京还是北京，所有企图限制城市增长的理想都失败了，尽管这些城市被加上一个又一个“箍”，城市仍然无情地膨胀。外围的“卫星城”在被膨胀的母城吞没前，没有一个表现出成长的活力。环城的道路像一道道水坝一样，试图将城市的蔓延“截住”，但外溢的城市功能撞到这些“大坝”上反弹回去，给传统的城市中心造成更大的压力，直到越过这道水坝。于是人们又开始下一个水坝的建设。北京的地价就清晰地反映出这种“外溢一回波”的过程，城市地租的级差几乎完全是根据与环路的关系确定，环内环外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而在一个城市的成长完全稳定下来之前，这种“摊大饼”式的蔓延将会继续下去。

赵燕菁形容，受制于单中心结构，北京选择了“外溢一回波”式的常规增长模式来处理超常规增长的现实，于是表现出典型的城市病症：城市发展的成本急升、各种功能在老城狭小的空间里重叠发展、历史名城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交通问题日趋严重、城市形象特色丧失。

申奥成功之后，尽管理论界掀起一股从“单中心”到“双中心”转型的讨论热潮，但是实践中，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转变通过控制人口和产业来限制城市增长的思路，试图把城市功能向外疏解。赵燕菁形容：“城市的生长和人一样，操心他应该多高是没用的。想让他不再长，这个本事可没有。但是长大到一定时候，就要分解。他需要单独的心脏，单独的肺，去承担不同的功能。”

疏解北京，就要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框架下去考虑。吴唯佳告诉我，实际上从城市研究到区域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了。“这一课题由吴良镛院士领衔，在1996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以‘大北京’为名。当时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大伦敦’‘大巴黎’‘大东京’的概念，但是北京对这个提法还是有点担心：‘大北京’，是让北京去领导天津？领导河北？人家愿不愿意？北京行不行？后来，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建议，就划定一个区域范围，用‘京津冀’的概念。”

虽然没有用“大北京”来命名，但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围绕北京展开的。吴唯佳参与了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区域协调发展策略”的制定，他认为，京津冀问题的核心，一是北京怎么发展，二是北京作为首都，要成为带动国家发展的龙头，只靠当时北京市域范围的1.6万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肯定不行，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腹地安排，更高的区域目标——提出了“世界城市”定位。



（蔡小川摄）



从历史上看，京津冀一体化顺理成章。董光器说，明清北京城的辖区就比现在大，顺天府把天津和保定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北京是军事重镇，自身没有港口，天津原来叫天津卫，就是个防御工程。这样一来，北京面山靠海，有充足的水源，有比较广阔的平地供建设。但是，如果不能打破目前三个区域行政割裂的制度壁垒，京津冀一体化仍然是个乌托邦。

“在计划经济时代，天津就和北京老较劲，北京搞什么，天津就搞什么。你建钢厂，我也建钢厂。这两个相邻的城市，就有40多个同样的工业门类。那时候有个故事挺典型，国家计划要在华北建一个炼油厂，合理规模是30万吨，可是北京要，天津要，河北也要。当时北京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是吴仪，她老跑计委去争取这个项目。后来吴仪开玩笑要市长给她报销一双鞋，说鞋都跑破了。三家争得太厉害，最后总理拍板，分成三部分，10万吨给北京，10万吨给天津，10万吨给河北。但这一分为三，规模效益就没了。进入到市场

经济时代，说京津冀一体化，我们规划上也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鼓吹，可就是一体化不起来，各有各的小算盘。当初高耗能的企业非要建在北京，后来疏散，又把这些效能低、污染大的企业疏散到河北去了，相当于甩包袱。人家太穷，这个包袱还得接，接完以后，经济还是发展不起来。而且反过来，河北省的空气污染严重了，又污染到北京来。这怎么能一体化呢？”

既然行政壁垒是客观存在的，不如换一个思路，建立一个利益共享机制。赵燕举例如纽约和新泽西的做法，新泽西很便宜，纽约这边很贵，两地差异客观存在，怎么办呢？“它们不是把两个城市合起来，而是共同成立一个公司，叫纽约港务局，两家各拥有一半的股份。比如码头，新泽西便宜，纽约贵，就把纽约的码头卖了，建高楼大厦，然后港口运量全转到新泽西去。这样一来，赚的钱两个城市对半分，很多城市基础设施、地铁、桥梁，也都是纽约港务局建的。如果没有这个机制，那么修隧道是纽约出，还是新泽



左图：2014年5月，下班高峰期的三里屯车辆拥堵难行。首都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叠加，让北京一直面临人口增长和环境压力

右图：2015年10月，通州区一处房屋拆迁现场。这里将成为北京行政中心的搬迁目的地，新的城市副中心

西出，收的费用是归你，还是归我，根本协调不下来。就像今天的京津冀一样，关键是要解决利益分配。”

吴唯佳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形容为“弹钢琴”。他说，在他们制定城市总体规划之后的2008年奥运会，为北京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打开了一扇大门，当时也顺势在“绿色奥运”“人文奥运”标准下，确定了一系列区域协同发展的方案。但遗憾的是，奥运会之后马上爆发了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些计划。“一时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所谓的实体经济上，各级政府关注的都是GDP指标，是怎么能够拉更多的企业来投资，怎么建设更多的项目。造成的结果就是‘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交通越来越恶化，空气越来越差，旧城越来越衰败。2013年习近平上任，把京津冀协同重新提了出来，挑战的就是大家如何不再一股脑地各自使蛮劲儿，而是在一个大目标下，各司其职，携手弹钢琴，把这个钢琴弹美了。”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局里去疏解北京城市功能，关键的问题是疏解什么，如何疏解。赵燕菁认为：“以往那种把‘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迁出去的疏解模式，不可能成功。因为要素就像流水，流向何

方，取决于哪里更低洼。由于中央政府的存在，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极大的落差，只要这个落差不缩小，经济要素涌入北京的总体趋势就难以改变。要让要素从北京流向周边地区，就必须创造一个比北京公共服务更好的地方。”

要创造一个公共服务更好的地方，行政功能的转移显然是最有效的。赵燕菁认为，过去北京的城市增长并不慢，但没有把核心功能疏解出去，各种功能都搅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建卫星城还是新城，都还是在把“大饼”往外摊，中心城区的压力继续增加。“就像一个人变胖了，血液增加了，心脏的压力还会恶化。现在北京要另外再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才能缓解心脏的压力。通州副中心就是这样一个辅助的心脏。”

通州命题：从增量转向存量

在2004版总体规划中埋下的“行政中心”伏笔成为现实，最大的悬念是，十几年后这一方案还适用吗？

采用跨越式增长模式有个前提，就是城市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一旦跨越了这一阶段，也可能会失败：荷兰 20 世纪 60 年代在兰斯塔德地区集中建了一批新城，新城本身十分成功，但老城也随之衰落了。北美的新城建设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新城的成功往往意味着老城的衰落。道理很简单，如果城市化已经饱和，那么一个地区吸引来新的人口一定带来另一个地区人口的减少。东京则是在高速成长条件下拒绝及时改变城市增长模式，从而丧失发展机会的相反例子。首尔的教训几乎是东京的翻版，虽然最终迁都，但彻底改变城市结构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

这就要做一个判断——北京还会增长吗？北京的增速还可以支撑副中心的建设吗？赵燕菁认为：“从全国来看，城市化水平已达 56.1%，很难达到过去 10 年的增长速度了。假设今年就停止建设的话，我们已建成的空间可以装进去 80% 的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不到 60% 的人口进入城市了，意味着很多城市都过剩了。但即使全国整体的城市化停止了，城市之间的转移还会停止，这个时候北京等几个大城市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就像英国一样，其他的城市都开始衰落了，但伦敦还是在增长。”他认为，这个时候把中央行政中心往外搬已经不现实了，选择北京行政中心更合适。“过去 10 年的金融危机，围绕中央又新增了很多建设，体量太大了。如果搬到通州，老城里还有足够的功能去填补中央行政中心搬迁后的空白吗？老城衰落的风险就增加了。假设今后增长的速度没有像过去 10 年那么快，北京市政府搬迁风险会小一些。”

随之而来的疑问是，通州，会不会成为一个跳动有力的辅助心脏，分担原来心脏的超负荷压力呢？再进一步，北京会不会形成一个哑铃式的双中心结构，一边是北京，一边是首都？

从地理上看，选择通州作为副中心理由充分。尤其是放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格局下看，它处在京津冀桥头堡的位置，能直接带动河北和天津的发展。对北京来说，现在每天大概有 20 多万人要穿越通州到市中心上班，如果通州发展起来，很多人就可以就近选择通州就业，也减少了北京的压力。吴唯佳告诉我，从历史上看，通州是北京的东大门，也是东大仓，漕运在那边卸货，船上的东西通过人、车往城里运，北京城的发展和通州城的发展是密切关联的。但是到了近代，通州发展并不理想。2004 年制定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他们讨论怎么才能给北京疏解找到出路，在外围规划了 11 个新城。其中提出三个新城重点发展，就是亦庄、顺义、通州。亦庄是经济开发区，顺义有机场，在做汽车，

问题都不大，唯独困难的就是通州，没有产业。“当时确定通州是综合服务功能，但 10 多年来，不是特别理想，没有服务中心城，反而成了睡城。”

通州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何而来？赵弘认为，北京目前的产业是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的集聚规律更微妙。“以前制造业的转移是成本导向，生产成本、用工成本以及环境成本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企业会主动地外迁。但是北京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完成，现在北京第二产业只占 19%，剩下的主要是服务业。服务业是人才导向，依托于城市区域的品牌效应。比如 CBD、金融街，经过几十年的打造慢慢形成品牌，很多企业就愿意到这些区域落户，人才也形成了在这个地方工作的习惯。如果一下子搬到通州，一些人可能会选择跳槽。所以这些年北京很多外围新城想发展经济，但是收效不是很大。从数据上也可见一斑，昌平的居住人口是就业人口的 19 倍，通州是 9 倍，大兴是 3.6 倍。”他认为，通州的潜力在于，相对于短期人口集聚，行政中心搬迁对社会释放的信号效应更大。

一定程度上，设立通州副中心延续了土地财政的思路。“上半年，国家发行货币的 90% 以上进了房地产市场。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经济都是靠卖地来支撑。现在如果没有新的增量，不建新的城市中心区，那么土地财政马上就要停止。”赵燕菁指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还需要一定的增量来维持，但是增量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整个国家都在从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从怎么建设城市，变成怎么管理城市。”

能否转变增长模式，也是通州副中心的未来挑战。赵燕菁认为，通州建成一个新城，几乎没什么风险，但这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怎么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这是在一开始就要摸索的。“比如现在卖地，就不要拍地价了，而是要拍税收。每年谁承诺交的税收多，就把这块地给谁。这么一来，地价可能一下子降下来了，但每年的现金流会增多。买房也是一样，可能房价并不高，但要交房产税。如果还是延续以前拍地的玩法，收益再高也是一次性的，而不是现金流。不要等到把房子卖了以后再说，现金流没了，才开始收税，那个时候没法收了。对于政府来讲，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就能从一次性收益变成长期收入，不只是把地铁、轻轨、基础设施都建起来，而且能够把地铁的支出、污水的处理、公共设施的维护统筹考虑。通州副中心的建设，应该在这方面率先尝试，从增长方式转变入手，建成一种新型的城市。”

（感谢实习记者赵钺君对本文的帮助）



上图:2011年,北京地铁拥挤的车厢内几乎再无落脚之地

下图:北京年轻人喜爱的三里屯商业区。因使馆、商家、酒吧聚集,这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消费者





(陶然 摄/视觉中国供图)

成为城市副中心，通州状态

记者 / 丘濂 实习记者 / 赵钊君

城市副中心的定位,让通州终于从“睡城”中苏醒。

抢房

9月3日,早晨8点半,此处位于通州的楼盘售楼处门前已经聚满了人。这个大体量项目,包含住宅、公寓、商业中心等形态,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即将出售的是最后两栋的其中两个单元,一共250套房。

2008年,通州政府为了解决“睡城”问题,就已经不再批准纯粹住宅项目了。一家地产中介的销售经理告诉本刊,通州现在还能提供新房的楼盘不超过4个,以大户型为主。所以这次出售的两个单元,包括一居到三居的户型选择,是个难得的机会。写着“收官钜作”“清盘爆抢中”的几排红旗簇拥着售楼处,分外显眼,维持秩序的保安也在那里值守。

等待的人手里都有号。5天之前开始排卡,一共放出500个号。为了能够到时选房占得先机,有的人前一天中午就到了,在售售楼处门口熬了一宿。



左图：2015年8月，位于首都东部的通州正式确定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加快了建设步伐

右图：2016年8月21日，位于通州区台湖镇的自住型商品房项目受到众人青睐，近万人到场排队申购

林莉坐在人群之外的休息椅上，她是300多号，是否能选上还不一定。她在北京市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工作，随着北京市四套班子在2017年底迁往通州，她也需要去通州工作。“公务员可能会有一些住房安排，但事业单位就不一定了。”两星期之前听说同事要在通州买房，她和家里商量了一下，觉得自己也应该考虑买了。她大学毕业已经4年，在市里租房从1000多元涨到将近4000元，如果要来通州工作，肯定也要来通州居住的。这处楼盘的售价已经达到均价5.3万元/平方米，林莉的打算是个朝向好的一居。她知道排卡的消息时，一天已经过去了，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

赵凡在和母亲抱怨着之前在通州错过了买房机会。她今年24岁，北京人，刚参加工作不久。本来在银行工作的她满一年之后有个“行员贷款”的福利，但是“房价涨得太快了，等不了”。她现在还和父母一起住，每天坐地铁从北三环去复兴门的金融街上班，从来没有想过要搬到通州住，想的是赶紧买一套，过一阵再转手卖掉。4月份有买房计划时，中介就带她看过这处楼

盘。当时开盘的是小区里的“楼王”。“售楼处说，我们到的那天是最后一天排号，千万别错过。我们心想，一来就赶上这个，哪儿那么寸啊，觉得对方在忽悠我们。结果4个月过去，均价已经涨了1万元。据说最后剩下的两个单元还要再涨，估计能突破6万元。”

选房的速度很快——用赵凡母亲的话说，买套四五百万元的房子不亚于买白菜。销售人员拿着喇叭分批叫号放人，一个号只能有两个人进去。进去后先花半个小时填表，然后上楼对着销控表来选房，已经销售掉的房子贴上了封标，也就5分钟不到的时间选择。买完房子的人被引导走另外一个出口。每当一个人出来，就呼啦围上来一群等候者，打听“还剩下什么户型？”“估计今天能够选上吗？”然后各自不断调整心中的备选方案。

站在几乎贴满封标的销控表前，在销售人员不断的催促声中，张晓丹还是有点发蒙。按说她在买房上是老资历了。她在2000年就先后在通州买了两套房子——最初是出于刚需，因为结婚之后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她那时上班的地方在国贸。尽管身边的

人都不看好她在“大农村”买房，但宽敞的三居和不算久的交通时间改善了她的生活。2004年她卖掉了其中一套房子，从每平方米2000多元涨到快5000元，对方付了她全款60多万元，那成为她房产投资赚到的第一桶金。紧接着她又在什刹海和五道口两个黄金地段贷款买了房子。“我先生一点都不支持，说每天睁眼就要还债，后来还不是佩服我的眼光？”此时此刻，张晓丹纠结是选一个楼层高、朝向好的两居，还是选一个可能被挡光的二层三居室。最后还是决定要了三居室，每平方米能少1500元。选完房后，她特意跑到新楼前看了看。那里有一小块不属于开发商的空地，“只要别盖楼房就行”，接着她安慰自己“如果种上树就很不错”。她选择这处楼盘还有一个原因——它离自己另外一处通州住宅较近，不排除将来他们全家都来通州生活的可能。这处楼盘距离正在建设的环球影城只有1.5公里，她有理由相信这里将是一片繁华成熟的社区。

下午两点左右，250套房就已经全部售罄。从每平方米1万元涨到5.3万元，这处一度定位为“价格亲民的刚需大盘”经历了7年时间，它也是通州房地产发展的缩影。它最早的项目负责人告诉本刊，2009年他们拿地后第一次销售，估算要卖到每平方米9000元才能盈利。可他开车在周边转了转，荒凉一片，而且3公里之内的房价超不过每平方米7000元，这让他伤透了脑筋。结果他们在圣诞节开盘，就已经是每平方米1万元，第二年3月尾房价格涨到每平方米2.3万元。2009年，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聚焦通州，借助国际国内资源，尽快形成与首都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际新城”。2009到2010年，该处楼盘正好赶上了“现代化国际新城”的概念给通州楼市带来的第一次升温。

2015年7月11日，北京市委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纲要〉的意见》，提出未来将聚焦通州，加快推进市行政副中心建设，争取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通州作为行政副中心的定位正式提出。在今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州的定位更准确地表述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尽管北京市政府及时推出了严厉的限购政策——一次是2015年8月针对商品房的限购，第二次是今年5月针对商住项目的限购，除了名下没有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外，其他没有通州户口或者没有在通州缴纳社保和纳税的人，基本没有资格在通州买房，住房交易量大幅减少，但房价依然涨幅很大。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

北京一直在为摆脱“单中心”格局对城市承载力、运行效率的牵制进行摸索，通州从卫星城到副中心的定位变化就是这种摸索的体现。

2016年8月的统计，通州普通住宅成交均价比去年同期增长52%，商务公寓增长34%。“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经成为地产项目宣传上一定要用到的词。

成为城市副中心

过去30多年来，北京一直在为摆脱“单中心”格局对城市承载力、运行效率的牵制进行摸索，通州从卫星城到副中心的定位变化就是这种摸索的体现。

早在1958年，北京就提出了在周边发展卫星城的想法，之后由于政治运动干扰，直到80年代才付诸实践。《通县志》记载，1986年，北京大学通州卫星城调研组、通县人民政府运河旅游区调研组曾召开“通州卫星城及运河旅游区调查研究汇报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及专家200余人参加会议。一年后，北京市确定通州镇为北京市卫星城。1993年国务院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提出建设10个边缘集团和包括通州在内的14个卫星城。

但通州作为卫星城来建设并不成功。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多次参与北京城市规划讨论的专家赵弘将失败原因归结为几点：首先是卫星城和主城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要在30公里到70公里之间。如果太近，功能和空间没办法区隔；如果太远，交通又没法安排。另外，主城和卫星城之间一定要有时速150公里左右的市郊铁路，让卫星城的人可以在20多分钟内进入城市主城区。第三，主城区需要严格控制规模，不能摊得过大。这三点北京主城区和通州在发展中都没做到。

考虑到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2002年5月，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修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工作任务。2005年1月，国务院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这一版规划提出了构建“两轴一两带一多中心”的新城市空间格局，在卫星城的基础上，建设8个功能性中心和11个新城，其中顺义、通州和亦庄为3个重点建设新城。

“东京是一个时期只搞三个副中心，我们一下子搞了11个新城，加上8个功能性中心，一共有19个点很多，非常分散，目标又不突出，也没有通过有意识的引导，把人口、产业、资源引导到一个特定空间去。而且‘新城’和‘老城’之间是一个时间关系，表明不了层级关系。因此这个阶段的新城建设也没搞起来。”赵弘说。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还在往市中心集聚，规划只好被一再修改，突破绿化隔离带不断摊大饼。



从2005年开始，每隔一段时间通州的各大论坛上便会传播关于通州定位要提升的帖子，这被当地人戏称为“月经贴”。除了各个楼盘以此为卖点，通州并未有实质的变化出现。

赵弘是将通州发展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积极推动者。通州区政府的一位公务员对本刊回忆，他第一次听说将通州定位为城市副中心的观点就是在赵弘的发言中。那是在2010年8月，由北京市发改委和通州区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城市建设中的通州国际新城发展”论坛上。赵弘建议通州的定位要高，要成为副中心，并且整体来讲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数量不能超过三个。“北京副中心，现代新通州”这是当时赵弘为通州的品牌形象想出的一句口号。

通州区一直在努力争取“副中心”的名号最后能“花落通州”。区长岳鹏在发言中表示，那次论坛的一个更深层次意义就是想通过专家论证，确定通州的新城定位，要给市委市政府起草一个新城规划。“如果像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包括重庆两江新区上升到国家战略概念，会建设得更快更好，得到的支持和优惠会更多。”

2012年6月，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落实聚焦通州战略，分类推进重点新城建设，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尽快发挥新城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政府的那位公务员说，在这句话的理解上并没有将通州和城市副中心完全画等号，但是通州区的领导马上重视起来。赵弘记得，党代会结束第二天，时任通州区委书记王云峰就主持召开研讨会，邀请他和另外三位专家就“副中心”问题进行座谈。“他们感觉多年的愿望要实现了。过去招商引资很困难，现在变成了招商选资，由被动招商变成主动选择。”

通州区委党校的副教授林学达告诉本刊，2012年通州区上上下下都很关注副中心的话题，为了在干部培训中解释通州作为副中心的含义，他开始从事相关研究。通州区委党校对项目给予了很大支持，林学达去外地调研时的资金、交通便利和单位疏通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他还参加过通州相关部门组织的调研活动，前往天津、上海实地调研副中心建设。林学达最终写了一本《北京城市副中心探索与实践——基于北京通州区的个案研究》的著作，“有很多人来要书”，最终发行了1万本。林学达也强调，随着2015年北京市政府整体搬迁的确定，现在所说的“城市副中心”内涵已经不一样了。

通州能被定为城市副中心，有它独特的区位优势。

它距离天安门广场20公里，距离国贸桥13公里。如果拿圆规，以国贸为圆心，画一个圆，东边是通州城区，西边就是西三环。在远郊区县中，通州的位置离中心城区最近。另外它紧挨着天津的宝坻和武清，以及河北的“北三县”，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京津冀。未来除了发挥对中心城区人口的吸引能力、疏解非首都功能外，通州还会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曾经副中心的备选区域也有丰台、石景山和门头沟的西南一带，但因为再往西就是山地，辐射度不够，因而被舍弃。

发展的困局

一位通州区政府的退休官员告诉本刊，仅凭通州自身力量，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通州人自己瞎折腾没用，要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通州的建制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设置的“路县”。它后来因为运河而兴旺，元明清三代是通州在古代史上的黄金年代。曾任通州文物管理所所长的周良向本刊这样描述：“应该说是先有通州才有北京，因为北京是漂来的北京。”元朝始至元二十六年（1289），京杭大运河形成，北端就在通州。从此京城中兴建宫殿楼阁所需要的木材、石材和砖都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存放，需要时再送往京城。不仅是建筑材料，还有粮食和物资。《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通州成为南北物资的集散地，城中有供给京师的四大粮仓。1901年京津铁路修成，国家的粮草运输不再依靠运河兴船；太平天国期间，某些河段被起义军控制，民间商船的运输也中止，通州作为漕运码头而形成的市井繁华渐渐褪去。“元明清三代，通州为拱卫、建设和安定北京做出了重要贡献。”周良说。

通州境内有河流13条，在北京的远郊区县中河流最多。它又处于永定河与潮白河的冲积平原上，一马平川，土质肥沃。1949年之后直到70年代末期，当时还称作通县的通州都以发展农业为重心，成为首都粮食、蔬菜和副食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肯定了它的价值，并将这种在南方率先发展起来的企业形式向全国农村推广。在1983到1993年担任通县县委书记的卢松华向本刊回忆，自从他上任之后就在稳定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了1985年，通州



张鼎璋

乡镇企业的数量达到一个高峰，全县有 1636 家。卢松华说，通州在发展乡镇企业上有它的人才优势。“它离城区最近，非农业人口就最多。许多农民在城里当工人，退休的也多。”他们还向苏南地区学习，设立了“星期日工程师”职位，周末高薪请来北京城区的工程师来企业指导攻克难关。“1986 至 1990 年，县委县政府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乡镇企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方针。那时乡镇企业是‘五行八作’‘东边不亮西边亮’，形成了机电、轻纺、化工、建材、印刷、工艺品六个主要行业。”谈起那个乡镇企业蓬勃兴起的八九十年代，卢松华形容各个区县的领导为了搞活经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时候通州的竞争对手是顺义，无论是倚重农业还是发展乡镇企业为重点的工业阶段，两个区县的产值都不相上下。

90 年代中后期，全国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大背景上

中国告别短缺经济，企业平均利润下降；并且政企不分的问题日益在束缚企业的生命力。从《通县志》记录的数字来看，从 1990 到 1996 年，乡镇企业的数量和吸纳的就业人数都有下降。2000 年乡镇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是 14.93 亿元，比 1996 年的 15.7 亿元要少。进入 2000 年后，各个远郊区县都在为当地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

2002 年韩国现代汽车城的落户和 2004 年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的落户为顺义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依托机场，顺义发展起来航空总部、航空服务、航空维修和航空培训等航空产业，形成临空经济航空产业集群；也依靠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培育了保税服务、现代物流、国际会展、特色金融等临空型现代服务业。如今顺义区 80% 的 GDP 都来自机场周边不到 60 平方公里的地区，顺义今年仅上半年从包括现代汽车、北京汽车等制造企业获得的税收就已经超过百亿



左图：通州十八个半截胡同是通州老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仍保留着当年的格局

右图：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图为北京通州段大运河

元，顺义和其他区县的经济收入差异一下子就加大了。

“这是北京市从整体功能布局的角度考虑产业分布安排，和之前单纯交给各区县自己发挥来干不一样了。”卢松华说。而对于通州来讲，它也迎来了发展机遇——2003年地铁八通线全线贯通，通州成为第一个通地铁的郊区。

通州的选择是将重心放在房地产业。今天坐在八通线上就能看到那个阶段的建设成果：密密麻麻、连绵不断的住宅楼，几乎没有商务写字楼，也缺乏大型商业配套设施。根据媒体报道，2003年通州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增速达到北京全市平均增速的6.8倍，而同期商业办公楼的新开工面积是零。

通州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幅。根据通州区政府每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表，2003年当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就比去年增长了6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增长率是个低点只有

14%，但转而在通州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国际新城”的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又达到111.9%，是过去10年中的最高值。“土地财政”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GDP，却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实体经济被边缘化的结果是通州人口急剧增长，但依旧没有形成新的产业吸纳人群就业。仅仅靠着相对便宜的房价，以及还算便利的交通，通州成为一座“有城无业”的“睡城”。赵弘告诉本刊，通州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产业发展的速度相差9倍之多。

现在早晚高峰时的“潮汐”现象仍然明显。早上8点半，到达四惠站准备换乘一号线进京的人们被后面的人流推搡着往前走，而从四惠站开往通州的车厢里却空空荡荡，让人想起欧洲那些清爽安静的城际列车。疲于奔命的上班族调侃着这条让他们又爱又恨的八通线，他们称梨园站为“壮士站”，九棵树站为“烈士站”，换乘车站四惠站则是“恩怨解决站”。

通州也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但由于基础薄弱也没有太大起色。2011年，北京奔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和物流配套项目曾考虑落户通州。了解此事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向本刊回忆，当时区政府非常努力争取项目落地，在马驹桥镇也拆迁、平整好了土地，尽管中间拆迁还有不小的阻力。当时的新闻记载，在与考察团队座谈中，通州区副区长崔志成表示：区里高度重视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2009年“北京汽车动力总成”项目选择通州就证明通州区有承载汽车零部件大项目的能力和空间；另外区委区政府也会以优于“动力总成项目”的服务水平，倾全区之行政资源，高度负责地抓好此事。最终很遗憾，项目仍然去了亦庄。“因为亦庄本来就有奔驰厂的一期。当时亦庄想争取让三星电子入驻园区，奔驰就计划找一个不远的地方建设二期。正好通州距离亦庄不到5公里，符合要求。后来三星去了西安，奔驰的项目也就自然回到亦庄。”

“通州一直以来都苦于没有支柱型的产业和企业。”这位工作人员说道。在2013年通州纳税大户前十名的排行榜上，除了第一名北京卷烟厂和第六名中国烟草公司北京分公司外，其他都是房地产企业；对比顺义，第一名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外，首都机场、燕京啤酒、现代汽车全部榜上有名，房地产企业只占两家。

安居，以及乐业

通州缺少对产业和人才的吸引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也缺乏优质的公共资源。“中国的城市是由政治地位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数量和资源的等级，北京的发展最为典型，借助于首都地位吸附全国资源，你看所有的公路、航路、铁路、物流、人流、资金流和现金流都向北京这个心脏汇聚。它犹如磁石一般，对资源的吸附能力是空前的。”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余钟夫对本刊说。“按理说大树下面好乘凉，通州也应有一些优质公共资源，但是，因首都地位而高度集聚的这些优质资源目前主要集中在主城区。拿北京和上海来说，都是大城市，但是上海周边的江南县市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周边的人们未必都愿意去上海市区工作生活，对上海就会起一定分流作用。这固然和历史积淀有关，也是由于上海和北京不同，上海不具有直接政治性吸附的功能，更多的是依靠城市强大的金融贸易服务地位和港口优势。”

针对这块短板，成为城市副中心后的通州正在实

行“内升外引”的战略，引入一批学校和医院，同时打造本区医疗教育品牌。今年，新建北京五中、景山学校通州校区，引进名校达到15所。首师大附属中学、人大附中、北京二中、北理工附中秋季就实现初高中招生。医疗卫生方面，三座三甲医院——安贞医院、友谊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即将落户通州，新华医院年内投入使用，东直门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两个医疗中心也将于年内竣工。

这种分院和分校建立的效果如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评判。余钟夫讲到之前的一个案例：东直门医院在河北涿州开了分院。老百姓去到医院看病，才了解到涿州这个分院，总院是在北京。于是好多人就干脆直接来东直门了，那边就成了一个窗口。“这是长期以来资源集中而造成的现象。基于目前的发展现状，分校和本校、分院与本院之间的配置和品质一段时间内做不到完全相同，所以难免在分散人口的目标上会打折扣。”

成为城市副中心后的通州既有的产业结构和类型也需要改变。“过去的工业园区，再搞制造业就不适合了，除非是高精尖科技制造；宋庄有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再加上环球影城的落户，文化娱乐休闲产业是未来的方向；商务中心区则可以发展高端商务、总部经济。”赵弘说，“以往的存量很难迁到通州。但是在城六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通州的位势提升，适合承接高端资源的增量。”

在商住项目没有限购之前，商务楼宇的开发商面临资金和经营压力，一度将空间大量散售给投资者。通州投资促进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他们现在也在和开发商博弈，争取办公间能够卖给真正优质的企业。“一般的小型公司可以去中央商务中心的写字楼，大企业则可以去商务园或者专门为总部型企业打造的环渤海高端总部基地。”

通州境内现有工业园超过10个。赵弘评价：“园区数量过多，资源没有整合。园区之间存在着竞争，对产业落地的特色化没有政府引导。”现阶段通州也在对园区企业进行着调整。

去年落户通州光机电一体化基地的罗克佳华信息技术公司是一家代表未来通州产业趋向的企业。在来之前，罗克佳华先后与通州区合作了环保局综合信息化项目以及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环保局综合信息化项目是在全区搭设大气环境监测站，每分钟上传数据，可以立刻确定污染源的种类以及出现的时间、地点，解决了雾霾的定位。通州区因此能够迅速对污

染问题展开治理，2015年便摘下了PM2.5绝对值全市第一的帽子。另外的水质监测系统则可以让环保局的监控中心实现水质的实时连续监测和远程监控。通州区政府很希望罗克佳华这样和环保相关的技术企业来到通州，而董事长李玮也正考虑重新调整企业架构、组建集团，来做生态大数据、环保公共服务平台，未来准备公开募股，因此也需要有地方作为总部。双方一拍即合。

董事长李玮告诉本刊，因为通州以前没有类似企业落户，所以政府非常重视，政策集成做得也很好。“为了使入驻园区的手续能够简便，投资促进局和其他部门联合在一起给我们开了好几次会。假如在海淀区，这样的企业还有不少，它对你不会在乎。”李玮认为，他的企业正是青春期的阶段，通州又刚刚定位为副中心，双方正好可以一起成长，比如关于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李玮说，由于北京市要求总部迁移两年之后才能解决户口，所以现在来通州工作的基本都是单身年轻人。“我们希望招聘到本地员工，可这回的本地招聘发现个痛点，计算机、信息化方面的高端人才本地没有，外地又暂时不愿意来。我们这样的企业扎根下来对人才的聚集有好处。”企业入驻的光机电一体化基地虽然已经有15年历史，但在李玮看来，园区里的企业类型比较杂，且良莠不齐。“我们期待在这边逐渐有个产业链的聚集。”罗克佳华所做的物联网前端需要设备供应商，后端是做环境评价与咨询的公司。随着它的入驻，对产业链上的企业也有吸引力。

而在另一位京通招聘网的负责人王志锐看来，这几年在通州有招聘需求的公司，对人才的要求和待遇已经有很大区别。京通招聘网2008年创立，当时因为奥运会的缘故，通州的人才交流市场关闭了几个月，人们急需有个平台寻找工作。他提到，2013年是个明显的变化节点。之前用人单位要么是工厂，要么是餐馆那样的10人之内的小型服务业，之后逐渐有了创新类、IT互联网类、金融理财类、培训教育类的机构；薪资水平则从过去的3000元左右，到现在大多数5000元起步，5000元到1万元之内的职位居多。“目前中高端人才向通州的流动，尽管还未能形成聚集效应，但趋势已经显现出来。”

关于未来：速度中的平衡

2017年底，北京市政府四套班子将完成搬迁通州，同时为通州带来约40万的新增人口。倒计时的这一

年半时间里，通州承担着巨大的拆迁、疏解和调控的任务。去年底通州区副区长崔志成表示，通州2014年底有135万人，以水资源承载能力测算人口上限，2020年要控制在160万人，包括随着行政事业单位搬迁而转移过来的人。控制人口、同时让通州更符合城市副中心的定位措施之一就是清退中低端产业、工厂大院等历史包袱，以及关停低端市场和批发市场，减少人口的同时能够为副中心建设留出足够空间。

李慧所在的召里村正在进行拆迁协议的签署。这片潞城镇下面的土地是将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行政办公用地，第一批涉及6个村子拆迁，召里村属于第二批的10个村之中。他们要在9月1日到10月4日完成搬迁，9月8日先要签署一份对自己田地的补偿协议，然后再进入民宅签约的程序。“我们如果有问题，也基本得不到解释和反馈。一些公示感觉只是走个形式而已。”李慧说，“比如签署的合同能不能一式两份，房屋测量面积有疑义怎么处置？”

对于第一批拆迁，政府表示“仅用100天时间。在前期准备不足两个月、没有现房安置、多村域大规模拆迁同时启动、建设地铁线路及城市干道多次拆迁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下，仅用13天就完成了住宅100%的签约”。第二次的拆迁难度不亚于第一次。在速度与和谐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仍然是个棘手的难题。

李慧说，通州变化之快，让“土著”们都感到措手不及。他们约会时仍会提那些老地名，比如“银地大厦”“果园环岛”，尽管外面的人会对这些已经消失的地标感到一头雾水。她赞叹这几年通州在环境治理上的提升，闲暇时喜欢去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这片2009年开放的公园具有2500亩水面和8200亩绿化面积，是城市中难得的一片“绿肺”。“过去讲通州是‘九河下溜’，它河网密布但同时水污染问题严重。现在政府花大力气治理后，水环境的城市格局成为通州最别致的景观。”按照政府预想，到2020年，通州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33%，绿化覆盖率达到5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8平方米，都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

在通州成为城市副中心的这一年，李慧还发现早晚高峰这座城市也开始堵车了，停车费也涨价了。在这个要为北京解决“城市病”的地方，很难说它自身不会被“城市病”所困扰。新的规划正在酝酿当中，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规划阶段就有所预见和控制。李慧对故乡有所期待的同时，也怀着一丝忧虑。■

（部分采访对象的名字为化名）

梁陈方案，历史与现实

主笔 / 贾冬婷



60多年前北京城改造中“梁陈方案”的出局，缘于政权更替之时政治、经济、情感、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叠加



1959年9月，新落成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民族文化宫

60多年前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因为现实一步步走向它的反面，而被永远地记住。这一次的北京行政中心搬迁如同它的翻版，促使我们重思历史：为什么“梁陈方案”当年没有实现？

旧城市与新政权

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新政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首都都要建成什么样？行政中心置于何处？同年5月，“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即成立，委员有梁思成、华南圭、朱兆雪等十几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城市规划方面的实际经验，长春、青岛等城市都是由日本人、德国人规划的，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家们头脑里多是一种对于新首都城市和制度的想象。

从总体轮廓上看，1949年的北京与明清古都相比没有大的改变，内城面积32平方公里，环绕内城的城墙长23公里，紫禁城的中轴线决定着整座城市的中心，从永定门到钟楼，全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分布着23座建筑。而进入这个骨架内部，则是满目疮痍的现状：北京工人占总人口的4%，大部分居民不是生产者，有大批的失业和半失业居民。生活环境如同《龙须沟》中的描述，市政的首要工作

是疏挖三海、清除垃圾、导通水流。所以在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之时，副市长张友渔即开宗明义说明该委员会的工作：“在保持北平为一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以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的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

事实上，新旧城分置的想法并不是梁思成和陈占祥的首创。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后做了一个规划，在西郊的五棵松一带规划了一个“西郊新市区”，以颐和园万寿山的佛香阁为北边的制高点，向南引出一条新市区中轴线，跟紫禁城的南北中轴线呼应。这个规划在城市性质中突出了“特殊之观光城市”，其中提出：“城内仍保持中国的意趣，万寿山、玉泉山以及其他名胜地作为公园计划，在此范围内乃至周围的庭园、树木、庭石、山川，希望采取中国的式样。将来准备复原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希望尽力保持中国文化。”1939到1943年间，日据时期伪政府还征用了17.7平方公里作为一期用地，打通长安街向西延伸段，修了500多栋房子、各式道路、市政设施……这个“西郊新市区”已经有了一定雏形。1946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后，尽管最终定都南京，仍决定北平的城市架构延续“西郊新市区”方案。1949年，新政权有关城市规划的设想是建立在这两个历史遗产基础上的。

1949年5月8日，新成立的北平建设局召开北平市都市计划第一次座谈会，中心议题之一即是如何利用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区”。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在会上明确了新市区用途：“现在我可以报告一下，将来新市区预备中央在那里，市行政区还是放在城里。”可以说，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区是当时的集体共识。

不过，建设新区的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考虑：“新北平的市民，不宜过度集居城内成为消费者，一部分应到农村、工矿区和新市区工作，成为生产者。”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也为日后的转折留下隐患。在这次座谈会上，梁思成也表达了疑虑：“彭真告诉我，‘有一次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

去到处都是烟囱’。……而我则心中很不同意。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梁思成并不孤立。1949年8月，此前曾任北平特别工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系列提案中，再次重申其新城建设和旧城保护相结合的思想：“改造旧城市，是市政上最大难题，故西洋某国，皆于旧城市之近郊，另辟新城市。而对于旧者，则仍保存之，整理之，又尽其可能以改良之。”

如果不是北京政府邀请的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17人专家组1949年9月到来，历史或许会改写。3个月后，在市长聂荣臻主持的城市规划汇报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抛出他们的方案，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

针对建设西郊新区的设想，苏联专家们撰文予以反驳，并且以莫斯科的经验阐述道：“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 this 建议，我们有成效地实行了莫斯科的改建。只有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情形下，才放弃改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对于北京旧城“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的不同认识，正是苏联方案和后来的“梁陈方案”的根本分歧。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甚至提出，建设新市区“就是承认市内一百三十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他还在会上透露了毛泽东的想法，“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机关设在新市区”。至此，已经断绝了在会上继续讨论下去的可能。

但梁思成并没有放弃。就在苏联专家组抵京不久，陈占祥受梁思成之邀加入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与梁思成合作“新市区”规划，他也在城市规划汇报会上见识了两种意见的激烈交锋。两人商议，开会之后，由陈占祥做规划，梁思成写文章，尽快提出一份与苏联专家抗衡的具体方案。

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回忆，父亲与梁思成的“缘

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1947年4月，梁思成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中国顾问时的工作照。他和陈占祥合作的“梁陈方案”被否定，如今被视为北京旧城的一个悲剧性象征

(于晓冬摄)



左图：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董光器。他参与了建国后的历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右图：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赵燕青

分”要追溯至1938年。那年8月，陈占祥乘船离开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随行的书籍里，就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旅英8年，陈占祥师从规划大师阿伯康培爵士——著名的“大伦敦规划”主持者。1946年，北平国民政府邀请还在读博的陈占祥回国效力，他随后参与了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但无一不在战乱中都沦为—纸空文。1949年，梁思成在给聂荣臻的推荐信中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而在陈占祥一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时，梁思成还专门派了一辆古典式马车去前门火车站迎接，把他们送到西河沿大街的解放饭店。

陈占祥在晚年回忆了自己的规划思想源头：“—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

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这个著名的规划是1944年做的，主要目标是疏散人口。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十几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

“当年，他们还做了一个剑桥的规划。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碰，古的风貌就全毁了。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远郊县都可建设起来，可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

(沈晖摄)



陈占祥的旧城保护思路与梁思成一拍即合，但他对新行政中心的选址做了调整，提出在旧城与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区之间设立中央行政区，这样既可以与旧城紧密联系，又利用已有一定基础的新市区建设配套住宅区。1950年2月，“梁陈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开篇就提出：“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在这份2.5万字的报告中，蕴含了通过规划新城来疏散旧城，以达到新城建设和旧城保护双赢的先进规划思想。

然而，“梁陈方案”满怀期待地送上去了，却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决策层迟迟没有回音。而在这时，梁思成与陈占祥等来了另一个声音，来自他们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同事朱兆雪和赵冬日，二人阐释了行政中心应该设在旧城的观点。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被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1952年，城市总体规划编制重启，分为甲、乙两个方案，这两个方案的前提都是将行政中心设在旧城，最终规划方案是两者的综合。梁思成被排挤在外，陈占祥在压力下参与了乙方案。其实在此之前，一部分中央行政机关——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公安部等已经沿着长安街展开建设了，“梁陈方案”早已在事实上流产。

若干年后，陈占祥在自述中感叹：“城市建设是极其复杂的过程，牵涉到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也包括当时人的思想感情。从技术观点出发，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

到了今天，“梁陈方案”成为北京旧城的一个悲剧性象征。似乎旧城破坏越严重，它的符号意义就越强。但回头再看，尤其是回到那样一个政权更替的节点上，政治、经济、情感、技术等各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历史图景更为复杂。

成本

“梁陈方案”与苏联方案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成本。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董光器告诉我，除了毛泽东与苏联专家的意识形态考虑，这也是当时最现实的问题。

参与当时规划的原北京市规划院总建筑师陈干曾回忆：“以旧北平市而言，194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8亿元，国民收入仅1.9亿元，失业与半失业者超过3万人，像龙须沟那样的贫民窟数以十计——那里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来要在那一片空地上大兴土木，建设国家新的行政中心，不但经济上力不从心，政治上亦将丧失民心，所以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

针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想法，1949年12月，苏联专家团在城市规划汇报会上援引苏联设计和建筑城市的一组数据，试图论证政府中心区建在城外是不经济的：“住房和行政房屋建设不能超出现代城市造价的50%到60%，另外40%到50%的造价是文化、生活用

房和基础设施。拆毁旧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新建房屋造价的25%到30%。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基础设施，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施的。”

梁思成和陈占祥对此并不认同。在“梁陈方案”中，他们给出了更细致的核算，列出了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七项费用：1. 购买民房地产费；2. 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3. 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4. 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5. 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地址工费及运费；6. 新办公楼建造费；7. 植树费。同时，列出了在城外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四项费用：1. 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2. 新办公楼建造费；3. 干部住宅建造费；4. 植树费。由此来看，在城外建设行政中心的1、2、3、4四种费用，就是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4、6、3、7四种费用。“而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

对于在旧城内建设中央行政区将引发的拆迁问题，他们更是忧心忡忡：“政府中心地址用地6.75平方公里，若要取此面积，则需迁移十八万二千余人，拆房一万二千五百余所或十三万余间。无论如何，必是大量人口的迁移。这一切——兴建住宅、迁移、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都是一步限制着一步，难以避免，极其费时、费事，需要财力的。而且在迁移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那么，两相比较，到底哪个方案更经济呢？

董光器认为，“梁陈方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过于理想化的。“1949年1月解放，10月共和国就要成立，哪来得及盖房，也没有钱盖房啊，所以基本上不涉及太多拆迁。”他说，客观上有一个100多万

人口、2000多万平方米房屋的旧城存在着，虽然设施破旧落后，但毕竟相对来说比较齐全，有一定的基础，可以马上利用。再从西郊的条件看，根据北平工务局的材料，当时日本人留下来的西郊新市区只有房屋581栋，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占地不足1平方公里，在那种经济条件下只能选择前者。

“刚一进城，只能利用旧城。当时有个清管局——‘清理敌特外来资产管理局’——占领一个王府建设一个部，到现在教育部还在郑王府，民政部还在九爷府。不能说像明朝的永乐皇帝那样，花了20年把皇宫建成了，再迁都。咱们是人民政权，不可能。还有些部委利用了长安街沿线的空地，比如在长安街南边有块地空着，原来是外国使馆的练兵场，纺织部、煤炭部就在那建了。所以，所谓拆迁成本高，当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董光器回忆，周恩来在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上报前，曾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他看到规划方案中，在中南海西侧副轴终端放了一组大型公共建筑，准备建国务院大楼，明确表态，在他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所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新市区大兴土木不现实。”

其实，“梁陈方案”后来也部分地实现了。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朱涛指出，纺织工业部、煤炭部、外贸部、公安部等办公楼沿长安街南侧建起，算是采纳了苏联专家的规划建议。1950年，军委各总部机关陆续搬到西郊的“军委城”，算是对日本人开辟的“西郊新市区”的再利用，只不过把原来的综合性城市变成了一个功能单一的军委大院。在1952年，经历了抗美援朝的毛泽东从安全角度意识到不能把中央行政办公机关全集中起来，于是提出“大分散，小集中”策略，从1953年开始，“四部一会”及其他一系列机关办公楼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成，算是部分采纳了“梁陈方案”，只不过将原来设定的尺度大大缩小。“总之，关于中央行政区在北京的设置，很难说政府在50年代坚定地采纳了哪一种方案，又拒绝了哪一种。中央在总体原则上不明确表态，随着时局变化‘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依次对每种构想都多少采纳一部分，同时又给予各部门以相当的自主权，任其在自己的领地内自主发展，最终达到一种各式布局折中混杂的状态。”

后来北京旧城保护的失控，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没

总之，关于中央行政区在北京的设置，很难说政府在50年代坚定地采纳了哪一种方案，又拒绝了哪一种。中央在总体原则上不明确表态，随着时局变化“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有彻底采纳“梁陈方案”。董光器指出，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有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冲击，但北京的旧城并没有伤筋动骨的破坏。“计划经济时代，除了长安街打通、国庆十大工程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多建设。当时住宅是国家的福利，不是经济行为，国家没有钱，老百姓就在四合院里搭小房，结果四合院越来越挤。当时还曾经提过，‘十年改造旧城，五年改造新城’，想是这么想，但是没钱，改不动。上世纪50年代曾经要改建朝阳门内大街，那是政府试点，结果从1953到1957年，就建了三栋楼，把老百姓迁到东郊去，矛盾很多，代价很高，最后负担不起了。后来是在改革开放后，土地有偿使用，超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开始，城市才搞乱了。不能简单说是因为‘不听梁思成的话’。”

朱涛认为，即使“梁陈方案”在50年代得以完整实施，它最多能在空间上暂时起到一定的疏散旧城密度的作用，但并不会帮助避免北京古城被破坏的结局。因为它显然无法根除上述导致北京城市格局失控的根本原因——各自为政的部门机构、狂热的政治运动、无度的房地产开发，都可仰仗各种强大的政治权力，轻易僭越城市规划的基本理性规则。

市场因素：“梁陈方案”的两个时代

如果将这一次北京行政副中心搬迁视作“梁陈方案”翻版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类似的方案，在这两个时代会有不同命运？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认为，“梁陈方案”当年未被采纳的深层原因在于市场的缺失。“很多人将‘梁陈方案’出局归结为成本问题，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还可以问‘为什么当时没有足够的能力建设新的行政中心’这个在当时看来似乎很傻的问题，今天问起来却一点也不愚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一个项目经济上是否可行不仅仅要看它投入多少，更要看它的产出是多少。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为什么建设新的行政中心成本一定会大于产出？’”

他的答案是，在计划经济下，城市建设是“非生产性”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因为缺失房地产市场，土地成为不能在市场上定价和交易的产品，城市建设“效益”也就无从体现。新城建设让出市内高价值的土地，带动郊区低价值土地的升值的结构调整效益，由于土地市场的消失，变得毫无意义。城市的建设，成为一

种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经济行为。这才是“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种佐证，赵燕菁告诉我，全国大规模城市土地有偿使用的推出是在90年代初，青岛、中山、厦门和后来浦东的跨越式“新城”建设也几乎全是在此前后进入大规模实质性建设的。这决不仅仅是巧合，它表明土地市场的形成与新城建设成败密切相关。

第一次实践“梁陈方案”构思的是青岛新行政中心的建设。1989年，青岛市对总体规划进行了一次战略性的调整，提出改变南北发展的格局，向东部大规模拓展，对老城实行相对的“空城计”。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位于新区面积1.5平方公里的行政中心区更成为开发的热土，政府也转让掉位于老城历史街区的老办公楼，迁往新区。新区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均来自新区升值后土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而且，还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数以亿计的资金，支援旧城改造。“青岛案例证明了‘梁陈方案’不仅技术合理，而且经济上可行。这样一来，它得到两个城市，新城建起来以后，老城还保留着。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的做法则是老城拆除了，新城还没建成，只有半个城市。从青岛新区开始，中国的城市就多了一种模式。”

梁思成当年的助手、两院院士吴良镛曾比喻：“拆北京旧城以取得其土地的使用权，就像把故宫的铜鼎融化掉，用它的铜；也像用古代的字画作纸浆，来造纸。”不过，在土地市场缺失的情况下，这种得不偿失难以体现，这也正是“梁陈方案”的遗憾。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梁陈方案’隐含着成功的因素，但在当时没有土地财政的情况之下，只是一种理想。而放在今天的语境下考虑，有了土地财政，有了增长速度，有了跨越式发展的模式，才是现实的方案。”赵燕菁说。

“全世界所有的历史名城，只要保留完好的，必定有一个新城。哪怕去欧洲的小镇上看，也一定有个新城。巴黎的新城是在工业化的时候建成的，罗马的新城是墨索里尼时代建成的，都是城市增长最快的时候。”赵燕菁指出，“梁陈方案”提出出来的是个世界性的规律，“试图在老城的基础上重建，同时把老城保住，是不可能的。”

（感谢实习记者赵钊君对本文的贡献。参考书目：《梁陈方案与北京》，梁思成、陈占祥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陈占祥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朱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経産デジタルニュース
医療手帳、別の患者にも同じミス
手術ミスで大腸に穴の開いた女性患者
が死した千葉県船橋市の船橋聖形外科
病院で、同じ日に同様の手術を受けた男
性患者の大腸にも穴が開いていたことが
明らか。原因は同じ男性医師。男性

ビックカメラ
BIC MULTIVISION

东京：超级首都的聚与散

主笔 / 徐菁菁

在过去 100 多年的发展中，东京从单纯的政治中心发展成为“华盛顿 + 纽约 + 硅谷 + 底特律”型的功能最为全面的首都。东京不断摸索、调校着自己的职能和布局，回应着国家发展所赋予它的不断变化的时代使命。



日本东京一处商业街密集的人流

“一极”之都

今年2月在东京旅行的时候，我住在千代田区半藏门的一家酒店。半藏门在皇居的西侧。从客房的窗子望出去，就能看到护城河的流水，和如孤岛一般的被松柏围绕得密不透风的皇家禁地。夜晚的时候，皇居漆黑一片，南面的永田町和霞关灯火阑珊，而在远处，皇居西侧的丸之内，一排超高层建筑连成一座巍峨的山峦，灯火辉煌。

事实上，要认识作为一座首都的东京，最讨巧的办法就是沿着皇居的护城河，在我目力所及的这一片区域走一走。从半藏门出发往南，永田町和霞关是这座喧嚣都市难得的安静疏阔之所。永田町是日本的政治中枢。它的中心是1936年落成的国会议事堂。这座建筑的规制和美国国会相仿：中间是9层65.5米高的中庭，左右两边楼高3层，分属众议院和参议院。整个大楼混杂着希腊柱式、罗马式圆拱、西欧教堂式花窗等多种西方建筑风格，正是20世纪初大正天皇时期的品位。议事堂的背面，马路的另一侧，四栋玻璃幕墙大楼是议员会馆，也就是国会480名众议员和247名参议员的办公室。安静的永田町只有在两个时候最热闹：一个是民众示威的日子；一个是每次选举换届的时候——落选和引退的议员要忙着从会馆撤出来。从议院会馆南边步行三分钟，一栋五层高，像座博物馆的玻璃外墙建筑是2002年启用的首相官邸。

顺着护城河边的内堀大道走到皇居的南面，能够看到始建于1636年的樱田门。1860年3月24日，“樱田十八士”在这儿刺杀了幕府掌权者井伊直弼，直接导致幕府独裁开始瓦解。1932年，也是在这儿，朝鲜爱国志士李寿昌向出席陆军阅兵式后回皇居的昭和天皇投出了一枚手榴弹。

樱田门之所以屡次见证历史，原因在于它与它面前向南铺陈的樱田大道是进入皇居的机要之处。今天的樱田大道是一条宽阔的马路。大道两边的区域被称作霞关。从明治时期开始，霞关就是日本的行政中枢。最靠近护城河的巴洛克样式的红砖建筑是日本法务省。1896年，明治政府曾在这里建立三栋同样的大楼，分别用做司法省、“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的前身）和海军省——那正是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三栋楼在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中毁于一旦。今天的法务省大楼是战后复原重建的。向南，警视厅、海上安保厅、外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和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在樱田大道的两边南北依次排开。

政治、经济双重中心功能的聚集为东京日后成为世界城市并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大城市圈奠定了基础。

每年，日本最优秀的大学生经过严格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来到这里，成为从明治以来逐渐发展健全的国家官僚系统中的一员，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而工作。

皇居、永田町和霞关共同构成了日本的政治大脑，是东京作为一座首都的根本所在。但东京并不只有这些。皇居的西侧，丸之内那些山峦般的大楼是这个国家的另一条动脉。丸之内以东京站为中心，与邻接的大手町形成了一片中心商业区。如果从东南面的繁华银座走过来，你能感觉到这两块相邻区域建筑语汇的显著不同。银座是宜人的商业尺度：小巧、喧嚣、外向、可达性强。而丸之内则高层林立：高档写字楼严整的玻璃幕墙和门前精心布置的开阔地塑造出的距离感标志着财富和与之相伴的权力。

明治维新后，原设于丸之内的陆军兵舍、练兵场在1890年被迁移。三菱创办人岩崎弥之助以128万日元买入大片地块。此地区至今仍为三菱财团各公司总部所在地。今天的丸之内每平方米地价高达3060万日元。它拥有新丸之内大厦、三菱东京UFJ银行本部大厦、邮船大厦，并兴建了很多大型银行与企业大厦。百余栋大楼中汇聚着约4000家企业，超过23万人在此工作。丸之内与纽约华尔街、伦敦的金融街并称为世界三大金融街，其总计营业额超过整个东京都GDP的20%，是全世界商务金融活动最频繁、最方便、最有效率的区域。

作为一座首都城市，东京同时扮演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双重角色。美国城市研究权威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说：“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探求城市原有的结构和原有的功能。”透过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线索，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东京的使命。

镰仓时代（1185～1333）东京始得名江户。15世纪中期，受命于关东地区武藏国城主上杉定正，太田道灌督建江户城。当时的江户城就是我从酒店客房能够看到的中央区皇居一带。德川家康于1590年奉丰臣秀吉之命移居江户。在关原之战中得胜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立幕府，江户从此开始成政治中心城市。政治带来了繁荣。江户原本是关东平原江水入海口的一小块地方。德川家康启动了大规模的填海造地。起点就是今天的皇居东南角的日比谷公园一带。现在丸之内、有乐町、新桥等市中心部分都是填海造地后形成的。日比谷公园再往东南去，筑地海鲜市场的南边是滨离宫恩赐庭园。这座美丽的江户园林最初是江户幕府的猎鹰场。庭园就在东京母亲河隅田川的边上。



河流向南汇入东京湾。今天的游客能在这儿乘坐水上巴士，沿河流北上到达浅草地区，南下到达东京国际会展中心。400年前，德川家康新建江户港口，使船只得以从隅田川出海，打通了江户与全国各地的海上通道。这一带就成为江户城市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那时，运载货物的船只从隅田川北上，而后在两河交汇处，沿着日本桥川西行，驶向江户城内。幕府在日本川上建造了大桥，今天东京站东面的日本桥一带因此得名。作为海陆转运的中心，日本桥也就自然成为江户最大的商业区。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快速引进近代资本主义，著名的大商店如三越、白木屋、大丸都在这里诞生，延至今日，东京最繁华的银座就在这里。

明治维新前夕的1865年，东京有近75万人，市区建成区的直径范围扩大到8~9公里，其规模大体相如今北京二环路以内的旧城区。以当时的标准看，东京已经是一个大都市，但它还算不上一个超级首都——那个时候，它还并不担当日本的经济引擎。明治维新后最初的20年，东京的工业生产额低于爱知、大阪两地。但此后，东京由单纯的政治性城市逐渐转向兼有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的城市。政治、经济双中心功能的聚集为东京日后成为世界城市并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大城市圈奠定了基础。

优越的地理环境是东京成为经济中心的前提。东京位于本州关东平原的南部，大致处在日本列岛的中心位置，面临东京湾。平原地形有利于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集聚人口。日本国内自然资源，特别是现代工业所需的矿产资源等原材料严重匮乏，多靠进口。因此日本工业聚集于太平洋沿海地区。加上日本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因此日本逐渐形成进口原料、出口产品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在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下，东京作为沿海港口城市的地理优势使其可以通过海运发展国际贸易。

1868年，明治天皇定都江户，更名东京。在他主导的国家工业化道路上，行政力量的强势使资本、人口以及以四大财阀为首的企业中央管理功能向东京集中。东京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领先于日本其他地区。1872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线，即东京的新桥和横滨之间的铁路线开通。由于银座是车站新桥和主要商业街日本桥、主要行政办公区和皇宫所在地之间的重要连接通道，为打造日本新形象，明治政府对银座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东京第一次出现了现代化的城市道路：道路人车分离，人行道5.4米宽，车行道14.4米宽，

有瓦斯街灯和行道树的设置。以后，如轨道马车、有轨电车、地铁等新的城市交通设施都是首先在这条街上应用的。在19世纪末，东京已经形成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铁路联系骨架，到20世纪10年代，连接东京周边地区以及全国的铁路网络已经形成。

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工业中心虽然仍然是在大阪。但那时，大阪的工业主要是以商业资本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轻工业和民用工业，而东京则拥有现代工业，主要是在日本银行等政府金融机构的支持下，以国家资本和官办企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铁路、电话、制铁等重型工业。20世纪30年代开始，东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生产总量就开始超过大阪了。从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战争前的时期，东京与横滨之间的京滨工业带逐渐发展，同时，东京湾沿岸的品川、太田、传奇等成了巨大的人工建成的市区。

战争时期，对东京城市发展起到较大影响的另一项政策是工业疏散政策。20世纪40年代，日本城市规划专家提出学习德国的国土规划理论，在全国建立若干个在经济和军事上能够自给自足的地区，并在各自的地区建设有一定粮食生产和军需工业生产能力的，有相应军事基地的一定规模的城市。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从东京市内的工业设施开始分散到周边20~50公里的圈内，一些典型的项目包括1937年迁到昭岛的昭和飞机制造公司、迁到东大和的日立航空公司、迁到武藏野的中岛飞机制造公司和1938年迁到府中的日本制铁公司和东芝公司。这些地区与其说是地方，更确切的是东京大城市的周边。

1942年，商工省制定的“工业控制地区和工业建设地区的暂行措施”开始实施。在当时内务省推行的“新兴工业城市规划项目”中，东京周围神奈川县的相模原、群马县的太田等地作为新型工业城市，开始了以建设军工厂为目的的大规模土地划整治工程。这些地方的很多土地被政府强行收购，转用军用机场或军工厂等军事用地。这一时期东京周边地区的工业设施扩散实质上为战后东京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

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时代，东京都的“战灾复兴城市规划”提出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定位：“现在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在此基础上应发展为将来的工业城市。”在制度上，东京的经济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美国经济学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其经典著作《通产省和日本奇迹》中将日本战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名为“发



展型政府”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而确保国家经济的增长。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现象：一方面日本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使得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这一模式催生了高度黏合的政治经济结构——政治决策决定经济发展走向，而经济发展依赖于政治决策同时又是政治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于是，首都东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为其吸引其他资源从而形成垄断扩张的路径创造了先决条件。

副都心

4年前第一次到东京的时候，我曾经站在涩谷车站的一栋大楼里，透过玻璃幕墙，仔细端详过那个传说中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对于很多外国游客而

言，人潮从绿灯亮起的那一刻，从四面八方潮涌过路口的景象是繁忙东京的缩影，但对我来说，涩谷路口给我的震动远远不及新宿。JR“新宿”站近400万的日流量和四通八达的地下街道足以把每一个初来乍到者弄得晕头转向。我曾听说有人打算到新宿站乘车，结果却在庞大的建筑群中逛了一整天。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新宿，我觉得应该是：稠密、混杂和活力。新宿是10条轨道交通的会聚点，其中包括国有铁路、私营铁路和地铁三大系统。在新宿交汇的非轨道交通线路则多达50条。以新宿车站为中心，东西新宿两个片区空间形象差异巨大。西新宿是曼哈顿。它已建成商务区总用地面积56公顷，相当于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中心区的三分之一。其中商业、办公及写字楼建筑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超高层建筑群40余栋，是全东京也是全日本规模最大



左图:1974年,新宿街头一度在周日禁止机动车通行。穿夏装戴草帽的导购女孩们为商业街增添了欢乐气氛

右图:1963年1月,东京为举办奥运会进行道路施工导致城市大塞车

最集中的超高层建筑群景观。那儿还有“新东京百景”之一的新宿中央公园,和环绕着它的高端住宅区。相对而言,东新宿是另一个世界。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微型酒吧、居酒屋、烧烤店、风俗店,相互连绵形成巨大的传统边缘文化商业街区。霓虹灯下,新宿的混沌蕴含在那些拥挤狭小的巷子里。游荡其中的是下班族、外国游客、作家、漫画家、电影人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西新宿和东新宿是不同年代里城市扩张和发展留下的印迹。1950年,日本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以使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破坏的东京能够更快地恢复和发展。首都建设委员会由建设大臣、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东京都知事、东京都议会议员及学术界代表共9人组成,主要职责是制定东京都内需要实施的重要设施的项目规划,推动有关项目的实施,以及对中央政府、相关地方公共团体、相关企业提出建议。1956年,首都建设委员会改名为“首都圈整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58年7月推出的“首都圈整备计划”

对今天新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该计划明确地将涩谷、新宿、池袋列为副都心作为重点发展其商业机能,从而分担一级集中的东京中心的负担,从政策方面为三大副都心的发展提供保证。

今天人们说“东京”,可能具有多种地域含义。它可能是指东京都——这是东京行政辖区范围的范围,包括23个区、26个市、5个町和8个村,面积2187平方公里。它也有可能是指包括23个区,位于东京都东部的东京市区,面积大约621平方公里。更上层是东京都心三区,包括千代田区、中央区及港区,面积为42平方公里,大体覆盖东京传统的政治中心和商业区。

1958年建立副都心想法的提出和东京在战后的复兴密切相关。1950年以前,日本一直困于停滞和萧条,东京的复兴举步维艰。朝鲜战争扭转了这一局面。3年战争期间,日本直接向战场上的美军提供的“特需订货”达13亿美元。源源不断的“军需订货”给日本经济注入了起死回生的“强心剂”。东京这台经

济引擎重新启动起来。仅1950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日本出口额增加55%。而1950年6月至1951年底,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增长达2.8倍。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日本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52年,日本“特需收入”为8.2亿美元,占该年外汇收入的66.8%。日本商业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六大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单一地域商业中心的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状态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其1000万居民的公共服务要求;另一方面,传统的商业中心也已经无法为首都日益扩大的经济中心功能提供足够的空间和配套服务了。换句话说,那些新兴的,或是从地方向东京靠拢的企业必须在都心以外找到新的据点。

新宿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副都心并不是意外。1885年,新宿火车站的建成是新宿城市化发展的开端。1914年,山手线开始运营,山手线内的城市化推进了周边的住宅等设施建设。当时,一方面,在“一战”的刺激下,日本工业产业发展加速,都心的工厂从东京的城东地区向大井、蒲田等方面延伸,形成了著名的京滨工业带,另一方面,以丸之内办公街为代表的东京“都心”也逐步形成。东京开始出现被称作“上班族”的新中产阶级,形成了职场与住居分离的东京城市格局。作为郊区铁路与山手环行线的交叉点和重要换乘站,新宿逐渐形成了大片的街区。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东京老城区毁坏严重,居民向西迁移,使新宿的发展更为迅速。“二战”后,东京都西部人口急剧膨胀,住在西部的工作人员,利用长期月票交通往返于工作地点和住宅区之间,新宿愈发成为东京都中心与西部住宅区间的交通要冲。1958年被定为副都心的池袋、涩谷也同样具有类似的交通节点特征。

1958年以后,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新宿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造。东京城区的第一个自来水厂,占地34公顷的淀桥水厂被搬迁。道路、公园和广场都进行了重新规划。1964年通过新宿的高速道路4号线建成。同年,车站大楼地下街及东口地下街建成开放。自此,新宿火车站成为全日本旅客流动量最大的车站之一。伴随着交通枢纽与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新宿逐渐吸引了更多的商业企业,成为仅次于中央区的商业中心。

但这还不足以成其为今天的新宿。根据服部蛙二郎、松泽光雄等的研究报告,1966年,东京都内共有百货商店、各类高级专门商店、酒吧、电影院以及娱乐等代表性设施9640家,其中日本桥、银座都心共

有3002家,约占总数的31.2%。新宿1239家,约占12.9%。东京的多心型城市构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虽然已经基本形成,但依然存在集中化的问题。

今天的游客到新宿一观,有一个登高远望的好去处。车站以西的西新宿伫立着由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设计的东京都新市政大厦。大厦主楼共48层,高达243米。游客们可以免费登上45层的眺望台。那儿有指示牌帮你认各种地标建筑。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富士山。

东京都新市政大厦是从1985年11月开始设计的,这一年,东京都政府决定将各机关从原来的丸之内旧址搬往新宿。这次搬迁对新宿副中心功能提升提供了极大的动力。大量的企业随之将总部迁往新宿。1999年,新宿设立了地区产业振兴委员会,负责制定区产业振兴战略,并为区内商务型企业的发展提供各种咨询和帮助。2003年在西新宿六丁目建成新宿产业会馆,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包括产业发展信息发布、产业咨询、招商咨询、企业诊断、业务商谈、经营讲座和人才培养等服务,成为CBD内外中小企业进行交流的主要场所。正是这些商业活动的繁荣促使东京都新市政大厦周边的土地,以超高层的复合式大楼和超高层公寓大厦为中心进行开发,形成全日本规模最大最集中的超高层建筑群景观。

现在的新宿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最著名的大型繁华商业区。它集中了伊势丹百货、三越百货、高岛屋百货、丸井百货、小急田百货、京王百货等日本百货业巨头,是全日本第一个百货公司的业绩和商品销售金额超过1兆日元的巨大商圈。更重要的是,1980年至今,新宿第一、二产业就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三产业与其他类就业比重不断增加,其人口就业构成已接近东京都中心三区。最显著的是金融业:仅在以新宿站为中心、半径为7000米的范围内,就聚集了160多家银行。2010年,新宿的昼间人口达到75万人,夜间常住人口为32.6万人,昼夜人口比达到230%。从人口流动看,新宿同周边地域的人口流入与流出差额为41.46万人,同邻接区的差额为0.24万人,同千代田、中央和港区的差额为-2.20万人;整体表现为向东净减、其他净增,可见新宿起到了对东京老商务中心的疏解功能。

时代的表现者

中国在近些年来开始关注的城市病问题对东京并



1967年12月1日上班高峰时间，东京一个车站的员工正努力把乘客塞进车厢去

不新鲜。早在1946年，东京的设计者就开始担忧一个超大城市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1946年《东京战后复兴都市计划》以东京区部（中心城区）为建设主要对象，其目标就是限制城市的规模和人口。然而，该计划认为东京中心城市人口可以控制在350万之内。1947年，人口就达到了382万。

1958年，首都圈整备委员会提出了东京的第一个发展规划，该规划与40年代的模型基本类似，以绿带加新城的模式控制大都市无限制地向外蔓延。规划的绿带位于距市中心16公里处，宽约5公里到10公里。这种“隔离”被证明是失败的。各企业均将东京视作良好的投资场所，产生了对建设用地的巨大需求。私人土地所有者在高地价的诱惑下放弃了绿带转而将土地变更用作建设用地，东京的建成区面积一直在不停扩张。

6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限制东京规模的政策变得既不实际，也不符合发展需要。副都心是东京都心功能纾解的办法之一。时至今日，东京先后建立了7个“副都心”，但对于一座拥有复合功能的首都而言，副都心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一个最直观的指标是地域。从东京的地理中心东京火车站到新宿直线距离只有6公里。虽然像新宿这样的地方在土地资源的利用上做足了地面和地下的文章，但承载力依然有限，更不用说惊人地价造成土地使用的各种方式均代价高昂了。东京修筑1公里长的公路需筹措5000亿日元，但全部工程费用仅需20亿日元，其余4980亿日元都作为土地所有者放弃土地的补偿。

1968年修订的第二次东京圈规划已经摒弃了以绿带作为城市建成区边界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大力给东京扩容。东京都周边的埼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群马县、栃木县、茨城县、山梨县七县被纳入东京都市圈的规划，作为一个整体规划发展。今天，如果乘坐轻轨从东京到横滨，看着两侧高楼林立的城市风景，还没有感觉出东京，就已经到达横滨了。这种都市群的格局让人平添一种大得走不出去的感觉。

东京周边新城的建设并不都是成功的。多摩新城位于东京西南方向的丘陵地带，距离东京新宿约20~35公里，1965年启动建设，住宅用地比例达到47%，规划人口34.2万。新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交通。多摩新城的开发主体是东京都以及东京都住宅供给公社。他们与交通建设主体京王电铁公司和小田急电铁公司之间并无紧密的关联，因而两者之间没有相互配合。1971年多摩新城第一期开业以后，没有轨道交通

通往新城，居民只能乘坐公共汽车或私人汽车前往东京市区，极为不便，限制了多摩新城人口的增加。而轨道交通最终在1974年完工后，多摩新城的实际人口依然多年达不到规划人口。这显示了首都圈规划的一个重要漏洞：那时，首都圈的范围虽然在扩大，但这种扩大依然建立在“一极集中”的基础上。新城主要目的在于疏解东京都心过大的人口压力，并没有注意产业的向外转移。更多是作为“睡城”而存在的新城并不能有效分散首都的压力。沿交通线蔓延的建成区只会使东京无限扩张。

1976年出台的第三次规划意识到了东京一极的问题，强调形成不依赖于都心的都市外围区域；在都市圈内应该存在多个核心城市，这些城市各有分工但是又保持相对独立。这种“分散型多心多核”模式在过去30多年一直是东京首都圈规划的原则。

在首都功能疏解的过程中，到底什么样的功能会被移出东京区部？从今天的格局来看，作为首都的行政功能依然放在东京区部的中央位置。业务管理、交通枢纽、科研开发、教育以及居住功能等服务型功能主要被挪到了首都圈10~50公里的圈域内。其中，中枢业务管理功能集中在东京区部的西部地区以及20~30公里圈内的东京周边城市，为首都圈内的企业提供包括金融、信贷、广告等生产性服务。交通枢纽功能集中在东京区部靠近东京湾的东南地区，作为圈内为企业和人口提供商品、信息、人才等的集散地。科研开发和教育功能集中在东京区部、八王子市、多摩市、厚木市、木更津市以及土浦市等城市，为圈内高端技术和劳动力的市场。以居住作为城市主要功能的地区集中在紧邻东京北部的埼玉县南部城市。

另一个被转移的重要功能是制造业生产型城市功能。20世纪70年代，东京开始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经济转型。转型的首要动力是经济因素：用地紧张造成土地价格攀升，工业用地的生产率大大低于商务用地的生产率，工业设施开始向东京以外的地方转移，服务设施进一步向东京集聚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为使东京能够代表日本参与全球化的竞争，行政力量在制造业生产型城市功能转移的过程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东京都市政府曾严格规定：禁止于都心三区之内建设规模超过500平方米以上的工厂。因此都心三区之内的产业选择非常有限，只有例如出版印刷业、金融和贸易等少占地、低能耗、小运输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得以生存和发展。1959年的《工业控制法》就提出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东京的计划。1972年



东京浅草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人力三轮车

《工业布局鼓励法》确定了“搬迁鼓励区”和“布局接收区”，对迁出城市的组织和企业给予购买工业建设用地的税收优惠，对建设工业设施和相关建筑、购置有关设备给予贷款优惠；工业厂搬迁后的固定资产投资3年内免税。《城市开发区域整备法》则规定“城市开发区域”内工业用地免征特别土地保有税；工业园土地免征土地保有税等等。

制造业生产型城市功能的疏解并不意味着东京区部经济中心功能的下降。《京圈都市研究调查报告》说：“东京是时代的表现者。”从1977到1985年，东京整个服务业就业增加71%。某些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率极高，特别是信息、研发等行业。从1986到1996年，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业的就业增长则进入了黄金时期。这些数据证明了这个说法：作为经济中心，东京保留和促进的核心经济功能总是踏在时代的节拍上。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美元遭贬，促使日本向亚洲国家的投资加快，以寻求更低生产成本。过去

东京是日本全国的经济中心，而随着日本投资由日本流向其他国家，日本经济也就发展成为一个跨国体系，而东京就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它的角色必须转变成为整个亚洲经济体系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管理中心。以金融为核心的中心管理功能也就成为东京的最主要职能之一。

今天，制造业生产型城市功能多被分散布置在首都圈50~160公里的圈域内。其中，轻工业主要分布在东京区部和次中心城市周边；IT产业多依托于具有科研开发和教育功能的城市。机械制造业城市功能主要分布在东京湾沿海地区、北关东内陆地区较为密集的工业城市群。资源密集型工业和汽车制造业城市主要集中在北关东内陆地区。该地区形成了贯穿东西方向的狭长的重工业地带。

东京功能的疏解不仅使东京区部受益，使其得以转型成为世界城市，整个首都圈也都得益于资源的重新调配。20世纪80年代，首都圈内的次中心城市成

为仅次于东京区部的率先发展起来的城市，发展速度超过其他省会城市。无论是南关东地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城市群和沿海工业城市带，还是在北关东地区以汽车、飞机制造等为主导的关联产业城市群，企业的运营模式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后福特制的柔性专精模式。南关东地区的企业间知识、技术的交流成本在不断增加，创新周期逐渐缩短。北关东地区以，大型汽车制造企业以组装为主，其他零部件转包给周边中小企业，形成了密切的网络群体。生产过程细分为各个环节，将不同环节转包给其他中小企业。大企业不需要将各个零件、各个加工环节统一管理和分配，从垂直生产和管理转变为横向加工，节省了零部件的加工时间，缩短了生产周期，同时其他运营成本也相应减少了。

离开东京

以世界的眼光看，东京已经是非常成功的超级首都。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城市；它优秀的城市服务功能让每一个游客印象深刻；它的经济异常发达，也在首都圈内形成了相对合理的产业布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弱点。

东京究竟还能有多大容量？1986年，分布在东京港区、千代田、涩谷和新宿的外资企业有1087家，到2009年已经翻了3倍。最近20余年，无论是新宿还是丸之内，都在使用以建设超高层建筑为主的办法增加城市密度。1988年三菱地所提出了副标题为“面向国际商业中心”的《丸之内再开发规划》，将容积率设定为惊人的2000%。从人口来看，今天东京区部（23区）的人口密度是1.4538万人/平方公里，远远大于北京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六区的8560人/平方公里的密度。

另一个问题是：东京蓬勃的生机之上，始终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安全忧虑。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中，因交通瘫痪，东京515万人滞留街头。东京有过惨痛至极的经历。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8.2级地震。这次地震摧毁了包括东京和横滨两大城市在内的关东地区。东京高层楼房之间形成“火流”，烧死3.3万人，整个江户时期的城市建设几乎完全毁于一旦。1990年9月，英国驻东京的新闻记者哈德菲尔德（P.Hadifeld）所著的《改变世界的60秒钟》一书由赤井照久译成了日文。该书有20万字，共13章，由日本地球物理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竹内均做了审校。作者指出：关东大地震时日本的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而当时日本还是个在世界经济中只占一隅之地的贫穷的农业国。只有分散集中在首都的各项功能，才是最终把东京从地震中解救出来的唯一出路。

抛开这些“杞人忧天”，东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东京本身，而是它在整个日本发展中的位置。

作为首都，东京的规划和治理从来不是单纯的城市问题。1947年，日本出台《地方自治法》，明确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及城市建设方面的自主权。但东京都政府为了得到中央政府对东京规划和开发资金更多的支持，在市民投票表决后，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制定首都建设法”的请求。1950年，该法正式颁布实施，其中心内容和目的可以总结为三点：东京都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同时必须认识到东京都作为日本的中心、与世界各国接触的日本的首都的重要性；为了使在首都开展的、与国内外相联系的各种中枢性活动具有更高的效率，有必要制定更有效的规划建设方案；为了编制各种设施规划，有必要设立“首都建设委员会”这一中央一级管理机构。这就使得东京的管理权又集中在了中央手中。

1974年，日本国土综合开发厅正式成立，作为总理府的下属机构，其长官由国务大臣担任。国土厅负责协调与国土开发政策有关的各省厅项目，自此，包括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在内的、各地方都市圈整备本部都被吸收进了新的国土厅内。行政框架调整的实质是：这一时期的首都圈规划首先考虑的不再是首都圈本身，而是在整个国土开发框架之中首都圈如何定位的问题。

如果从整个国土开发的角度看，一个不断强化的超级首都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东京扩张的过程是对日本城市系统的兼并。以前，日本存在三大“都市圈”：名古屋圈（爱知县、岐阜县、三重县等）、关西圈（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奈良县等）、东京首都圈。如今大阪、名古屋等都市圈的衰落使日本城市结构转变为东京圈对地方圈的两级构造。人口是一个直观的指标。所有到过日本地方城市的人都会发现，与川流不息的东京相比，即使是“省会城市”也很难用“人流如织”这样的词来形容。而中小城市的街道在大白天也是冷冷清清的。1920年东京人口占全国比例为13.8%，2010年则达到了27%。2005年东京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就已经是第二大城市大阪的2倍。日本调查机构“创成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日本896个地方城

市可能在数十年内“消失”。

由于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大量向首都圈外流，这一现象对国家政治也产生了影响：日本排名前100位的地方城市中，因为无人投票，有52个城市的行政首脑不是通过投票选举当选的。13个城市已经连续26次出现无人投票现象。

东京的黑洞效应在经济领域同样明显。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拥有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门上市的60%的企业总部以及日本所有外资中76%的企业总部。以金融行业为例，日本金融空间构造的固定模式是：银行下属的支行在全国范围内吸收存款，然后这些资金主要向东京都中心地区聚集并在那里贷出。这种资金流动的方向说明了全国资金向东京都中心地区集中的模式。进入全球化以后，金融机构向东京都市中心集中的倾向更为显著。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有13家都市银行（全国性的大型银行）。合纵连横以及破产过后，只剩下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瑞穗集团和三井住友银行集团以及利索纳金融集团。在13家都市银行存在期间，都市银行也驻扎在东京以外的札幌、浦和、名古屋、大阪、神户。但那以后，除去利索纳（大阪），东京以外的都市银行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集中在东京都千代田的丸之内这一带。

东京的黑洞效应或许有多种解释路径，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只要政治资源都集中在东京，那么实现地区均衡发展就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事实上，从1990年起，日本政府就开始讨论首都功能的转移，并编写各种相关报告。一些政治家也陆续提出过“迁都”的想法。1994年，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委员长的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日本综合战略大纲》中也提出了“迁都计划”。1996年6月，“迁都计划”也被列入桥本龙太郎行政改革蓝图，但随着桥本改革计划的失败，“迁都计划”也石沉大海。

1996年，日本国土厅曾经进行“国家各阶层民众对首都功能转移意见”的调查。调查中，赞成和基本赞成转移者超过3/4。赞成首都功能转移的理由依次分别是：改正东京单中心极化的状况；利于灾害时的危机管理；国家政治改革的重要环节；政治经济分离的必要性；国际趋势与国家变革的需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等。

但“迁都计划”的反对者也甚多。首先是东京都，迁都将直接损害东京都的既得利益。2000年底，东京都政府曾对“迁都计划”需要的投资和产生的效果进

行测算，公布了一份结果。按东京都政策报道室的说法，“迁都计划”中作为政府公共投资的迁移费用主要包括新都市的建设费用、搬迁费用、人们访问新首都的费用以及通信费用的增加额等内容。以新首都的三个候选地“栃木—福岛”“岐阜—爱知”和“三重—畿央”地区为基准测算，三地的公共投资费用分别约为8.337兆日元、9.7926兆日元和9.864兆日元。“迁都计划”的实施，将会产生如下社会效益：扩大办公及居住的空间、改善现在的首都圈和新都市的通勤状况、缓解交通阻塞以及迁移后的旧址再利用等。然而，三个新首都的候选地区在迁都后所能产生的效益都在3.535兆日元左右。东京都政策报道室认为，“迁都计划”从经济上讲是欠妥的，将给国家造成高达6兆日元的财政赤字。

最近两年，向首都圈外迁移政治功能的呼声再度高涨起来。2014年，由前总务大臣增田宽担任会长的民间研究机构“日本创成会议”，发布了一份“可能消失的城镇名单”。该名单根据作为生育主力的20~39岁女性人口数量的增减，推算出到2040年日本全国大约有896个自治体可能消失的结论。这个数字已达到了日本全国市区町村总数的一半。这一测算虽然存在科学性的疑问，但确一发不可收拾地激发了地方振兴的大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迅速做出反应，在名单发布后成立了以自己担任本部长、跨越现有政府机构行政限制的“地方创生本部”。安倍晋三是迁移首都功能的支持者。事实上，1987年10月，安倍晋三的父亲、时任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的安倍晋太郎就曾在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时就提出了“迁都”的竞选口号。

根据安倍晋三的计划，“地方创生”是持续到2060年的长期工程，2015~2019年需要达成的基本目标有四个：创造地方城镇的稳定工作机会；创设人口和资本向地方流动的新途径；实现年轻世代结婚、生产和养育子女的愿望以及面向时代需求，实现地域之间的合作。在2015年，创生本部就投资了7200亿日元。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中央政府机关向地方的转移又被提上议程。地方创生大臣石破茂在2015年3月宣布，将就政府机关向地方的转移展开提案募集。搬迁的目标包括了在东京霞关地区的中央各省厅，以及全国其他地方250处国家与和国家相关的独立行政法人研究设施。除了东京和同属首都圈的埼玉、千叶、神奈川四地之外，全国的都道府都可以向政府提交申

请。结果，具备报名资格的全国 43 个道府县中，42 个都道府县对 69 个中央政府机关提出了搬迁申请。一些热门机构更是被多个地方政府“争抢”，其中大阪和长野县都希望经济产业省的特许厅搬迁到自己辖区之内。而文化厅向京都的转移被认为是其中进行最顺利也最有可能被当作象征性事件被推行的。文化厅是日本文部科学省所管辖的外局之一，其承担的任务在于“文化以及国际交流的振兴”，同时也“管辖全国和宗教相关的各类行政事务”。

京都有安置文化厅的较完备条件。京都及周边的奈良地区拥有许多全国重点文物。京都在文化交流上也有重要地位。京都年游客量早已超过 5000 万人，连续 15 年增长。早在 2002 年，京都就已经开始为安置文化厅做准备。当时，在时任文化厅长官同时也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的河合隼雄的推动下，文化厅长官室京都分室得以设立。2005 年，同样由河合隼雄推动，旨在振兴“关西元气文化圈”的文化厅关西分室正式成立。但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后续支持，这些设施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文化厅搬离东京的最主要的反对声音就来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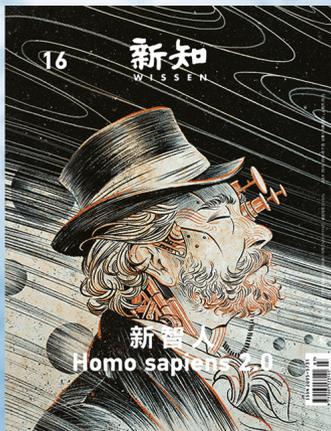
化厅的相关官员。2015 年底的一次讨论会上，他们提出了拒绝离开东京的几点理由：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人才培育点有七成设置在东京；公演舞台的六成、相关出版社的七成也都在首都；如果迁到京都，这种经济和文化的联动就无法实现。从近期来看，作为日本文化行政最重要事项的东京奥运会将在首都召开；东北大地震的复兴也是文化厅重要的任务，东京相比京都离灾区更近。此外，他们还提出文化厅每年有 500 件议案需要与国会议员以及其他中央机构联动，往返于两城之间的两个半小时的新干线路程还是太远。

尽管如此，首都行政功能的疏解已经是大势所趋。日本文化厅在今年 7 月已经开始为全面搬迁至京都府开展实证试验。包括长官宫田亮平等官员在内的约 10 名职员将轮流前往京都，确认与东京总部及相关部门的业务联系是否有问题，找出今后的课题。日本政府正探讨迁往京都府、京都市的时间、费用等具体问题，计划在年内制定出搬迁计划的细节。■

（参考资料：《城市管理创新：世界城市东京的发展战略》，王郁著；《日本首都圈城市功能分类与空间组织结构》，赵儒煜、冯建超、邵昱晔合著）

《新知》2016 年第 4 期上市

(总第 16 期)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 新知

微信公众号: 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 智识生活的乐趣, 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2016 年第 4 期要目]

Entrée

连接另外十亿人：关于理想主义、野心和网络中立

“小丑”的文化史

没有陷落的爱

普鲁斯特和逃逸线上的青春

机器控制论(漫画)

Main

大爆炸之前是什么？

人类在玩火吗？

基因编辑

我的祖先和我——源自尼安德特人的

基因神话

永恒之问

Fusion

欧洲认同在中世纪早期的构建与当代

挑战

青牛白马，来去何兮——古 DNA 研究

视野下的契丹贵族

达尔文的 1859 年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房子的故事

亚美尼亚：国界的迷思与现实

Dessert

繁星中的双螺旋：日本现代建筑浏览

化学：不对称之存在

菲利普·迪克：半疯的文艺极客

世界上第一家机器人酒店探访记

新战术对旧大陆：英国海洋帝国的肇始

埃及：走进未来的法老官殿

发现和探索大脑新大陆的历史

等待奇迹

1BOOK140 短评

《新知》2016 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每期 160 页，全年 6 期，零售单价 20 元，全年定价 120 元。

2016 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www.lifeweek.com.cn，全年订 8 折优惠，订阅年价 96 元。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www.amazon.cn / www.JD.com

2015 年珍藏礼盒现已上市。





2015年9月14日，当游客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留影时，载着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海军一号直升机正划过天际（右侧一架）

华盛顿：特区之“特”

主笔 / 徐菁菁

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在特殊的政治架构之上，这决定了它的“特区”身份，也决定了它作为单一功能首都的地位。

制度基础

美剧《纸牌屋》的片头是一部华盛顿风光片。片子的第一个镜头是在与华盛顿隔河而望的罗斯林的远眺。在开阔城市里，远处为纪念乔治·华盛顿总统而建的方尖碑是最显眼的建筑。接着，镜头划过宾夕法尼亚大道，通向尽头的国会山。城中的地标建筑悉数出场：南北战争中北方联邦军总司令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雕塑就在国会山脚下；最初曾是国家邮

政总部的威廉·杰斐逊·克林顿联邦大楼现在是美国国家环保局总部；国民军联盟纪念碑是为纪念所有参加过美国内战的老兵修建的；司法广场上有约翰·马歇尔的雕像，那是第一位对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首席大法官，他对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判决赋予了最高法院宪法解释权，确立了“司法独立”……短短一分多钟，观众们已经明了，这里不是纽约，不是旧金山，也不是西雅图，华盛顿是一座完全属于政治的城市，这部美剧所要讲述的，绝不会是一个浪漫故事。

全世界的首都城市大致可划分为复合功能型首都与单一功能型首都两类。复核功能型首都既是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世界上约80%以上国家的首都属于这一类别，它们往往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前就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地缘优势，是促进国家生成、发展的地理原点。单一功能型首都则

基本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华盛顿就是非典型中的一个：它并非国家的创造者，相反是联邦制国家的产物。

美国建国之初，定都问题引发了激烈争论。北方希望将首都定在纽约，南方希望将首都定于南方，最终，为了平衡不同联邦成员的利益，首任总统华盛顿确定在当时13个州南北分界线附近——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交界处，划定一个100平方英里的菱形区域，将这片荒野沼泽灌木丛生之地建成“联邦特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特区设立早期，波多马克河北岸有乔治城镇、华盛顿市和华盛顿县三个分开的行政区划。根据1871年的一项立法，上述三个行政区于1878年合并为华盛顿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核心城市。华盛顿的建立并不存在国防安全、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因素。这座全新城市在规划之初就确定了明确的目标：它的职能是就安置联邦政府部门。

这一点生动地体现在了总体规划和设计师法国人皮埃尔·朗方（Pierre L'Enfant）的设计里。除了漂亮的圈环形格局、窄长的风景带、开阔的林建绿地、蜿蜒的盘陀路和成对角的大道，朗方用城市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政治结构。

城市中心区由一条约35公里长的东西轴线和相对较短的南北轴线构成主要框架。三权分立中最重要立法机构大楼国会大厦被置于全城最高的国会山上，作为中心区东西轴线的东端。西端则以林肯纪念堂作为对景。轴线两侧建有一系列博物馆。南北轴线的两端则分别是杰弗逊纪念堂和白宫，两条轴线会聚的交点耸立着华盛顿纪念碑。城中的主要街道皆以美国各州的名称命名。连接国会和白宫的是最重要的“宾夕法尼亚大街”。每4年，新总统都要经过这里踏入白宫。进入白宫大门前，他会经过大道旁陈列着《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人权法案》的民族档案馆。市中心横贯东西的大街则以最高法律命名——“宪法大街”把国会和白宫一南一北等距离隔开，正是美国宪法的精神的体现。

不过华盛顿作为独特的“特区”首都，并不于它的城市设计，其根本在于它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政治框架之上。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章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特区由民选市长及一个13人组成的特区委员会（Council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负责打理。它不受任何州的管辖，但必须接受联邦政府监督。1870年，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政府机构成立，

但由于当时的行政长官过于铺张浪费，国会在1874年撤销了该机构，对哥伦比亚特区实施了近一个世纪的直接管理。在1974年，国会再次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特区议会根据国会直接授权，可以行使部分州政府立法机构具有的制定法律法规权力，但是，美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国会对当地的所有立法都有审查和否决权。

此外，在财税体制上，美国按照联邦、州、地方三级划分，各级拥有各自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范围。下级政府的预算只需要同级议会的审查通过，并不需要上级政府批准。相比州和地方政府而言，华盛顿特区同样具有独立的税收体系和发行债券的权限，唯一不同的是没有预算自治权。市长和委员会一起制定当地的税收和财政预算，也必须提交至国会批准。市长和委员会一起制定当地的税收和财政预算，也必须提交至国会批准。1995年，外界指责特区的预算过大，效率不高。为此国会设立了哥伦比亚财务控制委员会，监管特区的资金使用，直到2001年，下一任市长治下预算出现盈余，国会才将财权归还给市政府。

特区的政治权利还受到其他限制。1790年的《首都选址法》规定，特区作为联邦管辖区不属于任何州。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州才有民选代表，因此1961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哥伦比亚特区居民才获得总统选举权，目前有两张选举人票。

这些特殊的政治设计并不总能够保证特区的顺利运转。今年6月，首都特区和国会闹得很不愉快。特区市政委员会不顾以往报经国会审议的规则，独立通过了134亿美元的新年度预算。民主党人出身的现任特区市长梅利尔·鲍瑟尔声称要在今年11月份搞市民公决：华盛顿要不要放弃“特区”身份，成为美国第51个州。7月，特区政府通过了一项草拟的法案，决定在等到特区成功实现建州的想法后，正式将州名确立为“新哥伦比亚”。所有源于一点：当初北美殖民地发出了“纳税却无代表权”（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抗议，打响了独立战争，但如今这句口号仍适用于华盛顿特区。目前的首都市民有义务缴纳“联邦税”和“州税”，却并不享受与“州”同样的权利。市民们的权利诉求也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间的政治对抗：民主党在特区拥有传统优势，每当共和党在国会占有实力优势时，首都建州的呼声就格外高涨。2000年，特区政府决定，特区所有车牌上都要印制“缴税却无代表权”的口号。2013年1月，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就职典礼上，所有礼宾车辆都印上了这一口号。

都市圈

华盛顿立都 200 余年来，美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联邦政府机构也进一步扩充，对特区的最初规划的容量并没有完全满足发展的要求。1965 年才成立的美国交通运输部长期以来租赁私人修建的办公楼。直到最近几年，联邦政府才将一个空置的海军仓库改造成了现在的交通运输部大楼。即使如此，由于功能定位明确，行政边界清晰，华盛顿没有，也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城市扩张。长期以来，特区人口都基本稳定在约 60 万人左右。

但无论从经济还是从城市功能的发挥来看，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并不可能独立存在。这一点从负责对首都及其周边地区提供日常规划指导的是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的组成上就能看出来。这个委员会由 12 人组成，包括市长、特区委员会主席、参众两院对特区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主席，以及在 DC 占有较大土地的国防部、内政部及总部管理局的负责人，同时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委员会还必须包括两名分别来自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代表。

随着城市化、都市区经济和大都市区集群的迅速发展，首都城市规划思路也强调要靠卫星城建设分散中心城市功能。特区本身主要承担政治、文化职能，在公共交通、住宅、环境治理等则很难依靠自身能力解决。许多在华盛顿工作的美国人都选择住在邻近的马里兰州和弗尼吉亚州，从而形成“城内工作、城外生活”的职住分离现象，很多商业、住宅都建在郊区或周边市县。城市的商业、生活、娱乐等功能主要由周边卫星城提供。同时，由此形成的潮汐流对城市交通也带来巨大压力。这都使得特区与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周边市县的政府间关系日益密切，通过主要的区域交通走廊与周边地区形成了整体发展。现在人们说到“华盛顿”，可能指代三个不同的地理概念：华盛顿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大都市区。它们的区划含义分别相当于北京城六区、北京市和京津冀地区。为了处理大都市圈内的横向府际关系，1957 年华盛顿大都市政府委员会（MWCOC）应运而生。

由于美国政治中地方自治体制的存在，华盛顿大都市政府委员会没有政府权威，只是一个具有特殊协调功能的半官方、松散型非营利组织。21 个参与其中的地方政府可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退出。它也没有增加收入的能力，其资金主要来源是联邦和州政府拨款（占 60%）、地方政府会费（占 20%）、契约费（占

华盛顿立都 200 余年来，美国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联邦政府机构也进一步扩充，对特区的最初规划的容量并没有完全满足发展的要求。

10%）、各类基金和私人部门捐赠（占 10%）。

由于权力和支配的资金有限，华盛顿大都市政府委员会在区域经济合作上的领导力有限，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分配联邦和州的拨款。为弥补地方自治所带来的地方高度分化的缺陷，联邦法律要求交通、住房和环境拨款通过区域组织予以分配，那些不参加这些组织的地方政府没有资格获得联邦拨款。华盛顿大都市政府委员会每年可直接分配大约 25 亿美元用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以减少交通拥堵。自 1960 年以来，该委员会在作为特区边界的波多玛克河的治理上贡献卓著，使污染物减少了 90%。此外，委员会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跨地区的合作，如为政府的交通决策提供专家分析和相关信息，在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上协调区域合作。在委员会的统筹下，地方能够统一购买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公用设施，以节省费用。

虽然华盛顿特区城市功能的发挥极为依赖与周边市县合作，但周边地区也充分借助了首都的区位优势和政治影响力。联邦政府是许多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者和直接产出者。国家基金会（NSF）、国防部、能源部等政府机构控制了大部分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而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投在了华盛顿大都市圈内的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联邦政府还是重要的技术和产品需求者，大量依赖政府和军工合同的高科技企业也不断增加，在华盛顿大都市区内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科技和信息技术中心，大量的联邦政府订单保证了这一区域的持续繁荣。数据显示，华盛顿大都市区的人口已经接近 600 万，经济总量接近 5000 亿美元，在经济规模上名列全美第五，仅次于纽约都会区、洛杉矶都会区、芝加哥都会区、休斯敦都会区。

尽管所处的都市圈都十分繁荣，但与东京这样的超级首都相比，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并没有因此而扮演一个真正的经济中心角色。其中心城区主要以联邦政府部门为主，很少有工业企业和大型企业总部，工业用地面积不到 4%。2008 年经济危机发生后，华盛顿的经济受经济萧条的影响相对很小，经济形势非常抢眼，这一度使一些人开始惊呼华盛顿的崛起。但当美国经济进入复苏之后，2012 到 2013 年，华盛顿却出现了轻微收缩。这是美国 15 个大都市圈仅有的现象。原因非常简单：华盛顿对联邦政府的依赖太大——影响其经济的最大因素是政府的开销。当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并广泛地削减政府开支时，华盛顿也就失去了动力。■

（参考资料：《华盛顿城市治理经验：委托授权的协作治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著；《美国的大都市区管治模式及其经验借鉴》，宋迎昌著）





上图：华盛顿特区街景

下图：2016年4月18日，上千民众在华盛顿国会山参加“金钱政治”抗议示威，要求国会采取行动结束政治腐败，并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图为一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





首尔：“迁都”之困

主笔 / 徐菁菁

对于韩国来说，选择首尔与世宗“双首都”的模式，安全考虑，也是经济与政治选择。

韩国新行政首都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约120公里，面积465平方公里，约为首尔的3/4。它得名于创立韩文的朝鲜王朝圣君世宗大王，意思是“世界之最”。2012年7月1日，这座韩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特别自治市正式成立。韩国国务总统室、企划财政部、

国土海洋部、环境部等1室9部2处2厅及下设机构等36个机关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迁往世宗市，成为首尔政治功能疏解的第一步。

在韩国都市化的历史中，首都首尔的一极中心是近40年间形成的形态。日据时期，日本视韩国为提供日本国力扩张的枢纽和支点，遂于朝鲜半岛建立不少微城市，包括位于北部的平壤、新义州和咸兴建立重工业基地，南部的木浦、大邱和釜山则建成农业重镇，大致形成了朝鲜半岛的平衡发展。但自南北对峙和战争结束以后，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期，政府大力推行经济转型，透过政府直接介入在首尔设



左图：2012年7月，一名男子在韩国世宗市天文台内望向外面的建筑工地。世宗市行政首都在这年7月2日正式投入使用

右图：韩国首尔江南区的街道

立工业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中的67%集中于首都圈，而地方仅为33%。首尔对其他地区资源吸引力日益强劲，迅速成为韩国无可撼动的经济中心。

关于如何处理一个超重量级首都，半个多世纪来，韩国国内从未停止过讨论。早在60年代初，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就认为韩国有迁都的必要。1977年，他首次提出了要将首都自首尔迁往中部地区的设想。当时，朴正熙的主要考虑是“避战”——首尔距离朝韩分界线只有40公里距离。两年后，朴正熙遇刺身亡，迁都想法被搁置。不过首尔的安全忧虑一直存在，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驻韩美军做出战略调整，从首尔周边向韩国腹地南撤。

2003年，卢武铉上台。他在竞选时即以迁都作为执政承诺，入主青瓦台后便迅速启动了相关的调研和筹备工作。卢武铉与朴正熙的时代已经不同。他和

前任总统金大中都对朝鲜持温和态度，彼时的安全担忧让位于更为现实的经济考虑。一方面，首尔及其首都圈的负载已经饱和。以最基本的指标城市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重为例，首尔达21.5%，远远高于东京的6.4%，伦敦的12.3%和纽约的2.8%。若以首都圈来看，首尔首都圈面积占国土面积11.8%，人口却占到全国的46.3%。2000年，首尔市集中了韩国各种企业总数的29.7%，国内生产总值的28.8%，金融、机关、商店总数的41.6%，批发零售额的37.4%。首都圈的区域总产值占全国的48.0%，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9.3%和46.6%，存款和贷款分别为68.1%和65.2%。

全世界罕见的集中化程度给城市运行带来了巨大困扰。1980年，首尔市内车辆运行速度为每小时30公里，1998年减少到每小时13公里，产生的交通堵塞费用2000年达到4.7万亿韩元。首都圈的大气污

染与发达国家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非常严重，年社会费用达10万亿韩元。同时，首都圈内地价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4.6倍，使得住宅等基础设施的正常供给，受到严重困扰。

从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不断推出各种《大城市人口防止对策》，不断更新首都圈整备基本计划，以抑制首尔乃至首都圈的规模膨胀，但都未能取得显著效果。在行政功能疏散方面，政府曾经把财政经济部、产业资源部等9个部类机关分散到果川市，把铁道厅、统计厅等11个厅类机关分散到大田市。但是，前者迁到地属于首都圈范围，在空间上未能起到分散的作用，后者属于与社会各部门的直接联系性不强的机关，并没有缓解首都的一极化。

卢武铉政府迁都之策的另一个原因和今天日本的“地方创生”政策考虑相似。韩国有两个经济圈：首尔经济圈以及釜山经济圈，而韩国中部则是一个经济塌陷地带。忠清道、江原道等区域被许多韩国人称为“无家的孤儿”。这些“孤儿”尤其是忠清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以农业为主，民众生活水平也较低。韩国国会经过多次的协商最终决定在忠清南道燕岐郡与公州交界处建设新行政中心复合型都市，即世宗市。从选址来看，世宗市位于韩国国土的几何中心，通过高速公路、航空、铁路在两小时内可达全国大部分地区。

迁都同时附带有政治斗争的考虑。韩国几乎历届所有总统都来自新国家党和民主党两大党派。前者的大本营在以釜山为中心、由东南部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组成的“岭南地区”；后者的大本营以光州为中心、由西南部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组成。韩国各派政治势力要想取得执政权，除在首尔地区争夺外，还要仗仗各自地区的支持。当年金大中能够成功成为首位在野党领袖入主青瓦台，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有效拉拢扎根忠清道的前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金钟泌。2002年韩国总统大选时，民主党候选人卢武铉提出有关迁都的竞选口号，立即得到中部地区选民的青睐，才以微弱优势上台。

虽然卢武铉的目标是迁都，但迁都计划在2004年被裁定为违反宪法而搁浅，世宗市的目标定位变成了“行政中心城市”。2008年，新国家党的李明博执政后一度打算放弃该项计划。时任国务总理郑云灿曾表示，世宗市原方案将导致政府部门分割、行政效率低下。当时，根据规划，包括8.5万亿韩元（约合73.29亿美元）政府拨款，总计22.5万亿韩元（194亿美元）资金正用于兴建基础设施、政府建筑以及居

民住宅。李明博属意把世宗改造为商务、教育和科研城市，但遭到国会国土海洋委员会否决，同时，党内竞争对手朴槿惠也拉拢党员反对。2010年，新国家党在国会选举中惨败，李明博最终让步，并于同年12月颁布《有关成立世宗市的特别法》，世宗市作为新行政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按照规划，韩国中央部门中包括青瓦台和国会在内的外交、统一、法务、国防、行政安全、女性等部门留在首尔，其他16个中央行政机关和20个相关部门的1万名公务员在2014年完成搬迁。

根据2014年世宗特别自治市公布的《2030世宗都市基本规划》，世宗特别自治市将包括中央行政功能区、城市行政区、文化和国际交流区、大学和研究区、新兴知识区、医疗和福利区六个功能区。城市建设分三个阶段：2007到2015年，主要完成城市的中央行政功能、城市行政功能、政府部门研究功能、国际交流和文化功能，以及大学功能，人口规划规模为15万人左右；2016到2020年，主要完成城市的新兴知识功能、医疗和福利功能，人口规划规模为30万人左右；2021到2030年将完善并加强前阶段所建设的六个功能区，达到50万的人口规模。

世宗的中央行政区位于韩国四大江之一的锦江之滨，新办公楼群的屋顶相互联结成一体，整体弯曲盘旋呈巨大的龙形，总体长度达3.5公里，占地面积60万平方米，规模足有现果川中央行政区的三倍大，但世宗市的第一发展阶段称不上顺利。在韩国“迁都”世宗市一周年时，韩国《文化日报》联合世宗工会联合会，对韩国企划财政部、国土交通部、环境部、海洋水产部、公正交易委员会等五个部委的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世宗市厅工作的公务员中，有69.1%的人认为在世宗市厅工作不如在其他市厅工作方便。有59.3%认为“世宗市没有任何优点”。虽然为了改变世宗市处理业务效率低下的现状，韩国政府已经构建了电视会议系统，但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现状没有任何改善。由于城市配套的生活设施仍不完善，公共交通设施缺乏，周边许多高速公路、铁路也仍在建设中，住宅小区的商街餐馆、咖啡馆等店铺稀少，居民想去大型超市或综合医院只能开车20分钟到大田市，许多在世宗工作的公务员还是选择白天在世宗办公，晚上在首尔居住，两地奔波。这就意味着居民消费对世宗市经济贡献甚微。一个自给自足，并能够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第二首都还远远没有建成。■



时空交错里的片断

高承勇

记者 / 王丹阳
实习记者 / 郑亚博 摄影 / 张雷

在过往的时空里，
高承勇留下的痕迹与信息并不丰富，
有限的信息与他冷酷的杀戮形成极度的落差。
在这个时刻，竭力寻找即使片断的信息，
才是正当的媒体之道。



在甘肃青城与白银之间，是重重叠叠的黄土矮山

上图：在青城镇的深处，就是高承勇家所在的城河村。那里的房子由砖垒加土坯的方式建造

下图：高承勇家的宅院



甘肃青城古镇上开纪念品店的曾彩玲记得，高承勇是一个学习并不出众的人，网上所谓的“成绩数一数二”，根本没有的事。他俩是青城中学的校友，后者比她高一级，1985年落到了她班上补习，也就是复读。那个年代，曾彩玲即使和同桌男同学也不吭气，“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在这座镇上一流的中学里凝固不开，但她起码会记得些尖子生。“他也就中等水平，连话都没有，只跟一个残疾学生一起玩。”

高承勇喜欢用土疙瘩扔女同学是有的，但在风气不转的青春时期时代，这是很多男生引起女生注意的法宝。除此，他只是习惯性低着头，“仿佛地上有黄金”，或者埋头用功。1985年那届班上有8个同学考上本科，最好的在北师大，这个40人的班可谓优秀得惊艳。那时一届届复读下去的大有人在，四年五年都不稀奇，高承勇考了两年而不得，只能回家务大棚。

直到今年8月27日，“高承勇杀了人”的消息一传开，天下皆知。曾彩玲后来碰到同学就问：“你说意外不意外？”“咋不意外？太意外了。”高家四口虽已搬到白银14年，但这位沉默寡言的老同学一直在一个“风雅青城”的微信群里，“猜谜啊唠家常，挺能说的”。

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去年在东滩村，一位同学搬家暖房子，请高承勇来记礼。20世纪90年代，镇上人都知道白银出了个杀人狂，专杀红衣女子。她说：“那时候老妈子都不让我们穿红衣服去白银，千叮咛万嘱咐要晚上睡觉时顶着门。”眨眼工夫，那个横行28年的幽灵杀手，与这个眼皮子底下最不可能杀人的人重合到一起。

荒僻的祖宅

族弟高承海也是21岁才从高中毕业，他比高承勇小7岁。在20世纪90年代，走出农门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高考。2014年，镇上搞旅游开发，沿街农户一律换铺面式排门，高承海家拆了三间屋子，大量铺盖床、沙发柜没处放，一个亲戚给他介绍了常年在外的高承勇，后者很爽快地答应给他寄放物件，给他配了把大门钥匙。“我之前从不认识他，现在他的儿子走在街上我都不认得。”高承海这样强调，虽然是同族，但仅靠一条血脉微弱联系的高家门，

从不会远房近亲大团圆。

清明或七月十五，高承勇一定会回来祭祖上坟，那是青城人的规矩。他偶然跟镇上人打“扎金花”，多数时候很快就开着面包车走了，也不会跟高承海打招呼。高承勇1.73米的个子，身强体壮，肤色黝黑如茄，别人吃一碗糝饭，他要吃三四碗。高承海唯一跟他吃过一次饭是去年，然而也没什么共同语言。高承海觉着，自己是农民，高承勇不是；高承海的女儿在酒泉读大专，他族兄高承勇的两个儿子都是本科，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高承海现在镇上承包了三处茄子田，秋种时分整天来回铺地膜、浇水，农活非常忙。8月27日中午，镇党委书记带着七八个便衣来到大棚找他，出示搜查证后，让他把高承勇家的大门打开。那天，没有人知道高承勇到底犯了什么事，村民们难得在这座荒弃的院前聚集看热闹。高承海问警察到底什么事，警察回答：“小事，你不用管了，跟你没关系。”直到8月29日一早，他在地里听到传闻，连忙用手机连接网络……

高承勇的堂姐高承弟是8月28日知道的，她带孙子去镇上幼儿园报名，迟来的消息传到耳边，当场吓晕过去。至今，她嗓门低沉，话音冷得发抖，作为女辈，虽然跟高承勇无密切往来，但她是高家不多的还生活在小镇目光下的人。古镇的两条主路校场街和条城街如十字架般交叉伏在黄土矮山的怀抱中，高家人衍息的城河村就在古镇深处，村中砖墙由黄土夯起，跟地面连成一色。高承勇家的宅门寒碜，缩在一条仅容一人的10米土巷里，极易被忽略。90年代时，他就在外谋生，十天半个月出现一次，隔壁同族的长辈高作仁见到他，问：“才回来？”“嗯。”问一句答一句。

高家家业鼎盛时也曾庭院深深，高承弟站在土巷前描述，原来大门开在脚下位置，里边三重门，一一通过二爹、大爹、四爹和她的父亲，也就是高承勇的

五爹高作财家。父辈兄弟按“荣华富贵财源”取末名，民国时，高承勇的爷爷在镇上开中医诊所而受人尊敬，三爹继承医道，颇讲仁心仁术，族人相传“碰到个蚂蚁都要绕开走”。高承勇的父亲高作华稍微逊色，一辈子务农，但在新中国成立前，此地倚赖黄河漕运，水烟贩卖兴盛，他也曾在家里卖鸦片，新中国成立后更是转至地下，门前总来些影影绰绰的瘾君子。

50年代末，当地乡绅望族几乎无



高承勇（来源于网络）

一例外地衰落，高家分家，拆了大门，几家依次再添门面。如今，父辈中也只有五爹高作财留于故土，他耳背得很，只是见最近侄子家门口动静异常，知道他犯了错，没有人敢告诉他真相。高家有六七个堂兄弟都在白银，随着“作”字辈的老人一一离世，他们被裹挟在工业文明的各个齿轮上运转不歇，不再还乡，血缘的纽带只在族谱上赫然可寻。在高承弟眼里，高承勇与亲哥高承明也形同外家。

“他住在山根那里呢，咋会过来？”那山根和高承勇家，也就是古镇十字架格局上那一竖的两头。高承明在80年代就搬离了祖宅，村里凡有亲兄弟的家庭，都习惯大儿婚后另立宅基地，小儿陪同父辈住祖宅。他年轻时在兰州做泥瓦匠，与高承勇出没的白银一南一北隔着黄河，差80公里。按照高承勇的大儿子最初对媒体的说法，父亲在分家时与大伯有经济纠纷，“父亲的命比较苦”。

高氏血脉

族长高孝友在这几天不敢出门，怕撞见记者，再勾起这给家族蒙羞之事。青城古镇又名条城，以南北狭长而得名，就在悠悠伸向蓝天与土山之际的条城街上，高家祠堂挨过时代嬗变，一度是供销社的仓库，再还原了出来，这是目前镇上唯一的祠堂。高孝友引以为豪的耕读传世、风清气正如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可是很好的一个家庭啊！高承勇这一辈，就出了五个大学生。”他日日守在这座明清形制的悬山式建筑跟前，任里面错综层叠的椽梁和满目的翰林题字诉说着明洪武年间先祖从山东渤海迁来后的生衍。

这里在清代时，商号林立，多达200家，宛如一个西北的晋中平遥。高承勇家源自“泰和堂”，自古医术传家。清代同光年间，全国书院两三千之数，这里就有两座；榆中县历史上出过11名进士，有10名在青城。80年代，这里有两所高中，上级嫌过于特殊而撤并为一所……“我这个家庙250年了，如今出了个高承勇，是个耻辱。”然而高孝友也知道，到了高

说高承勇早年学途失利而受挫，老校长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那会儿的大学生也就是一个班一两个，一路要甩下多少无法攀上天梯的寒门弟子，他们还不是一代代固定在田地上？

承勇这第十八世，家族纽带已分崩，族人离散，走在街上，虽然都认识，却不熟识。

“他杀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结婚前谈过一个靖远的女朋友，那人喜欢穿红衣服；一个是考飞行员失败，受了刺激。”族里的老人靠着记忆和道听途说，竭力合理化他杀人的动机，尽管他们都没见过那个喜欢穿红衣的女朋友。事实上最近警方已辟谣，专杀红衣女子是谣传，那是从白银90年代起一个“叫魂”式的城市恐慌症。

高承勇在80年代考过一次飞行员，县里只录取一名，而他因家庭成分问题没有通过政审。母校青城中学的校长高华翰至今记得那时的考飞行员热，“初中毕业就能考，只要不是下三烂，体检通过就行”。在蓝天上飞，也是摆脱面朝黄土的又一途径。但大批人因严苛的体检标准未能通过，比如高华翰也考过，因双手震颤症而没有通过。高承勇在镇上，“没有一个人说他不老实”，说他早年学途失利而受挫，老校长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那会儿的大学生也就是一个班一两个，一路要甩下多少无法攀上天梯的寒门弟子，他们还不是一代代固定在田地上？

但高承勇就不一样，他80年代末在镇上务大棚，棚被风刮坏了，也不急着修，这在农民里是种异样。1988年，大儿子出世，他失踪了一段时间，老婆张清凤在月子里喊着隔壁亲戚讨点馍馍吃。整个90年代，他名义上是在镇上种地，却无心恋农，跑到白银或靖远打零工，工期结束了才现身镇上。

高华翰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么一个“肉怵怵”（胆小、女性化）的人，犯下如此天大的事，完全“跟杀人联系不起来”。他的儿子告诉他那天，他说：“不会吧，会不会还有一个高承勇？”“我就以我知道的来否定这个事情，我儿子说，爸爸没错，那两个儿子是大学生……”

有次高承勇和妻子去邻村的一个舞厅跳舞，“人家有点二杆子（当地俚语，混混流氓），搂着他老婆做了些不规范的动作，他去找那人，以表示他是丈夫，却被对方扎了一刀，他没反应。这事情是人家拿着2000块钱去白银找他，私了的。这就是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憋屁的人”。

高承勇的二哥20岁时被黄河吞没，高华翰看着也伤心。青城倚黄河南滩和谷地而生，与北岸的白银水川镇相望。为了改道黄河，造福南北自灌田，他的二哥是70年代治理黄河的一员，但在拉空船回岸采石的过程中，他在20来个纤夫中，不小心被缆绳打

落到黄河里，高承勇多次去到失事处哭过。

厂矿上的白银

榆中青城古镇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兰州，相距45公里；若跨黄河到白银，则25公里。青城南边的榆中北山，如一道耸出1000米的屏障，隔断了兰州之路，操着兰州金城片方言的青城人，宁愿在厂矿林立的小城白银营生。80年代，镇上运行着一种装有30座硬凳的“大轿子车”，形同城市公交车，穿过黄河上的索桥就到了白银的重镇水川，不愿花那1.6元的，便坐拖拉机在1里宽的河面上突突穿梭着。

地理之便与人口流动成就了青城的白银化，至今，此地供电由白银电力供应——也是白银区服务范畴唯一跨出其辖区的乡镇。据乡人介绍，白银曾有意将榆中县改划为自己管辖，但没有谈拢，后者当然更愿隶属兰州。白银与青城间无官方运营的汽车，黑车与大轿子车停在白银“水川十字”的路口，青城人黑压压地涌进白银这座丘陵与低山上开凿出来的厂矿聚落群，但80年代中后期，这座日益败落的西北矿城开始躁动不安，在早已夷平榨干的秃山上，犯罪如同死火山下的岩浆。

这里的开化史发端于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击退匈奴后，地跨河西四郡中的武威与安定两郡，均属凉州刺史部。那时，此地已有青铜冶炼；“白银”之名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间，“日出斗金、积销金城”的官方冶炼机构“白银厂”在此设立。直至1956年，凤凰山、折腰山爆破，白银在原本隶属兰州的王岷、强湾上平地而起，当地人身不由己卷入造城运动，眼看自己的坟山付之一炬。从谷歌地图上来看，这里的山形如黄河水之波纹，点缀着毁山的痕迹，如疙瘩与痼疾。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称白银公司）更是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白银成为工矿子弟的麦加。90年代时，前总理朱镕基曾来此地题词——“白银一爆出新天”。可以说，“企业办社会”的时代，白银因白银公司而生，白银公司渗透了整座城市，比一般工业城市特殊的是，这城市大多覆盖在一个巨人的羽翼下，那就是白银公司。

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在陇原大地拉开帷幕，白银这座群山屏障中的矿城顺当地成为“山散洞”（靠山，分散，隐蔽）的理想落脚点，大批重工企业举厂迁入，至今在郊县的山体上仍可见遍布的洞眼，悄然暗示着一个人造之深的时代。这一波移民潮来自沿海或

内地，有支边的人在论坛上这样描绘70年代初期的白银：“好像一个大厂区，人们住的都是一排排平房，只有原来苏联专家住的招待所是二层楼房。除了主要街道是一条水泥马路外，其余全部是土路，家里家外的地都难以分清。家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水缸盛水，如果把水吃完，水缸底部全是厚厚的黄土泥沙。”

到1988年，火焰山矿山闭坑，白银三大露天矿出产铜矿石6633万吨，生产10种有色金属约500万吨，产值和利税维持了18年的全国同行业第一。但作为一座资源型城市，它是短命的，30年未到就气数殆尽。人们在靠山吃饭、日出斗金时未曾探寻资源型生存的底部，白银公司主体矿山进入开采后期，必须深山掘进，对于白银来说，资源枯竭与体制转轨之困较早降临。

走在如今的街头，是一个初见就乏善可陈的城市。有意思的是，那曾经的厂矿企业一一破产倒闭，无处可寻，但一个个以单位命名的职工生活区依然鳞次栉比地排布开去。白银唯一的城区白银区虽从城市规划上来看，驱车纵跨南北得一个来小时，但生活区的范畴就如麻雀的脏腑，如果从著名的政府招待所白银饭店为圆心，人口稠密的主城基本在2公里半径内。

至今城里有3个电影院、13条公交线，由工人俱乐部改造的会展中心外放有一块罕见的电子广告屏，如同城市之眼眨巴闪烁，铜城商厦是八九十年代百货公司的形制，中央牌匾上的“铜城股份有限公司”是费孝通的题字……旧地换新装，现代化的外衣掩盖不住旧的里子——前工业时代大企业印记。按照《白银市志》的说法，2000年前白银城规“有总无详”。

白银出了个杀人狂

灰暗方正的宽而长的楼房三四层高，火柴盒般压在街头，它们的前身或许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房区。移民第三代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从厂矿上退下的老辈职工若无处可去，就世代处于原地。五方杂处、一代代移民累进迁入，也颠覆了这里原本微弱的处于兰州版图边缘的文化气数，厂矿移民居于自身的亚文化与公共设施内，与本地人隔绝，外地移民与候鸟族也只是在主流的机器轰鸣外找一些零打碎敲的活计，更无法做到文化结社或找到根。

这个如闷罐般的城市显然无法排泄恐慌，到了90年代如“白银出了个杀人狂，专杀红衣女子”的消息



多年来从青城到白银没有国有单位运营的汽车，这两年才有了公交车

弥布全城。1988年5月，当白银公司铅锌厂的“小白鞋”被残害家中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杀人狂”的说法。这个百姓回族女孩听说生得漂亮，住在如今工农路上的永丰路小区内，只不过那时是黑压压一片的平房，排山倒海地从工农路延伸到永丰路，足有半公里。

那杀人的手法前所未见，“颈部被切开，上衣被推至双乳以上，下身赤裸，上身共有刀伤26处”。屋子里尽是翻箱倒柜后的情形，奇怪在现场没有强奸痕迹，倒是有猥亵迹象。当时，公安还只把它当作个案侦查，“图财、窥阴、杀人”场面易让人联想到仇杀或图财害命……“有劣迹的，查的人很多，上百个不止。”曾经是白银分局预审科科员的郝玉新这样对媒体口述。

到1994年，同种面目的死神向白银市供电局单身宿舍逼近，警方的描述里，也是“颈部被切开，上身共有刀伤36处”。在现在的人民路上，这栋四层的苏联式红砖宿舍楼赫然耸立在街沿，宽幅很长，让人

联想到曾经的筒子楼那一望无际的长廊，它的中部曾被对襟隔开，分成宿舍和商贸公司两部分。供电局大楼跟它一字排开，如今仍是这座城市的命脉。

90年代时，这楼曾用来安置刚来单位、未成家的新人，男女宿舍按层数交错，一室两人。遇害者是供电局食堂的临时工，她的哥哥是供电局安保科的职工，至今，供电局小区的职工还会讨论那种悖论：“她的哥哥还是安保科的呢，在单身楼边就设着岗。”今年新装的防盗门就在岗边，但在过去，进楼是一扇隐蔽的蓝漆木门，哪怕不用避绕开执勤人的耳目，这道常年不锁的门像黑洞般随时吸纳着外界。

一位姓阎的退休职工记得那房间就在206号，“他们说一屋子的血”。后来她听那楼道里支着灶火烧饭的住户讲，午后，那临时女工应是食堂下班了，“见到她从走廊里走过，开门的时候很快就冲了进去，都没有开锁的动作……”她被发现时是两点，她的同寝室友回来了。“还是用刀子杀，整个都是血，脖

子几下，是习惯动作嘛，还懂人体解剖学，这个地方是动脉血管。他主要是灭口。”郝玉新说。这起案件也没有强奸。

在一个幽蓝如水的阴天的傍晚，我们站在单身宿舍二楼楼道的窗前，乳白色大理石地面反着荧光灯的冷光。这依然是一座单身公寓，接纳着刚来这所事业单位的大学生，只是楼道中央的水房和女厕提醒着昔日这里聚集着提水穿梭的繁忙身影，在早年的熟人社会里，进出都不锁门，楼房相比于平房，更少了安全隐患。

纵观那14年间发生在白银的9个案件，有的实行了强奸，有的没有，有的有侵财迹象，有的没有，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单一的目的，也让杀手的面目在白银人的心里变得飘忽。警方从白银市区常住人口，到北距市区25公里的武川，再到靖远、景泰、黄河南岸的榆中撒下天网，越是边陲山区越是地大人疏。

“可见他懂得分析现场的情况，有的环境不适合强奸。只能说他是双重人格，双重目的，生活上需要钱，变态心理上需要干这个事，不留活口的。”郝玉新没有想到，他28年的职业生涯会押在9起一人所为的未破案件上。他90年代初进入白银分局刑侦队，因为案件属地管理原则，几乎踏遍每个现场，熟悉到几近嗅到凶手手脚离开时的气息。如今，他坐在白银分局交通派出所的所长室里，这样回忆着当时的判断。

1994年的疑云还没消散，4年后，就在单身宿舍并排的供电局计量楼里，一个8岁的小女孩被皮带勒死，藏在整理过的衣柜里。那年1月，有两个女人相隔4天，以同样的情景惨死家中，除了抹颈的刀痕，残忍度变本加厉。郝玉新目睹过冬天里被掀开的皮肉还冒着热气，或者“耳朵、头皮、头骨一块儿连着头发，一起被带走了”。1998年，相等惨状共4起。

也就是那一年，郝玉新提出，由个案变并案侦查。那时，无论从作案方式还是现场遗留痕迹来看，已确定是一人所为。郝玉新并不认为白银警力薄弱，“在全国同等级别的城市，白银的警力不算少”。他这样告诉我，从市志上看，90年代初，白银市公安局为县级建制，刑侦连同其余20来个科室，共有民警168人。千禧年后，公安部曾规定从刑案属地原则来看，1万人口必须配备2名刑警，但在财力不等的全国，这种要求无法切实落地。

“1998年前，我们对白银下辖的三县两区常住人口打过指纹，1998年后开始扩散到榆中、靖远，这两

地成了重点。”他说。即使这样，依然无法捕捉那个在黄河两岸、榆中和白银间25公里的土路上穿梭的独行幽灵。2000、2001、2002年，他还在白银游荡，在街头巷尾随机入户，爆出一桩桩惊天惨案。

到杀人地点500米

2000年，永丰街以西的西山路上，有两栋棉纺厂的平房，各有7间，那是棉纺厂建来安置有家庭却排不上家属楼的新进职工的。80年代末，尚学成从新疆退伍回来，进了棉纺厂锅炉车间，携家带口住在那儿。平房相比于单身宿舍，起码让一家子同住一个屋檐下，尽管厕所、水房也都在外面。

两列平房由棉纺厂的办公室改造，孤零地并排而立，上是一栋五保科的平房，下有一条水渠，水渠外是车队的停车场。谁也不知道，死神会在凌晨降临，同样割颈，还取走两只手，当那28岁女工开夜火车的丈夫大早从五保科领了工资回来，他们两岁的女儿坐在血光里瞪着眼发呆。

那排屋子中间嵌了个水房，与出事的房间贴隔壁，尚学成的家在另一排平房的末间，他说：“我那老妈子晚上不敢出去提水。”那时候，棉纺厂已经倒闭10多年，尚有劳力的男壮年去南方私营厂找活是常态，尚学成也去温州待过一段，回来听老婆说了白银杀人狂。

2005年，他已经搬入了永丰路上的棉纺厂小区3号楼，那是一排建于1976年的走廊阳台式四层楼房，水泥墙面被侵蚀得苍老，但也是排队排来的房子。他住在1单元一楼，3单元一楼有个前纺车间的姓谢的榆中男人把房子租给了一户外地打工的，直到今天，他才知道那就是高承勇和他的老婆、两个孩子。

他从来没有见过高承勇，出事了才知道他们在一幢楼里共同生活过7年。那姓谢的把房子放租后常年在温州，他自己也在白银当地早出晚归，“这个小区闲杂人员太多”。其实，高承勇把家安在这里后，仍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2号楼的谢世俭几个星期见他回来一次，在楼下跟他互相发发烟。

2002年，高承勇的大儿子考上白银的高中，他携家租住到长通电缆厂的职工楼，从棉纺厂小区低矮的围墙向外望，谢世俭给我指着长通厂的方向。那个最初的落脚点距离1988年“小白鞋”遇杀的工农路平房区，是500来米距离。万人如海一身藏，但是，无论他搬到哪儿，都仿佛在那9个案点编织的网络里，

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多少次经过那一个个曾经杀红过眼的地方。

他住了6年多的棉纺厂小区，距离西山路那排平房也不过500米。那是一套3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房子，一楼的钢窗微微打开，无罩的灯泡和石灰剥落后的裸墙烘托出一个破陋的灶间。他跟隔壁一个姓孙的独居妇人处得还行，经常换烟抽，有时上门坐坐，自己拿起苹果就吃了。2单元里的原子宏（音）也住在一楼，都是烟友，知道他在白银铝厂干过两年，后来去平川的一个化肥厂做苦力、填大料，大概是和老板不和了，干了20天工资也没要就回来了。邻居眼里，他就是这么个老实人。

张清风从来没有工作过，不管是在青城还是在棉纺厂小区，小区里都知道她供着两个儿子吃饭，还有自己兄弟的一个孩子也在她这吃午饭。她这人快人快语，又大嗓门，藏不住事，她曾问过谢世俭，去新疆阿克苏那儿工作怎么样，小儿子在兰州一所理工大学读的是化工专业。白银人除了去兰州，就是去南疆，那里有甘肃无可比拟的油气资源。今年，张清风还回来给隔壁孙阿姨送过老家的杏，吃不完的就街上摆个小摊，临时的流动小摊是这座城市另一面俗世温情的景观。

高承勇事发后，小区里的人听孙阿姨说，张清风哭得死去活来，说不想活了。谢世俭曾开高承勇的玩笑，“你的话都被你老婆一人说完了”。高承勇从来没有咧嘴大笑过，“他要是笑，总是嘴一撇就收了”。那段时间，他跟这个小区里那些失业并四处觅活的男工没什么两样，西山路以西上到长通厂，下到棉纺厂、毛巾厂、羊毛衫厂都破产了，永丰路被称为“破产一条街”。2012年，从新疆探亲回来的谢世俭在汽车站碰到高承勇，那时，他刚从内蒙古回来，也是在铝厂做烧焙，简单说了说那边赚钱难。

那一年，房东要涨价到500元，这对已把两个孩子送上大学的夫妇和房东吵了一架，搬到了永丰街上的一个猪圈里，养猪是棉纺厂某厂长搞的副业。两个月工夫，张清风就盘到了白银工业学校的一个校内杂货铺，两人连住带开店地搬去了。如今，原子宏、谢世俭、尚学成这些老职工的午后闲谈，时常勾画着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半百之人。“小高这个人，不像是凶煞的人啊。”谢世俭说。

原子宏和尚学成坐在午后透薄的阳光里，在一楼门廊的地上用石块画出那两排平房的格局，棉纺厂职工的集体记忆里，那里因为血案而永久鲜明。只是今

天，真相大揭后，他们犹如惊梦初醒。高承勇租住的房间楼上曾住着一个刑侦大队的警察，也姓高。“楼下住着杀人狂，楼上住着公安。”在清谈中，他们仿佛在说一个不可思议的遥远的故事。曾经，高承勇也坐在门廊前晒太阳，只是他孤而不群，很少说话。

万人如海一身藏

在高家祠堂里，高孝文翻开那本族谱，特意向我展示那位媒体所称的高承勇“远房的堂叔”，正是他因受贿取保候审而抽了血，致使那些积案所取证的DNA有对上的一天。“就是这个人。”他指了指，“那不是堂叔啊，跟高承勇是一个太爷的，是同辈！”他划过一溜竖印的名字，那是高承勇真正的堂兄们。“这些人都在白银，你说怎么就没抽他们的血，反而抽到远房的才发现？”他认为，如果警察早点查验他堂兄的血，也许就能阻止几桩悲剧。

他显然无法理解个中复杂的原因。郝玉新承认，抽血普查在白银是今年才开始的。“我们晚得厉害了，但今年已经对常住和暂住人口进行采血了，只要把他堂兄的血采到，这案子无论如何都能破，什么时候破，就看今年。”他说。

这个案件的侦破，运用到Y-STR (Short Tandem Repeat) 染色体检测，那是一种针对男性家族遗传基因的技术。男性家族单传的Y染色体是一个保守基因，可追溯到无穷，并从源头上准确地表达。目前，在Y染色体上已发现有30个左右的STR标记物。“STR是短串联重复序列，人和人会有差异，但是同一个家族里差异就很小。比如说对其测了5个位置，放到数据库里去比对，就能找到家族成员。”上海解码DNA公司的CEO潘家奎告诉本刊。

找到STR就相当于找到姓氏，当犯罪者的样本与家族的参照数据的接近度达到97%以上，就说明血缘越近了。从高承勇的这位远房堂兄为基点，按时间、年龄、地点，筛选圈定出的家族成员仅十几人，高承勇果然就在里面。但是，我国2002年左右才建立了犯罪数据库，样本量小从而无法被大量运用到侦查中。

曾经办过邯郸王书金连环奸杀案的老刑警郑成月有过一次十分遗憾的经历。2005年时他为了比对受害者与其母亲的线粒体DNA，将样本提取到北京公安部相关中心做鉴定，因尸骨年代太久而做不出来。“公安部说只有上海和沈阳可以做，但当时局里经费紧张啊，考虑到差旅费就没有去做。”1999年后，在郑成

月所处的邯郸广平县公安局开始有了电脑，可以上网录入和查询指纹，但最初的指纹系统在省市间不联网，查询范围被限制。

1998年的白银，郝玉新在地毯式地采集指纹，浩瀚的纸堆把他淹没，三四个技术员整天伏案用肉眼比对着。“全市200多警力都联动了，不管刑警、交警、户籍警。”这些人都由郝玉新调配着分组分工，一摞摞资料铺满办公桌。但是，取指纹远没有想象的简单，第一，它不可能穷尽，白银4万个符合划定年龄段的男性，一个个排过去，但现实的人口流动早已造成无数缺口。青城也去了，500个目标人群里，200个没打上，“这200人里有吸毒的，有怕盗窃的，敲门也不会开”。

再则，公安条例上从没有赋予为破案而强制性取指纹的权力，不愿来打的是不能强迫的。他也有几次瞄上某个看似符合通缉画像的人，想好了再找，那人却可能打工去了。“我就记住他住在哪儿，深夜里带着技术员去，把门把手上的指纹提回来。”广平县公安局的郑成月则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比照，在他那儿只有被传唤的才能取指纹，否则是不允许的。

2001年，白银案与包头两桩杀人案现场指纹对比成功，并为“甘蒙805系列奸杀案”，成为公安部督办的案件。举国的刑侦专家都陆续前来探讨或参与，这些年来，调查未曾中断。“公安部来的人说，白银还有这种事？”官方统计，2003年，公安部门曾组织“指纹破案会战”专项行动，下载甘肃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捺印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万余次。2004年，入户指纹取样达到10万份。

郝玉新曾在脑中无数遍演绎凶手是如何出现和离开的。根据综合证言、现场痕迹、侦查等方面，似乎“有时是尾随进门，有时是推门看有没有人，有人就走了……应该是穿深色衣服，可能换了，可能没换，血染了就像墨汁一样看不出来……现场发现他提了袋子，可能放刀具和换下的衣服”。他直觉那应该是一个人群里的“好人”，一个嗜血的猎手、独狼，为了掩盖罪行而应付着做一个孝子、贤夫，总结下来，兼具双重人格和性变态心理。

8月26日，高承勇被从白银工业学校拷走的时候，表现得心里很有底。上了警车，警察问：“知道为什么抓你吗？”“知道。”“为什么？”“杀人嘛。”审讯在进行，郝玉新偶尔被上级叫去讨论案情，他在看守所的审讯室外瞥了高一眼，就是那么一个放在人堆里

极其普通而端正的“好人”。而这个表面上的常人，这两天的供述暗合了警方之前的一个推论——专家曾经分析，这个人应该对红的东西感兴趣，见血就兴奋，这是性变态的一种特征。

尾声

高承勇的“反侦查”手法并不高明，他作风大胆，在现场并不忌讳留下自己的痕迹。杀人后坐下来给自己倒杯水，在受害人家里的脸盆里洗血手，把血手印留在门框上等等，都让人联想到那个鲁莽又淡定的猎手，在一个特定的年代不设防的城市里自如地制造着血案、肃杀去来，时间沉闷到仿佛凝固。

他的逃跑路线也几乎不用设计，怎么来的怎么走，有几个血案现场的楼上楼下、左右隔壁都住着人，但他们告诉警方没有听见动静。郝玉新只是感叹，是运气把高承勇留到今天。“咱们累死了，到不了人家跟前，只能说人家的命运还没有到那时候。”他说。

当被问及公众对28年案件未破的质疑，郝玉新强调说，这事如果发生在上海或北京，也一样大海捞针。在白银，一种韵律似乎未改至今——每到夜幕降临，特别是雨夜，霓虹兀自闪烁，未打烊的洗浴中心空空无客，街道如黑亮的镜面通向无知的所在。翌日是个大晴天，职工纷纷上街，楼里只有老小。高承勇只在白天出现。

2014年后，青城古镇的旅游业开始发展起来，一些饭店和商店慢慢出现，当年挤破独木桥没考上大学的农民，如今在去白银打工之余又有了选择。“你说高承勇是因为穷，那个年代谁不穷？80年代有的连饭都吃不上。”一个女人坐在校场街沿街的廊檐下说。她是高承勇的初中同学，没有考过大学，如今把自家的门面房出租给一家牛肉面馆。

这几天，青城镇的人都在手机微信群里转发一条信源模糊的消息，说是高承勇第一个案子的初衷是入室盗窃，他不止杀了11个人，还有更多的没身份的拾荒女性，而他的犯罪灵感来自于祖上的一个秘密……高孝文无法解释笃信“孝悌礼义”的高氏怎么会出这种事，只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再次走进弯弯折折的土巷来到高承勇的祖宅，掉落在地上的猴年对联用毛笔字写着“地染三春润万家，门盈百福泽桑梓”，与此情此景的破败如天壤之别，在铁大门的里侧还有几个稚嫩的石头划的字：“爸妈我”。



豺狼的日子：白银案现场寻访

文 / 刘怡 摄影 / 张雷

对塞外工业城的刻板印象，使人们易于忽视上世纪90年代的城乡人口流动、盲区重重的空间环境乃至捉襟见肘的刑侦手段给白银市带来的深刻影响。杀人者高承勇的踪迹，就隐藏在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空隙之中。

水川十字的位置，在白银市公园路与109国道交界处，靠近市运输公司办公楼旧址（今银冠集团物流大厦）。尽管这里距离水川路口尚有450米的距离，当地人依然固执地将其称为“水川十字”。由市属三县（靖远、景泰、会宁）和武威、兰州、定西等周边

城市发往白银的短途客车，以此处作为终点站。在支付过5元到40元不等的票价之后，乘客们须在水川十字下车，步行或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进入市内。西北方650米外，是被当地人称为“大十字”或“王砚东路十字”的本市唯一的一级汽车客运站，在这里停靠的是往返于白银和外省各市之间的长途客车。带有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广场钟提醒着外来者：穿过大十字、进入人民路，便踏进了白银市的核心地带。沿人民路向北步行15分钟，可以抵达醒目的市政府白色办公楼旧址（今市公证处）；因歌手张玮玮的民谣《白银饭店》而小有名气的那家宾馆，在人民路东侧，均在步行所及的范围内。



左图：位于白银市白银区西北部的露天铜矿一号采场遗址。这里的矿坑直径超过1000米，已于1984年停产。1956年该矿坑的爆破开采成就了白银建市

右图：从市区近郊俯瞰白银市貌。尽管人口增长近于停滞，当地的房地产开发依旧火热

整整28年前，1988年5月，当高承勇在位于长通路和工农路交叉口（今永丰街小区）附近的白银织布厂附属平房区犯下人生中第一起命案时，水川十字还没有成为从他的家乡榆中县青城镇到白银市的短途客车终点站。那时的停车点，在水川十字正北方2000米外，公园路与四龙路交叉口，金鱼公园西北角。之后14年间，四龙路十字和王砚东路十字逐步成为毁灭9个年轻生命的死亡通道：9起案件的发生地，齐齐分布在两大十字路口周边1200米半径内，在地图上看来格外触目惊心。而从2006到2012年，高承勇本人甚至还曾在位于“88·5·26”案件和“00·11·20”案件犯罪现场之间的棉纺厂小区租住了6年多。在这6年多时间里，他数千次穿越自己曾经的作案地点，以四处游走的打工者形象隐藏着那些惊天秘密，直到一切在2016年8月水落石出。

28年的时间，足够使高承勇的两个儿子由初生的

婴儿成长为大学毕业生，也足够使这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连环杀人案成为耸人听闻的都市传说。从他的家乡青城镇城河村到曾经的租住地棉纺厂小区，任何一个与高承勇有过头之交的人都能向我口述出一段细节丰富、逻辑完整的恐怖故事，其中充斥着“专杀红衣女子”之类已经被公安机关证实为谣言的桥段。普通白银人在回忆那些残忍的凶杀案带来的长期恐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夸张的渲染。当我发现水川路的一位老住户居然指反了“98·1·9”和“01·5·22”案件发生地的方向时，不由得对高承勇的亲属、长辈乃至曾经的相识向媒体所做的那些叙述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高某本人的口供被披露之前，任何在他早年经历的碎片和犯罪动机之间建立起的联系都有不可靠之处。

但我们依旧可以探究一个确有实据的问题：在高承勇的杀机萌发之后，是怎样的环境为他的作案提供

了空间，并使他在整整28年间始终能逃脱追捕？答案来自时间与空间的复合：在90年代白银市的人口流动、社会结构、警力缺陷乃至思维习惯中，存在着无数的空隙和巧合，足够使一个狡猾的杀人者藏身其间。这个择业失败的进城农民，在改善经济状况未果之后，最终将屠刀伸向了那些体力和防范意识远不及他的年轻女性，付出的仅仅是相当于9碗牛肉面价格的交通成本。而将他逮捕归案，却需要上千人花费将近30年的时光。

失败的入城者

由水川十字开往高承勇家乡青城镇的短途客车，单程行驶距离31公里，用时约一小时。客车进入白(银)榆(中)公路五顾段之后，向南穿过一座四车道的钢筋水泥大桥，便进入了黄河南岸的兰州市榆中县境内。最近几年的春节和清明，高承勇夫妇有时会驾驶自家的微型货车，穿过这座大桥回到老宅拜年和扫墓。但在30多年前，当高考落榜的青年高承勇坐车前往白银市寻找工作机会时，那座漂亮的黄河桥还没有建成。从他居住的城河村西行1公里多，另有一座钢制吊桥通往对岸的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这座在2003年因不堪重负而垮塌的吊桥，清晰地隔开了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冥冥中也成为高承勇走向另一段人生的分界线。

始建于1779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氏祠堂，坐落于青城镇条城街，在着力开发旅游业的当地是一处颇有人气的景点。不过在2016年9月的这个周末，多数造访祠堂的游客关心的并不是后过堂中悬挂的道光帝御赐牌匾，或者高氏家族历史上出过的7位文武进士，而是带有猎奇色彩的连环杀手高承勇。这令兼任祠堂管委会主任的现任族长高孝友不胜其烦：“高家出过那么多正面人才，为什么只盯着一个杀人犯！”高承勇的族祖父、原青城中学校长高华翰颇感委屈地表示，青城中学在本地的升学率相当不俗，

高孝友、高华翰等长辈虽然对高承勇这位族中后生颇为熟悉，但在择业、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却远无能力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帮助或指导。

如今出了这么一位“知名”校友，声誉恐怕会受到影响。高承勇的一位堂妹甚至直接回复说：“我们和他不熟，没有关系。”

这种对名誉和舆论形象的看重，某种意义上恰恰揭示了传统宗族关系在今日榆中农村的真实处境——它已不具备几个世纪之前那种分享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独特效用，而弱化为一种纯粹的文化和礼仪纽带。高孝友、高华翰等长辈虽然对高承勇这位族中后生颇为熟悉，但在择业、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却远无能力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帮助或指导。城镇化尤其是城乡人口急剧流动的冲击，使宗族成员间的关系变得疏远而脆弱；古老姓氏和传统仅存的价值，似乎只体现在重修祠堂、续订家谱等形式感强烈的活动中。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农村就业机会匮乏带来的文化水平与收入状况的脱钩。高承勇五叔的女儿告诉本刊：尽管他们的祖父颇通医道，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乡村老文人，但因为家中有5个儿子，生活依然相当拮据。高承勇的三叔曾考上医学院，继承父业，但对几个终生务农的兄弟也不曾关照太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首先体现在了家族成员关系的疏离中。而对一介农民之子高承勇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或参军入伍带来的独木桥效应几乎是决定性的——只有升学和从军才能带来进入城市、改善社会地位和收入状况的机会；一旦失败，高中学历对贫瘠单调的农村生活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实质性帮助。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高承勇会对青年时代报考飞行员失败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并且相当重视两个儿子的教育。但在80年代初，高考落榜、参军失败意味着他只能延续父辈的命运，留乡务农。

我们进入高承勇在城河村的老宅院子，探访了其中的环境。尽管已多年无人常住，院中开满韭菜花，但房屋的布局和外观并不十分寒酸。土坯正房门口张贴着褪色的春联，从门缝中可以窥见干净的桌面和柜子，右侧是供两个儿子居住的配房。牲口房和灶台因多年无人使用而显得破败，但也不比其他内陆农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来得糟糕。实际上，此处老宅本身就是1986年高承勇结婚时与二哥和叔叔们分家所得，高家的其他子女分得的房产大致与此相仿。区别仅仅在于，周围的其他堂兄弟和亲属在最近十几年已经盖起了新砖房，按部就班地改善着生活环境；而高承勇一家在2002年已经集体迁出，将老宅和耕地一同抛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处小小的立身之

地并不足以支持农村三口乃至四口之家的日常用度。1990年前后，青城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不过385元，刨除每年人均378元的生活消费支出，结余不过7元，仅仅相当于当时10碗兰州牛肉面的价格。直到2000年以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突破了1500元。况且，高承勇从来都不是一个勤勉的耕作者：据高孝友、高华翰等人回忆，这位沉默寡言的晚辈在本村尝试过种植大棚蔬菜，但效益一般，对主粮的种植和收割也不甚关心。即使没有来自白银市靖远县的妻子张清风的敦促，高承勇自己也会选择前往一河之隔的白银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毕竟，1990年前后白银市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高达1631元，是青城镇农民的4倍多，而两地之间只隔着一张售价0.7元的汽车票的距离。

高承勇在白银市的活动经历，始于1984年父亲高作华的病逝，在与张清凤结婚之后成为常态。事实上，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城镇青年的选择：农忙时在自家耕地上劳作，农闲时则前往周边的县市打零工。但80年代中后期的白银对一个虽有中等文化、却缺少专业技能的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好去处——1984年，白银市露天矿一号采场闭坑；两年后，二号采场也宣告封闭，转入深部开采。构成全市最主要经济支柱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简称白银公司）自此进入长达20年的衰退期。据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白银市志（1991～2005）》记载：“1996到2000年，全市经济增长跌入谷底，白银成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产业衰退，失业人员剧增，环境污染严重，公共服务滞后，精神文化失落，社会矛盾凸显。”大批既有的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尚面临失业待安置的问题，类似高承勇这样缺乏技能的外乡年轻人，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希望。

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在工矿产业陷入衰落、各种矛盾此起彼伏的八九十年代，白银市依然是一个缺乏足够社会流动性和就业机会的控制型共同体。第二产业占全市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50%以上，巅峰时甚至高达60.87%（1993年）；而整个第二产业的基干，则始终是白银公司（主营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冶炼、合金加工和辅助生产）、靖远煤业公司、银光化学工业集团、靖远发电公司、白银供电公司、长通电缆集团、白银棉纺织厂（今甘宝棉纺织公司）等少数大国企。相对线性的招工和管理模式，封闭的企业结构，乃至基于企业形成的社会层级，都没有给黄河对岸的贫穷外来者留下按部就班地融入和致富的机会。而高承勇

最终将这种不合时宜的流动性，变成了独特的犯罪优势：在被他虐杀的9名女性中，有半数以上与白银当地国企有关。

直到2016年8月底在白银工业学校内的学生服务部中被捕时为止，高承勇始终是这个百万级人口塞外工业城的外来者。在2006到2012年租住于棉纺厂小区、照顾两个上学的儿子期间，他依然不定期地消失，行踪不明。30年间，高承勇的足迹遍布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贩卖过刀具、当过金属冶炼工人、经营过小卖部，从来没能在任何一个城市真正扎根，也没能谋得一份足以彻底改变全家经济状况的工作。同样是在这30年里，青城镇的产业重心逐步转向了果蔬种植和旅游业，四车道的新桥取代了城河村附近那座老朽的吊桥，高氏宗族的年轻成员们开始经营起餐馆和农家乐。但这一切都和高承勇无关：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游者。

168个警察

浪游谋杀者高承勇的存在第一次为警方所证实，来自2004年白银市公安局发布的一份公告。该公告明确指出，1988到2002年白银市发生的9起性变态杀人案件系同一人所为，并将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为：“大约在1964至1971年之间出生，身高约为1.68米至1.76米。此人应该是在白银长期居住，有较严重的性变态心理，或者生理缺陷……该嫌疑人在白银市区有独居条件，还与内蒙古包头市有一定的联系。”回头看来，除了年龄和身高比较接近，当时警方出现了一定的误判，比如高承勇真正开始在白银长期居住，其实是在终止作案的2002年以后。隔开水川镇和青城镇的黄河，意外地成为他的包庇者。

即使是久居白银市的本地居民，也容易把“工矿城市”“人口构成简单”这样的刻板印象挂在嘴边。实际上，在过去25年间，城市人口占全白银两区三县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0%到30%之间，仅为农村人口的1/4到1/3弱。而工矿企业集中、被老市民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市”的白银、平川两区，其常住人口仅占全市人口的1/4左右。自80年代中期起，市属三县以及周边城市的青壮年农民为改善收入，大批入城寻找工作机会，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2000年前后；而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资源需求（住房、医疗、公共空间、治安、娱乐等）的显著增长，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事实上，直到1995年，白银市才出台了



1 1988年5月26日
永丰街 177-1 小白鞋

7

高承勇曾经的租住地
棉纺厂小区内景

9

2002年2月9日
陶乐春宾馆朱某

白银系列连环强奸杀人案现场今景



2 1994年7月27日
供电局单身宿舍石某

5 1998年7月30日
供电局计量楼苗苗

2001年5月22日
水川路 28-1-12 张某



8

1998年1月19日
水川路 6号 邓某

4



3



7



6



4



8



9



6

1998年11月30日
东山路 59-6-4 崔某



3

1998年1月16日
胜利街 88-6 杨某

十字街
路
龙路社区
银嘉垣广场
高蒙箱包
园社区
山路
红星街
万盛花园
白银市第十中学
益民自选商场
新地阳光佳苑
王顺东路
银市第六中学
体育街
金穗小区
佳苑
花苑
家园



1

1. 位于青城镇城河村以西的黄河桥。该桥建于21世纪初，对岸是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20多年前高承勇从家乡前往白银时，桥基原址上还是一座老旧的钢索吊桥

2. 高承勇一家在白银棉纺厂小区所租住的房间

3. 高承勇的被捕地白银市工业学校学生服务部。他从2012年起便常居于此

第一部《流动暂住人口管理暂行办法》；1996年6月，才开始实行农村户口的精细化管理。换言之，高承勇在白银猖狂作案的那几年，恰恰是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的关注、管理最为粗疏的年代，因惯性而形成的盲点比比皆是。

1991年，白银市两区三县的总人口为146.9万人，而全市包含缉私、消防、纪检、户政、内勤在内的民警总数仅为168人，警力与人口之比达到了惊人的1.14：10000，不及今天全国平均密度的1/9。即使只计算白银、平川两区的28.9万城市人口，一名警察也须负责1718人的警情，而欧美城市的平均警民比例为1：300。更何况，168名民警中还包含大量无法参与治安和刑侦工作的国安、缉私、装备、财务、劳教、消防人员以及交通警察——直到1994年9月交警支队升格为副县级建制为止，消防、交通等非治安任务一直由市局直接管辖，牵制了大量人力和精力。而在高

承勇集中作案的白银区，每个派出所只有2～3名民警。

吴秋文曾任东部地区一座百万级人口规模的地级市的区公安分局局长、副处级侦察员，他向我们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侦办恶性刑事案件的一般流程：刑侦大队警员在勘查现场之后，会将提取的痕迹物证带回市局，由技术科加以分析比对；但因为当时尚未建立全国联网的数据库，这种比对基本上是单一、线性的。换言之，从“88·5·26”案件发生到“94·7·27”案件发生的整整6年间，由于高犯并未进入警方的排查和取证范围，从永丰街取得的痕迹物证仅仅是无法发挥即时作用的孤证。为侦办此类案件成立的专案组，倘若在数年内无法取得新的进展，或者嫌疑人并未再度作案，便只能暂时搁置调查、各回本来岗位。遇有重特大恶性刑事案件，等级升格为省督、部督之后，省公安厅乃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都会派专家参与调查，并向周边省市警方通报案情。但



2



3

这种通报程序，仅仅是书面式的——一般是一份由省厅下达的协查通知或通气通告，知会周边各市警方：倘若辖区内有相同类型的案件发生，应通知白银警方。但由于高承勇恰恰不曾在家乡犯案，即使兰州警方在90年代已经收到了邻市的协查通知，也不可能向其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与白银市相隔30公里的青城镇，也因此被“合理”地排除在了调查范围之外，留下了巧合的漏洞。

在吴秋文看来，90年代办案过程中常见的大规模调查走访、排查摸底，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六七十年代，刑侦工作中的走访排查实际上是依靠基层政权的控制力，依靠人口流动的非自由性和民众之间的相互监督来获取线索。进入90年代，一来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已经脱离了基层政权的视线范围，二来群众的思维方式也更复杂，大规模走访往往收获海量的无效信息，兴师动众，对破案所起的作用却不

大。”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白银案的侦破中：尽管当地公安机关不辞辛劳，进行了10万人级规模的指纹搜集和大规模入户排查，但除去收获了若干捕风捉影的疑似线索之外，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浪游者高承勇依旧隐身在排查范围之外。

90年代的白银并非社会治安良好的世外桃源。从1991到2005年，全市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达到了2.827万起，平均每年1885起，平均破案率不过58.65%，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高承勇猖狂作案的90年代中后期，白银市已经出现了规模不小的贩毒、破坏电力设备和大规模盗窃案，以至于公安机关几乎在每年春、冬两季都要进行一波“严打”专项斗争。从2000年开始，全市刑事案件的年均立案数甚至突破了2800起大关，以至于将警力增加到197人（不含交警、消防）依然不敷使用。就在高承勇犯下“98·11·30”命案之前20天，白银汽车运输公司经理蔡某（正县级干部）在水川路的家中被两名意图谋财的本公司职工子弟灭门，酿成白银建市以来影响最大的命案之一。贩毒、盗窃、杀人案件的层出不穷，牵制了本地警方的精力，也使类似高承勇案件这样的流窜人口连环杀人案的侦察和破案周期变得极为漫长。1999年9月17日，白银公司三冶炼厂职工张某全家被来自兰州的两名无业人员持枪抢劫后杀害，最终历时3年方告破案，难度可见一斑。

白银市空间环境和生活节奏的独特性，更强化了调查者乃至旁观者对嫌疑人身份特征的判断倾向。9起案件中至少有6起发生在相似类型的环境下——企事业单位附属住宅区，且作案时间以白天为主。结合同一时期曾经发生过的多起闲散职工盗窃、杀人案，当然会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企业内部人员或熟悉本地环境的常住居民。但恰恰是“单位住宅区”这一看似同质化程度极高、具有内向保护属性的公共环境，使许多案件的关注者甚至警方忽视了每一具体案发地实际存在的安全隐患：棉纺厂家属区的两起案件，受害人均居住在区位不临街、视线被遮挡、受关注概率较低的平房内。供电局家属院的两起案件，案发地靠近王砚东路十字，临街一侧的人流相当密集，使保卫人员容易忽视背向一侧的宿舍楼出入口。东山路59号楼案件中，受害人崔向萍居住在氟化盐厂宿舍区内，但59号楼恰好位于一条上坡路的起点，背面没有封闭院墙，又与人流密集的金鱼公园仅200米之隔，从而为作案者提供了隐蔽进入和离开现场的机会。而在“01·11·20”案件中，受害人居住的水川路28号楼

虽然位于农委大院内，正前方却有一个人流稠密、无法有效监控的市场。高承勇选择了楼内最靠里侧、楼层最高（6层）的一户实施犯罪，成功延长了被发现的时间，从而在得手后再度逃之夭夭。

在90年代的白银市，被不同归属、不同类型的单位及其宿舍区分隔开的城市环境，一方面使位于隔离分区之间的道路和公共场所变成了治安布控中的边际盲点（9起案件中有7起发生在水川路—人民路主干道近侧，2起在金鱼公园周边），另一方面则使分区本身存在的安全隐患，如半敞开性、视线不良（平房区与楼房区的分隔，街道狭窄造成居住区与背景环境无法彻底隔离）等，被习惯性忽视了。对实行多班轮换工作制的工矿企业和纺织厂来说，每隔一个班次便须进行一定规模的人员轮替；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人员流动又会相对停滞，直至下一个换班周期到来。流动犯罪者完全可以夹杂在刚刚结束工作的人群中混入宿舍区，并获得相当于一个换班周期的时间作为机会作案窗口。而高承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他的隐匿犯罪。

边缘犯罪者

平心而论，高承勇对作案环境的选择并不十分高明，反而带有一种因急不可耐而导致的鲁莽感。1994和1998年，他在供电局家属院两栋相邻的大楼内连续作案，似乎并不避讳警方可能的排摸。1998年1月的两起案件作案时间仅仅相隔6天，案发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足2公里，第二起案件的作案地点就在市公安局大楼不远处。到了2002年2月第9起案件时，这种肆无忌惮已经发展到了极致——高犯在位于闹市区的陶乐春宾馆（今永腾商务酒店）作案，案发地靠近市政府办公楼，正对着人民路派出所，距白银区公安分局仅200米之遥。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足以证明其对逃脱概率和作案成功可能的自信，达到了何其惊人的程度。

事实上，高承勇甚至还上演过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漏网戏码。2001年春节期间，他在尾随一名夜班女工、意图入室作案时被挡在了门外。但高犯不仅没有逃逸，反而继续在附近徘徊，直到巡警接电赶来才匆匆离开。那名女工及其丈夫以及与案犯擦肩而过的民警均记住了高犯的部分外貌特征，但本地警方采取的依然是传统的拉网式排查方式，最终无果而终。直到一年多以后，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上海铁路公安

局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张欣应甘肃警方的邀请前往白银协助办案，才根据目击者的回忆完成了对高犯的模拟画像。但由于时间已经相隔很久，目击者的记忆中混入了因都市传说和主观联想造成的概念化偏差，最终绘制出的3幅画像并未对破案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这一年的间隔期内，第九名受害者出现，成为系列案件的尾声。

在吴秋文看来，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女性案在整整26年之后最终被破获，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资源问题。全国公安联网数据库的建立，使白银警方得以与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共享案件信息和物证，推动了甘肃、内蒙古两大案发地的信息沟通和并案，并最终通过Y-STR染色体检测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取得了突破。若无最近十几年刑侦手段的进化以及网络发展带来的信息共享，警方根本不可能在尚未进行过传统式排摸和接触的情况下就精确锁定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资源充裕度不可避免地也取决于上级公安机关的重视程度。意味深长的是，白银系列案件专案组的成立并非始于高承勇集中犯案的1998年，而是在2004年当地警方集中开展侦破命案专项行动期间。彼时高承勇已经结束了全部9起作案，在5处现场留下了指纹，在3处现场留下了带有DNA信息的精液；包头系列案件的指纹信息，也已经与白银案的痕迹物证比对成功。此后在公安部的督办下，资深刑侦专家以及新的追踪手段陆续介入案件的后续调查，最终在2016年盛夏因为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高承勇远房堂兄因经济案件被拘并被抽血检验）取得了突破。也是在2004年，警方以公布案情的形式确认了连环杀人狂的存在，此时“红衣女子猎杀者”的猎奇故事在白银市已经流传近10年了。

从1985年的陕西龙治民案（杀48人），2003年的杨新海案（杀65人、重伤5人、强奸23人）、平舆黄勇案（杀17人、伤1人），2006年的佳木斯宫润伯案（杀6人），到最终水落石出的白银高承勇案，最近30年中国影响最为恶劣的几起连环杀人案，无不具有社会边缘人向体力、戒备心较弱的女性、青少年、农村中老年人等群体加害的特征。犯罪者的动机和心理状态固然各有差异，但他们的作案一再得逞，却与农村以及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控制力、公共安全等资源的整体性萎缩具有直接关联。杨新海以及高承勇甚至直接利用了地理区隔造成的办案模式的局部性——从2000到2003年，杨新海在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四省交界处高频率作案，但在每起案件结束后立

即流窜到邻近城市或省份，从而使诸多孤立的线索和物证无法串联起来。直到皖豫鲁冀四省警方在公安部督办下联合办案，才将嫌疑人捉拿归案。高承勇案件中，同样因为地理和行政区隔，嫌疑人仅需藏匿到一小时车程之外的青城镇，便可脱离白银警方的排查范围。而若无科技进步带来的DNA检验技术以及全国联网的公安数据库，他或许还将在漩涡中心的白银市继续藏匿下去。

在高承勇的落网之地白银市工业学校，我们见到了这个边缘犯罪者最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褪色的广告牌悬挂在布满灰尘的店面和生锈的窗户之上，日常睡觉的木板床上堆放着货品和杂物。即使在将两个儿子培养成为大学生之后，高承勇夫妇的生活轨迹依旧不曾变得平稳富足。在小卖部另一侧，破败的旧学生公寓和开水房在不久后即将拆除，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所顶峰时期曾经拥有650名在校生的中专学校，在今年秋天只招到了120多名新生，其中还有几人因为高承勇的落网而受惊退学。同样令我们感到惊讶的还有受害者家庭的生活境遇：至少有6名受害人的家属（父母、配偶、兄弟姐妹）依然在案发地周边不足500米的范围内居住。世纪之交的那波国企改革浪潮将年轻人推向了就业机会更充足、预期收入更高的大中城

市，年龄较长、专业技能单一、对旧企业及其福利政策依赖程度更深的中老年人则被迫留下来，与这座城市一同衰老。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那时为止，整个白银市尚有18.53%的文盲或半文盲人口，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含大专）者仅占全市总人口的2.43%。那些在整整60年前因为祖辈、父辈的西迁而与白银这座城市建立起归属关系的人们，在它之外几乎无处可往，只能停留在原地，哪怕因此要和撕心裂肺的记忆相伴。

离开白银前的最后一晚，我第三次来到了胜利街“98·1·6”案件的发生地附近。在全部9个案发现场中，只有这一处的确切位置始终不曾为我们所发现。在安静微凉的秋夜里，我打着手电一遍又一遍地查看着楼牌号，试图找出88号这个地址。但街牌在90号之前毫无预兆地中断，迫使我停在了又一个深邃的十字路口。与漫长的杀人回忆有关的传闻和传奇，最终在胜利街东侧的路口遽然消失，和那些尘封的卷宗以及9条逝去的生命一起留在了黑暗里。■

（实习生郑亚博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关于90年代白银市社会、经济、治安各项状况的数据，均引用自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白银市志（1991～2005）》）

《读书》2016年第九期目录

刘统 长征：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上）

江晓原 穆蕴秋 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

短长书

《全汉文》校理拾零（余才林）

食物的政治（张磊 燕碧天）

莱尼·里芬斯塔在法占区的申诉（徐之凯）

刘跃进 走进上古神话历史

康大一 隐形的翅膀

周质平 汉字繁简的再审视

常建华 乡约往事

段志强 三千弱水入流沙

杜书瀛 蔡仪百年 美学人生

陈平原 小书背后的大时代

刘晗 美国宪法的故人故事

田本相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学派

品书录

冈绍夫与《何为封建主义》（马克垚）

·美的对峙（戴潍娜）·唐传奇的文体与社会（张丽华）

李建军 “死文学”：王国维对汤显祖的一个偏见

杨俊杰 李太白漫游奇境记：闲谭布伯《我和你》

阮炜 民主不是古希腊的专利

陈颀 秋菊二十年：反思“法律与文学”

张慧瑜 《棉花》的故事：中国崛起的另一面



《读书》
生活需要读书，
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交叉持股新浪潮

主笔 / 谢九

交叉持股虽然并非新生事物，但是近期中国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却大有蔚然成风之势，经济低迷时期，交叉持股成为企业抱团取暖的新姿势。

这一轮交叉持股之风首先起于央企之间。6月份，中石油发布公告称，中石油集团拟将其持有的中国石油6.24亿股A股股份（占总股本的0.34%），无偿划转给宝钢集团。紧随其后，武钢股份发布公告称，武钢集团将所持有的5亿股武钢股份（约占总股本的4.95%），无偿划转给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在此之前，包括国投新集、中国海运、国投电力等央企之间也有过类似的交叉持股安排，不过中石油、宝钢等巨无霸央企的加入，使得央企之间的交叉持股进入高潮。在经济低迷时期，央企之间的交叉持股，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新浪潮。

作为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去年9月份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曾经提出：“要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进入2016年以来，央企之间的交叉持股实验开始逐渐落地，尤其是中石油等巨无霸央企开始交叉持股，意味着以交叉持股推动国企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

交叉持股在中国并非新生事物，尤其在A股市场的案例较多，早在20世纪90年代，辽宁成大和广发证券就完成了A股市场的第一例交叉持股，不过，交叉持股在中国企业之间规模并不大，尤其是像今年以来，大量央企实施交叉持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从国际上来看，大规模的交叉持股在日本最为常见。20世纪80年代，大量日本企业和银行之间相互持股，借此获取银行财团在资金扶持上的便利，成为当时日本经济的一大现象。除了日本之外，欧美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也较为常见。

理论上而言，企业之间交叉持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股东一股独大的局面，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不过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这一轮央企交叉

持股来看，实现治理结构的优化可能并非主要目标，因为各企业之间持股比例并不太高，难以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起到实质性制约或者优化的功能，更主要的目的可能还在于抱团取暖。

从实施交叉持股的几家大型央企来看，多以钢铁、航运、煤炭和油气等强周期和产能过剩企业居多，在当前经济低迷周期下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而通过资本为纽带实现企业间的交叉持股，企业可以更好地实现业务协作。按照武钢集团的说法，“交叉持股有助于打破央企之间原先封闭的产业链，根据产业上下游的关系重新布局和调整业务板块，有助于公司之间实现业务协作和整合，从而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从武钢和中国远洋、宝钢和中国石油来看，这些企业确实存在上下游业务上存在很多合作的空间，通过交叉持股实现利益绑定之后，这些企业有更大的动力来挖掘企业之间的业务协作能力，从小的层面来看，有助于交叉持股的企业摆脱经营压力，从更高的层次来看，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解决产能过剩的一条出路。

不同行业之间的央企交叉持股，也意味着央企之间的整合进入新的阶段。过去几年来，我国央企之间的整合主要以行业内的合并为主，同一行业内的央企强强联合，组建为更大规模的巨无霸，比如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为中车集团，五矿集团和中冶集团合并，中国远洋和中国海运重组，中国建材集团和中材集团重组，以及宝钢集团和武钢集团重组等等，目前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央企数量已由196家降至104家，预计年内央企总数还将减至100家以内。随着同一行业之内的央企横向整合完毕，不同行业之间的央企也开始纵向联合，尤其是具有上下游关系的央企率先联姻。如果说过去央企之间还多是各自为战，以后则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央企一家亲的特色，央企之间的相互抱团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交叉持股成为维系央企血缘关系的纽带。20世纪50年代，日本修改了国内的《禁止垄断法》，鼓励大型企业重组合并做大做强，通过企业间的交叉持股等形式，形成了以三井、三菱等为代表的六大财团，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日本的经济命脉，也对战后日本经济起飞起到了极大作用。在中国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国内的大型央企之间开始实

现前所未有的紧密连接，这些巨无霸式的央企能否实现强强联手，并且为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贡献更多的力量，还需要等待时间验证。

当年日本交叉持股的一大特点是大型企业和银行之间联姻普遍，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取信贷资源。在此基础上，日本甚至发展出主办银行制，主办银行不仅向企业提供主要的资金需求，甚至可以向企业派驻董事和管理人员，深度参与到企业经营之中。我国《商业银行法》禁止商业银行持有一般企业的股权，所以在法律层面上杜绝了日本企业和银行之间大规模的交叉持股现象。不过，未来中国也未必不会出现企业和银行联姻的现象，催化剂可能来自银行债转股。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因此商业银行实施债转股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存在明显障碍。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商业银行曾经对大量不良资产实施过债转股，不过当时是通过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来曲线操作，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将债券转为股权，并非商业银行直接债转股，规避了商业银行直接持有企业股权的法律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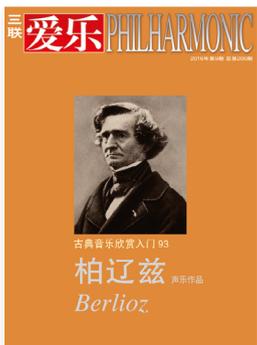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银行积累的不良资产持续上升，银行债转股再度来到了历史性关口。今年3月份，造船企业熔盛重工将171亿元的债务转为股

权，中国银行从最大的债权人转为最大股东，债转股开始重新悄然试水。时隔半年之后，近期有消息称，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订的债转股方案有望正式出台，最快可能在9月中下旬实施。如果银行债转股再度大规模实施，银行就有可能和很多实体经济企业之间形成交叉持股，甚至如中国银行成为熔盛重工的大股东。

除了央企之外，还有很多民营企业也在寻求交叉持股，比如以恒大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万科、廊坊发展、嘉凯城以及金螳螂股票。如果说央企之间的交叉持股更多是由国资委等部门主导安排，而民营企业的交叉持股则主要是市场自发行为。

从动机上来看，民营企业的交叉持股，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寻求业务协同，比如恒大在二级市场上追逐的万科、廊坊发展乃至金螳螂等公司，和恒大自身的房地产业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业务协同空间。除此之外，很多手握重金的民营企业在A股市场四处出击，寻求资本猎物，更多还是“资本荒”的大背景下，优质资产变得越来越稀缺，A股市场一些上市公司的股权也开始成为资本眼中的优质资产。在实体经济回报率越来越低的背景下，在资本市场持有其他优质公司的股权也是不错的选择。☑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九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3

- 柏辽兹，从音乐通往语言的途中
- 王立彬、雷苗苗、康啸、鲁瑶对《特洛伊人》
《浮士德的沉沦》和《安魂曲》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在以色列的首演

访谈 克伦佩勒访谈录：关乎人生的对话

话题 名家谈贝多芬九首交响曲（下）

对于法国古典音乐，我们了解多少？

爱乐笔记 她在我心中歌唱：女中音歌唱家费丽尔

现代音乐 专访当代作曲家西娅·马斯格雷夫

指挥家档案 听富特文格勒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中篇）

歌剧物语 陈银淑和她的歌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唱片说明书 卢德米拉·贝尔林斯卡娅的斯科里亚宾录音

作品 反讽与创新——那些20世纪的小夜曲

爱乐书房 古尔德的七宝楼台

听片购片与收藏 CD时代的古乐第一厂牌 ARCHIV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

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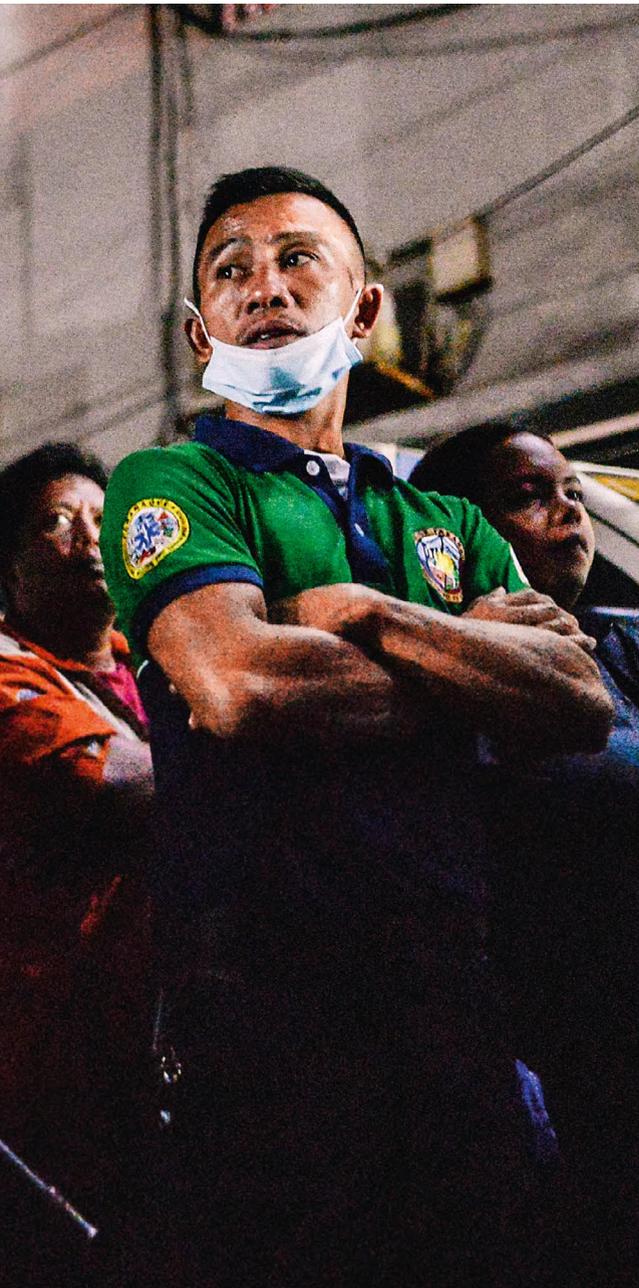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杜特尔特，强人当道

主笔 / 徐菁菁

屡屡在国际舞台上语出惊人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从不按常理出牌。这个在大选中黑马般获胜的“外省”“小人物”正以他的铁腕和现实主义回应菲律宾的需求，并可能将这个国家引向新的方向。



左图：8月11日，菲律宾帕拉尼亚克市的一所监狱发生爆炸，至少10名囚犯身亡。图为警察在监狱外站岗

右图：8月29日，菲律宾马尼拉市的警察在检查一名毒贩的尸体



铁腕

7月25日上午11点左右，46岁的雷斯蒂图托·卡斯特罗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约他去马尼拉北部卡洛坎地区麦克阿瑟高速公路的一角见面。对这样的信息卡斯特罗并不感到陌生。他的“朋友”常常委托他去购买“沙布”（shabu）——那是菲律宾人对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的称呼。卡斯特罗没法对这些人说不。每次，他会得到1~2克的“沙布”作为回报。他从不购买毒品供自己享用，对一名有4个孩子的酒店司机来说，市价31美元/克的“沙布”太贵了。

就在卡斯特罗收到信息的几小时之前，菲律宾新总统、71岁的罗德里格·杜特尔特刚刚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他说菲律宾是全球生产大麻最多的国家和东南亚最活跃的毒品交易中转运站，本国吸食毒品的规模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程度”。他再次重申了自己胜选时的承诺：“如他们所愿，我们不会住手，除非最后一个毒枭、最后一个毒品贩子都已经投降、被投入监狱或者下了地狱。”

不久前，卡斯特罗告诉他的表兄，他会在下一单交易以后收手。他打算从酒店辞职，开始做自己的小生意，至少在实现这个目标以前，沉溺于毒品“消遣”不是件好事。7月25日的这一次“赴约”确实成了他的最后一次。这天晚上，一枚子弹射入了卡斯特罗的后脑。

8月22日，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总长罗纳德·德



拉罗萨 (Ronald Dela Rosa)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总结：自毒品打击行动开展 7 个星期以来，警察在行动中击毙 712 人，治安小组击毙 1067 人。

这些数字是杜特尔特履职后的第一项成果。在 7 月 1 日的就职典礼上，他告诉他的警察部队：“履行你们的职责，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杀死 1000 个人，我会保护你。”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公开表示只要执法人员杀死或者活捉毒梟，便能获得约 75 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奖金，外加一面奖牌，还有机会升官。

在马尼拉的经济中心马卡蒂，居民们排队向警察和政府部门的官员宣誓自己不会使用和贩卖毒品。警方拟定了贩毒和吸毒的嫌疑人名单，把它们交到各个社区的领导人手里。名单上的人有三个选择：在警方行动中被捕；像卡斯特罗那样被击毙；或者“自

首”——签署一份声明，表示自己不会再碰任何毒品，如果再犯，愿意承担一切可能的后果。根据官方的统计，自新总统上任以来，已有超过 50 万人向当局“自首”。

私人戒毒中心几乎都人满为患。一家名为“希望之桥”的机构在马尼拉有 2 家分支共 92 个床位。尽管每月 650 美元的收费是菲律宾人平均月收入的两倍，但上门者仍然络绎不绝。“我们现在有了一份等床名单，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机构项目主管吉尔莫·戈麦斯说。自从 5 月 9 日杜特尔特在大选中获胜，平均每天会有 6 个吸毒者或其家人来打听戒毒的事情，而过去，他们一周只会收到 3 次咨询。

马尼拉街头越来越多的尸体引起了异议。很显然，对于毒贩和吸毒者的“处决”并没有经过任何正常的



左图：菲律宾马尼拉的一所监狱。杜特尔特上任之初便向贩毒者全面宣战，据统计已有近6万名吸毒者自首，至少43处贩毒点被查，没收毒品300公斤

右图：5月9日，菲律宾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杜特尔特在某投票点接受媒体采访

司法程序。人权组织担忧，人们会利用总统的政策借口杀死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人。但杜特尔特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我嘴里从没有应有程序一说。”早在竞选时，他就说过：“忽略人权法这回事，我当上总统后会秉持之前市长任内的做法，将所有毒贩、抢劫犯、游手好闲的人全杀光。”民主程序也不能够阻止他。新总统已经有言在先，如果立法机构妨碍他的计划，他会毫不留情地关闭它。至于媒体，总统告诉记者们：“如果你不尊重我，宪法就再也不能保护你了。”

任何人都不能对毒品之战指手画脚，哪怕是菲律宾最重要的盟友。9月5日，第十一届东亚峰会召开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媒体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表示，他将在峰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菲律宾在打击毒品问题上出现的“法庭职权之外的杀害”。“他（奥巴马）是谁？”杜特尔特面露愠色地反问。继而他突然发飙，惊世骇俗地破口大骂奥巴马是“婊子养的”。9月6日凌晨，菲律宾接到了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发来的通知，取消菲律宾方面希望在峰会期间举行的首脑会议。随后，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急忙发表声明称：“杜特尔特总统对其发言感到后悔。”

9月7日峰会庆祝晚宴前，奥巴马和杜特尔特有

了一次两分钟的寒暄交谈。菲律宾外长佩费克托·亚赛打圆场说：“他们在领导人接待室见面，是最后两个离开接待室的人。”这说明两国关系如“铁打一般”。杜特尔特竞选总统时的副手阿兰·卡耶塔诺形容，会面过程“温暖而亲切”。正当人们以为这小小的风波即将风平浪静时，杜特尔特突然放出大招。8日的峰会上，他发表了一场“狂怒的演讲”。一名在会场内的印尼外交官称，杜特尔特当着奥巴马的面，单刀直入，追忆了美国人当年在菲律宾殖民时期对当地人残酷的军事杀戮。他讲述了美国殖民主义给菲律宾造成的伤害，留下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现在面临的严重毒品泛滥。杜特尔特还拿出一幅美国士兵当年杀戮菲律宾原住民的照片说：“我们的祖先被他们杀了。他们现在却来跟我们谈论人权。”在杜特尔特的演讲时，一名外交官形容会议大厅里“一片寂静，令人震惊”。

这不是杜特尔特第一次就毒品问题在外交关系上撕破脸皮。杜特尔特8月5日视察宿务一处军营时发表演讲，指责美驻菲大使古德伯格干涉菲事务：“我跟克里（美国国务卿）交流过，他人还不错。我和古德伯格有过节，这个狗崽子，就是个伪娘。”今年4月，

在菲律宾总统竞选期间，古德伯格曾指责杜特尔特在达沃市的毒品战争中侵犯人权，双方随后连续发声，言语冲突激烈。

8月18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也对菲律宾的禁毒政策提出异议，认为与贩毒相关的违法行为应交由相关法庭进行审判，而不能任由持枪人员在大街上向人群胡乱扫射；禁毒行动必须在全面遵守国家国际法律、尊重人权的情况下展开。杜特尔特回应说，联合国的这两位“愚蠢”专家应该数一数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毒品夺去。他辛辣地回呛道：“让我们离开你们机构好了。你们一事无成。你们以前什么时候来过？从来没有，你们只会指手画脚。”他接着说，联合国没有能力解决饥饿、恐怖主义等问题，也无法结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争。“联合国，如果你能举出我干的一件坏事，我就能举出你的十件。我告诉你，你百无一用。”

杜特尔特心里清楚，比起一切的质疑，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4个月以前，从没有国家事务管理经验的他以33%的得票率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而现在，杜特尔特的民意支持率是91%。

这场毒品战争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2016年8月2日，菲律宾阿尔布埃拉市的市长罗兰多·埃斯皮诺萨（Rolando Espinosa）因涉嫌参与毒品交易，向国家警察局长自首。次日，菲律宾警方对埃斯皮诺萨的住宅进行搜捕行动，过程中击毙了至少6名该市长的支持者。警察总长德拉罗萨9月1日宣布：“第一阶段扫毒行动是街头层级，第二阶段的对象是高价值目标。”现在，第二阶段才刚刚拉开帷幕。

小人物

“帮帮我，妈妈。”5月，杜特尔特赢得总统大选后，媒体拍摄到了这样一幕：这个铁腕人物站在母亲的墓前，左手掩面，不能自己地抽泣，他口中喃喃念道：“我只是一个小小人物。”

杜特尔特绝非出身草根。在菲律宾，家族是政治选举中最为基础的单位。菲律宾每一个省市及小城镇都可看到政治家族的影子，这些家族经过少则一两代人、多则四五代人的努力经营，在地方上形成近150个“政治王朝”。1945年3月28日，杜特尔特正出生于这样一个家族里。父亲韦森特·杜特尔特早年是一名律师，母亲索莱达·罗亚是一名教师。后来韦森特步入政界，先后担任宿务省达瑙市代理市长和原达沃

省省长。韦森特的兄弟拉蒙·杜特尔特和其子罗纳尔德·杜特尔特也先后任宿务市市长。此外，宿务省的杜拉诺和阿尔蒙德拉斯两大政治家族还被杜特尔特家族视为亲戚，莱特岛的罗亚家族也和其沾亲带故。

但从马尼拉的角度看，杜特尔特确实是处于权力边缘的“小人物”。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位于中北部尤其是吕宋岛地区，杜特尔特的大本营达沃市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菲南主要是穆斯林聚居区，不仅经济落后，而且还因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菲共抗争运动以及恐怖主义等处于长期战乱，一直难有地方领导人跻身全国政坛，进军马拉坎南宫更是天方夜谭。

作为一个地方“精英”，杜特尔特的背景和成长经历与他的前任天差地别。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是菲律宾前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的女儿，15岁搬进总统府马拉卡楠宫，中学毕业就被父亲送到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接受教育。阿基诺三世出身于老牌政治世家阿基诺家族，是已故参议员贝尼尼奥·塞尔比利亚诺·阿基诺二世和已故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的独子。

杜特尔特成长的达沃市是棉兰老岛最南端的港口。它所处的苏禄海是世界上除索马里以外海盗最为猖獗的地区。对于毒品、药品、非法制品和人口走私来说，达沃就是天堂。在混乱的达沃，杜特尔特只能用“野蛮生长”来形容。他在中学时代一次被退学，一次被开除。他承认自己从小就是问题孩子，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因为每次闯祸后，都会被母亲逼着跪在受难耶稣像前忏悔。但他从来不会在打架中或者母亲的棍棒下退让。他胆子很大，自尊心又强得出奇。大学时，他接受了正规飞行训练，便开着飞机飞过自己曾经就读的中学，往学校屋顶上投掷石块，只因校长曾在同班同学面前责骂过他，他一直无法释怀。据杜特尔特本人说，他在大学期间还曾对辱骂他的同学开枪，所幸这位同学大难不死，而他也侥幸没被学校开除。

就是这样一位“无法无天”的青年，却选择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起点。1968年，杜特尔特获得菲律宾莱西姆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圣贝达法学院法学学位，同年顺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大学毕业后，杜特尔特在达沃市城市起诉办公室担任了长达10年的检察官。1986年，杜特尔特被任命为达沃市常务副市长。1988年，他参选达沃市市长并大获全胜。从那以后的28年时间里，杜特尔特逐渐成为达沃市

实际上的主宰者。他7次当选市长，任职22年，卸任6年，不过是因为根据规定无法连任罢了。

杜特尔特的全部政治经验都来自对达沃这座城市的治理。曾经的菲律宾第六大城市达沃是帮派横行、极端武装力量猖獗的“谋杀之都”。现在，达沃市是仅次于马尼拉、宿务的第三大城市，以“安全之都”闻名。在今天的达沃，人们很容易感受到市长的名望和影响力。商业区、餐馆直接命名为“杜特尔特城”“杜特尔特镇”“杜特尔特中心”和“杜特尔特茶餐厅”。今年总统大选时，达沃市一半的车辆喷上或贴上了市长的头像或名字，全市几乎只能见到市长的竞选海报，而不像马尼拉或者别的城市被候选人的海报装饰得五彩斑斓。在当地，合照的标准姿势都是握拳伸直手臂——这代表了市长的铁拳治理，是市长竞选时最有力的展现。

在达沃，杜特尔特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秩序。很可能正是因为有在司法部门的工作经历，他才会公然藐视程序正义。前总统阿基诺三世曾抱怨菲律宾司法效率之低：“审完一桩案件需要长达6年的时间，而且只有18%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开审。”于是杜特尔特用他自己的办法。“有一天我的方法可能变得不再必要。”他曾说，“但是现在，达沃市大多数人都认为，达沃的平安和秩序，唯一的原因是我。”

杜特尔特将自己作为立法者、法官、陪审团——还可能是刽子手。他特许警察可以随时对拒捕的嫌疑人开枪。通常是在深夜，他每周两次骑着摩托车亲自上街巡逻，检查警察是否正在履行职责。他甚至还开车到反叛组织中去，告诉他们他理解他们的不满、尊重他们为自己的信仰而战。“但是，别他妈的来毁我的城市。”他警告道，“除非你们想死。”达沃市还有城市治安维持会。它们在更多的时候被称作“杜特尔特行刑队”——连杜特尔特自己也这样开玩笑，不过他否认与此有任何牵连。在达沃的反毒品战争中，近千名盗贼和毒贩横尸街头，而被“处理”的方式几乎相同：两个人、一辆摩托车、一支手枪、近距离射击。对此，杜特尔特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记者兼政客帕拉称“行刑队可以随意行刑而不受惩罚”的现象是“恐怖统治”。而在2003年，在成功躲避了四次袭击之后，帕拉也死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

对于一些人来说，杜特尔特是魔鬼，而对于另一些，他则是救世主。“他们不能依靠司法系统，所以他们依靠杜特尔特。”东米萨米斯省前省长阿达沙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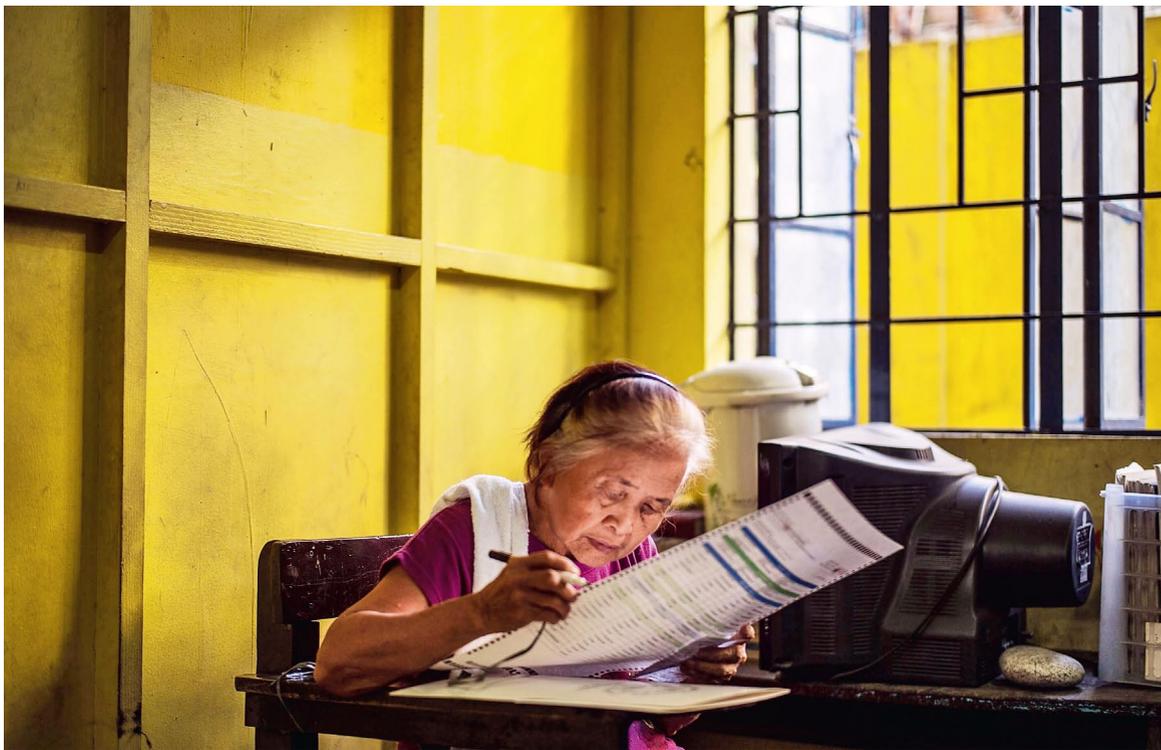
杜特尔特懂得也愿意照顾少数和弱势群体的利

益。他是菲律宾第一位给予土著卢马德人和穆斯林社区代表权的市长。在菲律宾，卢马德人和穆斯林往往被主流社会排斥，杜特尔特却在市政府为他们预留政治代理席位。他要求几位副市长在政府施政时必须为这些群体的利益代言。此外，他还通过一系列反种族歧视法令。杜特尔特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是好色之徒，但在达沃，他建立了一套体系旨在为妇女提供更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这个项目获得了菲律宾联邦政府的表彰，并在全国推广。令菲律宾最著名的女权捍卫者、参议员皮娅·卡耶塔诺印象深刻的是，杜特尔特组织律师为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并掏自己腰包为她们支付费用。令她大为惊讶的还有一次：杜特尔特看完一场选美比赛的泳装环节，他评价说，希望选美比赛能够强调“女性的才华，而不是外在形象”。

在菲律宾这样一个连离婚都被视为非法的保守的天主教国家里，杜特尔特的思想难得的开明。他是《生育健康法案》的支持者，鼓励家庭采取避孕措施。2005年，他在达沃推行免费的输精管切除术和输卵管结扎术，并对接受手术的人予以现金奖励。他甚至还维护LGBT者（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的权利。2009年，他批评选举委员将一个代表同性恋者利益的党派排除出选举名单。他要求达沃是一个对同性恋友好的城市。去年夏天，他参加一个脱口秀节目，表示如果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他不会有任何问题，“每个人都有权快乐”。

1998年，连任三届市长的杜特尔特依宪不得再次竞选市长，他转战议会作为过渡，成为代表达沃市第一区的众议员。担任众议员的三年被杜特尔特认为是最乏味无聊的三年。

毫无疑问，他对不温不火的协商政治没有兴趣。他迷恋绝对权力带来的效率。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杜特尔特要有一切的裁决权。就像东亚常见的家长式领袖一样，他对达沃的管理事无巨细：他禁止在一切公共场所吸烟；驾车时速强制限定在30公里以内；在凌晨1点到早上8点之间，禁止销售、提供、饮用含酒精饮料。菲律宾媒体报道了这样一起事件：一名外国游客在杜特尔特的朋友开的一家餐厅吸烟，被告知本市公共场所不准吸烟后仍然态度傲慢。餐厅老板告诉了市长，结果市长在数分钟后就来到餐厅。据目击者说，杜特尔特静静地坐在这位烟民旁边，拔出一把手枪抵住这个男子的裤裆说：“我让你选择：我杀死你，或是你把烟吞



5月9日，菲律宾5400多万登记选民投票选举包括正副总统在内的大批公职人员。图为马尼拉市的一位选民在填写选票

下去。”结果这名烟民乖乖地把烟吞掉并向市长道歉。

局外人

2015年1月，杜特尔特向媒体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废除国会同时增加政府雇员的工资以解决腐败问题。”这是他第一次暗示自己可能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然而直到2015年11月，杜特尔特才正式宣布将竞选总统之位。以传统政客的眼光看，杜特尔特和那时的特朗普一样都是笑话。2015年11月，杜特尔特在竞选活动时提及，自己1月在马尼拉，因教皇的到访遭遇大堵车，在路上堵了5个小时。他居然以戏谑的口吻说道：“教皇，你这狗东西，回去吧，可别再来了！”

然而那个时候，杜特尔特在全国的人气已经慢慢聚拢起来了。在过去一年里，每一次他欲拒还迎地表示自己无意参选，都会激起更多支持者的热情。人们甚至在马尼拉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呼吁其参选。杜特尔特足够精明，他比那些混迹在国家机构中的对手更懂得基层选民的需求。他知道，对他们来说政治正确一无是处，他们要的是切切实实看得见的变化，

包括安全和秩序，这与1988年的达沃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过去6年，阿基诺三世的执政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菲律宾从“亚洲病夫”变成了“亚洲觉醒之虎”，年经济增长超过6%，是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菲律宾人来说，这些成绩的意义极微。菲律宾经济学家希里托·哈比托（Cielito Habito）估算，菲律宾超过70%的GDP增长都流入该国最富有的40个大家族的腰包，在同样存在财富集中化的泰国，这个比值也只是25%。2015年，菲律宾国内贫困率从2012年的22.3%下降至21.1%，降速远远低于经济增长应带来的脱困速度。菲民间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今年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菲“自认贫困率”为45%，甚至高于2010年同期43%的水平。在菲律宾全国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32%的孩子有中度到重度的营养不良。60%的菲律宾人在去世前没有经过专业的医疗护理。与此同时，据菲国家警察统计，2014年前5个月，菲律宾全国犯罪率相比2013年同期增长18%，2015年前5个月，犯罪率同比增长46%。

阿基诺三世的另外一项执政业绩是打击腐败。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更是一出演出过无数遍的旧戏文了。

没有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在被控腐败之后被投入监狱。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贪污8亿美元被判终身监禁，但他被他的继任者阿罗约赦免了。现在他是马尼拉的市长，他的亲属是参议员和众议员，甚至他的情妇都在他的辖区里身居要职。阿基诺三世上台后扳倒了阿罗约。同样的，牵涉一长串腐败丑闻的阿罗约在被捕之后又重新当选议员。

7月1日，杜特尔特的总统就职仪式非常简单。过去总统检阅几万人的大场面不见了。在总统府，面对亲朋好友、各国使节以及商界要员600多人，杜特尔特和往常一样套着巴隆衬衫，连袜子都没穿。他发表了一篇15分钟的演讲，仪式就结束了。

菲律宾人没有理由不选择杜特尔特。至少，他和那些传统政治精英们都不一样。20世纪60年代在马尼拉上大学时，杜特尔特曾经是菲共前领导人西松的学生，他骨子里有一种左翼民众主义的倾向。在达沃，他住在僻静的街区一幢并不显眼的房子里。他喜欢男子气概的大摩托，曾经有一辆二手的哈雷，现在换成了一辆雅马哈“悍妇”。据说他憎恶豪车，过去接送孩子用的是一辆小面包车。杜特尔特钟爱路边摊，每周必到达沃一家路边摊吃饭。一次一家大银行的高层来达沃，市长直接把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们带到了这家只有电扇、凉棚的小店。他的办公室对市民开放。有媒体见证，他曾在10分钟里，给了一位妇女回家乡的车费，建议一个女人换份工作，温柔地安慰着一个年轻的严重烧伤受害者，并承诺将支付她的后续治疗费用。他动用政府资金在达沃建立了24小时服务的毒品康复和治疗中心，向每一个承诺戒毒的成瘾者提供每个月2000比索的补助。2013年，台风“海燕”肆虐菲律宾。他是第一个跑到受灾最严重的莱特省首富塔克洛班赈灾的市长。他以个人身份领导一支由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随身还带了700万比索的捐款。人们看到他在塔克洛班的灾难现场掉了眼泪。

更何况，他在搞经济上可能还有一手。在达沃，杜特尔特大胆启用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达沃2010到2014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6.6%，高于全国6.3%的水平。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的调查，在达沃创办商业的平均用时是27天，远远快于首都马尼拉38天的水平，而且创业的花销也更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一份报告把达沃称作菲律宾的“下一波浪潮”城市。2013年，达沃有2万人从事事务中心等外包生意，年增速超过20%。

在马尼拉，杜特尔特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在传

统精英阶层的疑虑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捡起自己的老本行，用一场血雨腥风的毒品战争迈开第一步。他成功说服菲律宾人，毒品是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他的每一次强悍发言都会让人们激动。8月7日，总统穿着自己设计的军事制服，面向全国进行了一次直播。他面对镜头念出了159位法官、公职人员甚至警官的名字。他说，这些人都和毒品贸易有关，名单上的警察将立刻被开除，政客正被相关政府机构处理，最高法院会在24小时内处理涉案法官的事宜。大众惊讶于他的效率和铁面无私，绝大多数人们都不会留意那些“瑕疵”：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玛丽亚·塞雷诺(Maria Lourdes Sereno)指出：在杜特尔特的名单里，7名涉案法官中1人已经在2007年被开除，1人已经死亡，只有4名还在任上。当她指出逮捕任何人都需要合适的逮捕令时，杜特尔特说她“一定是在开玩笑”。

在第一轮的组合铁拳之后，杜特尔特明白，他需要拿出别的一些真东西。在他的就职演讲上，杜特尔特谈到国内面对的种种挑战。对于国际关系，他寥寥一语带过。他说，菲律宾会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义务。很显然，新总统的一切举措都将以内政为核心。于是，他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咋咋呼呼和出尔反尔都可以得到解释。

7月12日“南海仲裁”结果出炉后，杜特尔特曾试图恳请前总统拉莫斯前往中国进行谈判。他曾说：“我和中国的立场相似，不相信国际法庭可以解决这场冲突。”但这种姿态未能保持良久。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在推特上称：“刚刚结束与菲律宾总统的会面，他向我们保证他没有与中国就岛屿争端进行协商的计划。”墨菲还写道：“他说他不会交易领土主权，仲裁结果不可协商。”

而在7月22日在马银兰佬省武努安社视察生物质发电厂，杜特尔特又暗示，愿意按照前总统拉莫斯的建议，搁置仲裁法庭的裁决，恢复与中国的双边对话。他解释自己考虑：“如果我们能够与他们解决争端，我认为，我们能够得到许多好处。”他举例说：“我们打算建设经济区和农场到市场的道路。”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是被民众普遍诟病的弱点。包括马尼拉机场在内的大工程都被搁置，在远离首都的外省，基建投入更是无法保障。据菲媒报道，杜特尔特上台后计划将2016年的基建投资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最后，他以一贯的直白风格总结说：“中国有钱，不是美国。美国是没有钱的。”



华侨城转型之路：一个央企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文 / 林南芝

在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以西 40 公里处，有一座建于唐武宗年间的古镇，名安仁，据《太平寰宇记》，取自“仁者安仁”之意。当时安仁为县制，直到元朝至元二十一年（1284），安仁县建置撤销，划归大邑县，安仁古镇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也许取名善意，1400 年间这座古镇在无数的日升月落、炮火洗礼中仍保留着自己别具一格的西蜀风姿，仿佛不受世事侵扰。现在，它那里最耳熟能详的是三样东西：民国“第一地主”刘文彩的庄园、樊建川博物馆群落和一座落成不久的福朋喜来登酒店。

夜幕下，在接近古镇的时候，车慢慢经过一条正在打通的主路，没有路灯，只听得车胎下的咯噔声，

四下无人影和车影。这是成都市政府为了 5 月末的“2016 安仁论坛”新修的路，将来，这个论坛将成为成都市的一张鲜活的文化名片，它的背后是华侨城“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入川的支撑，即意味着政府将与央企联手，探索目前正热门的“新型城镇化”。

人的城镇化

早在 5 月 29 日，“2016 安仁论坛·文化与新型城镇化”现场传出重磅消息，华侨城集团同时签约四川三大文化名镇项目，总投资 1200 亿元，推进“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入川。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和华侨城集团总经理段先念都来到了签约现场，在全国新型城镇化的模式探索中，这将是政府与企业合作的里程碑式的一笔。值得一提的是，“安仁



深圳华侨城生态全景图

(欧田勇摄)



位于深圳南山的华侨城集团总部

论坛”由国家发改委作为指导单位，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华文促会主办，它的目的是能够长期在成都落脚，为安仁古镇在打造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增加筹码。

今年伊始，华侨城上上下下就非常忙碌，为了一份执着和理想，华侨城人的脚步从深圳辗转四川、云南，不停寻找和筹建中国未来的“美丽乡镇”。就像华侨城的掌门人段先念常常念叨的那样：“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挖掘好文化底蕴，把城镇化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让它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5月底的安仁论坛上，华侨城股份公司总裁王晓雯在演讲中这样指出：“从土地伦理观出发，城镇化在工业化和大型住宅社区化之外，我们期望找到另外一种非农业的路径。”“土地伦理”出现在一个企业的语境里实属难见，它是1948年由美国自然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她认为“土地伦理”是“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土地伦理成为生态学的新内容，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的

道德形成共同体来思考。

对于华侨城这样具有30多年城市运营经验的央企，跃然进入城镇化领域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它涉及如何处理人和土地这样更隐性的关系。华侨城城镇化项目组在诸多理论研究后发现，每一个古镇所在的地域，它的文化肌理是不同的，比如安仁是西蜀的大庄园主式的文化，更适合做庄园旅游，而深圳甘坑新镇那样的有着严格生态保护线的地方就可以做小型观赏农场……

以做“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和“欢乐谷”等主题公园闻名海内外的华侨城为何要涉足城镇化？王晓雯认为，在深圳、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地以“旅游+地产”模式拓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文化旅游对郊区城镇公共服务提升、人口导入、产业聚集和土地价值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将这一模式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打开，就自然形成了“文化+旅游+城镇化”的模式。

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姚军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也认为，华侨城会提出这个问题是跟它30年



(欧田勇 摄)



成都市郊的博物馆小镇——安仁古镇

的发展史有关系。作为央企，华侨城过去打造的实际是一个文化旅游的领军企业，“因为旅游发展的规模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将地产部分整体装进了上市公司，希望以地产的快速收益来支撑文化旅游的发展”。如今，华侨城更能体会到文化旅游的含义，以及过去所提的“旅游+地产”模式的本质。“其实就是在一个城市的特定区域打造一个文化旅游的板块，我们所称的大型文化旅游综合项目，就是一个城区的一部分，我们用文化去打造的。”姚军说。而中华文促会的王石主席更加主张，把文化看成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因为“新型城镇化就是在新时期、新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以城镇为载体的、以城镇化为过程的一种新的文化样式和文化过程，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驱动模式”。

城镇化是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探索的老课题，而如今，政府开始赋予城镇化新的意义，那就是在城镇化率增长背后如何与“以人为本”的民生工程齐头并进。李克强总理曾在一份报告里指出：“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的。如果挤

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所以，这就提出了如何实行“人的城镇化”的尖锐问题，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国家发改委规划司的陈亚军副司长在安仁论坛上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如下举措：一是突出核心，即农业人口市民化，二是要补城市建设的短板，三是以城乡统筹带动新农村，四是特别强调新型城镇化制度的保障，五是要制度突破，为整体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安仁与天回的等待

“赏心多趣事，妙舞清歌夜未央；行乐须及时，奇花异草春常在。”这是刘文彩庄园中一处夏季避暑门厅前的楹联。在这座占地7万平方米、房屋545间的大型庄园中，这种象征着浮奢阔气的楹联比比皆是。

整个庄园建筑群始建于清末，历经几次大规模的兴建和扩建，至民国末年形成现在规模。其中居于领



深圳东部华侨城大侠谷登峰造极观景台

衔地位的是刘文彩公馆，为高墙深院封闭式院落，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山墙压顶，重门深巷，迂回曲折，徜徉其中，让人深觉遁出红尘。如今仍在展示的黄金床、鸦片榻和刘文彩五房姨太太的院落，仿佛诉说着这里与中原战火的距离。

但是在古镇的另一端，又是另一番壮阔的图景：樊建川博物馆群。这是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由民间收藏家樊建川投资修建，包含有抗战系列、红色年代、汶川大地震和中国民俗四个主题板块。

从刘文彩庄园走至博物馆群，宛若没有联系的两个世界。这两个庞然大物条块化地占据着古镇的两端，中间地带是一些当地人自经营的传统业态，看起来并无整体感。与刘文彩庄园之大门对襟而开的安惠里，虽然也是商贾往来，却难得地闲定自如。街上多保留着黝黯的清明木结构小楼，临街的铺子都是当地人的，卖着成都人自制的酱菜、乳腐和附加值不高的木艺簸箕等小商品；开茶馆的将铺子开到了街心，自动麻将桌展示在帐檐下；渣渣面等小吃也开得成行成市。但在午后，这里显然门庭冷落。

在安仁论坛的那三天里，这座小镇突然多了人气，

挂着吊牌的参会人员光顾着镇上的店，以至于一家饰品店老板这样告诉我：“平时白天生意冷落时甚至就关门了，但这几天晚上也不敢关门，就想再等几单生意。”安仁古镇虽在成都人心里是不错的度假地，周末，他们驱车一个小时就来到镇上，但这座浑厚古朴的小镇在全国的古镇旅游版图上远远不及周庄、乌镇来得出名，即使是周末，也很少看见镇上的主街游客熙攘。古镇入夜后，多数前店后屋的本地商家早早上排门板，有些店铺在双休日也几乎是不开的。华侨城项目组的人员曾多次来到这里，并一直在琢磨着如何将这散落的业态凝聚成有核心竞争力的观光资源。

“像刘文彩故居这样的历史性建筑，承载着太多凝重的记忆，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构成吸引力；但是樊建川博物馆群又是一个占地很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于观光休闲来说也显得沉重了些。那些‘民国街’‘惠安里’上的老店铺已经形成了自我的生态。整个古镇的生态需要完善和提升。”参加论坛的一位专家这样认为。

对于实际上已经深度介入城市化建设多年的华侨城来说，一直非常注重自然、人文生态的保护，对他

们来说，城镇化不是简单的推倒重建，而是在有意识地注入增量的过程中做到整体提升。虽然目前各个项目刚刚完成战略签约，但华侨城上下对于“文化+旅游+城镇化”的路径表露出明确的信念。深圳甘坑新镇项目组组长胡梅林对本刊记者说：“过去对城镇化的理解总停留在房地产模式上，但房地产是把人给圈起来，反而把人流越做越少了，对于当地政府来说，税收一次就完了，没有持续性的收入。房地产模式的城镇化正在慢慢被摒弃。”

华侨城现在是上下凝成一股力，来涉足城镇化这个国家战略上的“要津”。他们知道，一旦做出成绩了，将对全国有示范性意义。一位华侨城人士指着安仁古镇西面那块刚被清理出来、如今撂荒着的土地，说将来华侨城会在那里打造以文化博览为个性标签的中国文博小镇，在尊重“存量”的基础上，将新规划的增量与原有的历史特色相得益彰。与此同时，安仁项目还特别注重原本的公馆特色，在与成都市政府的签约中，提及“结合老公馆改造以及文博产业化功能，一期阶段内实现街区向文博创意市集转化；并新建西部游客服务中心、创展中心、演艺中心、安仁博物馆和人文居住社区等，全面提升改造公馆街、精品酒店群”。

在未来的蓝图里，这里还会有美容产业园、影视产业园、老场镇提升区、田园体验区、养生养老区、都市休闲区等紧跟国际潮流的功能区规划。

同样在城镇化一揽子计划里的，还有成都金牛区东北部的天回镇，这座小镇因出现在李劫人的小说《死水微澜》里而闻名在外，但在现实中，它俨然是个规划无章、人流芜乱的城边村。各种车在镇上的小街上壅塞不已，茶园、茶馆开到了街上，俚俗的市井气回荡在河面上。

但对于华侨城来说，看中这里有其得天独厚的原因，那就是这里曾是古蜀道的起点，也因一位名帝曾在此避难，从而大有文章可做。唐玄宗李隆基避“安史之乱”西逃，在此歇脚，却传来了平叛胜利的消息，便“天旋地转回龙驭”了，于是这里因天子回銮而得名。

因为曾是“蜀道门廊”，这里将会是一个西南地区承接丝路文化经济圈的支点，而因为这里有一条灵动的河穿镇而过，而使得水上实景演出成为可能，编年体式的“天回大观”就将再现这里历史上的生活故事，相当于独属当地的“清明上河图”画卷，周边再匹配以华侨城颇为擅长的花艺设计：世界上最大的凤凰花雨……如果一切落成，可以想象对天回镇所在的城乡接合部将是一个质的提升。

甘坑样板

这种“文化+旅游+城镇化”模式最早还是在华侨城的大本营深圳落地。

龙岗区布吉街道的甘坑新镇，恰到好处地盘踞在深圳中部的一个山谷地形里，它还平分秋色地处在罗湖和福田的中间，却长久不如沿海中心区受重视。龙岗区想搞一个“中部华侨城”，而甘坑因为客家人自然集聚而有了些文化的底子。今年5月，华侨城与深圳市龙岗区政府、深圳市甘坑生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下三方合作开发协议，项目总投资额500亿元人民币。

这块将要开发的6~7平方公里土地，毗邻以华为公司为龙头的坂雪岗电子产业等重要先进科技产业集群，但是一直以来由于排水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缺位和不足，这个客家小镇长期“孵”在山谷中无法提振。甘坑生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南还记得2011年初接下它时的样子：“只是一个荒弃的村子，村里都是三无人员驻扎，厂房、铁皮房、工业区一路延伸。”

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源于1997年这里兴修的平南铁路（平湖到南山），极易在雨季浸水的低地客家村落被移到了旁边的高坡上，原村宅基地荒废，而致一些三无人员进驻做起了低端的小生意。但在造铁路排水设施时只留下一个涵洞可通水，之后每年夏天规律性地闹起洪涝灾害，“一年得有两次，把门上锁，人都迁走”。江南说。龙岗区政府在2011年联系江坤城和江南父子的时候，是想把闲散的古村建筑修旧如旧，打造一张该区的旅游名片。后来，江南请了北大规划与设计学院的专家团队来，将原有的碉楼和城门重新加固，并植入了一些节点性的建筑：最有招牌性的就是仿鹿港火车站的一座钢型支架式英国学院派建筑，或者干脆从婺源整拆整装了几座宅院式徽派古楼……但三年后，江南就碰到了瓶颈——这些风格各异却集聚一处的建筑群突兀地伫立在大街两侧，里边的经营内容却单调而雷同。

“你会发现，本来是五花八门的产业做着做着就开始彼此复制，比如村里的传统强项是卖客家山水豆腐，渐渐很多商家都开始做这个薄利多销的生意。商家要求变，却不得要领。”江南说。这个客家村落其实有甘坑和凉帽两个村，虽有百年历史，但是几无精神或物质遗产保留，唯有凉帽村周围山上盛产赤竹，曾经以男人破竹、女人织篾、全村人会做凉帽而成为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唯一的凉帽出口



(张自勇摄)

深圳华侨城甘坑新镇

生产基地。当时，附近的姑娘都以嫁到凉帽村为荣，这样就可以不干农活过上舒坦的日子。而如今，随着凉帽的不再热销，这项手工业逐渐衰落，如今村中的凉帽手艺人只剩一位老人。

大家渐渐发现，全凭商家入驻、企业收租的经营模式已是无以为继了。江南作为本地客家人，家族以房地产生意为支撑，此刻他遇到的天花板是如何为小镇旅游注入时代性的内容。“第一是整个片区周边要改造好，第二是要有人流量，而华侨城的强项就是把世界各地的人往这里带。”

2005年，深圳对非商业和建设用地下达生态控制线，甘坑片区有5平方公里被划入生态线内，可开发用地不多，但这却开启了另一种灵感，那就是做生态农场。将来，控制线里将会汇集农耕体验、湿地科普、农业观光、山地运动等现代性元素。策划团队的思路是，将日本mokumoku农场的食育概念引入，这座坐落在三重县的养猪体验式主题农场以“食育”为主要线索，通过对猪的生长、体验和加工过程的观摩，加上连锁化的猪肉制品会员制销售，构成一种独特的农业魅力产业。

今年4月份，段先念率队赴日本考察大健康 and 生态观光农业等项目，提出“旅游+大健康+观光农场”模式。在此次考察的重要一站，mokumoku农场给随行的胡梅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来后念念不忘。他注意

到，那些观摩猪都不是随意繁殖、任人宰割的肉猪，“它的皮毛和尾巴长短都有讲究，为了不让调皮的孩子抓它的尾巴，当地培育的都是短尾的观赏猪”。他正在致力于将食育导入到甘坑的客家豆腐的酿造中，“到我们镇上的农民将不再是纯粹的生产者，而是被雇来当作非物质文化的传播者。因为非物质文化也可以是一种展示品，即文化旅游的知识，通过儿童教育，产生一个大市场”。

另外，在IP（知识产权）热席卷文化领域的当口，华侨城打算在那儿建造16个山水剧场做实景话剧和演出，由文化团体带着剧本和男女主角过来，随后再引进文化风投基金，使片区内有知识产权的交易。“那个婺源的老宅子，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剧场，而不仅仅是个茶馆。”胡梅林说，华侨城在经历了第一代静态旅游产品如“锦绣中华”、“世界之窗”和互动参与的欢乐谷主题公园后，正在向情景体验式旅游产品摸索前行。

其实，甘坑新镇更令人着迷的项目可能是首先落在一个风口上的产业——虚拟现实VR文创产业园。这是项目组近期通过密集的走访调研后决定迅速推进的“文化+科技”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兴奋和刺激的方案，不仅是华侨城体系内的VR产业团队将会集聚于此，而且包括深圳本土VR行业大咖和周边省市的VR产业资源都对这个产业园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一个

新兴的文化旅游科技集群将对华侨城的整体发展带来无可估量的益处。

PPP 模式导入

“这是华侨城首次跟龙岗区政府合作，也是正好应了省里的东进战略，要从相对富裕的深圳东部往粤东北开拓。”华侨城一位规划专家点评道。过去30年，深圳的城市发展都是“一路向西”，每隔10年城市建设重心就要发生一次转移，第一个10年在罗湖，第二个10年在福田，第三个10年到了南山。但在今年初，深圳市提出东进战略，提出要打造龙岗、坪山中心，发挥交通的先导作用打通联结东部、辐射粤东的战略通道。

至于甘坑小镇项目经营阶段的产权和分红模式，据持续关注城镇化进程的专业人士这样分析：“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如何把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融入进去，前提是双方的认同，所以要让当地人接受华侨城的文化。有些景区在搞旺了以后，当地人开始有相对剥夺感，开始制造麻烦，或者不让游客进入，所以如果不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上做好规划，矛盾总是会在某个时刻爆发。”他认为随着经营效益的增长，在实物上可以变更当地人的持股量，或者提高房租，而最关键的是推动当地人的就业率。甘坑的另一个好处是村民是以村集体股份公司的形式与企业合作的，所以不存在单户谈判。

在村庄景区化的过程中，时有听闻旅游开发企业与当地村民的摩擦，早有江西婺源李坑村村民因“分红不公”堵住村口不让游客进入，晚有安徽壁山计划中村民对小资化改造方式的意见。即使很多景区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对抗，但也难以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相融。

“目前中国的古镇开发中，有些采取固定分成，有些按比例分成，你会发现当你把当地人的房子改造后，建成个新屋，原来收租模式就不够了，毕竟山水是他们的，村民要求涨价是正常的。所以利益机制、账目结构要建立好，你要与他们形成利益共同体，比如雇佣。”一位古镇保护专家曾这样告诉我。

在未来三到五年，华侨城将完成甘坑文创新镇核心区域的投资建设，总投资500亿元中有一部分是做PPP模式基础建设投资。PPP模式（公私合营模式）是华侨城在推进“文化+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战略选择，也是华侨城为中国城镇转型升级而打造

的“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系统性整体方案的提供，而不仅仅是单个公共产品的开发。比如，通过建成后移交政府采购来做文化设施规划建设、通过特许持续经营来做旅游产品投资和运营、通过政府采购或使用者付费来做城市公共产品规划……

传统PPP项目的内容是政府通过和社会资本合作，引进创意、管理和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授权，参与对现有城镇的交通、能源、排污、文化和教育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因为政府举债平台的受限使得各级政府无法大手笔投入城镇化项目，华侨城看到了这一机会，从公开的省市PPP招标数据来看，未来PPP规模超过10万亿，而新型城镇化是重点。

PPP在国外的案例中更多是政府吸收社会资本参与进来，但在中国，遗憾的是小型、微型企业及个人信誉度没有国企高，所以中国的PPP还是大型国企、央企做得比较多。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拿政府信用做背书，象征性地现金参股并在未来维持税收收入是常见的方式。其实，对于华侨城这类央企来说，取得银行贷款不是难事，银行愿意把钱贷给既有信用背书又有好项目的企业。

对政府来说，PPP的好处是不用一次性掏出很多钱，而是分期兑付给企业就可以。比如100亿元资金，政府每年回报给企业15%，等土地做熟了，政府再把土地上的项目招标出去，等于说这十几亿元没有白出。而政府的风险就在于如果没有把地卖出去，也得把钱还给企业。这种模式前期风险在企业，后期风险在政府。

PPP和城镇化的关系其实在华侨城内部早就反复讨论。2015年10月下旬，段先念把集团业务高管们拉到太原专门研讨关乎华侨城未来的“文化+旅游+城镇化”模式与PPP的打通与结合。太原会议亮出成为全球第二的口号，其重要性直接体现在今年诸多城镇化项目的推进与落地上。正如段先念在会上所言：“未来华侨城的目标是在全国建设更多的欢乐谷、一定数量的城镇化项目、成批的轻资产运营的旅游景区和特色小镇，并在一线城市大手笔开发地产项目；同时在资本市场通过并购加大产业投资力度，并通过进入保险业、证券业，创建和运营产业基金，构建城镇化业务发展的金融保证体系。城镇化是将来的龙头，是华侨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切入口。未来也是‘赢家通吃’的时代，华侨城要在景区规模和年接待游客人数上挑战仅次于迪士尼的地位，成为全球第二。”对于企业来说，如果这一背水一战式的宏大战略能够成功，无疑是在全国的新型城镇化沃土上树立了一枚标杆。■



七彩云南美景

（张敬平）

挺进京津冀、覆盖滇全域：华侨城的南北计划

文 / 林南芝

6月14日上午，在云南昆明南亚博览会召开期间，华侨城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下大单，通过央企参与地方国企改革，以重大资产重组，与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构建三大平台参与云南全省旅游大开发。同时，还与德宏州、普洱市等地州市签订合作协议，涉及总投资逾千亿元人民币。

这就意味着，华侨城作为一个央企，深度参与一省地方国企的资产重组和国企改革计划，这对于华侨城无疑是战略性的一步；更意味着华侨城从此开辟了一个打造省级全域旅游的新战场，这是继以文化旅游

为主导的城镇化之后又一个战略突破点。

“央企+全域旅游”大战略

6月的昆明一派欣欣向荣，正值南博会期间，春城也亟待找到一条新的旅游升级路径。华侨城中高层在签约前颇为严谨保守，重组云南旅游（002059）控股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下称“世博旅游”）的详细方案尚未公布，华侨城与云南旅游的战略合作就已经展开。就在签约日一锤定音后，此前媒体报道的世博新区因华侨城集团重组世博集团令其迎来新金



位于深圳欢乐海岸的华侨城湿地

(欧阳勇摄)

主的判断，得到印证。

此前，华侨城集团主要领导已经带队来到云南各地踩点调研，与世博旅游、云南文投、云南城投等三大平台均达成合作方案。6月14日，签约现场的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对此次合作怀着高度期待。李纪恒表示：“华侨城选择了云南，就选择了成功。”为实现全省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云南提出了大企业引领，大项目带动和大资金介入的三大战略。省长陈豪表示，央企入滇是云南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抓手之一。

其实对于云南众多分散的旅游资源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处于开发商各占山头的松散状态，虽然在全国范围来说，云南的旅游业因为先天优势而发展比较早，但日久后发现，景区运营理念的更新换代应提上日程了。而华侨城拥有丰富的景区升级和管理经验，同时作为央企又具备足够的铺展能力来做全域旅游。

合建项目里，有一项是关于昆明世博园区核心区域改造，云南旅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为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募集资金13.7亿元，一部分就是用于世博新区范围内“昆明故事”项目、世博生态城鸣凤邻里项目，另外一部分资金则用于设立婚庆产业公司及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所需。

走在如今的世博园区，是一种盛会过后长期的沉寂和疲软，各国风情的展区或建筑里少有火热的业态，有些林立的欧式建筑还在进行内部改造，大门紧

闭。对于世博新区总经理朱金华来说，这种现象不足为怪，他回忆，世博园区自从作为主题公园来运营之后，面临过一次次升级，但都不是最理想。2010年前，这是一个以纯门票收入为主的公园，以园艺为主题的公园提供的产品太单一，以至于2010年最困难时只实现了4000万元经营性收入，“运营成本倒要六七千万”。

后来，在经过云南旅游集团初步改造后形成分时段混合经营模式，引入本地休闲餐饮+婚宴活动业态。此举取得颇理想的效果，2015年总收入攀至1.7亿元。“这块区域是昆明东北部难得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的地方，但我们总觉得没有释放世博园区的品牌、资源和环境价值。”朱先生说。因此，云南旅游很冀望于华侨城这样的企业来协助整体升级。他认为，昆明有全国最好的“气候牌”，但没有打好，以至于这座城市在气候宜人之外拿不出文化大餐。

如今，华侨城介入后将要协作动工的是世博园区1000亩核心区域，几乎所有的原世博馆址都在其中。围绕今年1月昆明刚出的城市控规，在未来3年内，会先动其中的200亩土地。要把世博园区做成“昆明的会客厅”，也颇为费脑，他的脑中有一幅“昆明故事”的大型实景舞台剧的画面，这也将与华侨城共同策划制作，“比如曾经的西南联大那段历史，不应该没有人提”。

占领城镇化制高点，三大平台公司启动

自从中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成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对于河北省来说，亟待一个产业格局上的全面转型，也到了吸引巨额投资的关键期。这个夏天，华侨城集团在成都、昆明项目连续落地后，又将目光落到了北方这块沉潜的沃土。

近日，华侨城北方公司通过央企参与地方国企改革、以重大资产重组，与南戴河区政府进行战略合作，这标志着华侨城的“京津冀”文化旅游一体化战略正式启动，一个位于北中国、拥有优质海滨度假资源的综合旅游度假区的全面升级拉开序幕。

北方公司是华侨城“战区”运营管理模式尝试之一，专门立足于北方的文化旅游布点而成立，在“文化+旅游+城镇化”和“旅游+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引导下，在旅游整合、兼并、重组、组建旅游联盟及大投资、轻资产相结合等方面发力。目前，在

欢乐谷已经进驻北京和天津的前提下，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项目无疑是华侨城押的另一个宝，而且因为独一无二而更考验团队的运筹布局功力。

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是秦皇岛抚宁区南戴河旅游度假区的一个区块，属于国家4A级景区，对于华侨城来说，他们的作用是盘活景区的自然环境资产，改变一种陈旧的门票收入型景区运营模式，而去挖掘项目背后的综合价值。在华侨城的蓝图里，对南戴河项目做出了全新的规划，以资本投资、输出旅游策划和管理经验方式为主。

6月，华侨城集团总经理段先念曾在对华北片区调研的一次会议上这样总结，对于华北片区的发展局面，“步子要更快，格局要更大，对首都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认识要更到位”。他认为，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三个经济发展中心版图上，华侨城要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气魄，敢于布点和占领制高点。而且，还要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去挖掘京津冀地区中能发展五到十年的大项目，“能够震撼京津冀的新型城镇化大项目”。

在具体的南戴河项目升级上，华侨城准备以海洋主题重新规划包装公园，根据设备使用年限，逐步更换将到期设备。就拿酒店来说，还会区别打造酒店度假村、新建主题酒店、分时度假酒店、酒店式公寓等，改扩建原有度假酒店；在基础设施改造上，加入文创聚落的元素也将是一个亮点，在对深圳的文化创意园区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将文创复制到各个城市运营体中是华侨城文化肌理的一种体现。华侨城的一位资深骨干曾告诉本刊记者，文创产品的盈利模式虽然效益缓慢，但是颇能体现华侨城作为央企的社会示范效应，而这点也是华侨城的立身所在。

据悉，为落实“文化+旅游+城镇化”和“旅游+互联网+金融”双战略，华侨城已组建了三大平台公司。其一是作为文产平台的文化集团，二是作为金融平台的资本投资公司，三是作为管理平台的混合制的景区投资管理公司。

华侨城文化集团以“中国城市文化运营商”为战略定位，通过文化新镇和文创科技产业园区开发与运营、IP内容文化产业投资与运营、城镇公共文化服务策划与运营三大核心业务，业务范围涉及文化新镇、创意科技园、VR产业、特色旅游、观光农业、文创酒店、影视动漫、演艺传媒、体育健康等多个领域，致力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城市文化运营商领军品牌。目前以深圳12平方公里华侨城甘坑新镇为基地。

华侨城资本投资公司通过获取金融特许经营牌照、资本运作、合作共赢等手段，积极涉足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期货、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将资本投资公司建设成为金融牌照齐全、金融板块全面、金融体系完整、能够为集团公司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支撑，资金融通和资产优化配置功能突出，探索和创新文化投资基金、文化企业资产证券化、文化融资担保、文化融资租赁、文化小额贷款、文化信托、文化保险、互联网金融等产品，业务模式独特，最具市场竞争力的综合性文化金融公司。

而华侨城景区投资管理公司未来将把“旅游+互联网+金融”从“点、线、面”展开：管理输出拿点，智能景区管理谋域，互联网手段连线织网，金融（旅游发展基金）支持整合营销做全域旅游年卡一卡通，让玩景区从低频次消费变为多频次消费，打造出一个“省心、省时、省钱”新消费范式。其第一步是小题大做：输出华侨城景区管理的经验、标准，输出星级厕所文化、感染性的跟随式清扫，培养文明公民示范者、传播人；第二步是老事新做：管理输出、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投资、智能景区、目的地营销、全域旅游组合进行；核心目标是大题实做：一是务民生，让核心景区与当地居民和城市共增价值、共享收益，二是建标准，在共生链上培育众多优质品牌随行，优化典范，引领行业。

在这个范式中，关键点在于“金融”的环节。华侨城的团队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9月1日晚18点，在段先念的亲自安排下，一场很特别的座谈会在深圳华侨城的欢乐海岸召开。座谈会上来了几位来自金融界的专家，与华侨城有关城镇化项目、全域旅游项目负责人，就项目运作如何深化金融合作进行了认真交流和热烈讨论。这几位专家是在当天做了几场与金融实操运作相关主题的报告后又马不停蹄来参加这个座谈。召集人段先念用很认真的语气告诉在座的项目操盘者，要认识到金融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要认识到没有金融的支持和金融体系做后盾，华侨城走不远，“做强做大做优”就是一句空话。这场座谈会直到深夜才结束，当欢乐海岸水秀剧场的烟花在空中亮起时，每个与会者脸上都洋溢着因学习而满足、因投入而喜悦的幸福。正如一位与会专家所由衷感慨的：在华侨城的这两天，大家找到了久违的创业干事的激情，仿佛回到了那曾经澎湃燃烧的峥嵘岁月。其实，奋斗的路很长，而路就在脚下。■

“大棕熊”昭示斯柯达雄心

主笔 / 李三



斯柯达汽车 CEO 梅博纳

德国当地时间9月1日晚19点，斯柯达全新SUV Kodiaq的全球首发仪式在柏林老发电厂举行。这款7座中型SUV计划于2017年引入国产。

Kodiaq，据说这个奇怪的名字来源于生活在阿拉斯加西南部的科迪亚克棕熊（Kodiak Bear），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棕熊，甚至超过北极熊成为现存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斯柯达为自己的SUV命名保持着一贯风格——传奇色彩的物种，比如Yeti，就是一种传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大雪怪。

欧洲媒体则对斯柯达的这款新车有另一种解读，认为从新车取名就可见其用意企图。斯柯达甚至把Kodiak市长请到新车首秀现场，Kodiak市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同名岛屿Kodiak岛上，也因此和斯柯达有了一种特殊的缘分。欧洲同行们猜测，斯柯达有意重返自20世纪60年代后即退出的美国市场，而首款导入的车型就是7人座SUV Kodiaq，就本身的产品而言，斯柯达Kodiaq符合北美消费者对于大中型SUV的需求。定位于中级SUV的Kodiaq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斯柯达产品线，一定程度上也填补了大众汽车途锐和途观之间的尺寸空当。

视线拉回到国内市场，在日益增长的SUV需求面前，作为年度重器的斯柯达Kodiaq，对中国市场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斯柯达汽车CEO梅博纳（Bernhard Maier）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提到了一句德国谚语：少许诺，多兑现。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与之前的速派相比，Kodiaq在设计上有哪些进化？

梅博纳：的确，我们新的设计语言是从全新速派开始的，包括在功能性、空间性上进行改变，使得斯

柯达成为物超所值的产品，从设计角度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品牌形象和产品形象之间总是有着明确的界限，速派应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线条更加精准犀利，运用了水晶切割的元素，也应用了捷克立体主义的一些设计理念，所有品牌身份的要素都被继承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推出一款全新的产品。

谈到车型产品形象，我们对SUV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Kodiaq是一款SUV车型，速派是轿车，有贴地的特点，而SUV车型离地会高一点。但整体的品牌特点完全一致，Kodiaq可能比速派更加先进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设计对斯柯达有特别的意义？

梅博纳：设计对我们特别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因为如果把选购汽车的理由排序一下，首先是品牌及品牌具有的理性价值，其次就是设计。除品牌具有的理性价值和品牌形象外，现在我们更加强调的是情感上的品牌价值，并通过在车的内饰和外观上运用设计语言将其展现出来。然后还会运用创新技术。我们在Kodiaq这款车上就运用了创新技术，这款车能够一直保持互联互通，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电子辅助系统，这在之前的车型上是不具备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斯柯达Kodiaq有何期待？

梅博纳：这款车具备了成为品牌塑造者、品牌改变者的所有条件。我们刚刚做完Kodiaq与其所有竞品的对比，结果令人鼓舞。我们在产能上已做好准备。

通过这款A+级尺寸的SUV，我们将占领新的细分市场，赢得新的客户。这款全新开发的车型强壮如

熊，风格强烈的设计将让斯柯达品牌更具吸引力。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Kodiahq 将开启斯柯达品牌 SUV 车型的猛烈攻势。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 SUV 竞争激烈，Kodiahq 将如何加入到市场角逐中去？

梅博纳：目前中国市场消费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从以轿车为主的市场倾向于 SUV，对于斯柯达来说这是一个机遇，抓住中国的变化，就是抓住了机遇。Kodiahq 将于明年年中在中国上市，我们现在还在紧张地筹备中。我们的信息很清楚：这是一款年轻的车型，让人耳目一新，并继承了斯柯达的所有元素。它完美运用技术，能全天候保持联网在线，适合用户的各种出行需求，这在中国市场是很少有的。而且 Kodiahq 这款车只是我们 SUV 车型攻势的开端，在中国市场尤其如此，我们未来会推出更多的 SUV。我们不仅有即将上市的 Kodiahq，还有 Yeti 换代车型，未来还会推出跨界多用途新车型。总之，我们会更加专注于这一细分市场，并致力于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对这款车的销量有何预期？

梅博纳：销量总是与车型所在的细分市场有关，明锐所在的 A 级车细分市场是规模最大的，在过去绝对是我们销量最大的一款车型。而 SUV 市场的全球增速很快，我们预计 Kodiahq 能够占我们全球销量的较大比重，但 Kodiahq 的全球销量暂时还达不到明锐的规模。我预计 Kodiahq 的销量会超过现在的 Yeti。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与上汽集团合作，斯柯达（在中国的车标）现在改成了上汽斯柯达。这种调整是否会对斯柯达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产生影响？

梅博纳：我们与合资公司的合作在今年年初有很大变化，我们持有合资公司的部分股份，这一举措让我们首次能够发动自己的品牌攻势。因为之前没有上汽斯柯达，斯柯达这个品牌的定位并不明朗，现在情况大有改观，我们正式成为合资公司的股东之一，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推出自己的品牌语言和品牌推广活动。我们已经决定在今后 4 年与合资公司共同投资 20 亿欧元，这是很大的投资，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实力，实现业务翻番。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斯柯达未来将如何进一步

提升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梅博纳：强劲的品牌形象肯定会让我们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从斯柯达在其他市场的经验来看，良好的品牌声誉是建立在好的车型基础上的。目前我们拥有斯柯达有史以来最年轻、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组合，我认为这对中国市场来说尤为有利。今年我们的发展要领先于市场，8 月份的业绩非常出色，全新速派的业绩数据也很喜人。

中国是我们的主要市场之一，是我们销量最大的市场。现在随着 SUV 推广活动的启动，我们将大力推广品牌形象。我们与斯柯达总部、大众等各方都达成了一致，他们深信此举的方向是正确的。比如为了增加销量，我们之前推出了斯柯达 Yeti 与（古惑仔）五兄弟合作的宣传活动，非常成功。结合奥运题材推出了第二轮活动，效果也很好。产品推广越好，计划越宏大，市场上带有斯柯达标志的车型越多，我们就越能把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底蕴传达给消费者。据我了解，这一点对中国消费者来说非常重要。我认为 5 年以后情况会发生转变。

我们刚刚采用了一套新的品牌管理体系，密切关注斯柯达的品牌知名度。我们已经把今年设定为一个基准，将自己的品牌与竞争对手进行对比，找出双方的优劣势。这是一项全面的工作，不仅在中国开展，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

三联生活周刊：你担任斯柯达总裁将近一年了，从保时捷董事会成员调任斯柯达总裁，从负责跑车业务转而负责量产车产品，你怎么看这种角色的转变？

梅博纳：相同之处远大于不同之处。无论是保时捷还是斯柯达，我们的目标都是在自己所在的细分市场，提供最好的车型，这是斯柯达 120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宗旨。斯柯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品牌之一，有着深厚的底蕴。在 1895 年，全世界有 12 家汽车制造商，斯柯达是硕果仅存的 5 家之一，而且历久弥新，现在正处于品牌发展的最佳阶段。自 1895 年以来，斯柯达一直运用智慧的创意服务于个人交通。我们是一家非常出色的企业，在这里能看到创业精神，看到工程师的聪明才智，看到波西米亚地区的工匠技艺，看到追求卓越的精神。☑



藤本壮介的“脚手架”

文 / 曾焱

“做任何一代人都挺尴尬。”

9月3日下午，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前面的小广场上，一个独特的白色脚手架建筑正在最后阶段的搭建中。傍晚，工人们终于将艺术家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双语霓虹装置作品安上了外框架。灯光打亮，层叠的白色脚手架通体透明，面上缀了那些蓝色、绿色和紫色的标语，其中一句被现场的工作人员和记者拍下来，迅速发到朋友圈：“做

任何一代人都挺尴尬。”

白色脚手架是日本著名建筑师藤本壮介为“上海种子”带来的实验建筑作品。“上海种子”是一个比较难以描述的艺术和文化项目，概括地说，它是将持续一年时间、对市民开放的各种视觉展览和主题论坛。相比较于项目中显得复杂宏大的艺术、科学、文化和生态等话题，100年后的2116年愿景，藤本壮介的这个“脚手架”反而是最可描述的观念：透明，开放，流动。未完成的现场。

明星建筑师的明星作品，被作为一个类似于双年展的当代艺术场域的开场白。这座高23米、长76米



（“上海种子”供图）



（IWAN BAAH 摄）

的白色脚手架，其景观图片在开幕前几天被传播到各种媒介之上，像一个漂浮在热闹之上的巨大的诱惑。

三年前，为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建造的2013年夏季宫，是藤本壮介作为当红建筑师和当代艺术界的第一次明星范式的联手。

蛇形画廊位于伦敦的肯辛顿花园里，不到50年历史，但在西方当代艺术界一直保持着百年老店式的上流社会范儿，戴安娜王妃生前也曾是他们的名誉赞助人。2000年起，每年夏天，画廊都要举办一次募集资金的慈善派对，为此会在室外草坪搭建一座临时的实验性建筑作为展示空间。虽然注定一年后建筑就将消失，每年受邀设计的却都是世界顶级建筑师。十几年的设计者名单里面，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弗兰克·盖里、伊东丰雄、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让·努维尔等人都赫然在列。

他们无一例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都是世界级著名博物馆（美术馆）扩展计划的设计师，比如，库哈斯参与过伦敦泰特现代馆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工程，近两年入主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的新馆建造；弗兰克·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馆已经成为美术馆的当代范例，卡地亚当代艺术中心和马德里索菲亚皇后艺术中心则是让·努维尔的作品。

2013年夏季，藤本壮介被蛇形画廊放进了这份名单，成为这个明星建筑师“俱乐部”里面最年轻的成员。藤本壮介1971年出生于北海道，199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建筑系，2000年创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建筑事务所，之后藤本壮介在连续获得包括《建筑评论》大奖在内的各种奖项，被视为新生代建筑师里面的先锋人物。

就像他在我们专访中提到的大地艺术家理查德·朗，此人一生以行走的方式来联结自然和艺术，对于藤本壮介，联结自然和建筑也是他一直对外界所呈现的设计理念。2013年，也就是他受到蛇形画廊邀请的同一年，藤本壮介在日本一家画廊里举办了自己的主题展，展览以“自然和建筑之间”为题目，几乎所有作品都在探索同一个问题：如何提出一个新的空间定义，让复杂的自然环境和有意义的人为秩序相互植入？

堆叠，纤细的钢结构框架，大面积的透明玻璃……这些都是我们所见的藤本壮介在其建筑作品中反复使用的“原始”语汇。2013年夏天，它们也无意地在肯辛顿花园里出现。藤本壮介当时使用了20毫米直径的白色钢柱来造这个展亭，他在采访中称之为“Envision Pavilion”——利用柱子分布密度的变化，他控制着整个建筑的光线节奏；无数纤细的钢柱组合成三维网格，最后演进为像“森林”一样优美的不规则几何体。完成后的这个艺术空间没有屋顶，透明的

藤本壮介作品：
左图：为“上海种子”艺术项目专门制作的户外空间“远景之丘”（2016）

右图：位于日本东京的住宅项目 House NA

聚碳酸酯光盘作为“瓦片”被嵌入每个柱网单元，既为参观者提供一定的遮蔽，又保留了一部分空间可与外部自然景观息息相通。

现在看起来，这些概念都被挪移到了上海浦东喜玛拉雅美术馆前的这个临时建筑体之上。半透明建筑，悬浮在空间中的参观者，玻璃“瓦片”……如果对蛇形画廊的夏季宫有所了解，会发现“远景之丘”和三年前那座建筑具有高度相似的地方。它们来自同一概念：观众看到建筑师如何在复杂与简洁、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努力平衡。

藤本壮介告诉本刊，“远景之丘”可以说是三年前夏宫的“提升”版本，“每个元素都是人造和自然的结合呈现，又都在人造和自然之间游离”。为了弥补周围是钢筋水泥环境而不是肯辛顿公园的自然绿色，他在上海的建筑上增加了很多绿色植物，制造出树的漂浮。

“上海种子”联合艺术总监李龙雨认为，这两个建筑的区分可能在于“远景之丘”更具功能性，并且在材料上，它用白色脚手架替代了白色钢管。在策展人的阐释体系里面，这种材料转换具有很重要的“观念的寓意”：未来建筑是否还需要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

库哈斯曾将他对自己参与过的博物馆工程的分析转化为一件装置艺术作品——《扩展—忽略》(Expansion-Neglect)，在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他和他的建筑同行们都很清楚，在西方博物馆体系和艺术市场向全球扩展的背景下，当代艺术的制造者以及接受群体都在发生变化，而建筑师对艺术展示空间的实验无疑将导向新的转变。看起来，承载了观念的临时实验建筑和当代艺术装置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明星建筑师的作品近年在大型艺术现场高频出现，是否意味着实验建筑的加入，将成为当代艺术突破局限和困境的一种潮流？

“其实逐渐模糊界限的不仅是建筑和艺术。设计、影像、新媒体……也是一样的。它们和建筑都偏属于综合形式，和当代艺术概念必定越来越融合。早在197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上，就提出了不同领域艺术形式的跨界融合问题，那时候更多是关于艺术和哲学、历史、文学等等，当代艺术看起来好像一直是在孤立地发生，如果和其他领域融合，会更有力量，也更迷人。”

李龙雨在1995年为韩国创办著名的光州双年展，现居上海任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国际双年展协会主席。他和另一位国际当代艺术界的活跃人物、被中国艺术界称为“小汉斯”的汉斯·乌



藤本壮介作品：为伦敦蛇形画廊建造的夏季宫（2013）

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联合策展了“上海种子”，提出打造“多学科的知识平台”和“本土加全球的研究”。在他看来，当代艺术提供了更宽广的想象力和创造的自由，而这种特质对于其他知识领域同样重要。“很多建筑师就曾跟我说，他们从当代艺术中获得灵感。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不只是一种表达形式，而是



一种价值观念。”

“上海种子”第一期因此放弃了常规的视觉艺术展览，目的在于更开放地去探讨公共空间和公众参与。据介绍这也是李龙雨想要突破城市双年展模式的试探。“上海种子”这个和双年展谨慎保持距离的充满陌生歧义的名字、探讨未来人类100年的雄大主题、“根

基研究员”以及跨学科论坛……都是令人期待却也深感迷惑的地方。

“透明有什么意义？”有人在公众论坛上提问藤本壮介，关于他的“脚手架”。

“实体的透明之外，还有观念上的透明。”藤本壮介回答。☑

我不太在意短暂或是永存



藤本壮介

（“上海种子”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选择脚手架这种材料来建“远景之丘”？

藤本壮介：我也是被上海这座城市所启发。脚手架本身是建筑过程的一种象征，也是我个人所认知的上海的一个标志——我指积极意义上的（隐喻），并非消极的。另外脚手架的结构有一种暧昧，它通常是作为建筑辅料出现，或搭或拆，总在变化中，所以我要用到它这种不断“改变”的未完成的潜质。但在设计过程中，最先想到的其实还是轮廓，之后才决定用什么材料。我希望获得一种反差：脚手架搭建的“远

景之丘”柔和、轻盈，而在它背后，矶崎新设计的喜玛拉雅美术馆以其庞大、厚实的洞穴建筑成为一个对比。

三联生活周刊：三年前你为伦敦蛇形画廊夏季宫设计的建筑令人印象很深，那好像是你作为建筑师和当代艺术的第一次明星式的合作。“当代艺术”的概念在类似设计中给了你什么影响？

藤本壮介：蛇形画廊的“Envision Pavilion”更像是我为公众建造的一个互动空间。画廊的前身是一座老英式茶馆，人们来此休憩，可以随心所欲，所以我的主要考量也是如何为观众提供更多空间选择。其实“远景之丘”也是一样的，以后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有很多功能场域，包括表演区、展示区、咖啡厅什么的，并且有一条步道穿行于整栋建筑，因为我希望人们不仅可以站在平地上观赏它，也能够把它当作“山水”那种自然概念，就像登山、玩水一样，在建筑中体验人和自然空间的关系。

当那些当代艺术最终被放置进来，在我看来，它们和我的建筑简直是出人意料的美妙结合。比如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的霓虹户外装置作品《22世纪的标语》，它们恰如其分地融入到脚手架的结构中，彼此衬托。正在安装作品的工人甚至也成了景观的一部分。我很喜欢这种不期而遇。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远景之丘”在你看来，更像是一个建筑，还是一件由建筑师创作的巨大的装置作品？

藤本壮介：我始终都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建筑来看待，因为这是我认知空间的方式。建筑是这样一个场所：它和人发生互动，有一定的功能性，有内、外空间的区隔；建筑还有自己的语境，比如选址在哪里非常重要。这些是我所有思考的起点，意味着我的每次设计必定是从这些基本元素发散开来。当然，有时候我的作品会让人觉得和装置艺术有些相似，因为视觉强烈，并且也有一些概念的东西，但我仍是以一种建筑思维来思想的——我关心人在这个场所如何相遇以及如何关联；我的焦点不在于结构本身，而在于什么将要发生。

三联生活周刊：但“远景之丘”注定将被拆除，就像你为蛇形画廊做的那个建筑现在已经消失了一样。通常来说，建筑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一个时代风格的象征，流传于后世，而现在你所做的却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对于一位建筑师，这是怎样一种创作经验？

藤本壮介：我不太在意短暂或是永存，因为有些东西就是会永久，而有些将会消失。我觉得重要的是建筑中所包含的理念是不是能够留存下来。

为蛇形画廊所做的工作对我来说特别重要，那些想法至今仍活跃在我的头脑中，不仅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思考，也是对整个社会而言。一旦某个强烈的想法演变成了某种真实存在的空间，人们可以置身其中体验，那么你个人对于新生活或者新环境的观念就会影响到外部世界，即使它是暂时的，即使作为物质的存在它会消失。所以对我来说，与实体空间是否还存在比起来，一个建筑的概念和思想将如何影响人们更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为著名美术馆设计一座令人瞩目的建筑，现在已经成为明星建筑师的标配。我很想了解你怎么看待“美术馆建筑”这种概念？像白盒子（white cube）形式的艺术空间会过时吗？

藤本壮介：某种程度说，“white cube”仍是最根本的，所以它仍将存在。但我们未来会有更多多样性的环境来展示和享受艺术，将和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城市发生一种更深的植入关系。

我不认为“white cube”会被完全取代，它和其他不同的空间形式并存，并且相互影响。这才是未来。我对于未来的观点就是，它并非线性的，而是发散状的，所有个性彼此共存。就像我们的地球上有着蚊子、小鱼和各种各样的生命物种，这是我所认为的富饶。我希望未来建筑也有更多选择，而不是被单一风格主宰。

三联生活周刊：在世界各地工作、旅行的时候，有哪些博物馆或美术馆建筑曾经吸引你？

藤本壮介：很遗憾我没有能把每座城市的美术馆都看到，但喜欢的确实不止一个。像我10年前去过柏林新国家画廊（Berlin New National Gallery），设计者是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那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空间，以玻璃围合起来的一个完整体，作为美术馆也许有点硬朗，但真的非常漂亮并且与众不同。当然还有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

馆，当年它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个螺旋梯简直疯狂，但现在已经成为如此独特的东西。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馆、伦敦的泰特现代馆……我很喜欢这类强烈的、独一无二的空间概念。还有哥本哈根的路易斯安纳博物馆，被那么美地安嵌在自然之中。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美术馆建筑如今越来越庞大的趋势？

藤本壮介：我不是特别了解美术馆建筑这一特殊形式设计的发展方向，但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把美术馆造得更小、更轻盈的尝试，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观点：建筑的发展不是单向的，可以有不同方向共存。

几年前，我曾在广州为朋友设计过一处小的画廊群落。那地方叫“镜园”（Mirror Garden）。那就完全不是白立方式的展馆，体量相当小，藏身在自然丛林里。建筑看起来柔和轻巧，但里面的作品和展示的观念却很sharp，也就是说，比较前卫和实验性。

三联生活周刊：在和蛇形画廊那次著名的合作之前，你关注当代艺术吗？有没有什么艺术家的作品影响过你的建筑理念？

藤本壮介：我其实不算是一个好的艺术观众，不过还挺感兴趣的。也许我能跟你说两位艺术家的名字，其中一位年纪比较大了，是理查德·朗（Richard Long），他在全世界长途跋涉，创作一种“行走艺术”（Walking as Art），在行走中记录自己的轨迹。有时他走直线，有时沿不同地形，比如河岸。他会用石子在行走路线上做出标记，以这种非常原始的材料形成轮廓，诠释身体介入和自然能量的关系。他也曾把实物和文献带到美术馆的展厅里。我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很多灵感。第二个人很出名了，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他对光、水和色彩的深度探索，对基本几何形式的关注，还有他对人道的感知力，对我都是非常吸引的。■

（实习生王琪对本文也有贡献）



老斯卡拉剧院的《吉赛尔》

文 / 驳静

《吉赛尔》最早的演绎者就是斯卡拉剧院的舞者，如今，《吉赛尔》是除了《天鹅湖》外，在全世界的芭蕾舞舞台上演出最多的剧目。

天津大剧院据称有过关于芭蕾舞剧《吉赛尔》(Giselle)的魔咒。

2013年春天，新西兰皇家芭蕾舞团携《吉赛尔》来天津演出。开演前一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温度骤降，剧团为了演员考虑最后不得不取消表演。随后的2015年春和夏，又有法国波尔多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和白俄罗斯国家歌剧芭蕾舞剧院的两版《吉赛尔》演出安排，都因某些不可抗力而取消。

这个“魔咒”直到今年夏天，在意大利斯卡拉剧院(Teatro alla Scala)版的《吉赛尔》顺利上演后而终止。

我在天津大剧院后台逛了一会儿，这里呈现出一种被意大利人统领的活跃气氛。走廊里张贴着此次《吉赛尔》的演出海报，据介绍这也是斯卡拉第一次上演该剧目时的海报。依旧沿用19世纪风格的海报，大约是一种对200多年历史的自珍，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斯卡拉剧院版《吉赛尔》呈现出来的气象：这是一个古老的剧团，但它讲的故事其实挺现代，甚至还有



些女性主义。

《吉赛尔》在芭蕾作品中，算得上情节简单。它统共分为气氛对比鲜明的两幕。第一幕是明快愉悦的乡村生活，未经世事的少女吉赛尔与母亲一起住在森林边缘，有一天她遇到了乔装成同一阶层的贵族青年阿尔伯特，二人坠入爱河。赏心悦目的恋爱后，随之而来的是身份暴露后的生死之别，吉赛尔不堪欺骗与爱而不得，最终选择了自杀。第二幕画风一变，吉赛尔化为悲切但仍爱恋不舍的幽灵，而另一个世界里的



意大利斯卡拉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吉赛尔》剧照

幽灵头目则要为她复仇。第二幕的情感处理显然要复杂得多。但其中的爱恨交织，交给现代人理解，却是一条十分简单的公式：女主角被骗后，闺蜜们要帮她报仇，结果却以她心软不舍而告终。故事讲到这里，变成幽灵后的吉赛尔，几乎拥有了决定爱人命运的能力。

森林为《吉赛尔》带去神秘气息，第一幕尾声，森林少女吉赛尔狂舞至力尽而死。这一段历来以高难度著称，除了技艺上十分考验舞者的功底，还有一段

对情绪表达有高要求的段落。疯掉与情绪激烈之间仍然有一线之隔，吉赛尔用剑尖对准胸口，又跑向自己的母亲似乎在最后的告别，这些细分段落既需要充沛的情感，又需要保持抒情，一不留神，就容易划破那道薄弱的窗纸而将吉赛尔生命的最后一段诠释成一个因爱而疯的形象。

与之相关的其他著名片段，还包括第二幕中众幽灵的群舞，最后男女主角的双人舞也总是作为许多芭蕾舞大赛中的指定片段。从这个角度说，《吉赛尔》

是芭蕾舞界教科书式的剧目，这意味着经典和不可更改。对《吉赛尔》内心世界的挖掘，成了这部经典芭蕾舞剧极为重要的开拓方向之一。

斯卡拉剧院和《吉赛尔》更大的渊源在于，第一位《吉赛尔》的表演者卡洛塔·葛里西（Carlotta Grisi）正是毕业于斯卡拉剧院芭蕾舞学校，可以说，葛丽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意大利学派的继承者。当年，她被在欧洲游历的朱尔·佩罗（Jules Perrot）发现，佩罗自己是一位已经成名的芭蕾舞演员，他像星探一般发现葛丽西后，决定要将她推到更广阔的舞台。1836年，佩罗带着亲自指导过的葛丽西在伦敦亮相。

对于《吉赛尔》是否佩罗为葛里西量身定制的剧本有多个版本的叙述，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德国诗人海涅的幽灵“维丽丝”（Willis）是《吉赛尔》故事的创作灵感。在这个来自中世纪德国的古老传说中，婚前不幸去世的少女，生前喜爱跳舞，到了冥界后因而变成名叫“维丽丝”的舞蹈幽灵。她会在夜里飘落人世间，诱惑年轻人，邀其狂舞至死。

朱尔·佩罗与简·克拉里（Jean Coralli）共同为这个故事编舞，并带着它来到巴黎，在浪漫芭蕾全盛时期的佩莱蒂耶剧院（Salle Le Peletier）进行了《吉赛尔》的首演。女主葛里西由此成为那一代芭蕾舞者的代表，“ballerina”（意大利语，芭蕾舞女演员）这个称呼也开始多了一层“演员”的含义，由之前更多注重艺术技巧转向注重情感的表演。

《吉赛尔》的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吉赛尔的形象既梦幻又动人心弦。斯卡拉剧院的继承者们对19世纪诞生的这部伟大的芭蕾几乎很少做出故事框架的改动。斯卡拉成立于1778年，这样一个古老剧团，200多年来排练过数十个版本的《吉赛尔》，这些版本据介绍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斯卡拉剧院的芭蕾大师劳拉·孔塔尔迪（Laura Condardi）接受本刊采访时，承认这次《吉赛尔》所选用的年轻演员，在内心挖掘和情绪表达上还有成长空间。

这次来中国的主演妮可莱塔·曼尼（Nicoletta Manni）出生于1992年，与她搭档的克劳迪奥·柯维罗（Claudio Covielle）同样是一位“90后”演员。柯维罗并非毕业于斯卡拉剧院芭蕾舞学校，他是意大利人，但来自罗马的芭蕾舞学校。在保持学派血统上，孔塔尔迪认为：“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很大。以前巴黎、伦敦、莫斯科等芭蕾学校之间的演员选择都泾渭分明，

现在不一样。斯卡拉剧院在挑选演员时，不会像俄罗斯那样注重体形，不会在乎舞者是来自哪个国家，是否像传统的意大利芭蕾舞者那样纤细柔软。”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曼尼的表演怎么样？

孔塔尔迪：我觉得还不错。吉赛尔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角色，她是芭蕾舞剧里难度最大的角色之一，因此需要非常多的练习与经验。这个角色的难点在于，她相当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第一幕的吉赛尔充满青春活力，也天真可爱，沉浸在爱中，而到了第二幕，吉赛尔拥有了完全不同的人格，这个新人格又要求她在舞台上有不同的风格。

三联生活周刊：意大利芭蕾舞演员和其他国家的演员之间，会有什么明显的风格区别吗？

孔塔尔迪：有。但区别在于不同的学校。意大利、法国、俄罗斯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著名的舞者来自俄罗斯，但她也和美国芭蕾舞团合作，也和法国舞团合作，现在就是这种大的风格混合趋势。但这也是芭蕾舞的美妙之处，也是伟大的芭蕾舞演员的伟大之处，可以在古典或现代芭蕾之间转换。

三联生活周刊：那斯卡拉的风格现在是怎么样的？

孔塔尔迪：斯卡拉挺与众不同。我们有许多本身就毕业于斯卡拉芭蕾学校的演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演员是来自其他不同的学校，这意味着学派之间也有融合，我觉得这是趋势。当然，并不是其他学派都是如此，比如俄罗斯，他们的芭蕾剧团里没有外国人，只有俄罗斯本土的演员。

三联生活周刊：对斯卡拉来说，使用像曼尼这么年轻的演员是不是一种冒险？

孔塔尔迪：的确是。在《吉赛尔》这部剧里，男女演员都非常年轻。但是让年轻人担任主角，给年轻一代机会，指导他们成长，也是剧团的成长。这一点上，斯卡拉做出了很大的理念转变。舞蹈是门十分古老的艺术，但又是一门对变化十分敏感的艺术。仅仅是二三十年前，流行的芭蕾舞技巧与现在比就是完全不同的样貌。另外，过去更注重的是艺术层面，如今肢体、技艺也同样重要了。但我常常跟他们说，回去看过去芭蕾舞大师们的表演视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大师的表演方式太精彩了……如果不看过去，只往前走，就十分可惜。■

（本文图片由天津大剧院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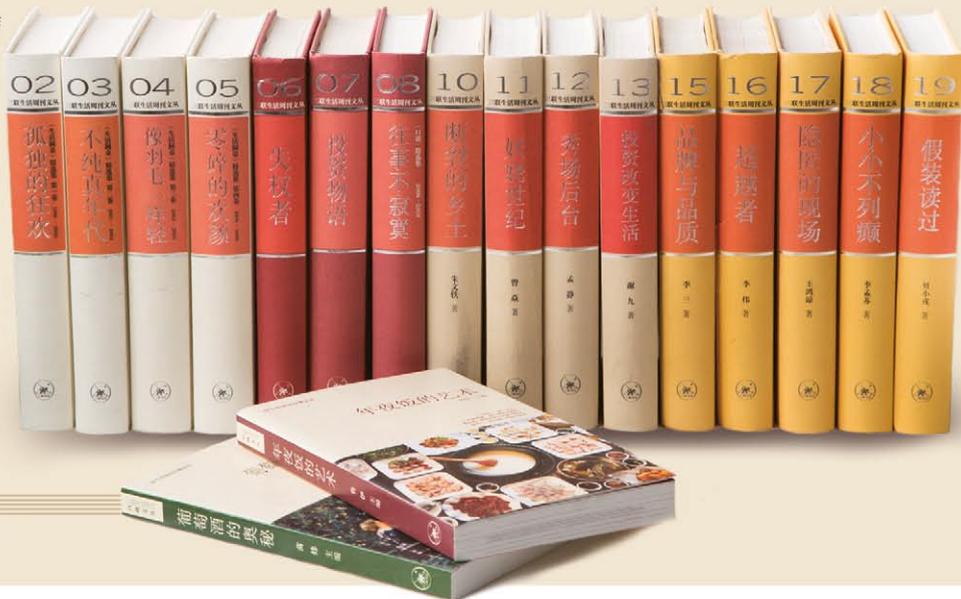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投资物语	往事不寂寞	有关品质	断裂的乡土	妖娆世纪	秀场后台	投资改变生活	生命八卦	品牌与品质	超越者	隐匿的现场	小小不列颠	假装读过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10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拉夫·迪亚兹和他的纯粹电影

特约撰稿 / 陈凭轩 (发自威尼斯)

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于9月10日颁奖落幕。今年获得“榜眼”评委会大奖的《夜行动物》(Nocturnal Animals)有着星光熠熠的阵容,由时尚名人汤姆·福特执导,放映后又证明质量相当过硬,几乎肯定是奥斯卡大热门。但问鼎最高金狮奖的,却是一部来自菲律宾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电影:《离去的女人》。



菲律宾导演拉夫·迪亚兹(上)和他执导的电影《离去的女人》剧照。
该片获第7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片长近四个小时的《离去的女人》(Ang Babaeng Humayo)全部以固定镜头拍成,并且是黑白片。导演拉夫·迪亚兹(Lav Diaz)解释说,固定镜头是一种诚实的表达方式,与过度运用的剪辑技术相比,这种拍摄方式放弃了电影镜头切换时的炫技,保持了对观众的真诚。黑白更是他观察世界的根本,任何色彩在他看来表现的都是一种肤浅的美,而黑白,以光影的复杂性制造出一种深邃。

《离去的女人》讲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仇和报恩故事。女主人公遭陷害被判终身监禁,身陷囹圄30载,洗脱罪名后谋划复仇。她好心收留了一位身心受尽虐待的变性人,后者在知道了她的故事后,替她刺杀了仇人。

故事并不是迪亚兹的强项,但他总能触及人性,比如复仇和报恩的冲动。他的影片也有极强的社会批判性。迪亚兹反复谈到菲律宾社会现在的腐败和戾气,而艺术是他评议时事的一种手段。他在今年初的柏林电影节上也获了银熊奖,那部《悲伤秘密的摇篮曲》(Hele sa Hiwaga ng Hapis)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历经了17年之久,其中很大原因就是菲律宾政府以各种手段阻挠他拍摄,因为这部影片是以菲律宾革命为主题的。

关于迪亚兹的个人生活和经历,人们知道得很少。与艺术无关的东西,他一般不愿多谈。这位57岁的电影人出生在菲律宾南部的山区,在他右臂上有“巍巍”两个字的文身,意为“山神”,那是偶遇的一个来自中国青海的老者告诉他的。除了拍电影,迪亚兹还是音乐家和漫画家,但电影对他来说是一种更纯粹的艺术,有无上的地位。“艺术比政治和宗教更重要。”他说,“艺术是最原始的教育手段,使人得以跳出自我中心,获得其他视角。”

迪亚兹一向把电影当作艺术品来拍,不自觉地与商业制作对立起来。他的作品从来都无视电影作为产业的规则,声称只对艺术和美负责。他最为人的特点是极端的片长:《离去的女人》将近4个小时,对于其他导演来说已经十分冗长,但在迪亚兹来说算是正常。《悲伤秘密的摇篮曲》全长8个多小时,在柏

林首映时放了一整天，中间还要休息一小时。而他2004年的成名作《一个菲律宾家庭的进化》(*Ebolusyon ng isang pamilyang pilipino*) 将近11个小时。迪亚兹认为艺术该是自由的，那么如果电影是一种艺术，就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

迪亚兹拍片的速度也十分惊人。《离去的女人》是今年初柏林电影节之后才开始准备的，从筹划到完工，他只用了5个月时间。他拍片往往不等资金到位，用自己的设备先拍起来，钱慢慢再说。

片长和速度并没有削弱他影片的质量。他的作品在构图上煞费苦心，所有道具、人物、布景都经过精心设计，银幕上呈现出摄人的美感。他对光线的运用也登峰造极，特别是《悲伤秘密的摇篮曲》，可以说光影本身就是一条有生命的叙事线。他对叙事节奏的掌握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虽然速度非常缓慢而且镜头并不移动，他的电影却并不是单纯的视觉艺术，总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在其中。《悲伤秘密的摇篮曲》和《一个菲律宾家庭的进化》都是背景宏大的史诗般的故事，前者讲述了菲律宾现代建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后者则时间跨度极大，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离去的女人》反而在故事上有些弱。这样的复仇故事在文学、戏剧、电影中一再被重复。评委选择把金狮奖给迪亚兹，一方面是对他所有作品的肯定，另外也是对一种独特而纯粹的艺术风格的颁奖。固定镜头、黑白片、不紧不慢的节奏、任性的片长，迪亚兹在找到自己独特风格的同时，对电影语言和叙事方式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但他的作品从美学到内容，也正在陷入自我重复的循环，比如道德意味极其浓厚的故事加上永远不变的拍摄方式。对于跟着电影节追片的评论人来说，他开始变得无聊了。许多大师在创作生涯后期都难免自我重复而渐平庸，所以威尼斯授予迪亚兹金狮奖也算十分及时——在一种纯粹的艺术风格由于作者故步自封而变得平庸之前，把它镌刻在电影艺术的史册中。好在迪亚兹也表示愿意拥抱变化，他说，只要表现形式符合叙事和内容的需要，固定镜头可以放弃，片长也可以变短，唯独彩色片这个东西他不会染指。

获得最佳导演银狮奖的俄罗斯名宿康查洛夫斯基 (Andrei Konchalovsky) 在记者会上说，他不相信艺术能对现实有什么直接作用。他这次的获奖作品《天堂》以“二战”为背景，用尽了叙事的机巧。对于出身艺术世家又在好莱坞工业体系中浸泡过的康查洛夫斯基来说，电影的本质是一种游戏，玩出花样和新意是最重要的。反而是以纯粹艺术为己任的迪亚兹，更相信电影的社会功能。《离去的女人》中的霍伦达 (Hollanda)，是迪亚兹作品中很罕见的变性人角色，也是他首次正面触及 LGBT 问题。他坦言自己在马尼拉有不少关系很好的变性人朋友，由于社会压力对精神带来的摧残，他们往往性格复杂，反复在无上的欢乐和无尽的悲哀之间，或者两种极端并存。迪亚兹试图在影片中拍出一个具有群体复杂性又有自己独特性的个体，不把边缘群体作为自己电影中的道具。

主会场丽都岛电影宫附近的 Excelsior 大酒店是威尼斯电影节官方嘉宾下榻的指定场所，马路正对面有一个临水的露台，常有影迷聚集在这里等着看明星。有一次我做完采访出来，看到迪亚兹席地坐在露台的台阶上吃冰淇淋，混在那些追星的人群中，毫不起眼。他的外形和气质跟在电影产业中摸爬滚打的导演有些不一样，金狮奖也没能把他变成明星。在颁奖后的记者会上，被提问最多的是汤姆·福特和康查洛夫斯基，他们的片子很可能会成为明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的热门，就连现场的两位普通拉美导演也显得比他这个金狮奖得主人气更高。

也许这就是迪亚兹这样一个自认纯粹艺术家的最好位置：拍真诚的电影，拿最高的奖项，把娱乐大众这件事交给别人去做。✍

许多大师在创作生涯后期都难免自我重复而渐平庸，所以威尼斯授予迪亚兹金狮奖也算十分及时——在一种纯粹的艺术风格由于作者故步自封而变得平庸之前，把它镌刻在电影艺术的史册中。

《追凶者也》，曹保平的黑色幽默

文 / 宋诗婷

“我要在个人表达和商业性之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临界点。”

结构

上海国际电影节似乎特别青睐曹保平，一年前，《烈日灼心》拿到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导演奖，时隔一年，他的新电影《追凶者也》又让刘烨在同一个电影节封帝。很多人会拿这两部电影作比较，曹保平却极力避免：“它们不是一个东西，《烈日灼心》在严肃地探讨人性和人性背后复杂的关系，而《追凶者也》特别明确，我就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故事，侧重于打造人物的趣味性。”

虽然都是犯罪题材，但《追凶者也》在结构和气质上与《烈日灼心》完全不同。剧本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贵州五兄弟追凶案”。原故事中，五个农民兄弟为给惨死的弟弟一个交代，在警方毫无头绪的情况下私自调查、追捕真凶，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另一位导演蔡尚君也曾以这个故事为原型，拍摄了电影《人山人海》，那部电影曾为他赢得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

与《人山人海》一样，《追凶者也》也将原故事简化为一人追凶，刘烨饰演的憨包修车工宋老二为洗脱杀人嫌疑，独自上路寻找真凶。而段博文饰演的小混混王友全阴差阳错地卷入这场追凶行动，夹在张译饰演的“五星杀手”董小凤和宋老二之间身不由己。三个人的命运彼此牵连，在荒凉、粗砺的西南一隅展开了一场猫鼠游戏。

电影采用非线性叙事，分别从三个人的视角展现故事的不同侧面，随着洋葱一层层剥开，事件的真相也越来越清晰。这个结构似曾相识，去年上映的独立电影《心迷宫》也曾以同样的环形结构讲述故事，但相比《心迷宫》的克制和灰暗色调，曹保平的《追凶者也》更强调戏剧性，他以黑色幽默和更直接的暴力场面来修饰这个精巧的“莫比乌斯环”。

在上部电影《烈日灼心》中，曹保平注重刻画人物复杂的心理，用人物的心理变化来推动情节发展。电影着力挖掘人性，因而显得沉重。《追凶者也》显然志不在此，这部电影情节简单，心理驱动也并不复杂，但人物的背景和状态更为丰满，曹保平把更多心思花在了刻画人物上。“这个故事在触及人性的深度和展现人物的复杂性上是比较弱的，分量不够，用线性的方法讲故事会比较索然无味，但用现在的环形结构来呈现，就可以把人物的状态和各自的故事融入其中，再加上黑色幽默，就会更有趣味性。这也是为什么用现在这种结构来讲故事的原因。”曹保平说。

电影在云南拍摄，男主角宋老二说云南方言，黑色幽默又贯穿其中，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曹保平的另一部电影《光荣的愤怒》。《光荣的愤怒》是曹保平的第二部长片作品，电影讲述了一个云南农村的村支书带领村民和四个村霸斗智斗勇的故事。在那部电影里，曹保平已经熟练地实践了突出戏剧冲突，将黑色幽默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电影风格。“以这个风格来拍《追凶者也》很大程度上也跟《光荣的愤怒》有关，那是我的电影里个人最喜欢的一部，一直想找机会再拍这样的风格，但没有合适的剧本。”曹保平说，他至今觉得《光荣的愤怒》在商业属性和类型化上没有问题，但无奈当时的市场不好，受投资规模所限，电影也没有大牌演员坐镇，再加上发行不得力，票房很让人失望。“如果放在今天，情况会很不一样。”

风格

《追凶者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光荣的愤怒》的遗憾。在风格上，二者有衔接，而在演员配置上，后者请来刘烨、张译和王子文，演员阵容的升级让《追凶者也》有了更明确的商业诉求。

电影开场没多久，刘烨就开着一辆明黄色的修理车上路追凶。云南郊外的荒蛮和苍凉贯穿整部电影，再配上刘烨和张译颇为夸张化的表演，电影的整体气质更接近于美国的西部片。曹保平肯定了我的判断：“西部片是这部电影美学上的调性。无论是配光还是



电影《追凶者也》剧照



有些地下电影、个人风格的电影，呈现的是某种状态。或者一些动作片，其实对演员的宽容度较大，人物塑造可以没有复杂的内心，只要具备基本的性格特质就可以了。而我的电影恰恰两边都不靠。

道具选择上，我都希望突出那种粗犷、苍凉的感觉，而演员的表演要有种牛仔的劲头，有种杀戮的气息弥漫其中。电影在后期制作时，也特意调大了颜色对比度，往暖黄色上调整了一下，就是希望突出这种浓烈的风格。”

电影最终呈现的气质与原剧本有较大差异，作为风格化的导演，曹保平能把接手的所有剧本都拍成“曹保平的电影”。《追凶者也》的原剧本作者是张天辉，这个剧本曾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金钟奖上拿到“最佳扶植剧本奖”，而曹保平是那届金钟奖的执行主席。“当时第一感觉是剧本基础很好，也比较完整。台词很生动，但人物有点飘忽。”决定把这个剧本投入拍摄时，曹保平对剧本结构和整体方向做了很大修改，“如果按照原剧本拍摄，拍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个有些闷的、很个人化的独立电影，商业属性上会非常弱，当然，那也没什么不好，但不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现在的电影气质已经完全不同，我加入了很多激烈的追逐戏、打斗戏，在每场戏的处理上也更直接和外化。”

曹保平试图解释这种电影气质上的调整。电影中有一场宋老二带人去小混混王友全家抢猪的戏。原剧本里，这场戏被一带而过，以声音来暗示抢猪的场面，再以一个抱猪出圈的动作来提示结果。但实际拍摄时，曹保平拍了宋老二带着兄弟们抢猪，搞得人仰马翻的全过程。“那种外化的刺激和冲击力就有了，这是商业化的剧情片所必需的，你不能躲闪，虽然它不容易拍。”

整部电影最激烈的一场戏发生在一艘渡船上。“五星杀手”董小凤要夺回自己的杀人证据，他绑架了小混混王友全，在渡轮上逼他把自己的西服交出来。在张译的记忆中，这场戏原本要在一个水泥厂里拍摄，董小凤往王友全身上倒水泥，逼他招供。但曹保平觉得，这样拍出来太常规了，不够有趣味性，于是，他要求美术指导四处勘景，希望找到一个更有冲击力的

方式来呈现这场重头戏。最终，他们找到了这艘摆渡船。“船足够大，船尾有个大铁板子，一靠岸，板子直接戳进岸上的黄土里。那个声音和画面非常野蛮，视觉上和听觉上的冲击力都足够。有了这艘船，我们就开始围绕它设计所有的动作戏和台词。目的只有一个，把人逮住，严刑拷打，逼他说出西服的下落。但这个过程怎么实现、怎么利用道具、怎么在视觉上和情节上突出高潮段落，这就需要仔细琢磨了。”最终，这场临时调整的戏拍了10天。曹保平利用船上的道具设计了各种阴差阳错，快节奏的捉捕中夹杂着笑料，董小凤和王友全的打斗路线几乎覆盖整艘船。

在《烈日灼心》的访谈集《导演的控制》中，当时的摄影师罗攀就提到过，曹保平是个控制力和创造力同样强悍的导演。在片场，包括摄影、灯光、美术、演员在内，所有人都被他裹挟着陷入专注的创作状态。“的确，很多表演，电影场面的设计都和剧本不完全一样，有些是在勘景时有了想法，根据现场环境临时设计出来的。每部戏都有它即兴的部分。”曹保平说，《追凶者也》里有一场王友全和王子文饰演的杨淑华的床戏，按原计划，这场床戏要在杨淑华的职工宿舍拍摄。但宿舍上下铺，空间小，拍不出新意，“那是最省事、最保险但最没创意的拍法”。后来，曹保平相中了一个闲置的房间，在房间里堆了很多床垫子。“但戏不能在房间里拍，不然就又憋回去了。”于是，这场戏一开始，曹保平就让王友全站在房间的窗户外，拼命拉一个床垫子出来，“有点滑稽可笑，又有点小骚动的感觉”。最后，两个人在房间外的空地上来了一场“野合”，一场程式化的戏，经过一些调整和设计，在写实的基础上多了几分浪漫。

表演

两部电影，四个影帝，曹保平调教演员的方法被业内外反复揣摩。“曹导对演员表演的控制非常多，非常精确。”《烈日灼心》的摄影师罗攀说。曹保平也承认，他并不知道合作过的演员是不是喜欢主动与导演沟通，因为在他的电影里，没有演员找导演的机会，他一直在主动与演员沟通，不停向他们“要东西”。

“有些地下电影、个人风格的电影，呈现的是某种状态。或者一些动作片，其实对演员的宽容度比较大，人物塑造可以没有复杂的内心，只要具备基本的

性格特质就可以了。而我的电影恰恰两边都不靠，它们是主流的剧情片，对人物心理的解释难度比较大，而我的故事又常常复杂度很高，所以演员表演起来是挺难的。”

男主角刘烨一出道就拿到影帝，但最近几年，他的电影作品鲜有入围各大电影节，《美人草》之后，他也再没得到过任何表演奖项。“这次与曹导合作，我特别期待，我特别信任他。”刘烨说，刚拿到剧本时，他对这部电影的整体风格没有概念，“剧本里发生的事儿都很接地气，以为风格上会是一个传统的艺术片”。

但拍完第一场戏，刘烨就发现，这部电影不能按以往的经验来表演。刘烨一边表演一边解释曹保平的要求：“第一场戏是开车，一开始我就特别生活化地按部就班地挂挡、踩油门，拍了几条后发现，曹导要的不是这种，是要‘咔咔咔’，很风格化，有点戏剧化的那种表演方式，从这两个动作上我就找到感觉了。”

与刘烨的角色相比，张译的表演更需要现实性和戏剧化间找到平衡。董小凤的戏份主要集中在两部分，一部分是展现他“五星杀手”的一面，张译需要以略夸张的方式诠释一个既冷漠又不靠谱的杀手。另一部分是他与女友的感情戏，这部分要演得很实在，很有生活质感。“董小凤与其他几个对手博弈是需要这个角色展现黑色幽默的部分。但这个角色写实的根基在哪里呢？那就是解释他行为的那条生活线，他要带着他心爱的女人过上最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这也是这个电影现实主义的部分。”张译说。

最近几年，张译参与拍摄的电影大多是文艺片，而《追凶者也》的商业气息要足一些，他要在表演上做出调整。张译以往的角色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他也是个体验派演员，对于离自己较远的角色，表演起来会不自信。“我从没想过要演一个杀手。”张译说。这个角色在他的经验之外，电影刚开拍时，他总会看着回放镜头质疑自己的表演，他说：“我问曹导，你觉得我像个杀手吗？为什么像个山村教师？”

曹保平仔细看看，也觉得张译演得不像杀手，但他觉得这并不妨碍他的表演。“曹导说，要么我们就演一个不像杀手的杀手。”张译接受了曹保平的建议，在最后一下亮刀杀人之前，他都卸下了自己的“杀手”包袱，让自己更接近一个底层小混混。“操一口夸张的东北话，平时喜欢说最俗气的小沈阳春晚上用过的



导演曹保平工作照

梗。我让这个人更普通一些，普通到流俗。这样，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那一刻，才可怕，才有寒气。”

从处女作《绝对情感》起，曹保平就显示出了不同于其他第六代导演的电影追求。他不甘于从地下电影做起，对纯粹的个人表达和纯粹的商业片都没有兴趣。“我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临界点，要做以个人表达为基础的有商业气息的电影。”过去这些年，曹保平一直在他所定义的个人表达和商业性之间摸索，包括《光荣的愤怒》和《李米的猜想》在内的电影都曾叫好不叫座。但从《烈日灼心》开始，他似乎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

这部《追凶者也》成本不高，拍摄难度也远不如《烈日灼心》，它更像是曹保平对以往成功经验的一次验证，也是他对黑色幽默的第二次探索。☑



荷兰建筑师设计事务所 MVRDV 在香港改造的玻璃办公室

透明未来

文 / 方振宁

透明建筑和透明空间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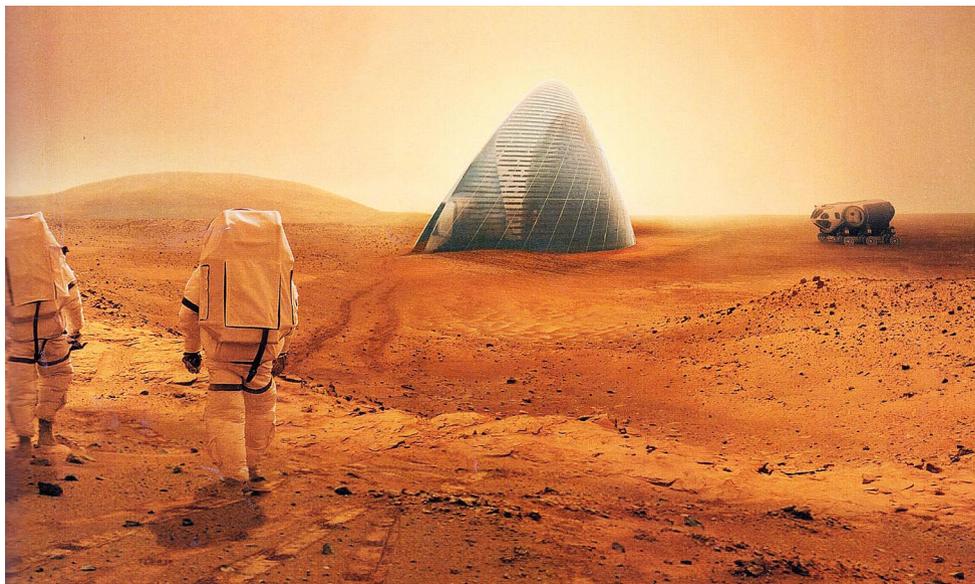
所谓“无限厨房”，实际上是“透明厨房”，是用全透明材料制作的厨房设施。我们看到透明的台面、厨架、壁橱、龙头和餐具，通过视频看见食物的制作和储存流程。几个月前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平行展

单元中，MVRDV（荷兰的一家建筑师设计事务所）的这个项目在威尼斯大学展出时，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个艺术装置，通过对一个现代模块化厨房的改造，试图让人们进行全新的体验。

厨房这一空间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有多少食物被储存起来了？有多少被浪费掉了？厨房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干净吗？不管怎么说，它给人们一个具有未来感的视觉冲击。



(Ossip van Duivenbode 供图)



(Ossip van Duivenbode 供图)

“火星冰屋”宇宙建筑的方案图



荷兰 Schijndel 的集市广场曾在“二战”中遭受重创，之后进行了多次扩建和重修。2000年后，MVRDV 的“玻璃农庄”方案被采纳，这座外观完全由玻璃构成的建筑包含了一系列公共设施，并与 Schijndel 传统农场的风貌十分相近。艺术家 Frank van der Salm 与 MVRDV 合作，拍摄了一系列历史建筑物，并由此创造了一个“传统农场”的拼图，这些照片在加热处理后，被印在总面积 1800 平方米的玻璃表面上，效果与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类似。随着光照和视角的变化，玻璃的透明度也会产生变化。夜幕降临，整个结构被内部的照明点亮，成为一座传统农舍的纪念碑

其实在这之前，MVRDV 已经有过建造透明建筑的尝试，这个厨房是迈向更大的梦想的一小步。MVRDV 的温尼·马斯 (Winy Mass) 说：“有朝一日，也许它会存在于一个更大的透明环境中，这个大环境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城市。”“想象一下，如果厨房里其他的东西都是透亮透明的，就意味着食物是唯一彩色易见的物体。如果不仅厨房是透明的，我们家中的墙甚至邻居的墙也是透明的，那么城市生活将会被无限地丰富起来。

我们可以从幽闭的城市，一路看到山川，看到海洋。”

这几年 MVRDV 已经实现了一系列透明项目，比如一个梦想“水晶屋”已经在阿姆斯特丹落成。这个设计是将其中一个传统墙面替换成玻璃墙面。这个为一家高端品牌店打造的全透明立面，处于阿姆斯特丹的高档商业街 PC Hoofstraat 上。它利用玻璃砖、窗框、额枋等元素作为手段，试图在激发地方特色的同时，保留地段传统性格，立刻成为建筑和设计界的话题。



(Martin Rijstra 供图)

透明厨房，是用全透明材料制作的厨房设施

在视觉上，它确实很冲击，在理念上也很前卫，让意大利一直延续至今的高超的玻璃砖工艺，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大放光彩。每块玻璃砖都一块一块烧成，据说成本高达每块 100 欧，可见他们把烧制每块砖都当作玻璃工艺品来做。砖的立面向上排开的时候，最迷人的是直到和上部的传统陶土砖公寓立面融为一体，这种渐变一样的自然过渡，让人赞叹不已。目前老式公寓的存在，是作为城市传统审美和记忆而存在，而这排沿街公寓有着样式上统一的屋顶，保持原有的立面形式是改造的前提，现在它好似漂浮在店面之上。

要想完美实现建筑师的想法，必须有具有高技术和合作者才行，MVRDV 与多家机构进行了合作以提升技术可行性。比如使用一种德国生产的高强度 UV 结合透明 Delo 工业黏合剂，代替传统灰浆作为砖体黏合剂。显然，要想追求全透明的效果，传统的黏合剂是无法胜任的，这也说明，新的设计思维也会产生新的建材产业，这就是革新的重要性所在。对一家建筑事务所来说，实现构想的时间超过了构想的时间，工地更像一个实验室。由于玻璃材料本身脆弱敏感的特性，施工现场全程都需要配备一组专业的技术团队以确保高精度的工艺水平。因为对这样一个史无前例

的工程来说，一系列新技术和工具都需要被引入：从高科技激光到实验室级别的紫外线灯，再到相对低科技的荷兰全脂牛奶的使用。牛奶的低透明度使其成为一种理想的液体反射表面，用于第一层砖的砌筑找平。所用的玻璃砌筑墙体虽然表面看起来脆弱，但实际上经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小组的力学测试证明，在很多方面比混凝土更为坚固。这让我想起我们中国传统建筑维修时，是不是也有一些让我们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低科技是那样的实用，而荷兰现代建筑的施工中，竟然有使用到荷兰全脂牛奶的地方。

最近 MVRDV 在香港地区又完成了一个对旧厂房的改造，让它脱胎换骨，摇身变成一个玻璃办公楼。脱胎的过程是，旧楼被剥离到只剩下拥有原始美的基本结构，不必要的装饰全被拆除。填充材料仅仅选择了白色涂料、玻璃和不锈钢，以保持并强调基本结构的纯净感。在新和旧被清晰分离的同时，也将建筑内部向公众展示出来。这个 1.8 万平方米的建筑使用不锈钢填充的玻璃作为唯一建筑材料，它坐落在后工业区九龙东内的观塘海滨，初衷是创造一个全透明的办公楼，给我们展示了全新的透明美学。但是如何将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建筑体转变成一个办公场所呢？答案如

下，玻璃的桌子、架子、地面、音响、电脑、墙壁——一切都用玻璃做成，不留视觉死角。

温尼·马斯说：“我们正在迈向一个透明化的社会，企业对公众更公开，公众也更关心门后发生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来，透明的工作环境不隐藏任何问题，可以增加信任。同时，这个玻璃建筑也时时提醒着人们这个区域的工业历史。”尽管大量使用了玻璃元素，该建筑公布的年能源消耗量仍比香港办公室平均值低 17%，高峰电能消耗量比平均值低 15%。

而 2015 年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内，有一块长方形的由阳光板材料做外壁的发光建筑，它是由库哈斯和 OMA 设计的格拉吉当代艺术博物馆。这个由阳光板材作为外立面的建筑改造项目是由“车库当代艺术中心”改名而来，库哈斯的设计完全没有触碰 20 年前本来是一个长方体的建筑框架，只是在这条长方体上谨慎地设计了一个可移动嵌板，它成为面积很大的外立面板，有着建筑标记的作用，往上推开后，从公园能清楚看见建筑物内部，而置于双层通高大堂里的艺术作品也变得非常显眼，使博物馆从内到外、从外到内的视野均毫无阻隔，并重新建立展馆内部和公园之间的视觉联系。

要看这个有着半透明效果的长方体最美的时间段应该是黄昏，也就是里面点灯，而外边的暮色降临时，蓝色的天空衬托着一个长长的发光体。库哈斯尊重 1968 年的原始结构，做了谨慎的包装，使这座已经沦为废墟的建筑变身为一座全新的当代艺术博物馆，这个设计远离现代建筑标准的“白盒子”，相反它是一个被赋予特色和历史的“场所”，建筑师使用了新的技术和先进的立面构造。

在我们关注透明设计时，注意到“火星冰屋”的宇宙建筑的项目，它是 2015 年由空间建筑探索 (SEArch)、云架构工作室 (Clouds A0)、建筑与空间研究团体联合设计的火星 3D 打印冰建筑。这个设计是为了实现 2030 年以后有人探测火星，在 4 名宇航员到达火星之前，就可以自动建设的住宅方案。

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居住在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上的可能性。最新研究发现，太阳系中存在着水和水冰，如月球和火星，这为发现生命形式的存在提供了很大的可能。由于水是未来在地球之外的天体上建立前哨最基本的资源，因此，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向采取“先找到水”的方法进行探索。正因如此，投标团队首先在这个居住设计中选择了水作为冰屋的主要材料。基于火星上某些特定区域存积着大量的水的预测，这一

方案充分利用了水作为固有原料这一特性——既维持人的生命和生态系统，同时又是用于 3D 打印的建造材料。

冰屋犹如火星表面的一座灯塔，宣告着人类生活环境的存在。这个设计的理念建立在为室内带来阳光的同时，与室外的景色创造视觉联系。科学家曾经试图寻找阳光的人工替代品，但人造替代物始终无法像真正的太阳那样经历真实的、未经调和的日循环，实现昼夜变化与平衡人类心理—身体健康的能力。目前，火星的建筑项目都被设计为埋在黑暗的火星表面之下，而火星表面却被认为含有高氯酸盐、石膏及其他危害人类生命的物质。然而，水冰被认为可以屏蔽辐射，抵御太阳暴晒。

这种半透明的外壳重新定义了室内外关系，挑战了我们惯常的假设：外星人的栖息地需要坚不可摧的阻挡视觉的屏障，而这种屏障却把室内空间与周围环境完全分开。冰屋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居住区，是严格的室内空间，这样能够得到更多保护。在核心居住区与作为辐射屏障的冰屋边界之间是一个综合性的植物生态和狭长形的火星景观，将室外与空间环境结合起来。冰屋上镶有薄膜窗户，在冰壳变薄的地方，大型乙烯薄膜窗户填充了一种防辐射的气体，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大对周围景观的感知。

关于冰屋的建造材料，被迪尼玛超强的纤维材料加固的完全封闭的透明乙烯薄膜是从着陆器上部署，并且形成了着陆器和火星表面之间的压力边界。这个在地球上精密制造的薄膜，对即将打印好的冰壳形成一种保护，它可以防止任何打印出的冰升华到大气中去。在这一纬度地区，一年四季都保持在冰点以下，保证水将保持固体形态。冰吸收对居民有害的短波辐射，但允许可见光穿透，光甚至在室内空间内反射。这个提案是对人类首次到达火星的纪念，也是作为居住追求物理和精神的居住性的结果。

被誉为“纪录片之父”的美国职业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 (Robert Flaherty, 1884 ~ 1951)，1922 年拍摄了一部关于阿拉斯加州原住民爱斯基摩人生活的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就是纳努克一家在盖雪屋时，为了采光，在雪屋上方朝阳的方向开了一个方孔当窗户，智慧的是，纳努克在冰河上切了一块方冰镶在雪屋的方孔上，并在窗外立了一块方形雪块向室内反射光线。这反映了采光是人类生活的本能需要，而透明未来只不过是这种需要的延长线。☑



世界首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法国女子伊莎贝尔·迪诺尔（摄于2009年）

谁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

文 / 鲁伊

伊莎贝尔看似非典型的命运，恰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相连。肉身无常易朽，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病人？谁又能够保证，自己一定会成为一个“合适的”病人？

开着厨房里的电视，一边准备晚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新闻，一个熟悉的名字被念出来，“伊莎贝尔·迪诺尔（Isabelle Dinoire），世界首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法国女子，已经离世……”

忍不住“呀”了一声，本来坐在窗边涂鸦的儿子转瞬便弹簧一样跳了过来，望向电视画面，发出惊叫：“太丑了！好可怕！这是谁？”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顿时想起，2005年底，写完当时轰动全球的这个真实版的“变脸”故事，排版时，被特意叮嘱，千万别上大照片，因为实在“有碍观瞻”。

年纪和学养未必会让我们变得更宽容，只不过是越来越擅长掩饰心中的真实看法罢了。

即便是上了厚厚的妆容；即便是所有公开照片的灯光角度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安排；即便在全世界迄今为止完成的31例面部移植中，如果单从术后外观评价，作为首例的伊莎贝尔仍是不可超越的一个里程碑——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一个一眼可见的冷酷事实：她的那张脸——或者更准确地说，以她原本残破的脸

为基础而修补构建起来的那张体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整形外科技术成就的脸——在最巅峰状态时，也明显的僵硬和不自然，随后更是加速衰老变形。好莱坞大片和偶像剧里历劫重生后依然保持俊美容颜的变脸主角，从来与现实世界里的人物相距甚远。

2007年10月，备受关注与争议的手术完成两年半后，英国《每日邮报》的记者到伊莎贝尔的家中探访，发现屋子里几乎一面镜子都没有。她不能接受镜中的对影。除了惊恐，还因为那不是她所熟悉的自己的脸。那上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鼻子、嘴巴和下巴——属于另外一个女子。

2005年11月，38岁的单亲妈妈伊莎贝尔在亚眠医院的V1病房中，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可供移植的面部组织。这之前，她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但却在昏迷中被自己的宠物狗咬掉了大半边脸。与此同时，46岁的单身女子玛莉莲·圣·奥伯特（Maryline St Aubert）在父母相继离世后经历了一段艰难而不为人所知的心路历程，终于还是选择用一根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只成功了一半：大脑死亡，心脏却仍在跳动。玛莉莲的亲属同意将她的脸和其他器官一道捐献出来用于移植。15个小时的手术后，伊莎贝尔和玛莉莲的身体和命运从此以奇异的方式交叉在一起。

感谢现代外科手术技术和抗排斥药物的进步，器官移植早已成为一种常规的治疗手段。但作为每个人的自我认知重要一部分的脸面，和藏在身体内部的心、肝、肾，毕竟还是有着极大的差别，而且，毁容虽然会显著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但却并不危及生命。这正是面部移植手术虽然在技术上早已可行，但2005年之前一直被各国的医学伦理学专家和医疗监管部门百般阻拦的原因。然而，出于种种错综复杂罗生门般的原因，2005年11月27日，以伯纳德·德沃谢勒（Bernard Devauchelle）和让-米歇尔·迪贝尔纳（Jean-Michel Dubernard）为首的团队，终于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无论是在术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是在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回顾文章中，伊莎贝尔“终于有勇气出门见人”都被作为一个证明面部移植合理性的关键论据而反复提出。然而，《每日邮报》的报道中透露的种种细节却令人无法轻易接受如此乐观的结论。伊莎贝尔回忆道，有一天，她随口说“我的鼻子很痒”，但看了一眼旁边的女儿，马上改口，“我有一个很痒的鼻子”。她每天需要服用10粒药丸——移植手术后不久，伊莎贝尔的身体就开始对来自玛莉莲的器官和组织产生排斥，医生不得不加大抗排斥药物的剂量，并

进行了另一次修补手术。这些药物导致过一次急性肾衰竭，还让伊莎贝尔患上了高血压。每隔几个小时，她要掀开上衣，看看肚皮上来自玛莉莲的另一块皮肤，那可以告诉她是否出现了排斥反应的迹象。虽然把家中所有的镜子和以前的照片都清扫一空，但她却会反复观看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05年面部移植手术前后对她跟踪采访拍摄的纪录片。

出于好奇，我找来了这部当年因为伊莎贝尔和主刀医生手术前收取了高额拍摄采访费而引发巨大伦理学争议的片子。看完之后才发现，近50分钟里，伊莎贝尔居然绝大多数时间是以受伤后、移植前的形象出现的：一个束着马尾、身材纤瘦的法国女人，虽然一直戴着巨大的口罩遮挡下半边脸的恐怖伤口，但露出的额头饱满光滑，眼睛清澈明亮，与随后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头版照片里的那张疲惫肿胀的脸判若两人。

就算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若不堪自己的打量，那又如何？

在新闻数据库Factiva里搜索伊莎贝尔·迪诺尔的名字，此次死讯传出之前，她的最近一次大规模媒体曝光，是在2008年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完成美国的首例面部移植手术之后。在这些报道中，她被描述为一个困惑的无法适应当下自我的形象，而2005年的那场手术，也更多地被当成反面典型来反省和解析。

众多与之相关的文字里，2010年9月发表于《公共关系评论》（*Public Relation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是一个相当奇异的文本。在接受论文作者玛乔丽·库凡德（Marjorie Kravand）采访时，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企业传播部负责人艾琳·希尔（Eileen Sheil）以一种几乎令人感到不快的直率指出，法国团队最大的失误便在于，伊莎贝尔不是一个“合适的病人”（the right patient）：因自杀失败而意外导致的面容受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移植前和移植后一直烟不离手，喜欢媒体曝光却又不会以专业的手段包装自己，被利益诱惑出卖隐私却又无力承受心理上的压力，引发的媒体关注被错误地导向了伊莎贝尔本人而不是手术团队和医院的高明医术。

作为对照，艾琳·希尔列举了美国首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者康妮·卡尔普（Connie Culp）的种种“合适”之处：康妮脸上的伤口来自丈夫的枪击，作为家庭暴力无辜受害者的她更值得同情；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在移植前与康妮签订了严格的保密协议，所有的媒体曝光都经过艾琳的控制和预先操练；对于手术后并不尽



2010年康妮·柯尔普和女儿、外孙在家中。康妮在2004年被丈夫一枪击中面部，2008年接受了全脸移植手术

如人意外观，康妮在接受美国 ABC 新闻频道采访时用一个动人的故事便轻易化解——当听到一个小女孩把她叫作“怪物”时，康妮掏出自己的驾照对女孩说：“这才是我以前的样子。这也是为什么你永远都不要摆弄枪的原因。”最关键的，还是2009年9月康妮在奥普拉秀上的“精彩”出场——她成功地让有美国脱口秀女王之称的奥普拉说出了一句关键台词：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是“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艾琳在这篇论文中承认，经过公关专家精心设计的美国首次面部移植，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曝光度。《纽约时报》在伊莎贝尔接受面部移植手术消息曝光后的一周内做了6个相关报道，其中包括两个头版故事。而康妮的故事，在所有的美国媒体上“热度仅持续了两天”，且基本上与头版无缘。

当然，如果按照“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标准，艾琳或许可以不用那么遗憾。在过去的7年里，伊莎贝尔几乎销声匿迹，康妮却依然不时在各种电视节目中露上一面。虽然同样经历过排斥反应，但在展露出来的画面中，康妮似乎已经成功地回归“正常”

生活——在一次采访中，她甚至表示已经原谅了当初伤害自己的丈夫，准备重新与他一起生活。

与此同时，根据法国报纸披露的零碎信息，我们只能大致窥探出伊莎贝尔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状态：她患上了两种癌症；去年冬天，排斥反应让她的嘴唇失去了功能；今年初，她为治疗癌症接受了又一次手术；由此导致的并发症在4月22日最终夺去了她的性命；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她的家人——很可能是两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选择不向外公布死讯，不刊登讣告。最终将消息公之于众的亚眠医院在新闻稿中着重强调，虽然伊莎贝尔罹患的癌症有可能与她长期大剂量服用免疫抑制剂有关，但也不能忽略她本人长期为抑郁症所困和身为重度吸烟者的事实。

无论如何，把这些信息置于法国女性以85.4岁的平均预期寿命高居欧洲榜首的背景之下，难免令人产生疑问：种种伤痛烦扰，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伊莎贝尔并不是第一个死亡的面部移植者。2008年7月，全世界第二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中国患者李国兴在地处偏僻的云南老家去世，死亡原因据

说是听信了江湖郎中的话，放弃服用抗排斥药物而改用中草药。此时距离他2006年4月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接受面部移植手术仅有27个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08年8月23日发表于《柳叶刀》杂志上的术后两年随访研究的论文结尾，32岁的李国兴被描述为“目前总体状况良好”（at present, the general result is good）。

在此之后，法国、西班牙和土耳其的三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者也相继死亡。根据已发表的论文披露，第四个死亡的面部移植者——54岁的土耳其男性——几乎重现了当初反对者最恐怖的预言：因为严重的排斥反应，医生不得不切除掉移植给他的面部器官和皮肤，留下比此前更惨烈的伤口，但依然没能阻挡病人在手术一年后因器官衰竭而死亡。

然而，直到伊莎贝尔的死讯传开之前，所有这些信息都埋藏在浩如烟海、不为大众所知的专业数据库中。事实上，就在这一次报道伊莎贝尔之死的通讯中，使用的表达方式依然是欢呼医学胜利式的“术后幸存长达11年”。

当然，在一个可能的平行世界中，伊莎贝尔或许在11年前就已经自杀成功而死，而外伤毁容者的平均寿命也的确显著低于普通人群。在《脸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Face*）一书中，美国获奖诗人、9岁时因癌症而面部严重受损的露西·葛雷利（Lucy Grealy）写道，毁容的痛苦不仅来自外貌，更来自毁容者针对其他人对自己的反应而做出的反应。她说，光是修理好下巴无法修理好多年累积的创伤记忆，更无法让此后的岁月免于同医疗体系打交道时持续不断被强化的身心伤害。在39岁的时候，露西因吸毒过量而死亡。

我最早在美国精神科医生、生物伦理学研究者迪雅·鲍威尔（Tia Powell）2006年的一篇关于面部移植手术的评论文章中看到露西的故事。十年回首，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被着重强调的一点今时今日却显得格外惊心动魄。迪雅指出，鉴于大部分脑死亡的器官捐献者都有严重的颅面损伤，再加上面部移植需要供体和受体的性别、血型 and 皮肤颜色都严格吻合，实际上可供移植的脸是相当稀少的。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有机会接受面部移植的患者，事实上都经过千挑万选的过程。

而在一个月前刚发表的《推卸责任：患者死亡与面部移植》（*Unmaking Responsibility: Patient Death and Face Transplantation*）一文中，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者塞缪尔·泰勒·亚历山大（Samuel

Taylor Alexander）更是尖锐的指出，伊莎贝尔和其他4名接受面部移植后死亡的患者，当初之所以被选中，也并不像许多分析者认为的那样为了追风而极尽匆忙草率。2005年时的伊莎贝尔足够年轻，足够健康，被认为最有可能经得住移植手术所带来的身心折磨。此外，形象不错，手头缺钱，也是她的加分因素。

直到实际结果不如预料之后，各国面部移植团队才开始反省，或许应该采取更细致、与此前不同的筛选标准。但这并不改变病人依然在被“物化”的本质。其结果，便是在将风险未能尽知、专业界依然争议重重的全新医学手段加诸病人之身以前，主刀的医学团队常常会拿接受治疗者强烈的主观愿望作为积极干预的依据，但在出了岔子之后，也会以病人主观和客观上的各种原因作为移植手术开脱。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伊莎贝尔看似非典型的命运，恰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相连。肉身无常易朽，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病人？谁又能够保证，自己一定会成为一个“合适的”病人？

2003年，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简称RCS）发布了一份有关面部移植技术和伦理挑战的工作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观点：那些最易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强烈要求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患者，往往正是最不能忍受破坏力极大的手术过程和术后长期治疗的人。拥有良好适应技能和支持网络的患者会学会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从外貌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取自尊。与之相反，那些看重外貌的人一方面会积极地要求在身上进行昂贵而危险的手术，一方面却也很容易因为结果不如预期而出现各种自毁式的不遵从现象。这就引出了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结论：越是在某种意义上的“合适病人”甚至是“完美病人”，为其自身利益计，越是不应该成为治疗的对象。

可是，谁又应该拥有判断“该”与“不该”的终极话语权呢？

病人？家人？医生？医院？政府？法院？世界各地，答案仍在风中飘。

或许，我们只是该再耐心一点，再有信心一点。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情人》那段著名的开头里，一个男人走向女主角，说：“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仔细看上去，你会发现，这个形象，原来只存在于女作家一个人无声无息的想象世界中。但倘若没有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与相信，我们又从哪里汲取勇气，去忍受眼前这个世界昼夜不休的摧残？

一场有关上帝的赌局

文 / 苗千

科学史往往被认为充满了乏味的论文、人名和数字，除了专业人士之外很少有人关注，但一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段落却被广泛地传播、演绎，乃至最终被改编得有如武侠小说般充满刀光剑影。将近90年前举办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上最著名的论战来自爱因斯坦与尼尔斯·玻尔。反对量子力学的爱因斯坦留下一句名言：“上帝不会掷骰子。”而玻尔则针锋相对：“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该怎么做。”两位大师见招拆招，刀光剑影，确实有着武侠小说般的节奏感。

当年的物理学大师们可能不会想到，在几十年之后，陷在困境之中的物理学家们仍然在苦苦猜测着上帝这个造物主的做法。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可以通过数学的美感了解到宇宙最深的奥秘，另一些物理学家则持相反的意见。这些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人们最终决定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开设一个赌局。

丹麦时间2016年8月22日13点30分，一群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聚集在玻尔的故乡哥本哈根，了结一场在2000年定下的赌局。在21世纪刚开始时，欧洲核子中心开始建造大型重子对撞机(LHC)，这为理论物理学家们带来了希望，人们希望这个开始建造的庞然大物能够发现各种理论假说预测存在的粒子。除了标准模型中至关重要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外，人们最关注的就是能否发现“超对称”(SUSY)理论预测的“超粒子”。有20位物理学家认为，大型重子对撞机在10年之内至少能够发现一种超粒子，而另有24位物理学家则认为不会发现。因为大型重子对撞机建造过程的延迟和故障，赌局在2011年又被延迟了5年，然而直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超粒子现身，这场持续了16年的赌局终于有了结果。

在哥本哈根，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理论物理学家尼马·阿尔卡尼-哈米德(Nima Arkani-Hamed)充当仲裁人(他相信超对称理论，也参与了这场赌局)，20位输掉赌局的物理学家为赢家们奉上价格不菲的白兰地。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并没有参加这场对赌，但是他也作为观众出现在了哥本哈根。之后，霍金发表了一个声明，认为超对称理论很可能存在错误，他说：“如果超对称理论成立的话，那么超粒子应该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另一方，输掉白兰

地的物理学家们并不服。阿尔卡尼-哈米德就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个理论。

这场物理学家们的聚会，揭示了物理学目前存在的一个重大危机，或者也可以说，当年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的辩论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至今。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要问：上帝到底是不是在掷骰子？上帝到底有多少骰子？

人类探索自然的根本动机并非从来都一成不变。牛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探索物理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的构想。因此在他的力学体系中，也是以一个上帝创造的完美的静态宇宙作为背景。时至20世纪，作为无神论者的爱因斯坦并不相信有一位人格化的造物主，他相信隐藏在纷繁表象之下的自然规律是美与和谐的，也可以说，这个宇宙是“自然”(natural)的。对于“美”和“自然性”(naturalness)的追求，就是爱因斯坦时代的科学家们探索物理学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手段——物理学家们相信，宇宙中的规律应该是相互统一、自洽的，而一些宇宙常数的数值理应从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中浮现出来。

对于美和自然性的追求，作为探索物理学最根本的动机和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在21世纪正在受到挑战，而超对称理论的失败，也可能正在加重这种危机。物理学家们开始怀疑，宇宙中的规律真的是“美”的吗？这些宇宙常数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这些看似随意分配的宇宙常数恰好可以允许生命的存在？我们所生活的宇宙，各种数值究竟是被精细地调整过，还是我们恰好生活在无数宇宙之中(允许生命存在)的一个？

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给物理学家们带来了迷惑，这个基本粒子的质量与物理学家们此前的预测有极大的差异。物理学家们希望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是“自然”的，但实际上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与科学家们此前的理论计算完全不符——这个质量从何而来，难道真的只是上帝随意掷出的“骰子”？粒子物理学家们曾经希望大型重子对撞机可以相继发现一群超对称理论预测的超粒子，以此来解释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问题，但现在看来希望并不大。

与之相似的，宇宙物理学家们也无法理解“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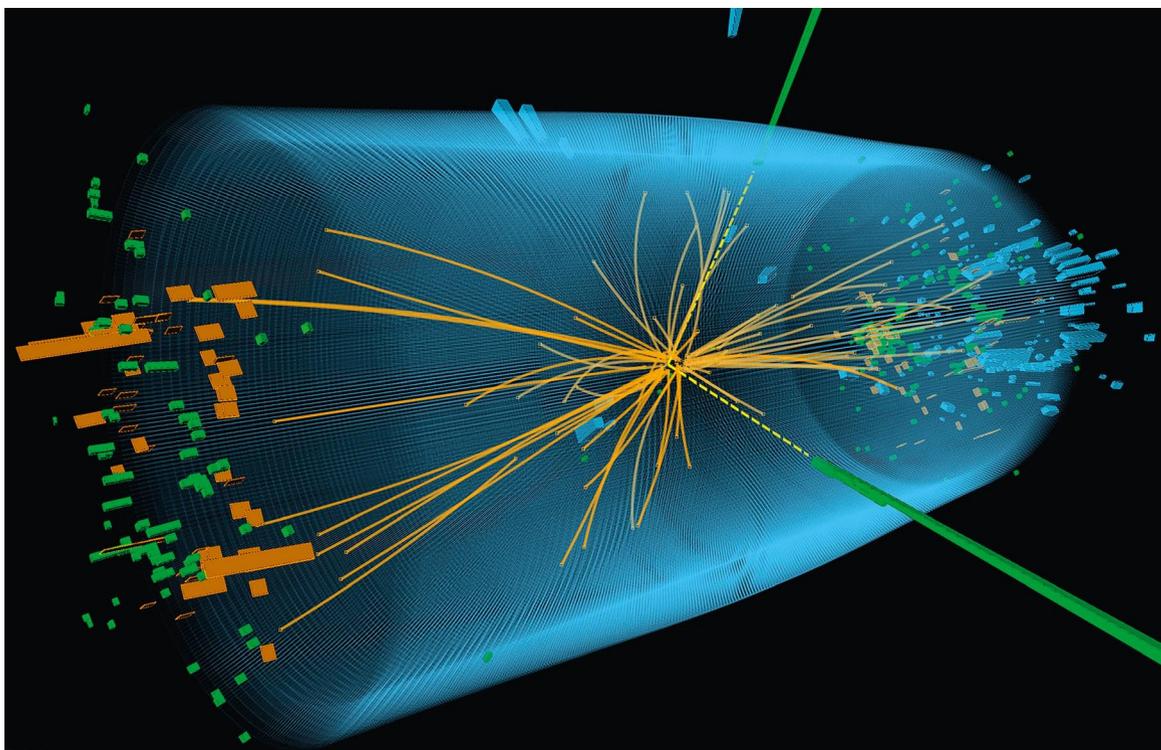
常数” (cosmic constant) 如此微妙的数值。宇宙常数描述的是令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人类对它测量的数值与理论计算的数值相差不止千百倍，可正是这样的宇宙常数保证了一个可以允许生命出现的宇宙存在——数值过低会导致宇宙坍塌，过高又会使一切物质快速地飞散，无法形成星系。

21 世纪的物理学家们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新发现（或是没有发现），无法感受到宇宙规律的和谐和自洽，一个问题开始浮现出来：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究竟是被精心设计过，还是只是近乎无穷多的宇宙中的一个？在这样的氛围中，多重宇宙 (multiverse) 假说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所接受。这种假说认为，存在着近乎无限多的宇宙形态，不同的宇宙中有着不同的各种常数，而在其中极少见的情况下，才会形成稳定的、允许生命存在的环境，因此生命存在于这样的宇宙中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人类只能存在于这

样的环境中。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相信多重宇宙假说，也就说明人类对于一些宇宙规律和宇宙常数的探索毫无意义（因为只能是这样），而且因为多重宇宙假说可能无从验证，这难免会演化为 21 世纪的另一种宗教。

物理学家们是否像当年抛弃神创论一样，急于抛弃对于自然规律的“美与和谐”的信念，而为探索自然加上某种底线？对于一些理论物理学家来说，这种选择或许是唯一符合逻辑的做法。回顾过去几十年，物理学家们急于统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得出一种可以描述一切的大统一理论，却又屡次失败，如今物理学的危机，或许只是一次对于人类信心的考验——或许人类还远没有理解这个宇宙，又过于急躁。对于人类来说，宇宙的美与自然性的回归，或许就会源于某一次的意外发现。☑

（本文写作参考了《Quanta Magazine》的报道）



2014 年 7 月 4 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瑞士日内瓦发布粒子物理探测器——紧凑型缪子螺线管探测器探测到的质子碰撞轨迹图

实践是检验疗效的唯一标准

文 / 袁越

在讨论疗效标准之前，先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

案例一：骨关节炎的主因是关节之间的软骨磨损严重，导致关节相互摩擦，诱发炎症。已知葡萄糖胺(Glucosamine)是合成软骨和关节润滑液的重要前体，硫酸软骨素(Chondroitin Sulfate)是软骨的重要组分，因此中老年人适当补充这两种物质将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骨关节炎的症状。

案例二：中老年妇女对钙的吸收效率不高，极易因为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等疾病。已知钙片中含有游离的钙离子，比牛奶等食品中含有的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中老年女性应该定期服用钙片，预防骨质疏松。

案例三：发达国家对花生过敏的人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却不常见。已知新生儿的消化道尚未发育健全，如果此时接触花生制品的话，花生蛋白将有机会穿透消化道壁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诱发免疫系统合成出专门针对花生蛋白的抗体，最终导致对花生过敏。因此应该避免新生儿接触花生制品，母亲在怀孕和哺乳期间也应该尽量避免食用含有花生成分的食品。

上述三个案例从道理上看似乎都很合理，因此葡萄糖胺和硫酸软骨素一直是中老年运动爱好者的首选关节保健药，钙片则几乎成为中老年妇女每天必服的保健品，新生儿3岁前不应该接触花生制品则在2000年被美国儿科协会写进了育儿指南。

不幸的是，上述这三个案例最终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或者可疑的。葡萄糖胺和硫酸软骨素对于关节的保护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成年人的软骨组织不具备再生

能力，一旦磨损就无法复原了；钙片中的游离钙会让血液中的钙离子浓度在短时间内出现一个峰值，正常食品中含有的钙吸收缓慢，通常不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而钙离子的峰值会增加血栓形成的概率，使得中老年妇女患心脏病和老年痴呆症的概率大幅增加，得不偿失；最新的研究表明，上文提到的过敏机理是不正确的，新生儿接触花生制品反而能降低对花生过敏的概率，因此美国儿科学会修改了原来的育儿指南，建议新生儿早期应该多接触花生制品，以此来降低花生过敏的概率。

上述这三个案例绝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曾经统计了3000个全世界常用的药品、保健品和医疗措施，发现至少有一半后来被证明无效，只有三分之一被后续的严格试验证明确实有效。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往往太过相信理论而忽视实践。人体是一架复杂而又精密的机器，很多看似有道理的修补措施往往会因为一些事先没有想到的原因而变得无效甚至有害，这就要求我们不要轻信任何理论，多做临床试验，在实践中检验疗效是否属实。

这方面的一个重灾区就是保健品。保健品不需要通过临床试验的检验就可以被允许上市，生产保健品的厂家为了推销其产品，往往会请来明星或者专家现身说法，用一些看似无懈可击的道理来说服消费者掏腰包，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维生素和营养补充剂这一类，它们大都是食物中本来就含有的物质，不少人认为服用这些补充剂应该有效，至少也能起到预防的作用，最起码肯定不会有有害。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站不住脚的，市面上销售的绝大部分营养补充剂要么完全无效，要么反而有害，前文所说的钙片，以及各种号称能抗氧化的维生素类营养补充剂就是明证。

正规处方药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才能被允许上市，出问题的概率要低得多，但现在不少厂家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临床试验时降低标准，有时甚至不惜造假，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建立并完善药品上市后的监管机制，继续监测新药的疗效和副作用。

据说今年正在审议的《中医药法(草案)》的二审稿中增加了“生产符合条件的、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时，可以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这样的条款，这个做法显然违背国际医药界的共识。☑



城市中的行人都在去向何方？

文 / 薛巍

城市中每天行人和汽车川流不息，甚至每晚八九点的时候，连我住的郊区的道路上进城和出城方向都有许多车辆开过。每个人都在奔向何方？汤姆·范德比尔特在《开车经济学》一书中说：“你可能认为在高峰时期，公路上都是驾车上班的人，他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也不能选择在其他时间出行。不过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研究人员详尽地追踪了公路上高峰时期的车牌号码，并将这些号码和其他时期获得的结果相对照，很明显可以发现：只有 50% 的人每天都出现。”

人们的出行看似很随意，但经过深入研究，也能发现固定的模式。研究发现，在早高峰时期，如果人们每周的周三时使用公路，那么他们下周三出现在同一条公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超出在其他日期出现的可能性，这就是英国交通研究院的理查·克莱格所谓的“下周三见”效应。

城市里的人为什么经常出行？在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物理学教授路易·贝当古看来，城市的意义就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他说，城市被比作有机体、蚁群或河流网络，但这些类比都不能反映城市是如何运作的。“城市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全新的复杂系统，它首先是一个社会反应堆，它就像一颗星，把人吸引过来、加速社会互动和社交产出，就像恒星压缩物质，它们越大，燃烧得越明亮、越快。”数据显示，城市越大，行人走得越快。这跟生物系统相反：动物体形变大时，身体会放慢，心跳减速，所以大象比老鼠长寿。

约翰·里德在《城市的故事》中写道：“卡车源源不断地涌入各个城市，数量惊人。这似乎暗示着必需品和服务的流动是城市生活中主要的运输问题，因为有成千上万吨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运来运去，但是人的运输是城市生活中一个更大更有需求的元素。在个体集合而成的总质量和数量上，人的运输量都要大很多，因为货物和服务运转的来来往往是在固定点之间，数量相对有限，而每一个人的行程都是一个独立事件，在其中有许多不同的起点和终点以及路线可以选择。”

规划界权威人士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说，在现代世界，你的朋友不住在你家隔壁，而是住在远方。在传统社会，如果一个人被问到他的最好的朋友是谁，接着去问他这个最好的朋友，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他们都会互相提到对方的名字，这就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圈子。但是今天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了，今天的朋友圈一直在



向外发散。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人们就没有什么密切的小圈子，取而代之的是人际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交通方式的进步，使之不断扩大和更加方便。人们对出行的需求是永不满足的。正如建设新的高速公路，并不能根除拥堵，反而引来更多的交通流量进入公路网，因此每一项新的发展计划都是着眼于增长的交通量，而不仅仅是满足直接的需求。

复杂系统专家说，城市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美国都市规划理论家理查·佛罗里达说：“在这个技术日益进步的世界存在着一个悖论。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技术不仅能做更多事情，而且使用起来越来越容易。孩子都能使用 iPhone 和 iPad。汽车不久就能自动驾驶了。但这些技术背后的系统却非常复杂，甚至会超过人的理解能力的极限。人们经常说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但它们可能也是最复杂的技术系统。”

今年 2 月，英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析了世界上 15 个最大的大都市交通网络，他们估计，人们在计划行车路线时能够承认的信息限度大约是 8 比特（比特是二进制数字中的位、最基本的信息单位），照此推算，交通地图上的连接点不能超过 250 个。

牛津大学非线性和复杂系统教授梅森·波特说：“我们知道人能记住的电话号码的位数（7 位）、移动物体的数量（4 个）都有其认知限度。如今，城市及其交通网络已经增长到了其复杂性超过了人类处理能力的水平，虽然 GPS 和手机应用有帮助，但它们在地下使用受到限制。最终，我们需要绘制不同类型的地图。”

活下去的勇气

文 / 张斌



9月11日，比利时运动员玛丽·费弗尔特获得里约残奥会T52级女子轮椅竞速400米银牌

里约水上中心，一个小时的赛后发布会，在场的记者们静心聆听，分享生死边缘的体悟。对死亡冰冷的恐惧，对命运转折的释然，让泪水和笑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的主角只有一位——轮椅竞速400米T52级别银牌得主，比利时人玛丽·费弗尔特女士。

国外残疾人运动员难得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留下痕迹，37岁的费弗尔特4年前在伦敦残奥会上，一金一银，那一年是她被脊髓炎折磨的第18个年头，那份手续繁琐的安乐死准许文件放置在家中也有4年了。最近的4年，虽不致命但痛不欲生的脊髓炎继续侵蚀着费弗尔特活下去的念头。中国媒体在里约残奥会来临之际，也曾报道过：完赛归国后，费弗尔特就将安然结束生命。已经规划好的葬礼上，亲友们预计将按照死者的遗愿，举起香槟酒杯。

话筒前，费弗尔特大声呼喊：“相信你可以！是的，你可以的！”向死而生，谈何容易，全世界都在预期的一场生命终结的主角如今暂且没有了死的念头，反倒平添了几分勇气，活下去！2002年，安乐死在比利时成为合法，借此机缘，费弗尔特向世界做了安乐死最好的常识普及。在比利时，寻求安乐死需要非常繁琐的手续。首先，医疗机构必须证明患者的身体和精神疾病是具有恶性发展的趋势，需有三名医生签字

认可，而且还要最终通过精神病专家的面对面谈话。

费弗尔特15岁罹患严重且罕见的脊髓炎，病情不断恶化，直至下肢瘫痪。病痛不断蔓延全身，费弗尔特越来越绝望，她细致地将身体感受告诉遇到的每一位医生，希望他们可以找到治疗的办法，后来的讲述逐渐变成了寻求解脱。几经努力与煎熬，拿到随时可以安乐死的批准文件后，费弗尔特反倒觉得生命可控了，不再急于结束自己的生命。

“没有批准文件之前，我一直在想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费弗尔特说，“但后来，我变得从容了些了，有更多时间去亲近佛教，参禅自修。”面对记者们，费弗尔特不再去讲述赛道上的感受和日常的训练，而是大声疾呼安乐死的种种益处。“世界上本该有更多的国家准许安乐死，巴西也该在列。安乐死可以让受着病痛折磨的人们活得更长久。在批准文件上签字之后，并不意味着就要在两周的时间内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我2008年签署文件，而现在是2016年，我不是还拿到银牌了嘛。”

费弗尔特平日做的最多努力，便是以微笑示人，虽然身体的衰竭每天都在悄然发生着，但活下去的勇气从未丧失。“我是不断恶化的疾病。”费弗尔特说，“每年都会更糟一些，甚至每天都要丧失些什么。如果几年前，你看到我，我还会画美丽的图画，但如今完全不可能了。我现在只有20%的视力，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也很恐惧。”

恐惧与绝望时常萦绕在心，费弗尔特总算可以在大部分时间里安之若素了。当冬天来临，她最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到更为温暖的地方去训练，而不是在家乡忍受严冬。可以预见的人生也许很短暂了，但是费弗尔特的梦想列表很长的，来一次空中跳伞，搭乘F16战机，开一家博物馆，参与一次拉力赛，这比很多没有活在死亡阴影中的人梦想还要色彩斑斓些。

里约残奥会是费弗尔特规划中的最后一届大赛了，开幕式上她泪水奔流，对于死亡已经全然没有了恐惧的她，认定安乐死不过是她安然睡去。费弗尔特希望日后人们追忆她时，可以留下两个印象：第一，是一个会笑的女人；第二，当苦难降临时，始终没有忘记期许美好。■

朝鲜核问题有可能“长期化”

文 / 宋晓军

9月9日，朝鲜进行了“核弹头小型化”的第五次核试验。随后，在我回答一些媒体就此问题的询问时，我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朝鲜核问题有可能“长期化”。我的这个思路主要源于三个基本判断：一是这次核试验是朝鲜时隔36年召开劳动党“七大”后的第一次核试验；二是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耐心”政策；三是希拉里和特朗普对朝核问题的表态。

简单说，第一个基本判断是：朝鲜新领导人在今年5月6日召开的劳动党“七大”上，强调了今后要推进“经济建设和核武装建设并举”的战略。而9月9日的核试验对于朝鲜新一届领导人而言不仅是一个军事成果，更是一个政治成果。第二个基本判断是：奥巴马政府执政近8年来，始终没有改变对朝的“战略耐心”政策。按照今年2月15日美国的朝鲜半岛安全专家给国会的一份报告的表述，这个政策的大致内容是推动联合国和盟国加强对朝的制裁，特别是要说服中国加强对朝制裁力度，同时通过军事演习对朝施压。第三个基本判断是：根据CNN记者高埃特(Nicole Gaouette)9月9日在题为《朝鲜核试验成为总统大选的政治武器》一文中的梳理，作为“战略耐心”政策制定者之一的希拉里，在朝鲜这次核试验的前后表态都还是要继续推行“战略耐心”政策，而

特朗普除了在之前有几次前后不一致的对朝政策表态外，这次只是借朝鲜第五次核试验批评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失败，而对未来如何应对朝鲜核问题并未给予回应。

接下来，再对这三个基本判断做一下分析和归纳。第一，朝鲜新一代领导人上任以来共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在正式确定其领导地位的劳动党“七大”召开之前的两次核试验，有继承他父亲“先军政治”遗嘱的含义。而“七大”召开后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和几次的弹道导弹运载火箭的试射(KN-08和KN-11)，则更像是在兑现他在“七大”上提出“经济建设和核武装建设并举”的战略之举。由此可以判断，未来若内部不发生变故，朝鲜会继续推进和完善其导弹+核弹头的“两弹结合”项目。第二，奥巴马政府执政8年里虽然朝鲜进行了四次核试验和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但奥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其“战略耐心”的对朝政策。第三，从希拉里和特朗普近期对朝政策的表态上看，并没有明显超越奥巴马政府“战略耐心”的设想。虽然希拉里在9月9日说了“不能让朝鲜拥有可以打到美国领土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是我们的底线”，但就其提出的所谓“加大制裁范围和力度”的建议而言，很可能仍会像9月9日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中所说的——华盛顿多年来的撒手不管策略即所谓“战略耐心”在遏制朝鲜军事威胁方面收效甚微。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朝鲜核问题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而美国下届政府仍延续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对策，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将更趋复杂。美国下届政府很可能一方面施压中国进一步加大对朝实施制裁，一方面借助朝鲜核问题进一步放宽在东北亚部署和销售反导系统的束缚。根据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8月公布的一份题为《2017财年武器系统概况》的报告显示，从2017~2021财年美国计划在防空和反导武器系统的投入上将占所有武器系统投入的13%。而此前希拉里和特朗普在各自的国防政策阐述中，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美国发展反导武器系统的支持。从这个意义看，美、韩今年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也许只是一个开局。☑



8月25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刊登朝鲜前一天发射潜射导弹的相关照片

乔姆斯基及其批评者

主笔 / 薛巍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已经统治了语言学界近半个世纪。50年来，不断有人对他发起挑战，新一期《科学美国人》说：“普遍语法理论好像已经进入了它最后的死胡同。”



汤姆·沃尔夫和他的著作《语言王国》

语言的递归特性

乔姆斯基的名气有多大？美国记者汤姆·巴特利特说：“你可以订购诺姆·乔姆斯基造型的地精，售价195美元。花15美元，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刻着‘诺姆会怎么做’的马克杯。乔姆斯基举过的例句‘无色

的绿色思想愤怒地睡着’被印在了手机套上。”作为50位最有影响的在世哲学家之一，乔姆斯基不仅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对哲学、认知科学、历史、逻辑学、社会批评、政治运动都产生了影响。

86岁的乔姆斯基已经写了100多本书，击退了无数辩论对手。1989年，鲁道夫·波塔在《挑战乔姆斯基》一书中记录了乔姆斯基遭到的质疑，波塔提醒那些想挑战乔姆斯基的人，要做好被虐的准备，因为以前质疑他的人下场都很悲惨。如果还有谁敢挑战乔姆斯基，那一定是掌握了过硬的证据，但也有可能是“无知者无畏”。汤姆·沃尔夫是美国新新闻主义的干将之一，85岁的他出了一本新书叫《语言王国》，他在书中向达尔文和乔姆斯基开炮，说他们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理论是错的。

10年前，沃尔夫在一次演说中说，在大约1.1万年前，语言拿走了进化所做的塑造人类未来的任务。语言功能带来了宗教、农业等所有使人类成为例外的东西。但如乔姆斯基所说，自进化论宣布150年之后，我们仍未提出令人满意的关于语言的演化的叙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语言是从低于人类的生命形式那里演化而来的。他写道：“关于语言的起源他们一无所知。语言为何让一代又一代学者和天才们彻底地困惑不解？”美国学者亚当·柯什指出，沃尔夫这番话并不公允，他完全不提索绪尔、符号学、威廉·琼斯爵士、原始印欧语、萨丕尔-沃夫假说等现代语言学研究上的里程碑。

沃尔夫对乔姆斯基的批评依据的是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的论著。埃弗雷特曾经跟亚马孙丛林里的皮拉罕人一起生活了20多年，他说，皮拉罕人的语言的一些特征证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言理论是错的。他在2008年出版的《别睡，这里有蛇》一书中提出了他的论证。

沃尔夫的逻辑是：乔姆斯基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显示出一定的特征，其必备成分是递归，即能够无限地嵌入句子。但皮拉罕人的语言没有递归特征。因此递归并不是语言的普遍特征。因此乔姆斯基错了。对此乔姆斯基的回复是，某一种语言缺少递归特性并不重

要，“来做一个类比，如果发现某个部落的人不是直立的，虽然他们做得到，对于人类的两足行走特征来说，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今年埃弗雷特在一篇论文中承认，经过多年的研究，谁也不能肯定地说皮拉罕人从不在句子中嵌入句子。

沃尔夫说，皮拉罕人是“前概念的”，做不了抽象思考。皮拉罕人的语言确实只有现在时态，他们的数字也只有1、2、3，但不等于说他们没有抽象思考的能力。

汤姆·沃尔夫对语言从何而来的回答是：语言是一种记忆工具。我们设计出语言是为了帮助我们记住物体和事实，比如“九月有三十天”。芝加哥大学教授杰瑞·科因觉得沃尔夫这种说法很可笑：语言的功能不只是个人的幻想，而是为了相互交流。语言还有所有人都遵守的规则。

基于用法的语言学

乔姆斯基的理论是一种从事实逆推出来的假设：不同智力水平、不同成长环境下的孩子学习语言的速度差不多，儿童学习语法的过程表明，他们遵守规则而不是机械地模仿他们学到东西。由此推断应该是存在着普遍的语法。普遍语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比较可靠的解释是，它是长期进化而来的。

但乔姆斯基对进化的态度一直很含混。他是一个很传统的科学家，承认进化论很强大，能解释大部分生物学现象，但他抗拒把进化论用于语言。他更喜欢认为语言器官是一个起源很神秘的封闭的系统。史蒂夫·平克认为，乔姆斯基之所以不喜欢进化论，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假定事物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它们有好处，乔姆斯基则认为人类的动力是创造性表达的欲望，而不是为了粗糙的、微不足道的优势。丹尼尔·丹内特认为，乔姆斯基之所以抵抗进化论，是因为他不喜欢进化临时的、机巧的方面，他希望把语言当作一个完美的、统一的系统，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偏好。

牛津大学认知及演化人类学学院院长罗宾·邓巴说，历史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语言的产生是因为

人们需要交换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真实性描述。但是，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为了促进社会性的联系。进化生物学家杰夫瑞·米勒提出，语言的产生始于寻找潜在的伴侣，以及在配对后继续保持伴侣关系。他指出，这就是为何语言尤其是男性的语言经常显得华丽而冗长，因为把语言运用得娴熟自如，能显示机智和聪明，也就是显示了良好的基因（大脑）。

如何判断语言最初的功能主要是什么呢？专家做了两组系列实验，来测试语言的各种功能。根据对讲述过的故事内容记忆的多少，来测试人类大脑究竟最适合接收哪一类信息。两组实验得出的同样结果是，人们都更加记得社会信息，而不是物质世界中的一些事实性信息。

新一期《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有证据能够驳斥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习理论，乔姆斯基语言学革命的大部分内容正在被推翻。”“语言研究对许多学科来说都很重要，无论是诗歌、人工智能还是语言学本身。使人误入歧途的方法会导致可疑的后果。”

文中所说的证据是，儿童语言学习的过程显示，他们不是天生就有一套普遍的、专用的语法学习工具。相反，他们拥有的是像瑞士军刀一样的东西：一套多用途的工具，如范畴划分、沟通意图的解读、类比，孩子们用这套工具形成语法范畴和规则。正确的语言学理论应该是以用法为基础的语言学，这种理论提出，语法结构不是天生的，而是历史和人类心理的产物。

这是经验论对理性主义的胜利，文章的最后说：“在语言学及相关领域，许多研究者已经对完全形式化的研究越来越不满。许多现代的研究者也对坐在扶手上所做的理论分析感到不快，如今有许多语言学数据可供分析来验证理论。范式转换当然还没完成，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已经进入了语言学领域。对世界上不同语言的研究、对比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它们在历史上的变化、儿童如何掌握语言，将会带来令人兴奋的发现。普遍语法理论好像已经进入了它最后的死胡同。代替它的以用法为基础的理论将为经验性研究提供道路。”

杰斐逊和想象的国度

文 / 龙荻



历史学家彼得·奥诺夫（左）、安内特·郭登·里德和他们合著的著作《“最幸运的家长”——杰斐逊和想象的国度》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无论是学院派的专业历史研究，还是历史传记作家们的记叙，关于建国之父的著述发生了一个显然的改变，从流行多年的歌功颂德的造神式描写，改变为对一个个个性饱满甚而不无偏见充满矛盾的人的兴趣和探究。新的研究趋向告诉人们，虽然建国之父们在这片应许之地领导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他们的丰功伟业、传奇政绩为美利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们也并非像神一样完美。他们曾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但也会为了政见和名誉互不往来；他们争吵，他们记仇，甚至与人决斗；他们也制造性丑闻，甚至有人和女奴留下后代。

国父之中，要数互为政敌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人生对比最为鲜明。印在10美元钞票上的汉密尔顿是来自加勒比海岛国的孤儿，靠孤身一己的奋斗成为国父，他是《联邦党人文集》的幕后主笔，推动了金融和工商业改革。而他的死对头杰斐逊，终身依恋继承自父辈的庄园，坚信共和式家庭构成和文化是美国社会的基石，在流传已久的历史里，对美国的想象是一派如他弗吉尼亚庄园一般的田园牧歌景象。汉密尔顿性急，最后死于决斗，而崇尚启蒙主义的杰斐逊从来都认为决斗是野蛮人的行为。他们俩可以同病相怜

的地方似乎只有各自的性丑闻，一个出轨卷入政治性丑闻，一个和奴隶留下后代。

汉密尔顿的一生用艺术形式来表达，普遍叫好的便是近两年一票难求的嘻哈歌舞剧《汉密尔顿》，而杰斐逊的丰富一生，就如一出《唐顿庄园》版的长篇剧集，让人悬心期待那种。随着《汉密尔顿》风靡一时，不期然又催生了历史学家对国父的一系列研究和著述，这本探讨杰斐逊作为父辈和爱国者的著作《“最幸运的家长”——杰斐逊和想象的国度》，更是将这个第二任总统的人生冷暖和矛盾以及家庭在他生命中的关系都一一讨论。著名历史学家安内特·郭登·里德与彼得·奥诺夫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提炼和对杰斐逊书信资料的整理，使得杰斐逊的形象内涵变得更加真实饱满。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九个章节，依照并不严格的时间次序，以家庭之于杰斐逊的意义为中心探讨了他人生中的各个阶段和不同主题，将他描绘成一个始终精力饱满又矛盾重重的人，既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一家之主。

开篇从杰斐逊垂垂老矣的临终前岁月讲起，揭开了杰斐逊追求完美自洽、启蒙友爱却又充满矛盾的人生。杰斐逊从总统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就回到了弗吉

尼亚的庄园蒙蒂塞洛度过余生。他不再旅行，也不再出访，直到去世。在这里不断有客人登门拜访，他常常应接不暇，包括他的法国老朋友拉法耶特。这期间他的孙女艾伦远嫁波士顿，从弗吉尼亚坐马车一路北上。艾伦目睹了工商业经济发展给北方城镇建设带来的变化——商业发达，道路交错，城市规划已初具规模和规范。这对一个从小生长在蛮荒的弗吉尼亚奴隶庄园的年轻女子来说，对比十分强烈。在她熟悉的家乡，除了杰斐逊的庄园建筑之外，四周就是未经打理的茂密树林，道路颠簸。这其实就是杰斐逊理想中的美国和美国真实走向的区别。

当孙女写信跟爷爷描述这些发展与落后的差别的时候，甚至触及问题的根源是奴隶制，但杰斐逊已无力做出有力的评论和反驳。比如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拉法耶特来拜访他，谈到废奴的话题，杰斐逊也欲说还休。尽管他知道奴隶制是一个坏的制度，却从未有过在他有生之年消除这颗毒瘤的意愿。和他相信启蒙主义的同僚们一样，他认为奴隶制度会随着人们的不断“启蒙”而自行消亡。另一方面，他虽然也参与过是否在非洲建立自由奴隶殖民地的讨论，却并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组织。在他看来，尽管道德上他鄙夷奴隶制度，但仍然不认为奴隶具备自制力以及和白人一样的认知能力。杰斐逊在自己的庄园却也会对奴隶严厉管制，鞭刑等等并不会少。他自认对奴隶已经足够仁慈，认为成全他们的意愿将奴隶全家买进和卖出就是一个善良的主人。他死后对于奴隶的安排最能体现杰斐逊对于奴隶制矛盾而有所保留的态度，他去世后的遗产里包括奴隶，他并没有在遗嘱里解放他们。他只给了和他关系亲密，为他生下后代的海明斯一家自由。

在谈到杰斐逊对于家的眷恋的时候，作者认为，杰斐逊在这个庄园长大，最后也死在这个庄园，这个庄园是他的家，是一个他终身不离不弃的精神堡垒和最后归宿。但因此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热爱农业和热衷于耕种的庄园主。为了驳斥流行文学里杰斐逊的这一形象，作者通过征引旁人的回忆和记叙得出结论，杰斐逊爱的并不是农业和耕种，他爱的是建造，是整修和修建庄园，而这也使得他的庄园经营不善，常常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而他的其他热情所在就是读书和思考，以及音乐。杰斐逊的父母都热爱音乐，从小他就受到过系统的声乐训练，家里一直有音乐回响。他身边的人说，他常常独自哼着小曲，他和他早逝的妻子亦曾一起对唱。他的两个女儿都学习了乐器，其

中一位更精于乐器的女儿婚后和他住在一起。

杰斐逊重视家庭，认为共和制度下家庭的和睦与家族世代的沿袭是维持共和国社群稳定的基石。对于家庭的重视，无疑影响了他从政的原则和理念。他既害怕英国的世袭君主制在自由共和的美国出现，也害怕崇尚英国工商和金融制度的汉密尔顿一派政敌将美国带离他心目中的理想轨道。在和汉密尔顿一派进行辩论的时候，他甚至含沙射影攻击汉密尔顿那样没有家庭根基的机会主义者是不可信的领导人。他甚至希望他和他的朋友们可以住在一起或者相邻守望，组成想象的共同家庭社群。虽然他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却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宣扬，在他离开公职之后，他的庄园逐渐成为人们频频造访朝圣的地方，仿佛只有造访过他的庄园，才算是爱国者。而他也竭尽所能安排这些人的住宿，最多时候一天接待50位不期而至的客人。

杰斐逊虽然重视革命兄弟友谊，但他从未对自己和约翰·亚当斯的争论中对亚当斯的攻击道歉，一方面他渴望在大家都卸下公职之时可以重修旧好，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男人在政治上的争论是不会影响私下关系和家庭中的气氛的。然而，亚当斯太太并不这么认为，她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尖刻地指出了杰斐逊的错误，并拒绝原谅他。另一点值得一提的，便是杰斐逊对于家庭的看法同时影响了他的性别观，他认为女性的位置在家庭，不应该被家庭之外世界的混乱所污染。当传记作家为了给他立传而请求采访他的家人时，他觉得这简直是荒谬的要求。不过同时他又和那个时代优秀的女性密切通信，探讨人生和政治，其中还有汉密尔顿妻子的姐姐——著名的安杰利卡。

就像本书最后所言，杰斐逊最大的问题便是，“他无法承认他犯过任何错”。这就是杰斐逊建树颇丰又矛盾重重的人生的症结所在。他带着他对家和共和家族关系的信念从政，期待自己的理想可以在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他无法直接面对那些自己体系无法解释的问题，比如政见之分歧争论，比如他“完美”杰出人生最大的矛盾——奴隶制，但却有一套理论来帮助自己平复矛盾带来的困扰。精明“自治”如他，他从未留下过任何关于自己和身份特殊的女奴海明斯的任何描述，留给后世无数想象和解读他和海明斯关系的空间。通过详尽论述剖析杰斐逊的人生矛盾及其根源，便是这部著作最大的贡献。国父也是人，他建功立业，也有其懦弱、过错和局限性。而他在蒙蒂塞洛死去时是否有遗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世界如此美好，我们连一半都未曾理解

主笔 / 陈赛 供图 / 海燕出版社

童书作家存在的目的，是让童年多一些笑声，少一点恐惧，少一点焦虑，帮助孩子面对生活中那些谜一般的问题，让他们学会保护那些比他们更弱小的人。等他们长大了，可以好好照顾这个世界。

我在簋街的花家怡园餐厅里见到尼尔松先生。他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举手投足却透着孩子气的天真，活脱脱一个老顽童。

他说自己是跟弟弟一起来旅行的，但北京只是中转站，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听说那里天大地大，白云碧草，风景壮阔。

“通常这种旅行都是跟妻子一起，不是吗？”我问。

他若有所思地说：“当你60多岁的时候，也许也会愿意跟你的弟弟一起去一个遥远的国家走走，作为一种人生重聚的方式。”

那天下午，我还真的见到尼尔松先生的弟弟。他们有着一样的蓝眼睛，一样高得有点滑稽的鼻子。

在《世上只剩我们俩》里，5岁的小男孩误以为爸爸妈妈死了，他决定要照顾自己的小弟弟。他制定了周详的计划，用木棍盖了一个白色小房子，用纸板箱做了一个小电视机，自己表演节目给弟弟看。还跟邻居借了鸡蛋，做了蛋糕……

这是他们小时候发生的真实故事。50年后，当他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他们老了，不能走路了，然后死了，而我们已经能够照顾自己。当年我的难题也不再是一个难题。”

“现在，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独自留在这世上。但我会照顾你的，会把您照顾得很好、很好的。一切都会和以前一样。”当年的小哥哥对小弟弟信誓旦旦地说。

“毕竟，时间会消解很多难题啊。”在离家万里的北京，在胡同小院的树荫下，60多岁的一对兄弟一边喝啤酒，一边相视而笑。

“我觉得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思考这些问题。如果灾难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对孩子来说，最大的灾难莫过于爸爸妈妈消失了。”

虽然从瑞典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滑稽的情境，因为就算一个孩子真是失去了父母，仍然会有人照顾

他们，亲戚、社区，瑞典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儿童福利制度……多年后，他到柬埔寨旅行，发现自己童年时代最恐怖的噩梦在这里却每天都在发生——两个孩子被剩下来，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你必须直面它，做点什么。”他的眼神里有忧伤，也有无能为力的愧疚——他能做什么呢？

乌尔夫·尼尔松从19岁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创作了100多本书，尝试过各种类型、文体与形式，拿过瑞典儿童文学的几乎所有奖项。他的很多作品曾经被改编成歌剧、电影、广播剧、儿童舞台剧，甚至邮票。

他年轻的时候受左翼思潮影响，对社会问题充满兴趣，关心公正、平等、世界和平，也曾试着写严肃的长篇小说，但他说自己缺乏足够的体力、耐力和专注力。他写过两本成人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聊到死”。

在他的儿童小说中，却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生硬的政治性。在那些以豚鼠、兔子、小猪和小孩子为主角的故事里，你能感受到他对生命最细腻、微妙而动人的描绘。

他喜欢以小动物为主人公——“我想让人们知道它们是多么的可爱。我刚养了两只猫，一只足窈窕淑女，格调优雅，另一只却是粗鲁奔放，充满活力，它用爪子吃饭，喜欢踩我们的肚子。如果你了解一只猫，你会看到它身体里住了一个人的灵魂，那么可爱的一小个人儿。”

“生命如此珍贵，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表达。”他说。

他最近正在构思一个5岁的小女孩想要成为一只猫的故事，因为她想要一根尾巴。她开始吃猫食，因为哥哥说吃了猫食就会变成猫。她想要进入一只猫的大脑，她想知道猫在说喵的时候，真正说的是什么。她想知道，当一只猫坐在窗口凝视窗外时，它在想什么，它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他认为童年是做这些思想实验最好的时候。然后，他又给我布置了一个思想实验：“从现在开始，你走到街上，遇到第十个男人，无论年龄、职业、美丑，然后你要嫁给他，跟他度过余生。你觉得你能爱他、尊重他，在他的身上看到善意与智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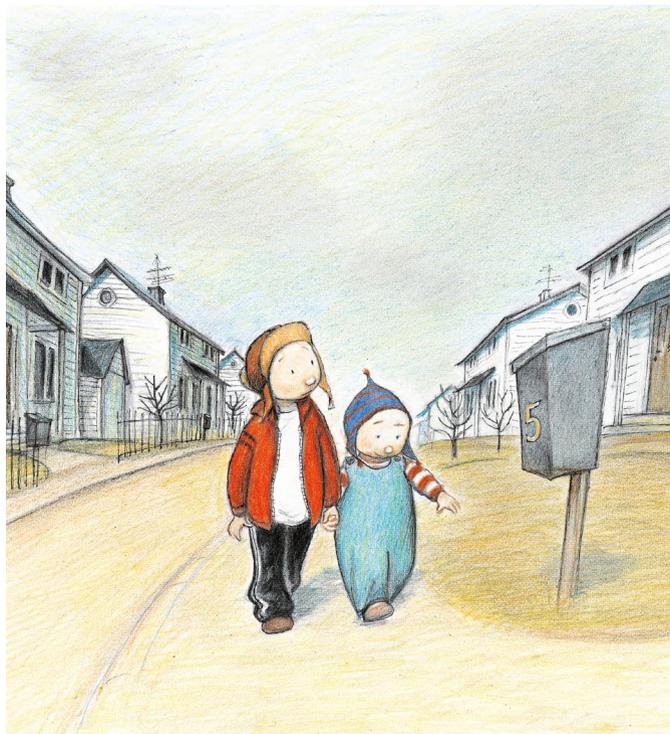
善意是一个如此深刻的问题，每一种宗教都在谈



作者介绍：

乌尔夫·尼尔松 (Ulf Nilsson)：生于1948年，瑞典作家。主要从事绘本、童话及青少年文学的创作。自1998年开始任瑞典儿童读物文学院院士。该院成立于1989年，任务是促进优秀儿童及青少年文学发展，院士由儿童与青少年读物的作家和插画家构成，共18个席位，为终身制。

乌尔夫·尼尔松所著的书超过100种，其中引进中国的包括《最美的葬礼》《奶奶所有的钱》《当世上只剩我们俩》《爸爸和我》等。



上图：《奶奶所有的钱》插图

下图：《当世上只剩我们俩》插图

论它。“你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善的一面吗？每个人都有爱吗？你相信每个人都有智慧吗？”

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讲一只小老鼠想要改变世界，它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善意，然后他遇到一只可怕的大田鼠，坑蒙拐骗，尽做坏事，大家都怕他，唯独小老鼠不怕。最后，他安排了一个非常乐观的结尾，让小老鼠在这只又丑又坏的大田鼠身上找到善意、悲

伤与智慧。

“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故事：一个有趣的故事，很幽默，但又可以启发孩子去思考一些大的问题，存在主义的问题。比如人活在世界是做什么的、社会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会活着、如果我们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死亡是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主题。什么是死

亡？我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会疼吗？

《再见了，松饼先生》是他最著名的一本书，曾经得过奥古斯特奖（瑞典文学的最高奖）。松饼先生是一只豚鼠，他的主人是一个7岁的小姑娘。在瑞典，7岁是上学的年龄，所以人生对她来说刚刚开始。松饼先生也7岁，但已经很老很老了，生命即将终结。

小姑娘给豚鼠写信：“松饼先生，你怎么样？爸爸说你快死了。也许死亡没那么难。你会去到祖先们在的地方。”

她每次都把信放在松饼先生的小邮箱里，信里总是夹着杏仁，那是松饼先生最喜欢的食物。

豚鼠每次开信箱，吃杏仁，连信一起吃下去。她觉得它已经明白了她的信。

最后，松饼先生死了。他们将它安放在小小的鞋盒里，举行了盛大的葬礼。鞋盒里放着小姑娘的最后一封信。“松饼先生，现在你已经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了，但我还不知道。”

这是一个温暖、悲伤和充满尊严的故事。他喜欢以拟人化的方法谈一个孩子生命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和难题，但他的故事总是设置在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环境里。然后有些事情发生了，主角突然得到瞬间的顿悟，对这个世界有了某种清澈的理解。这种“瞬间的清明”来得有点魔幻主义，但仍然在现实的范围之内。

《再见了，松饼先生》一开始只印了3000册，因为出版商觉得死亡是童书的禁忌话题。但最后卖掉了10万册，是他最畅销的作品。教堂邀请他去演讲，他突然间成了某种死亡专家。

“当一个孩子面对了小豚鼠的死亡，就能更好地面对祖母的死亡。”他说，“所以，父母应该和孩子谈论这些问题。这种对话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起点。”

“对我来说，一切是从我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开始的。

小时候，我害怕父母死了，只留下我和弟弟两个人。后来，我长大了，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又开始害怕有一天我死了，而我的孩子还没有成年，孤零零的一个人留在世界上。所以，写这些故事，是我自己面对恐惧、处理恐惧的方式。我曾经那么害怕死亡。但现在我不怕了。”

在他看来，童年是人生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阶段。他仍然记得自己小时候的许多恐惧和焦虑，除了死亡这种终极性的恐惧之外，还有很多琐碎日常的恐惧、焦虑与不安，比如舞台恐惧症，他至今记得幼儿园要表演节目的时候，他怕得整夜睡不着觉，后来他发现这是很多孩子共同的恐惧。

7岁那年，他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当我20岁的时候，我得穿着西装去餐厅吃饭，找到一个未来的老婆，我得跟她跳舞，然后我还得跟她回家，开始一个家庭。也许，我还得买一辆摩托车。那将会是人生里很艰难的一个时刻吧。”

一个小男孩秘密地想象和焦虑着成年人的千愁万绪，因为每个人都告诉你，长大了你得娶老婆，你得当医生，你得会开车……“我能做这些事情吗？我能做一个成年人，有职业，有妻子、有孩子，装修房子、计算税单吗？”

以前，祖父母会给孩子讲故事，谈论这些事情，但现在祖父母参与孩子的生活越来越少了。作为作者，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给孩子提供这些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写作毫无意义。”

现在，他喜欢听TED演讲，每天听一点，觉得有一整个世界可以去发现，只要你有好奇心。不久前，他刚刚听了一个植物学家的演讲，说植物会互相之间发送信号，大树会将“智慧”传递给小树。“如果植物在互相对话，那么我们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世界如此美好，而我们连一半都还未曾理解。”



《被狐狸追》插图

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1）

文 / 朱伟



王安忆上世纪70年代在上海家中

王安忆第一篇给我印象深刻的小小说是《雨，沙沙沙》，发表在1980年《北京文艺》上。在1980年的语境中，它干净、单纯、清新、秀气，就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雯雯在一个雨夜的向往。不是在深深的雨巷，就在飘着细密雨点的马路上。故事非常简单——她犹豫不决地退了两步，就有意错过了末班车，内心在等待曾在雨中带她回家的那一位。她走在雨中，那个他最终并没有出现，但王安忆只用雨中橙黄色的灯光一个意境，就娓娓完成了感人的叙述——那个雨夜，坐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自行车后座上，沐浴在一个橙黄色温存的世界里，她就觉得一切戒备都是多余的。这个雨夜，他无须再出现，她走在橙黄色温存的回顾中，就像走在梦里。有了梦，才有了生活的美好。

记得我被这篇简单的小说感动后不久，就贸然

给王安忆写信了。那时她在《儿童时代》当编辑，我知道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那个小战士枪管里插着的野菊花，那床新媳妇献出的枣红色白百合花的被子。曾经在山里拖毛竹的农村小战士当然不会有往枪筒里插花的趣味，乡村小媳妇也不会懂白百合花的雅致，但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荒烧得暖烘烘的土炕上，《百合花》的情调就曾那么强烈地感染着我们。也许是那个缺少色调时代的渴求使然吧。我至今记得那个新媳妇一针针默默地给死去的小战士缝好衣服的细节，至今都不觉得情节或意境的人为。那是因为茹志鹃叙述的氛围是真实的，黄菊花、白百合花，在那个年代，也是梦吧。下乡时还读过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写“我”与一位沉默寡言的大姐在战争中的感情，战后去大姐家乡寻找，找到的是一位同名同姓，热情洋溢在养兔中的姑娘。情节毫无引人处，挺拔的高高白杨树的意象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我对这种树也有了某种情感。我以为，茹志鹃深深影响王安忆的，不仅是百合花、白杨树这样的诗意结构，还有在淡淡细密叙述中蕴涵的那种味道。我喜欢她的小说，就从这味道始。女儿的叙述细腻度高于母亲。

我向王安忆约稿，她很快寄给我《庸常之辈》，写街道作坊里，下乡回城的，一个只本分地守着自己一方卑微天地的普通女工何芬。她认清小户人家只能配小户人家，于是男朋友与她一样没地位，没房子；将自家厨房改作新房，也要反复求房管所去贴冷脸。她不会吵闹，甘于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于是每天都被分配做吃力、指标又高的活。但她又立志活得不让人瞧不起，她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嫁妆，要让自己不差于别人，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王安忆写她在意自己的婚礼，是因为“也许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以她为中心，为角主”，而在别人的生活中，成为中心的可能就太多了。在上海弄堂里，要面子的女孩当然很多。但像这样，尽自己本分，实实在在守护自己自尊的，自然不多。结尾，王安忆写她，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打发走了疲劳的一天”，熟睡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只占了个很

小很小的位置”，是“庸常之辈”。但认真占好这小小的位置，其实又闪烁着暖暖的光芒。王安忆刚起步就是这样：甘居一隅，静静的，在一个并不宽敞的空间里，以细细的笔触，淡淡的情调，写一点小女子身上的触动人处，在不大的格局中寻找一种充盈。

《小院琐记》是她刚起步时写得最好的一个短篇。小院是歌舞团宿舍。同是知青身份，舞蹈队的李秀文，因漂亮而嫁给文化局局长的儿子，就住上了小院里最大的房子，有了优裕的生活。但优裕是否优越呢？小院里的贫困代表老姜夫妇，就天天为五角钱吵架，安逸的生活毕竟令人向往。有意味的是，安忆以叙述者桑桑的视角接近李秀文，以最大、最富丽的房子对比厕所边最小的房子，是为了以李秀文对比在团里默默无闻、像“泥土一样”的小木工。王安忆要表达两种不同选择的不同价值，而她又以精神简单对立物质，这就构成了叙述者桑桑情感的复杂性。小说中的亮点是，桑桑看到小木匠夫妇拥有的财富——箱子里珍藏的好几包“两地书”，启蒙了她自己的价值观。其中最珍贵的一包是在一个集体户里，两人的通信。我不知道这些“两地书”是不是安忆自己的。王安忆下乡两年就考进了徐州文工团（后改为歌舞团），我原以为她吹长笛，后来才知道，她先拉手风琴，后改拉大提琴。“两地书”在那个年代，确是很多文学青年爱情的寄托。1976年我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改稿，浙江金华有一位胡姓作者，是中学老师，就曾津津有味地说他们学校某老师的热恋通信，装订成三大卷“两地书”，第一卷名《相识》，第二卷名《缠绵》，最后一卷是《婚后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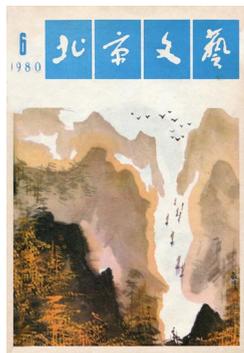
王安忆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应该是1981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本次列车终点》。“本次列车终点”，应该是当时所有上海知青的一种共鸣。回上海，似乎都是清早。过了苏州，那种欢悦似乎都会使呼吸变得急促。随着上海越来越远，所有车窗玻璃都被拉开，人人都趴在窗口，享受着久违的家乡的风的沐浴。过了真如，列车骄傲地在轨道间缓行，所有人似乎都会冲着回到上海喊两声，这就是“终点”。而离别

呢？似乎都是夜晚，车缓缓驶过“早桥”，大家都是默默望着窗外，眼看着上海的灯光一点点被甩向远方，车窗外展开无边的黑暗……小说开头，王安忆的描写，接站喜悦地跟着火车跑，离别悲伤地追着火车跑的情景，在我们心里，都是软软的共忆。

终于回来了。在农村日思夜想，上海是美好的象征，思念的寄附，是理想。但真回了上海，又觉得这里其实已经不属于自己了——陈信顶替母亲上班，是占了本属于弟弟的位置；与弟弟共睡一张床，是占了本属于弟弟的空间。而哥嫂更担心，他一旦结婚，就要侵占他们的空间。原来的美好思念一旦变成现实，却被残酷意识到，上海的“鸽笼”“口琴格”里，你原已没有了位置。这空间你本已经让出了的，现在你却要收回来，给大家都倍添烦恼。这大约是多数回城知青，刚回城共同感觉的悲哀——原来的思念虽然熬人，毕竟温馨；到了“终点”，思念没有了，只有悲凉。那时候，每个城市，每户人家几乎都是三代同堂，拥挤在人均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没有住处，没有工作岗位，曾经的艰辛没人认可，到处是嫌弃、鄙夷的目光。下乡前拥挤在一起暖融融的记忆，现在都变成赤裸裸的刺痛。王安忆以这样的角度开始她的知青叙述，自此开始她的知青社会身份思考。实际上，无论雯雯、何芬、桑桑还是陈信，王安忆关心的，都是他们与现实的关系。☒（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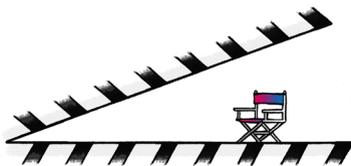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雨，沙沙沙》



《雨，沙沙沙》最早发表在《北京文艺》1980年第6期

导演呢？

文 / 谢大刚 (Dagan Shani, 以色列) 图 / 陈曦



“导演呢？导演在哪儿？”小伙子从化妆室跑进摄影棚里来了。

左看张艺谋不在，右看贾樟柯也没有来探班。

现在小伙子往我的方向转头，眼睛好像闪烁出什么，全身往我的这里转动并且果断地走过来。毫无疑问他想要的东西就在我这块儿，可据我所知冯小刚不会躲在我椅子后面玩捉迷藏，旁边厕所里刚冲水的人应该也不会是陈凯歌。小伙子走到我眼前说：“导演。”他毫无疑问是在对我说的：“导演，演员已经化好妆了。”他显然有些紧张，在他的声音中我多少能听出他对我的敬佩。

我被叫过很多称呼：原名、中文名、“哥们儿”、“先生”、“亲爱的”、“谢老师”、“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的”，等等。

“导演”却最让我听不习惯。虽然我做的工作确实符合词典里对“导演”这个词的一些描绘，我一听“谢导”，就有立刻克制回答“不敢当不敢当”的冲动。

估计是因为我对“导演”这个词的认识是来自别的时代吧。二三十年前，“导演”这个词跟现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你基本上只能用胶片来拍东西，而胶片又如此的昂贵，在那个资源只控制在少数人手里的时代，导演是值得被敬佩的艺术高管。那个时候导演一说“Action”，摄影机胶卷旋转出的“卡拉卡拉”声就是金钱流失的声音。拍摄中剧组里任何小失误都会导致直接的亏损。而现在呢，遇到话筒穿帮了、演员心不在焉忘了词儿什么的，你迅速喊出“再来一条”就解决问题。场记打板前大声叫“第27条！”我已经听了不止一次。虽然我没有系统地统计过，我猜过去拍摄中出现咳嗽声比现在少了很多倍，而且这一定不是因为咳嗽药有惊人的进步。数字技术给我们增加无穷的拍摄材料，在让我们更加轻松的同时，也多加几分不负责任，在这个时代做导演当然没有在容忍不了错误的胶片时代那么难。

数字时代也把资源大批大批地分给大家，这意味着很多原来没有机会摸到摄影机的人突然可以用视听语言来表达自己，很多天才有机会被发现了，让电影从只有极少数人干的专业变成非常的普遍。过去导演是报纸上和走红地毯的那个人，遥不可及，你在生活中基本上遇不到的；而现在导演没准就是在咖啡厅坐你旁边聊洗发露广告策划的那个人。北京有不少咖啡厅估计导演比服务员还多。

胶片时代毕竟还没有走了多久，所以数字时代对“导演”的含义并没有完全把之前的意思抛掉。有可能是我个人过于敏感吧，可是我确实能在每一个叫我“导演”的人的声音和眼神中感觉到一些多余的敬佩，估计是因为一说出“导演”他眼前隐隐约约出现斯皮尔伯格、金基德们的样子。

虽然从事导演工作的群体这几年里发生了畸形的繁殖，可是这一行毕竟曾经拍过《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罗生门》。“导演”因为各种杰作所获得的荣誉并不会被无数烂电视剧、网络剧和小广告的导演给灭掉。换句话说，现在每一个拍小广告的人（包括我在内）每次被称呼“导演”其实都在沾那些张艺谋、黑泽明们的光。

“演员已经化好妆了。”小伙子看我，他静静地看我，耐心等着我的回答。我知道他对我的敬佩跟我个人没有关系，其实那是他对电影历史的敬佩。大师们努力了100多年为这门艺术争取到荣誉，我就凭借“导演”两个字来收获。“OK, thanks, I'll be right there.”我用英语回答，说马上去。此刻他脑海中既然看到的是斯皮尔伯格的形象，我可不想把他的幻觉那么快就给破坏了。☑